

K827.7
81
2

熊 克 武 传

周富道 马宣伟



重 庆 出 版 社

1989年·重庆

B 631547



孙中山先生的忠诚战友、著名的民主革命战士、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者熊克武先生。

一九五零年

主席



特此通知

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第八次會議通過任命熊克武爲
茲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
府字第2149號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

府字第
5039號

茲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任命熊克武為
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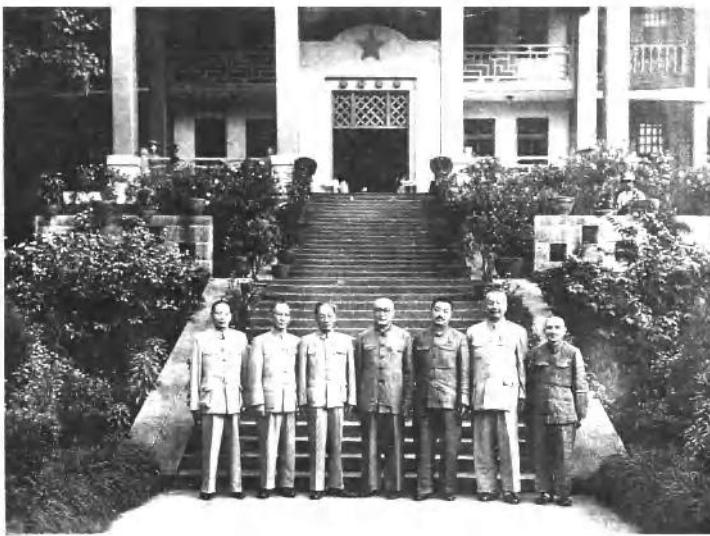
特此通知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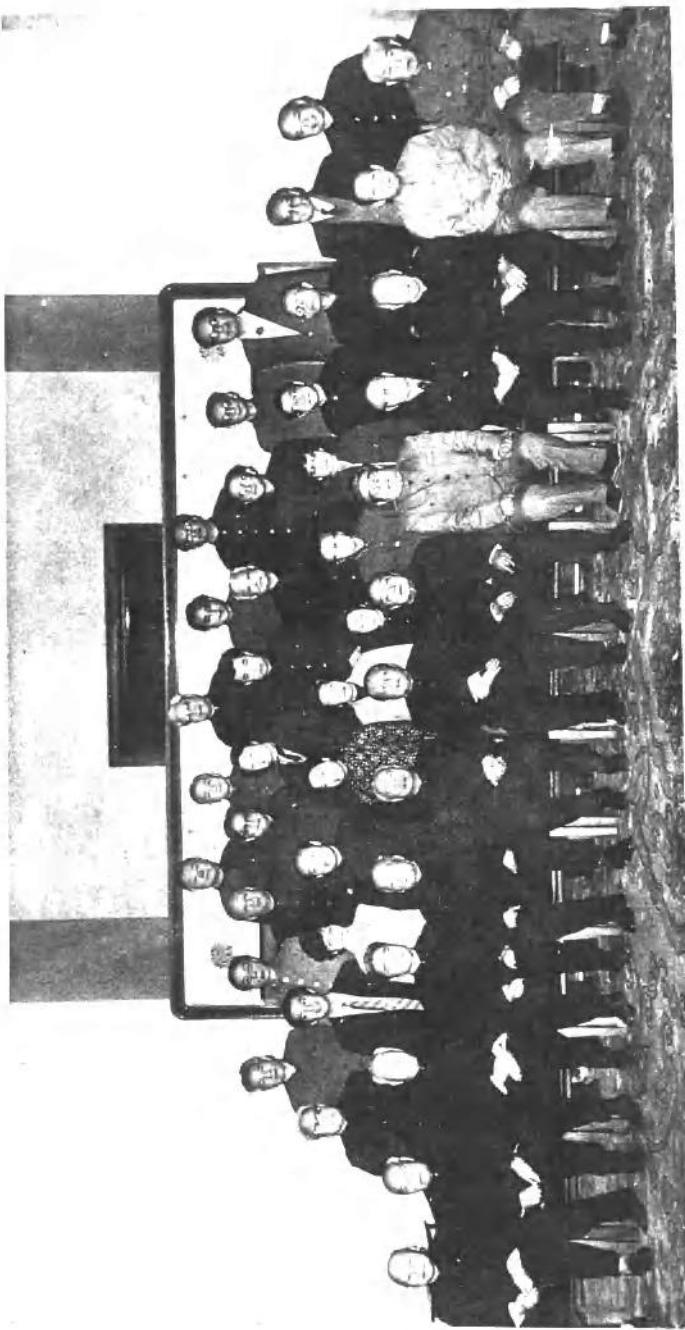
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熊克武为西南行政委员会
副主席的任命通知书。



1950年熊克武先生在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与刘伯承主席，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副主席等的合影。左起第三人为熊克武先生。



熊克武先生与家人合影。前排中是熊克武先生原配夫人陈静芬，后排右起第一人是熊克武，第二人是熊克武的女儿熊凤翔，第三人是熊克武的女婿李家荪。



1985年12月26日在熊克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
中央领导同志杨尚昆、习仲勋等与熊克武先生的亲属及部分
与会者在人民大会堂的合影。



熊克武先生1908年（23岁）摄于日本东京。



熊克武先生1915年
(30岁) 摄于日本东京。



熊克式先生被扣虎门
17个月无罪获释后养病期间
留影（1927年）。



熊克式先生1942
年（57岁）摄于武汉。



熊克武先生在1964年12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三届时
一届会议上。

熊克武手迹

克武謹誦 先生遺殮 覺先生之精神
蓋足炳耀千古今直祭奠日以淚和墨告成
同志曰 先生往矣竊願相与再援再厲
奉良心主張為主義奮鬥究竟
先生未竟之志謹以此遺屬書紳共
仰承勉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六日同盟會員熊克武〇

熊克武手迹。

淺嘗輒止 深思遠慮
經常考慮別人意見修正
補充自己意見去掉固執
與偏見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一、家世坎坷	1
二、勤苦读书	3
三、不断觉醒	5
四、东渡日本	11
五、投身革命	13
六、愤然回国	22
第二章 奉命返川，组织起义	27
一、草堂议事	27
二、迭败迭起	29
三、名震川北	40
四、嘉定悲歌	46
第三章 广州起义，九死一生	59
一、筹备起义	59
二、血战粤城	63
三、死里求生	68
第四章 组建蜀军，率师返川	72
一、奔赴陕、鄂	72
二、组建蜀军	74
三、率师返川	81
第五章 兴师讨袁，沦落海外	90

一、挥师西指	90
二、全川震响	95
三、忍辱出走	99
四、沦落海外	102
第六章 护国反袁，胜利返渝	109
一、奔赴云南	109
二、进军四川	116
三、胜利返渝	131
第七章 响应护法，主持川政	136
一、左右逢源	136
二、矢心护法	143
三、主持川政	147
第八章 同志成仇，血战千里	159
一、同志分道	159
二、联军会议	162
三、川东烟案	170
四、投靠云阶	172
五、战在眉前	174
六、血战千里	181
第九章 韬旋川局，奉命讨贼	192
一、倡导自治	192
二、运筹援鄂	199
三、击溃刘湘	201
四、川战重开	212
五、奉命讨贼	214
六、讨贼失败	222
第十章 组建联军，被囚虎门	228
一、组建联军	228

二、策划北伐	232
三、中山逝世	236
四、奔赴广东	241
五、被扣虎门	245
第十一章 抗日反蒋，迎接解放	255
一、不忘国事	255
二、坚持抗战	260
三、迎接解放	266
第十二章 新的历程	272
附录 在熊克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仲勋)	283
后记	286
附记	287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家世 坎 塚

四川井研县东北，是由成百上千座形似馒头的小山组成的丘陵地带。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山坡上，山坳里，是密密麻麻的簇簇竹林，片片桑树，间杂着笔直挺拔的松树和柏树。站在井研万山之祖的巍巍乌抛山，俯瞰这片丘陵，宛如一片无边无际、波涛翻滚的墨绿色林海。在这林海之上，山峦之间，飘荡着一条长长的玉带，“斗折蛇行，明灭可见”，那便是井研龙尾溪。在距井研县城30里与仁寿、荣县交界的弯弯龙尾溪畔，苦茨丘下，是一条狭长的平地，叫盐井塆。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国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和爱国主义者熊克武(字锦帆)，便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据光绪二十六年《井研县志》记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江西的刘、李二姓，湖广的杨、曾二姓，带着一群群衣衫褴褛的移民，肩挑背扛，扶老携幼，先先后后来到这一带风光旖旎，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盐井塆建立了一座有70余户铺民的盐井镇(即今研经镇)。

在这群移民中，有一个身材中等、手脚壮实、腰围粗圆、皮肤黝黑的20来岁的青年锡匠，他是从湖南麻阳挑着一副担子，一

头装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和几样破旧的衣物，一头放着锻铸锡件用的工具，带着妻子来到盐井垮的。来到盐井垮后，他便砍了些竹子，搭了一个简陋的勉强可以栖身的竹棚住下来。他就是熊克武的先祖，从此熊氏家族便世代居住在这里。

熊克武的先祖曾规定，熊氏家族每一代人必须有一个是锡匠，以承继祖业。可是到了熊克武爷爷这一代，已没有一个是干锡匠活路的人了。

熊克武的爷爷以经商为主，在场上开有一个栈房，取名长兴店，兼卖茶饭，生意颇为兴隆，算是场上的小康之家。

熊克武的父亲熊宝周，号治平，兄弟四人，排行第二。他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为人忠厚宽和，在镇上开有一个中药铺，取名长发店。他医艺高，态度和蔼，每天总有许多人围着请他看病；对拿不起脉礼钱的穷苦人，他不但免费看病，还施舍药物，因此很受当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熊克武的母亲邱氏，身材修长，身体单薄，16岁便嫁到熊家。开始接连生的三个都是女孩子，以后好不容易才盼着生下一个儿娃子，可是生下不久便死去了。直到1894年，熊宝周夫妇才得一子，取名克成，意思是一定能够长大成人。

接着第二年(1895年)，邱氏又生下一男孩，取名克武。克武一来到人世就很不幸。这年井研继续闹旱灾，连续10个月无雨，田土龟裂，溪水断流，老百姓整夜整夜地从岩石缝里候点滴水维持生命。家境稍好一点的熊宝周家每天也只能吃上两顿用包谷、红薯碾成粉，和上豌豆秆、胡豆叶煮的稀粥充饥。邱氏仅有的一点奶水喂了克成便没有克武的了，熊克武很难吮吸到一点妈妈的乳汁，经常吃的是米粥或包谷、红薯粥。直到晚年，熊克武还说，由于幼时稀粥吃得太多，以后只要一见稀饭就难以咽下。

熊克武从小就热爱劳动，从五六岁开始，他晚上便和几个姐姐一块包豆腐干，第二天天麻麻亮，他便端着满满的一筲箕豆腐

干到场口去叫卖。

入春后，他卖完豆腐干，便背着背篼和哥哥一同上山摘桑叶喂蚕。空了还帮着体弱的母亲煮饭，打杂。

二、勤苦读书

熊克武八岁时开始在镇上的熊氏祠堂发蒙读私塾。

熊宝周要求子女很严格，主张对孩子从小就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认为这样长大了才有出息。

熊克武刚满10岁，熊宝周便把他和克成转到离家10多里的石牛埂廖家祠堂念书。

每天天不见亮熊克武便和克成一块背着书囊上路了，要到天黑才能回到家里，中午就在学校吃带去的包谷粑和煮熟的红苕。学习负担很重，生活清苦，但熊克武却毫无怨言，一天到晚，他专心背书、破讲、习字，希望能考上秀才、举人，光宗耀祖。

过了半年，熊宝周又把熊克武两兄弟转到离家20多里的易灵寺去读寄宿。

易灵寺座落在钵儿山下，有学生40来人，多是寄宿生。在这里执教的陈锡周先生治学严谨，对经学和文字学很有研究，尤喜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屈原、陶渊明的诗文，写得一手好字。他思想比较开明，崇拜康有为、梁启超。熊克武坚实的古文基础和毛笔字功力，均得力于陈老师的教授。

陈老师除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外，还选韩愈、柳宗元的文章让学生读，有时还让学生读点陶渊明的诗文。

熊克武刚到易灵寺读书，便接二连三传来中日甲午战争的败讯，以后又传来李鸿章到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

不久，陈老师兴奋地告诉同学们，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

邀集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2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刷新政治，针对日军的侵略，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并说，国难见忠臣，康先生真了不起，我们中华民族有救了！

井研四面皆山，是一个很闭塞的地区，年仅10来岁的熊克武对井研以外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来到易灵寺念书，便听到了什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康有为上书等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闻。特别是陈老师的话对他震动很大。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形象，开始在他思想上动摇了，他感到中国军队不行，清政府无能。他十分崇拜康有为敢向皇帝上书的勇敢精神，立志长大了要做一个像康先生那样有学问的改革家。

从此，熊克武学习更加刻苦努力。放学后，走读学生都回家了，寄宿生有的到大殿里去捉迷藏，有的到断墙下边去捉蟋蟀，大一点的同学则在钵儿山一带散步漫谈。而熊克武常常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专心一意读书。老师教给的知识，他不仅能及时掌握，而且经久不忘，不管什么时候问他，他都能对答如流。

一次，熊宝周到易灵寺拜望陈老师，询问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陈老师坦率地对熊宝周说：“锦帆读书就像麻绳子拴钱一样稳当，是一块读书的材料。而克成贪玩好耍，心性浮躁，恐难学有所成。”

熊克武在陈老师的熏陶感染下，也很喜欢读陶渊明的诗。他既喜欢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闲情淡泊的生活，更喜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倔强性格。这对熊克武叛逆性格的形成，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1898年6月21日，清帝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自上而下进行改革。

这时，熊克武仍在易灵寺念私塾，他从陈老师那里听到变法的许多进步措施，感到国家富强有望。

过了三四个月，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慈禧太后动用刀兵，把

光绪皇帝抓起来了，正在通缉康、梁，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在这段时间里，熊克武特别注意从北京传来的消息，特别注意打听康、梁的下落。

一天，陈老师噙着眼泪告诉学生，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刘光第、杨锐等6个维新志士于八月十三日（旧历）在北京南城菜市口惨遭杀害。

听到这噩耗，熊克武抱头痛哭了一场。

也在这一年夏秋，沱江爆发特大洪水，资中、资阳、内江、富顺一带灾情惨重。熊克武经常看见一批批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的难民，三五成群，扶老携幼地来到易灵寺乞食。易灵寺的长老在庙门口摆了一个大黄桶，给乞食的难民每人舀两瓢稀饭，算是阿弥陀佛，大发慈悲。有的难民还没走拢庙门便倒在路上，活活地饿死了。其情其景，真是惨不忍睹。

熊克武的母亲也在这时病故了。

年仅14岁的熊克武，从这急剧变化的政局中，从灾民们的悲惨遭遇中，从自己母亲的早逝中，深深感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激起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三、不断觉醒

就在母亲病逝的第二年，熊克武听说荣县方家冲但氏办的书塾请了个具有反满思想的好先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他说服了父亲，辞别了陈老师和克成兄，于1899年初转到方家冲但氏办的私塾念书。从此他与但懋辛结成终生好友。

但懋辛的父亲是这一带很有名望的大地主，家室殷富。但氏私塾就设在但懋辛家。

在但氏私塾任教的是吴蜀筹老先生，他是引导熊克武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吴老先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热

情。他的哥哥吴蜀尤，字嘉漠，是清末举人，四川都督赵尔丰手下的红人。对这样一个效忠清王朝、丧失汉人气节的哥哥，吴先生十分憎恨，曾发誓说：“不杀吴嘉漠，不足以谢天下。”吴先生学识渊博，对学生要求既严格，又能循循善诱。为了启迪学生的民族意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经常有意识地给学生讲宋末、明初的历史，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常常讲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还爱给学生们讲项羽、刘邦的故事，每次讲完，总要发表一番感慨，高声吟诵杜牧《题乌江亭》中的“江东才子多俊才，卷土重来尤可知”的诗句，把推翻清王朝的希望寄托在年轻学生身上。吴老师还要学生抄写有关反抗元、清异族统治的文献，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让学生了解异族入侵时，残酷屠杀、掠夺汉族人民的血腥罪行，教育学生不忘民族的奇耻大辱。

《扬州十日》是王秀楚所记自己亲身的经历。他亲眼目睹并记下了1645年4月25日扬州城陷落至5月5日的10天中，兽性大发、穷凶极恶的清兵血洗扬州的惨景。熊克武在抄《扬州十日》时边抄边流泪，清兵血洗扬州城的惨景，历历如在眼前。

熊克武最爱听吴老师讲夏完淳的故事。

夏完淳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复明小英雄，他5岁读完了《五经》，8岁会作诗文，9岁写出了一本诗集，取名《代乳集》，被人称为“江左神童”。他忠于大明王朝，仇视异族侵凌，胸怀故国，立誓抗清，15岁就跟随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岳父钱栴一道，联合一批抗清志士，发动了反清复明的武装起义。从此转战江南，喋血疆场，与强敌周旋，累败累战，从不气馁，直到最后兵败被俘。大汉奸洪承畴曾多方诱降，均被夏完淳断然拒绝。1647年夏完淳在南京英勇就义。

夏完淳英勇抗清，顽强不屈，大义凛然的动人事迹，感人至深。血气方刚、忧国忧民的熊克武，对夏完淳悲壮的一生十分景

仰，立志要做像夏完淳一样的民族英雄。

他非常爱读夏完淳的诗文，曾反复吟诵夏完淳写的《即事》、《别云间》、《由丹阳入京》、《狱中上母书》等，并把它们工整地抄写在笔记本上，作为勉励自己的座右铭。

吴老师的教育和启迪唤起了熊克武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他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热情。

受当时哥老会秘密结社的影响，为了加强同学间的联系，熊克武串联志同道合的刘均斋、但懋辛、程洛川、吴慎武、宋维章、程长奕和戴峨牲结为兄弟。

在阳光明媚的初夏的一天，这八个小兄弟鱼贯来到静谧的但家河畔竹林中，点上几柱香，然后朝拜天地，共同发誓：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刘均斋年长，被推为大哥。

这群小兄弟经常在一起阅读《时务报》，还经常探索救国方略。戴峨牲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列强的欺侮，主要是经济落后，主张发展工业；吴慎武认为，主要是当官的无能，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刘均斋认为主要是文化落后，主张教育立国；熊克武则认为，主要是国防太弱，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改造绿营兵，改进武器装备。大家讨论十分热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但氏院子有个看门人，姓王，约60来岁，他阅历深广，对学生们很和善。熊克武八兄弟经常围坐在王大爷身边，听他谈古论今。

一天，王大爷神秘地问熊克武八兄弟：“你们知道大足的余蛮子不？”大家摇摇头说：“不知道。”

王大爷小声对他们讲道：余蛮子，叫余栋臣，他肩宽腰圆，力大无穷，天不怕，地不怕。前几年大足龙水镇的洋教士作孽，打死百姓，烧毁民房，奸淫妇女。余蛮子气不过，领着众兄弟打进龙水镇教堂，杀了洋教士，烧了洋教堂，为老百姓出了气。朝廷也太不象话，反而站在洋人一边，派了大批绿营兵围剿余蛮子

的队伍。余蛮子在大足西山一带和绿营兵斗了好些日子，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兵捉住了，给他戴上脚镣手铐，把他关在荣昌城里的牢房里。他的弟兄们个个能飞檐走壁，听说就在前几天晚上，把他从大牢里劫了出来，还抓走一个法国教士。余蛮子扬言，要把所有的洋教士杀光。事情还不知道怎么了结呢。

听完了王大爷的叙述，熊克武脱口而出：“余栋臣真行！给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1900年，刚满15岁的熊克武和刘均斋、程洛川、吴慎武、谭敬夫怀着读书做官，做官报国的天真想法，告别了吴老师，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资州考秀才。

他们到资州已是半下午，住宿安排好后天已晚了。刘均斋、程洛川、吴慎武三人上街找饭吃；熊克武和谭敬夫两人前往西街状元府铺子买笔墨。铺子里另有几个考生也在买纸笔，有一个差役买东西，他把灯笼放在货柜上，有个考生不慎把灯笼撞落在地上。这差役不问青红皂白，对这个考生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硬要这个考生赔一个新灯笼。熊克武实在看不下去，便走上前去和这个差人讲理。蛮不讲理的差役又给熊克武两耳光。熊克武忍无可忍，和这差人扭打起来，其他考生一拥而上，一起把这差役痛打了一顿。差役狼狈不堪地跑去向主考官诉苦，要求惩办凶手。

主考官也不问情由，马上赶到考生寄宿的地方召集全部考生点名，共约30多人未到。主考官认为这些人均属闹事分子，当众宣布取消他们的考试资格。

主考官刚一宣布，会场便闹开了，考生们都不服。主考官见情势不好，只好转个弯，叫考生第二天派代表去商谈。大家公推熊克武、谭敬夫两人为代表与主考官谈判。在谈判中，熊克武谈事实，说道理，弄得主考官无言以对，被迫允许这30几个人入场参加考试。虽然熊克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由于触怒了主考官，结果名落孙山。

通过这次州考，熊克武对官场的黑暗有了一定的认识。

参加州考回家后，熊宝周怕熊克武出事，把他转到井研陈家坳继续读书，老师是吴嘉让。

1901年7月(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不久，井研举人徐桐甫在井研县东城来凤书院的旧址办了一所高等小学堂，这是井研县的第一所新学堂。积极追求新思想的熊克武，不久就转到该学堂读新学。

徐桐甫是立宪党人，热心办学，具有革新思想，因此遭到井研守旧地方势力的大肆攻击和诽谤，县知事还将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董含章、宋梓园派到学校作学监。在此情况下，徐先生愤然离开了学校。熊克武和同学们也一块跟随徐先生离开了学校，以示对旧势力的抗议。学校因无学生被迫停办。

人心不可违。知县见此情状，只好在第二年又亲自去把徐先生请回来教书。徐先生回来时，四川总督府为了表示支持新学还发给了他委任书。于是学生又纷纷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知县见徐先生这次回来，来头大，得拉拉关系。一天，他派人带一乘八人大轿来接徐先生，请他到县衙门吃饭。当时徐先生正在改作文，他把笔一放，对前来接他的差役说：“徐老爷不去。他是举人，我也是举人，我这个举人比他更贵重。”熊克武目睹这一情景，十分敬佩徐先生的硬气。

差役杵了一鼻子灰，怏怏回到县里禀报知县。知县自讨没趣，对这事耿耿于怀，总想找徐先生的岔子进行报复。

8月，县城东门火神庙演戏，熊克武和但懋辛、程洛川、宋为章等人中午没有请假，偷偷地溜出学校由火神庙后墙翻入戏场厢房看戏。凑巧宋梓园家修房子，儿子刚结婚，他凭着自己的势力把家具全堆放在庙里，儿子和媳妇也一并安置在火神庙底楼暂住。熊克武在楼上看戏，忽然发现楼板有一个洞，正好看得见新媳妇。新媳妇住在庙里，是违反“庙规”的，熊克武灵机一动，心

想这下正好出宋梓园的丑，于是他故作惊疑，大声大气地喊道：“但懋辛、宋为章你们快来看新媳妇。”熊克武的话音一下传到了新媳妇的耳里，顿时羞得她满脸通红。许多看戏的年轻人也纷纷拥过来看这位新媳妇，大家七嘴八舌，吓得这个年仅十七八岁的新媳妇大哭大叫，直嚷：“不要脸！不要脸！”

宋梓园闻声赶来，气得脸青面黑，认为只有小学堂的学生才干得出这等胆大包天的事。他撵走围观的人后，便急匆匆跑去向知县告状。知县以为这下抓住徐先生的辫子了，急忙坐着轿子，带上大批差役，前往学校抓“调戏民女”的学生。

知县一进学校便对徐先生说：“你教的学生太不象话，竟敢在青天白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调戏民女。”

徐先生毫不示弱地把点名册扔给知县，叫他清点学生。徐先生见地上放着差役带来的刑具，十分生气，叫学生把它扔门外。

知县一点名，学生全部都在。

徐先生神情自若地对知县说：“既然我的学生全部都在学校，何以会发生学生调戏民女之事？这是对学校的栽赃！对学生的陷害！我很想听知县老爷公布一下事情的始末。”知县道听途说，便匆匆赶来，对事情的始末并不了解，因此无言以对，只得带着差役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熊克武抓住此事，在同学中鼓动说：“这是知县有意捣毁学校校誉。”同学们很气愤，派熊克武、宋为章、刘均斋、吴慎武等人为代表，前往县衙门找知县说理。知县拒不接见学生，只派了一个老衙役出来敷衍。代表们气冲冲地返回学校，把事情的经过向徐老师和同学们作了报告。

第二天，徐老师命学生着制服，整队到县衙门找知县说理。知县自知理亏，怕把事情闹大，只好硬着头皮出来会见学生，向学生们道歉说：“本知县，据县民稟告，未查虚实，前来责难大家，

欠妥，欠妥。”说完便退回衙门去了。熊克武对知县轻描淡写的几句搪塞语很是不满，坚持要继续留在县衙门找知县出来评理，并建议说：“如知县态度顽固，我们就罢课。”

徐老师怕把事情闹得太大学生吃亏，令学生整队回校上课。

此次学潮虽然平息下来了，但却启发了熊克武：县大老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他斗，就能取胜。官压民，也怕民。荀子说：老百姓能载舟，也能覆舟。不正是这样的么？

据研经镇老人吴旦成回忆，他父亲吴廷相（光绪举人）在这一时期曾在井研高等小学任教，是熊克武的老师。他说，锦帆的文章思路敏捷，视野开阔，议论风发，不同流俗，很“野”。

1902年10月，17岁的熊克武奉父亲之命和仁寿县观音桥（距盐井镇25里）的陈静芬结婚。

陈静芬（1885—1969）比熊克武年长半岁，父亲是私塾老师。她在父亲的长期教育薰陶下，略知诗文，性情温文，善良忠厚，而且善理家务，勤劳克俭，是熊克武的好内助。

四、东 渡 日 本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熊克武深感中国只有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才可能得救。以后，他又读到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张在《劝学篇》中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熊克武决心留学日本。

1904年初，政府在各地选拔官费留学生，这正合熊克武的心意，他兴冲冲地到县里报了名。通过考试，县里选拔了熊克武等24名成绩优异者前往资州参加初试。井研县初试合格的仅熊克武和刘均斋两人。不久，他俩结伴前往成都参加复试。

在成都的复试中，第一榜刘均斋是第10名，熊克武是第30名，两人都取了。第二榜刘均斋是第30名，熊克武是第50名，也取了。但在最后一榜，两人都落第了。即将变为现实的官费留学的美梦一下破灭，对他们打击很大。刘均斋含着眼泪对熊克武说：“算了。锦帆，我们还是回去吧。”熊克武却毫不动摇：“不。我决心要去日本留学，要去日本寻找富国强兵之道。”并说自己准备在省城找个临时工作，边工作，边补习，明年再考。

熊克武的叔父熊治宜是一个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工商业者。正好这时他运缫丝到成都来卖。熊克武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叔父，熊治宜夸他有志气，有出息，表示愿意资助他自费留学。

在叔父熊治宜的鼓励和资助下，熊克武于1904年春考取成都东文学堂(即东游预备学堂)，^①地址在打金街三道会馆。校长叫徐子休。同学有但懋辛、刘光烈、戴季陶等。

熊克武进入东文学堂后，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经常阅读《蜀报》、《渝报》等进步报刊；还常和同学们一块讨论国事，纵谈理想。

有的同学准备到日本学法律，有的准备学机械，有的准备学经济，有的准备学体育，熊克武的父亲则希望他学医。熊克武曾就这一问题与好友但懋辛、刘光烈一同进行了商讨。

他对刘、但说：学法律是热门，学经济利民富国，学医能救死扶伤。从振兴国家计，这些职业都很好，但我认为目前正值国难当头，清廷如此腐败，列强如此猖獗，国家如此羸弱，当务之急惟强兵才能救国耳。有志男儿应当效法岳飞、夏完淳、余栋臣，从戎报国。因此我决心去日本学军事。随即他吟诵了夏完淳《大哀赋》中的名句“国破家亡，军败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弦”。但、刘都很赞同熊克武的意见，他们决心一块走从戎报国的道路。

这年初冬，熊克武得到邹容(1885—1905)写的《革命军》一

书。这本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最全面、最系统地倡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名著。他如饥似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本近两万言的专著。那呐喊呼啸、犀利明快的文字，那“革命”、“革命”、“革命”的声声呼唤，像阵阵春雷在熊克武胸中炸开了花。刚合上书卷，那激扬的文字便在眼前跳荡：

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面对像铁一般硬，像钢一般坚的《革命军》，一股痛苦的自责之情阵阵涌上熊克武心头：我和邹容同为四川人，论年龄，我和他一般大小。可是他早已献身于革命，为唤醒民众，奔走呼号，写出了这样好的书。我呢？仍安居川西一隅，空想革命而无实际的行动，真是相形见绌，差之太远！

就在这年12月，熊克武怀着从戎报国之心，和但懋辛、刘光烈一同沿着邹容曾走过的路，穿巫峡，渡东海，前往日本，走向那广阔的天地，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五、投身革命

1904年12月下旬，熊克武从上海乘日本邮船公司的“大疑丸”

号到达日本横滨，再从横滨改乘火车到达东京。

到东京后，熊克武在留日学生会馆的帮助下，进入大成中学补习日文。

在大成学习期间，熊克武眼界大开，他经常阅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刊《汉声》、《江苏》、《苏报》、《浙江潮》等，特别喜欢阅读孙中山先生倡言革命，抨击康梁保皇党，揭露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文章。中山先生的文章以其敏锐的思想，鲜明的观点，雄辩的逻辑力量，痛快淋漓的文字征服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心。在看完了中山先生的《伦敦被难记》后，熊克武曾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孙逸仙真乃当世之英雄也！”

在这期间，他还阅读了许多描写日本爱国人物的传记作品，如《日本七十三侠传》、《大日本中兴先觉志》、《日本维新人物志》、《日本近世豪杰史》，等等。

1905年4月11日，熊克武邀约但懋辛前往麹町靖国神社观看日人祭祀为国忠死的志士。祭祀完毕后，熊克武和但懋辛一块到陈列室去参观陈列品。当他看到陈列品中竟陈放着中日甲午战争时的战利品时，感到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满腔怒火勃然而生，他一气之下，将这些战利品掀翻在地。但懋辛见状，赶急拉着熊克武的手说：“锦帆，你撞祸了。快走！日人也太欺侮我们中国人了，你干得好，总算为大家出了一口气。”

1905年夏，熊克武和但懋辛同时考入东斌学堂，这是一所私立振武学堂。与熊克武同时在东斌学校学习的四川同学还有喻培棣、王丽中、张伯祥、曾冠等。

当时清廷怕革命党造反，明令禁止自费留日学生学习陆军，因此，许多有志于富国强兵的留日学生无法进入日本官办的“振武学校”。在此情况下，日本在野党知名人士寺尾亨博士，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便自筹资金于1904年在东京南郊著名风景区芝公园附近，创办了这所东斌学堂。东斌学堂具有浓厚的革命空气，

在这里求学的留学生思想十分活跃。

熊克武进入东斌学堂后，思想更加自觉地倾向于革命。但革命工作应该做什么？怎样做？他还是很茫然。

1905年7月25日中午，在岩仓铁道学校暑假补习班学习的同乡鄧奉先急急赶来东斌告诉熊克武，补习班的翻译程家柽先生下课时在黑板上写到：“孙逸仙先生到了东京。”熊克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他急忙约同但懋辛去程家柽老师家打听孙先生的住址。他们赶到程家柽老师家里，正巧孙逸仙也在那里。熊克武就在程家第一次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孙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见两个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了活力，心里十分高兴。便热情地招呼他俩坐下，然后开始了谈话。

孙问：“熊、但二君在此学什么？”

熊答：“学陆军。”

孙又问：“为什么学军事？学来何用？”

熊、但答：“为富国强兵计耳！”

孙说：“当前国弱势危，实非仅军事不如列强，根子在于清廷腐败。如等学成报国，不仅报国无门，恐怕也来不及了！”

熊问：“然则，何以为计？”

孙说：“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熊当即表示：“谨受教，愿力行之！”

谈话结束时，中山先生还告诉他俩，拟于7月30日在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址召开会议，望他俩届时参加。

这次与中山先生的会晤，是熊克武终生难忘的一次会晤，它决定了熊克武一生奋斗的方向和道路。

熊克武和但懋辛遵照中山先生的嘱咐参加了在黑龙会会址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

参加会议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70余人，包括兴中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部分成员。全国17个省有人出席会议。

会上，孙中山先生首先作了关于革命理由、形势和实行方法的演说。孙中山在演说中强调散布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应结成新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工作。

熊克武和在座的同志都积极支持中山先生的提议，并一致推选他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

关于名称，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则认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提议称作“中国革命同盟会”。又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用“革命”三字。最后大家同意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接着讨论宗旨，当孙中山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时，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鼓掌支持中山先生的提议。但有少数人对“平均地权”表示异议，要求取消。

中山先生耐心进行阐释。他论述世界革命趋势及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并说：“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将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

听了孙中山的解释，熊克武联系自己家乡农村的实际，深深感到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思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办法。他和多数同志都积极赞成把“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之一。

黄兴随即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

熊克武立即按照孙中山先生起草的盟书式样，十分庄重严肃地写好了自己的誓约：

联盟人四川省资州府井研县人熊克武，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

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熊克武

从这天起，许多革命者由孙中山先生领导，不断举行宣誓加盟仪式。

8月19日，熊克武与但懋辛、邓絜、曾上泉等人同时参加宣誓加盟仪式。

宣誓完毕，孙中山把熊克武带到隔壁一屋传授同志相见联系暗号：

“问：何处人？

答：汉人。

问：何物。

答：中国物。

问：何事？

答：天下事。”

传授完联络暗号后，孙中山与熊克武行新握手礼，并热情祝贺说：“为君祝贺，自今日起，君已非清人矣！”

8月20日，熊克武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东京赤坂区灵南日人坂本珍弥宅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到会约100人。

先由黄兴宣读同盟会章程草案30条，经大会讨论通过。章程中确定孙中山提出的16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于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各省区成立分会。与会者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

在会上还成立了评议部，熊克武和四川的吴玉章，但懋辛、董修武均被推选为评议员。

由于当时四川入盟者已有好几十人，大会又议定成立了四川分会，黄树中被推选为四川分会会长，熊克武负责组织联络工作。

参加了同盟会，熊克武不仅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更重要的是思想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他深深地感到，革命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来源于社会的需要（即所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认识到许多革命者的成长，是靠领袖人物和革命理论的启发和感召；他懂得了革命者自己必须具有一定的觉悟、决心和勇气。

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先生即到横滨从事革命活动。他从横滨函告总部，要总部派人去横滨跟梁慕光先生（广东人，三合会首领，对制造炸药和炸弹很有研究）学制造炸药和炸弹。

听到这一消息后，熊克武放弃了学业，报名前往横滨学习制造炸药和炸弹。随同他前往的有黄树中、谢奉琦、曾冠等四川同志。

熊克武等人到横滨后，住在横滨山下町梁先生家里。梁先生教他们用王水煮化墨西哥银元制炸药，其爆炸力极猛，很容易出危险。虽则如此，由于当时炸弹和手枪是威力较大而又便于携带的武器，因此熊克武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主动地向梁先生学习，热情甚高，不久便学会了制炸药和炸弹。

在横滨期间，熊克武和孙中山先生往来密切，关系融洽。他常去看望中山先生，聆听他的教导。有时熊克武自己一个人去，有时他和谢奉琦等结伴同往。天晚了，中山先生总要挽留熊克武住在他家里。

这段时期同盟会刚成立，中山先生很繁忙，许多重大问题都有待他决策、处理。

熊克武每次去，不是看见中山先生伏案看书、写作，便是会见客人，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甚至看见中山先生一边做家务，一边和来访者谈话。中山先生常常连吃饭也无暇顾及，饿

了便在小店吃点东西充饥。

中山先生常托熊克武为他寄信，找书，取资料，与横滨的同志取得联系。凡是中山先生托办的事情，熊克武总是小心谨慎，竭尽全力去完成。

中山先生和熊克武在一起时，常询问他学习制作炸弹的进展情况，留学生的思想动向，四川哥老会的情况，以及四川的风土人情，有时还关切地问问熊克武的家况。他们谈话很随和、亲切。

中山先生还常向熊克武讲述革命行动的方针和策略，回答熊克武提出的问题。中山先生曾多次教导熊克武：“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我辈应该有这种坚强的信心，又要有不怕失败、百折不挠的勇气；还必须有舍生取义、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中山先生精辟的见解、深刻的教导，对熊克武以后的生涯有重大影响。

在横滨，经孙中山先生介绍，熊克武认识了久闻其名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

熊克武到日本后，曾读过宫崎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孙中山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称宫崎“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因此，熊克武对他颇为景仰。

宫崎见熊克武年轻有为，对熊也很有好感。当他听说熊克武是四川人时，曾对熊说：“四川是我向往之地，那里人杰地灵，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嗣后中国反满革命，应以四川为负隅之地，再张羽翼于湘、楚、汴梁，方可望取得成功。你返川后，将大有可为！”

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政府鉴于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会员又多是留学生，多次与日本政府交涉，强烈要求日方对留学生严加监督管束。为此，日本政府文部省于1905年11月2日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共15条，明令从1906年1月1日起施行。

《取缔规则》旨在取缔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甚至专断地限制留日学生的行动自由，有损留学生的人格和民族的尊严，是日清两政府朋比为奸的产物，这就必然激起具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广大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血气方刚的熊克武，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了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为实施《取缔规则》，日本文部省于11月26日在中国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贴出告示，限令各生于29日前呈报其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

熊克武读到告示后，十分愤怒，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日清两政府勾结起来镇压革命运动的前奏曲，断不能接受。于是他和但懋辛、喻培棣等人商议，立即在学校召开留日学生大会，揭露其阴谋。熊克武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下，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如不取消《取缔规则》，宁可全体罢学回国。

12月3日，熊克武代表东斌学堂的留学生，参加了由留学生会馆主持召开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弘文学院、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大成学校、成城学校、振武学校、东亚实业学校的代表。

会上，大家一致要求彻底取消《取缔规则》。当讨论到如何才能达到目的时，与会者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集体罢课，有的不赞成。熊克武发言说：我认为集体罢课不可能解决问题，只有归国才是最后的方法，不过在实行前，最后再向公使进行一次紧急交涉，以争取主动。会上最后议决：各校代表于次日同往公使馆，请求公使强力交涉，务求取消《取缔规则》。

4日上午，熊克武收到弘文学院留日学生给各校留学生的信，信中说：我们弘文学院本部及分校的留日学生皆已开始集体罢课，希望各校大力支持。

熊克武见信后立即集合东斌留学生商议支持弘文学院行动事宜，大家一致同意与弘文取一致态度，全体罢课。其它各校留学

生也相继作出了集体罢课的决定。

当日晚，熊克武随同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及各校代表前往公使馆要求取消《取缔规则》，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5日，300名留学生代表在富士见楼聚会，商议如何进一步开展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熊克武作为东斌学堂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青山实践女子学校的代表秋瑾，发表了慷慨悲壮的演说，她在演说中剖析了《取缔规则》的实质，控诉了清政府的黑暗腐败，日本侵略者图谋中国的野心。边讲边失声痛哭。秋瑾那饱和着血泪的讲演强烈地震撼着熊克武的心，他的眼泪也和着那悲壮的字句不断流淌。

会上大家一致议决，为反对文部省的命令，各学校一齐罢课，并通过了《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之驳议》的声明。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破坏罢课，破坏留学生的声誉，会上还制订了《学生自治规则》。

6日开始，东京各学校一齐罢课。

这天一大早，熊克武和但懋辛、曾冠等带着短刀，佩着纠察员的标记，在校门前维持秩序。

7日，在京都的留日学生响应东京留日学生集体罢课的决议，赴东京汇合。反对《取缔规则》运动，终于发展成为上万名留学生参加的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

同日，《朝日新闻》在报道留学生集体罢课的消息时，胡说什么，这次罢课是由“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

法政大学留学生陈天华为抗议《朝日新闻》诬蔑中国人“放纵卑劣”，于8日晨愤然投海自杀。他在遗书中悲愤地写道：“近该国（日本）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当留学生奋起抵制时，“《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鄙人痛此言，欲我同胞

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陈天华是熊克武很好的朋友，噩耗传来，熊克武心如刀绞。他对陈天华那宽宽的肩头，英俊的面庞，豪爽的性格是多么熟悉啊！他曾和陈天华一块加入同盟会，一块联络同志，纵论革命。他不止一次地读过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狮之吼》，那通俗朴实的文字，那热爱祖国的深情，曾使他振奋、掉泪。“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警世钟》）陈天华不正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敲鸣警钟，唤醒长梦千年的中华儿女么？！

陈天华投海自杀的消息，在全体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大家悲愤填膺，决定以集体归国反对《取缔规则》的实际行动来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来纪念陈天华烈士。

在集体归国前，熊克武还曾与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校代表共同讨论了如下善后办法：由留学生会馆将归国理由报告“学部”（相当于教育部），要求学部将北京派送留学生的官费拨给留学生会馆，在上海创办专门高等学校，以解决归国留学生的学业问题。

六、愤然回国

12月14日，204名留学生乘邮船公司上海线的“安徽”号轮，首先启程返国。

熊克武在安排了几批留学生先行回国后，于12月下旬与秋瑾、刘道一、黄树中、谢奉琦、曾冠等同船返上海。但懋辛、刘光烈、喻培棣等到码头送行。熊克武紧紧握着但懋辛的手，激忿地说：“日本政府太欺侮我们中国人了，我发誓不再重蹈日本，一定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创办新式学校，启迪国人民族意识，向国民传

授新知。”并叮嘱说：“望与亚休（刘光烈字亚休）兄抓紧处理善后，尽速返抵上海共同办学。”

这时，留日学生相继返回上海的已有3000余人。清政府却不同意在上海兴办专门高等学堂，拒绝拨款给留学生会馆。

面对清政府的顽固态度，为了使回国留学生不致失学，熊克武与同盟会总部秘书长马君武、秋瑾的好友陈伯干、同盟会党人姚宏业等约集了73名归国留学生，商议自筹款项办学。会上推选熊克武、张定杰、姚宏业、孙镜清、王抟沙等负责学校的筹办工作。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取校名为“中国公学”。“中国”，表示有对外和自立的意思，又有“学术独立”的意义；“公学”，表示由各省归国留日学生合力创办，是一所具有“公共”意义的“学校”。

不久，在北四川路横浜桥租了一所民房，作为学校的临时校舍。

为了支持办学，熊克武典当了自己的部分书籍和衣物，凑足100元捐给学校。

这时，但懋辛、刘光烈也回到了上海。但告诉熊克武：总部要求以办学为掩护，在上海建立一个联络站，负责日本、上海和内地同志的联络和接头工作。

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国公学”于1906年2月正式开学，设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和理化专修班。

不久，密探报告两江总督端方，说马君武系同盟会总部秘书长兼广西支部长。端方得到这一密报后立即派出大批官兵四处搜捕马君武。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熊克武冒着生命危险，护卫马君武机智地避开了密探的缉捕，把他安全送出上海，前往德国暂避。

“中国公学”虽然办起来了，但上海人对这所由剪断发辫和穿

着洋服的学生倡办的学校，却投以怪异和鄙夷的目光；清朝的官吏们更对它怀有戒心。因此，学校创立后，赞助的人很少，经费短缺，经营十分困难。熊克武等革命党人虽竭力维持，但仍然发生了江苏5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的事件。

筹办组成员姚宏业，不忍中国留学生苦心筹建的“中国公学”就此夭折，而遭人耻笑，遂于1906年4月6日愤然投黄浦江自杀，希望以死来换取人们对“中国公学”的同情和支持。他在遗书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为中国公学而死”，并满怀深情地说道：“予愿予死之后，君等不复念予，但念我中国公学。予愿我四万万同胞……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若此）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姚宏业为中国公学殉身的悲壮事迹，使熊克武又一次深受震动。从陈天华到姚宏业，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战友，为洗雪中华民族的耻辱，为唤起民众的觉醒，就这样硬铮铮地离开了自己，离开了人世。中国人是不怕死的，是不可征服的！熊克武立即带着“中国公学”的学生们，走上街头，宣读姚宏业的遗书，宣传姚宏业“为中国公学而死”的献身精神。

姚宏业的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捐款资助，并对清政府进行了愤怒的谴责。

在各地舆论的谴责下，清政府被迫拨出吴淞炮台公地百余亩兴建“中国公学”校舍。

经过“中国公学”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中国人自己一手创办的第一家私立大学终于以新的姿态屹立在黄浦江畔。

1906年6月29日，熊克武和但懋辛一道，奉命去上海西牢迎接章太炎出狱。当这两个年轻的陌生人出现在太炎先生面前时，章太炎略带警惕地望了望他俩，轻声问道：“你们是谁？”熊克武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我们是奉中山先生之命，前来接先生的，不知先生准备如何出处。”章太炎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中山在哪里，我

就去哪里。”当晚，熊克武安排了两名同盟会会员陪同章太炎前往日本，晤见中山先生。

不久，中山先生化名高野，乘法国邮船由日本经上海去新加坡，熊克武和但懋辛得总部通知后，立即专门组织了暗中保卫工作。安排停当后，熊克武还上船向中山先生汇报了内地工作的情况。临走时，中山先生告诉熊克武尚需1000元。熊克武立即赶到虹口祥庆里“锐进学社”找秋瑾共同筹措。这时，秋瑾正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会党首领，进行革命活动。她听说中山先生急需经费，即和熊克武分头找革命同志，及时将款项筹足。为了不至引起密探的注意。熊克武托秋瑾将款项送至中山先生乘坐的船上。

7月，同盟会总部又派熊克武和龚铁铮（湖南人）去武汉调查新军和警察冲突的案件，目的是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乘机拉拢新军。他俩按照总部要求，前往武汉，依靠当地同志，顺利完成了此项任务，然后返沪。

返回上海不久，东京总部派董庆伯带来命令，要熊克武回四川和谢奉琦、黄树中共同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联络会党，积极组织武装起义。董庆伯告诉熊克武，总部的要求是：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起来，建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核心骨干。然后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新军，发动起义。他还告诉熊克武：孙总理前不久在东京接见了川西南会党首领余英，希望余英“谕会党以大义”，返川组织会党进行起义。嘱咐余英“吾国革命用兵，当在扬子江流域，四川乃其上游也，宜急图之。”董庆伯还对熊克武说，孙中山希望他回四川后要主动和余英联系，共同组织领导四川的武装斗争。

熊克武欣然领受了这一任务。

即将回家乡组织和发动民众参加埋葬清王朝的战斗，熊克武热血沸腾，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希望。

注释：

①熊克武在遗作《辛亥革命前四川历次起義亲历记》(《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中说：“我于癸卯(1903年)春入东游预备学堂，是年冬即东渡日本。”据光绪三十年《四川学报》载，熊克武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到日本”，并注明系自费。《四川学报》还载有熊克武当时在井研县城的通讯处：“县城外小学堂”。笔者分析，因事隔过久，熊先生遗作所记时间可能有误。据《四川学报》所载推算，熊克武入东游预备学堂应在1904年春。

第二章 奉命返川，组织起义

一、草堂议事

1906年冬，英俊奋发、年仅21岁的熊克武，怀着推翻黑暗的清王朝，解救于水火之中的4000万家乡同胞的炽热豪情和凌云壮志，乘船直抵重庆。

在重庆停留数日后，熊克武继续乘船溯长江而上，来到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的泸州。在泸州见到了余英和谢奉琦。

很快，他和余英、谢奉琦一道联络泸州同盟会党人成立了同盟会泸州分部，把秘密机关设在小市绫子街邓邦植家。邓系官宦世家，亡父曾任山西某地知县，不会被官府疑惑，而且邓家屋舍宽敞，便于掩护。熊克武和谢奉琦均住在这里。

泸州工作基本就绪，熊克武又前往荣县。

到荣县后，他即去拜访但懋辛的大哥但献之。两人久别重逢，真是喜出望外。

1907年初春，熊克武怀着喜悦的心情，跨过荣县的但家河，越过方家冲，经过井研的东林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盐井湾，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和妻子。父亲倒还健旺，而妻子的面庞却明显地消瘦了。熊克武爱抚地对妻子说：“我走后，家里的事让你操劳了，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啊！”陈静芬微露笑容，只是脉脉含情地点了点头。她还有什么可说呢？只要丈夫了解自己，也就心满意足

了。

熊克武在家里住了几天，便前往县城拜会留日同学吴嘉议。

吴嘉议的父亲是井研一带有名的富商。吴嘉议返回井研后，他父亲便把井研县城数一数二的餐馆——同春楼交给他经营。

吴嘉议见熊克武回到井研，十分高兴，风趣地说道：“不知道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同春楼来的。既然来了，就喝个痛快吧！”他一面吩咐店小二摆酒上茶，一面悄声对熊克武说道：“锦帆兄，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井研已经成立了同盟会支部，就缺你这根主心骨了。”

熊克武回井研后，进一步根据秘密斗争的需要，在井研设立了秘密通讯点和联络站。通讯点分别设在城内的吴子君杂货店和税含章酒馆；联络站设在“品吉祥”茶馆。同时规定了联络暗号。其间，熊克武亲自介绍邹国宾、熊克成、陈绍白等加入了同盟会。

熊克武在井研住了一段时间后，前往省城成都。在成都府中学堂见到了黄树中，与黄树中等商定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寺召开各方面负责同志会议，讨论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余人。熊克武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东京总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要求，传达了黄兴的意见。他说：“克强（黄兴字克强）主张发动起义应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发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响应之。’”

张培爵补充说：“学界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谢持插话：“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在学堂中推行军事体操，有些学堂还领到了一些枪支，这更是组织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

接着，熊克武对四川军队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指出：虽然上层军官多是清廷的心腹，思想顽固守旧，但在中下级军官中，许多人对清王朝的统治是不满的，对这一部分人，应当积极争取。目前在军队中最可利用的一是武备学堂，一是陆军速成学

堂的学生。

熊克武又请余切介绍四川会党的情况。

余切很自信地介绍说：四川帮会的势力雄厚，山堂林立，公口遍地，分布地区很广，大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这是可以信赖的力量。

会议还讨论了起义的地点。熊克武指出：泸州、叙府（今宜宾）一带是余英的势力范围，这一带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的力量也较强，应当在这一带地方选好突破口，首先发难，打出一个局面来。

会议结束时，熊克武希望大家回去后积极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策应川西南的起义，以造成全省声势。

草堂会议是第一次由四川同盟会党人组织的全川武装起义的准备会、动员会。它显示了四川同盟会党人的决心和力量，它犹如黑夜中的闪电，隆冬即逝时的春雷，给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挣扎的四川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二、迭 败 迭 起

草堂会议一结束，熊克武立即返回泸州，召集谢奉琦、余英、邓邦植等人研究在泸州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

在会上熊克武全面而详细的陈述了首先攻取泸州的理由，他说：从地理位置来看，泸州为川南重镇，是长江和沱江交汇之处，交通方便，上可进窥嘉定、叙府，下可俯视重庆。泸州得手，即可震动全川，造成革命大好形势。同时泸州又接近云南和贵州，万一有不测，也有退路，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的军事基地。再则泸州及附近各县党人较其它县多，领导力量强，是荩臣（余英号荩臣）兄的家乡，各帮口都很听余大哥调遣指挥。而驻泸州的盐务巡防营和川南道巡防营，多是余大哥的兄弟，可以策动

内应。

听了熊克武的分析，大家很有信心，认为发动起义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会议制定了如下实施计划：

(1) 请刘安帮、鲍九成先期在江安作好准备，届时顺流而下攻打泸州，由程德藩协助。

(2) 由余英召集会党3000人，散布于泸州城内外，举火为号，党人和会党分三路进攻道台、知州、都司三衙门。另一路打破城门，迎接刘、鲍部队、城外会党及反正的巡防营，做到里应外合。由党内同志谢奉琦、邓邦植、席成元等负责组织。

(3) 由余英邀约刘天成带领帮会弟兄作为外援。

(4) 通知成都、叙府及时响应。

(5) 以熊克武从东京带回来的5个炸弹作实样，立即组织力量仿制。

余英建议说：泸州素有端午划龙船的风俗，到时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要来看热闹，沿河两岸，人山人海，我们可利用这个机会，集中几千万把人，这样泸州便可能一气攻下。

熊克武认为余英的意见很好，他对谢奉琦说道：“还是荩臣兄想得周到。起义就定在端午节吧。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分头去作准备。”

泸州起义事决定后，熊克武立即赶到成都召集会议，要求成都和泸州同时起义，以造成全川声势。他自信而乐观地说道：“一旦四川光复，全国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铁道学堂教师李异文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指出：现在距端午节仅仅只有10余日，无论如何也准备不及。匆促起事，必然失败。我们不应作无谓的牺牲。他主张把起义时间改在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的10月9日。

参加会议的同志大都赞成李异文的意见。倔强而自信的熊克武开始时对李异文的意见听不进去，认为李贪生怕死，临事生畏。

当他听到许多同志都发言支持李异文的意见后，冷静思之，感到李讲得有理，短短的10余天，不要说成都方面准备不及，就是泸州起义也太匆促。会议结束时，熊克武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马上赶回泸州更改起义时间。

熊克武返回泸州，向余英、谢奉琦转达了成都同志的意见。余、谢二人也感到在短短的10来天里，约集几千上万人来泸州有很大困难，同意将起义延期至10月9日举行。

起义改期后，熊克武带着5枚炸弹实样，与杨兆蓉、杨维一同前往永宁中学找正在该校任教的革命党人杨庶堪和黄树中落实制造炸弹的事情。

临行前，余英和邓邦植告诉熊克武，距离永宁县城40里的兴隆场有个叫黄方的，此人足智多谋，任侠好客，颇为乡里推重。如果起义能得到他的支持，一定能取得成功。他们还说，他们都曾先后去请过黄方，但黄方不肯出山，并婉言谢绝道：“革命是大事，不是一般的人能承担得起，能取得成功的。”余、邓俩人希望熊克武到永宁找黄方多谈谈，做好他的工作。

熊克武等一行三人去拜访了黄方，受到黄方的热情接待。彼此相谈，甚为投机。

熊克武向黄方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和革命活动。把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向他逐一作了详细的说明，还向他介绍了许多仁人志士积极拥护孙先生的主张，甚至不惜杀身成仁的感人事迹。熊克武满怀激情，滔滔不绝，推心置腹地和黄方纵谈了三天三夜，希望黄方以民族大义为重，以邹容、陈天华等英烈为楷模，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最后他满怀深情，十分坚定地对黄方说：“中山先生说：只要‘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这话说得多好啊！”

黄方感情激动地拉着熊克武的手说：“中山先生真先觉啊！我

追随孙先生革命之意已决矣！”当即，黄方请熊克武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黄方入盟后，和熊克武他们一块到了永宁县城，住杨维家。经黄方介绍，又吸收了永宁会党成员马九成和他的妻弟赵铁桥参加同盟会。

熊克武与杨庶堪、黄树中取得联系后，便在永宁中学召集同盟会党人开会议论开展武装起义的问题。会上，熊克武向大家介绍了泸州起义的计划，要求大家协助制造炸弹和炸药。黄方主动提出把制造炸弹的地点设在他家。

当时，永宁叙永中学堂完全控制在同盟会党人手中，马九成任视学（教育行政部门的住校代表），杨庶堪任监督（校长），朱之洪任学监（教导主任）。因此，杨庶堪满有把握地告诉熊克武，制造炸药用的药品、器械、蒸馏水等，均从该校理化仪器室那里取出供应。

大家商定由熊克武领着黄树中、赵铁桥、杨维等人到黄方家制造炸弹。以办家族学校为名掩护其身分。税钟麟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机械工业，他精铁工，制螺旋和炸弹壳有专长，熊克武请他到青山岩专制弹壳。

熊克武等人到黄方家后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研制炸药、装配炸弹的工作中。炸弹制成功后，便派人陆续运往江安、泸州、成都等地。

制弹工作上路后，熊克武约同黄方及兴隆场舵把子黄建勋，一同前往四川边境的云南小镇长官司，拜会当地绿林头目殷吉祥。

殷吉祥是一个瘦小干瘪的老头，但精神矍铄，两眼咄咄逼人，性情豪爽，具有强烈的反满意识，是这一带有名的龙头大爷，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常常和官府过意不去。

黄方、黄建勋是殷吉祥常来常往的朋友，熊克武与殷吉祥虽

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大家相见甚欢，感情很融洽。

熊克武向殷吉祥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四川革命同志拟在川南组织武装起义的情况，然后恳切地说道：“久闻吉祥兄素有反满复明之志，望兄届时助我一臂之力。”熊克武刚说到这里，殷吉祥便哈哈一笑，拍着熊克武的肩头说：“锦帆兄，此言差矣。驱除鞑虏，是我四万万汉族同胞共同的责任，什么相助不相助。我佩服中山先生的思想，他是伟人，我殷某愿服从中山先生的领导。”熊克武介绍殷吉祥加入了同盟会。

熊克武等三人拜访殷吉祥后，不敢懈怠，立即返回兴隆场。熊克武一进黄方家门，便见杨维、郑銮、税钟麟等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院内的空地上神色慌乱地在谈着什么。他心里一紧，忙走上前去问道：“出了什么事？”杨维脸色铁青，沉痛地对熊克武说：“出大事了。昨天晚上，理君（黄树中字理君）兄在收药入瓶时，不知瓶内留有滤碘余末，误以铁器触之，发生剧烈爆炸，声震栋宇，灯火尽灭，理君兄身负重伤。”

熊克武立即前往卧室看望黄树中。他见黄树中伤势太重，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立即派人把黄树中转到重庆治疗。从此，黄树中更名为黄复生。

第二天傍晚，叙永中学学生陶子琛，气喘吁吁地赶到黄方家，将杨庶堪亲笔信函交给熊克武，信中告之：“爆炸事发，官府知系党人所为，巡防军明晨即来兴隆场捕人，望速转移，万急！”

当晚，熊克武召集紧急会议，布置撤退。派杨兆蓉返回泸州报告消息，其余全部同志随他转移到犍为县罗成铺铁山税锡畴办的炭厂，继续制造炸弹。

泸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预定计划紧张进行。

到9月中旬，会党弟兄数千人已乔装成各种各样的商贩工匠，先先后后赶来泸州集中，城内外大小客栈挤得满满的。

这时，熊克武也从犍为赶到泸州，在泸州小市建立了起义指

挥部。

由于泸州人数骤然剧增，加上有的会党弟兄说话随便，行动不检点，民间又传出种种谣言，加之帮会弟兄缺乏组织纪律，十分涣散，各小头目约束不了，相互械斗之事，屡有发生。清吏已有所警觉，加紧了防范。

熊克武恐日久生变，在指挥部召集紧急会议，商定将起义提前在10月1日进行。会上余英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罗绍图通知江安县署刑吏戴波举火为号，黄宗干组织江安城内外同志和帮会兄弟，只要届时见到城内火光便起而发难；邓邦植与江安江防军哨官刘安帮、鲍九成取得联系，到时要他俩带领部队以救火为名，乘机攻占县城，然后再由刘、鲍率部顺流而下，直取泸州。

泸州起义部署就绪，熊克武急赴成都，通知成都同志泸州起义将提前举行，要求他们抓紧作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0月1日傍晚，戴波将燃烧用的薪膏存放在城中某妇家，叫她暂时避一避，这妇人感到蹊跷，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差役。夜半火起，差役急报县令，县令命紧闭城门灭火，不准江防军入城。

刘安帮、鲍九成刚领兵至城外，便遭到统领率领的大队人马的拦击。

当晚，清吏在江安城内捕杀了10余名嫌疑犯，并将戴波和他年仅9岁的女儿一块装进笼子里，高悬城门之上，绞杀示众。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

江安事发，县令即将党人起事情况电禀泸州知州杨兆龙。杨立即下令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全城戒严，并派出大批卫队彻夜巡查街道，这样使城内外待命出动的同志，彼此隔绝，无法联络，明知大事不妙，却不敢妄动。泸州起义就这样夭折了。

熊克武得知泸州起义失败的消息，立即从成都星夜赶到泸州，召集同盟会骨干开秘密会议，研究善后处理工作。会议商定余英、杨兆蓉留泸州，由席成元筹款遣散会党；谢奉琦、杨世尊、刘永

年转至叙府作策应成都起义的准备；其余同志跟随熊克武分路奔赴成都。

熊克武安排好泸州工作后，化名陈一峰急赴成都。

途经嘉定时，该县警察所所长、党人黄农江告诉熊克武，有个叫李鸿钧（即李蔚如）的人在打听他的行踪，要和他见面。

熊克武一听到李鸿钧的名字，十分高兴地对黄农江说：“快把他请来，他是我在日本结识的好友。”

李鸿钧告诉熊克武，他这次是奉中山先生之命回来慰问四川同志，并了解四川起义情况的。

熊克武向他报告了泸州起义的经过，以及正准备发动成都起义的情况，请他转达四川同志对中山先生的敬意。

熊克武到成都后，张培爵、谢持等起义负责人向他报告：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仍按原定计划，利用十月初九夜，总督以下高级官吏集合在会府，举行祝贺慈禧太后寿诞典礼的机会发难，占领成都，造成全省起义的革命声势。张培爵还告诉熊克武：泸州起义失败后，川南的同志纷纷转移到成都来。会党也约集了五六千人，分住小天竺、安顺桥、茶店子一带。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同志们对这次起义充满了信心。

至期，由于叛徒告密，清吏当晚突然改变了朝贺地点，派重兵把守会府，并宣布全城戒严。城门迅速关闭，城楼上全是荷枪实弹的清兵。城内的各路要口，均派兵丁把守，交通完全中断。

负责放火发号的朱麤，在东门附近一家客栈里包了一个房间。傍晚，他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铺床的草垫上浇满汽油，点着火后，立即锁上房门溜走。没想到火烟一起便被店家发现，立刻扑灭了。

朱麤在东门放火后，兴冲冲地跑到书院南街永和旅店，十分自信地向熊克武报告：“火已点燃，只要听到炸弹声响，成都就是

我们的了。”

过了好一会，熊克武仍不见东门火起，心里一冷，知发生了意外。他立即叫黄方和朱龜前去查明原因，重新点火。两人刚跨出门，便被清兵拦了回来，这时全城已经戒严了。

熊克武从窗外望去，街上冷寂、阴森，除提着灯笼、打着火把、往来巡逻的清兵外，一个人影也不见。他掩好窗，痛心疾首地轻声慨叹道：“又出问题了！”随即他请黄方分别转告住在旅店的同志：“迅速作好应变准备，但不得鲁莽行事，擅自行动！”

第二天早上，戒严倒是撤除了，但巡逻的清兵仍然随处可见，街上只有稀稀落落的行人。

熊克武很清楚，城外的同志还不知道城里出了什么事，需要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以便应付事变，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另外会党兄弟放荡不羁，此时更需要做工作，处理好善后。

一大早，熊克武放下盘在头上的辫子，扮成差役，悄悄离开了旅店。行至老南门，抬头一看，城楼上贴着很大一张缉拿革命党人的布告，所列名单中为首的是自己，此外，还有余英、余切、谢持等人。这时城门口站着一队清兵，正在盘查过往行人。熊克武稍略迟疑了一下，如果往前走，怕清兵识破，如果退回去，又怕被清兵怀疑。“一定要闯过去！”他暗暗告诫自己，于是神态自若地继续往前走。当清兵盘问他时，他从容不迫地取出胡雨岚太吏的请柬，说道：“奉胡大人之命，前往簇桥请李二爷赴宴。”守城门的清兵打量了他一下，便放他出城了。

熊克武在茶店子见到了黎靖瀛，黎焦急地告诉他：帮会头人要求拨款遣散他们，如不立办，发生牺牲，下回就喊不动人了。熊克武果断地回答道：“你告诉弟兄们，三日内即将银钱送到，不要擅自行事！”

熊克武返回成都城后，即和黄方、余切、谢持等商议筹集款项事宜。

仓促之际，要弄到一大笔钱谈何容易！幸黄方在广西凌云县做知县的胞兄，前两天汇到成都一批银子，叫黄方托人在成都给他买房子和侍妾。为了革命需要，黄方立即把全部银子交给了熊克武。谢持也在商学界中，很快筹集了2000两银子。这样才迅速地将会党兄弟遣散出成都。

起事流产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清吏搜出了党人名册，派出大批差役捕人，风声很紧。

新军和弁目队里的伍安全、程德藩、秦炳、龙光等10余个同志，都是偷着出营参加起义的，事泄后均不敢回营，相继逃匿。

10余天后，伍安全在金堂被捕，押回成都，惨遭杀害。

党人黄方、杨维、黎靖瀛、张治群、江永成、王炳璋等人也相继被捕。

对于所谓“首要”的熊克武、余切、谢持、余英等人，清廷到处出示通告，命令各地缉捕捉拿。

在这种形势下，同志们都劝熊克武赶快离开，以防意外。但他没有同意。他考虑的是自己是主盟人，又是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应当临危不苟，留下来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务，及时组织力量，利用各种关系，营救被捕同志。

熊克武留在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他组织学界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奔走于耆老之门，请他们出面说情。

熊克武和成都很有名望的耆老胡雨岚太史交谊较厚，胡太史是康梁的忠实信徒，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严刑重罚。熊多次去拜访他，希望他出面转圜，营救被捕同志。

胡太史对这些被捕的青年人也颇为同情，于是邀老翰林伍崧生等代表省中士绅，向首道贺纶夔、首府高增爵呼吁。他们陈述说：政治不良，青年人谋求改革是出于爱国之心，若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动辄杀人，后患将不堪设想，总以宽大处理为宜，更

不必株连多人。

成都知县王棅却坚决主张格杀勿论。

经胡雨岚、伍崧生、贺纶夔、高增爵等向护督赵尔丰陈述利害之后，赵也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因而有所顾虑，于是把所捕的人全部交承审局讯办。经审判，判处黄方等人终身监禁。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他们才出狱。

熊克武留在成都的另一件事，就是对叛徒进行调查。他曾派人贿赂官吏，寻找线索，买通狱卒，向狱中的同志们打探情况。但由于他处境险恶，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始终未能查明。

一天，熊克武去可园看戏观察动静，背后有人轻轻拍他的肩膀说：“外面风声更紧了，快走！”听声音他便知道是当时成都的有名士绅韩锡藩。随后，韩锡藩托人送给熊克武旅费 100 元，他只收下30元，其余70元留给了其他困难的同志。

直到10月25日，熊克武把善后工作基本处理完毕后，才搭木船离开成都，经嘉定前往叙府。

尽管泸州和成都起义失败了，但四川党人并没有气馁，他们急图再举，发誓要替死难同志报仇。

叙府方面在谢奉琦等人的主持下已为发动起义作好了初步准备。谢奉琦联络好叙府中堂勇管带刘绍峰、县幕詹树堂届时率堂勇起义。党人聂次荀在屏山联络好清军哨官李飞鹏和李忠臣，届时率清军反正，策应叙府起义。此外，隆昌的郭尉华，在云顶寨有洋抬枪(需二人抬运，故名)数10支，经黄万里前往联系，答应到时协助起义。

熊克武到叙府后，立即召开会议，进一步落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在12月13日晚发动起义。

为了加强起义的力量，熊克武在安排好叙府的工作后，立即赶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地，号召同志前往叙府参加起义。

叙府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当就绪的时候，詹树堂的朋友雷

东垣竟将起义的全盘计划向官府密报了。

12月11日，知府宋联奎正出巡至岳口，得到叙府即将有变的紧急情报，立即返回县城，加强防卫，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12月12日傍晚，谢奉琦急匆匆地赶来告诉熊克武：“消息泄漏了，刘绍峰和詹树堂已被知府宋联奎逮捕（后被杀害）。”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熊和谢当即决定马上通知参加起义的同志迅速分散转移。起义就这样夭折了。

泸州、成都、叙府起义相继失败，很多革命党人被丢进监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在敌人的血腥镇压面前，熊克武感到，应当召集各地负责同志开会统一认识，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考虑对策。他通知余英、谢奉琦、程德藩等10余名同志于戊申（1908年）正月初，借拜年为名，到隆昌黄万里家开会。

会上，大家对前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尽管前几次起义的策划和组织是以党员同志为主导，但到了行动的时候，却依赖新军巡防营和帮会弟兄来发动，党人倒反主为客，一切操之于人。而新军和巡防营中，只吸收了一部分中下级干部。至于帮会方面，虽然人数很多，但成分复杂，靠他们打开局面，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家认为，要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作为暴动的先锋和主力军；而要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就必须有枪械，有装备。

最后，大家议决派熊克武和余英去日本设法购买枪弹，并向东京同盟会总部报告川中革命情况，以期得到总部的指导和支持。

熊克武和余英接受任务后，立即启程赴日。他们先到泸州，然后顺长江而下，经重庆，出上海，于当年3月到达东京。

熊克武和余英到东京后向同盟会总部报告了四川几次武装起义的经过，以及这次前来购买枪弹的计划。

总部派吴玉章、李肇甫、张冲协助他们购买枪弹。

川籍同学闻讯，都尽力设法捐助购枪款子，有的手中不便，就拿官费折子去抵押现金，情绪十分昂扬。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也大力相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熊克武很快买到大小手枪百余支，子弹1万余发。

如何才能混过海关的检查，把枪弹安全运回国，却是很困难的事情。熊克武和余英正一筹莫展时，恰逢党人廖小咸和刘永年正准备将在日本购置的幻灯机和印刷机运回上海。

熊克武立即去找廖、刘二人协商，拟将枪弹分散放置在两部机器里面。廖、刘毫不迟疑地满口应承下来。这样混过了海关的检查，把枪弹安全运到上海。

到上海后，听说沿途搜查很严，但懋辛组织了三个四川同志，协助熊克武护送武器返川。

熊克武把枪弹分散放在各自的行李中。他们有时行船，有时绕道步行，走走停停，饱一顿，饿一顿，有时竟至风餐露宿。由于枪弹太重，爬坡上坎，翻山越岭，均须自己肩挑背扛，大家的肩膀和背全都磨烂了，备尝艰苦。直到这年初冬这批枪弹才运到四川。

为了不引人注意，熊克武决定将枪弹分散寄存，在路过忠州时，他征得当地可靠党人吴恩鸿的同意，将三分之一的枪弹寄藏在他家。到重庆后，他们除各自随身带走几支枪外，其余全部枪弹放在党人淡春谷家。

三、名震川北

熊克武把武器寄存好后，在重庆稍事休整，便和余英一块前往长寿、江北、邻水、大竹、渠县、广安、合川等地察看地形，了解情况，听取这些地区同志的意见。

在熊克武和余英从广安乘船至合川时，沿途看见两岸往来的

老百姓瓜皮帽上的红结顶取掉了，有的染了颜色，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于11月14、15日相继死去，在办国丧。熊克武和余英认为，这是起义的极好时机。他俩仅在合川作了短暂的停留，便径直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熊克武立即主持召开川东北同盟会骨干成员会议。他在会上宣布：“经我和荩臣兄与川东北同志商讨，决定在广安发动武装起义。”他把广安一带的情况向大家作了具体介绍，指出，广安位于渠河西岸，交通便利，起义队伍集中方便。邻近的大竹、长寿、邻水等地的党员同志也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他还进一步分析说，过去几次起义都在川西南，因此，清吏在那方面加强了戒备，而在川东北则防范松弛，驻军不多。在广安只有一个保安营，而且很腐败，我们突然起义，攻其不备，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余英在会上也发了言，他说，会党在川北一带势力很大，“孝义会”龙头大爷李绍伊，聚众大寨坪，名声赫赫，大竹的同志与他交谊甚厚，我这次到大竹还专程前往大寨坪拜访过他。他告诉我：“反清复明系吾素志，你们有什么行动，尽管吩咐，我李某一定竭诚相助，要枪给枪，要人给人。”

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届时把队伍拉到广安来。

会议结束后，熊克武专程前往自流井看望谢奉琦同志的家属。他从日本刚回到重庆时，就听说去年3月谢奉琦被敌人杀害了。他曾和谢奉琦一块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一同在横滨向梁先生学制炸弹，一同为抗议日本政府制定的《取缔规则》返回祖国，一同领受同盟会总部的任务回到四川开展武装斗争。他俩相逢异国，在如火如荼的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谢奉琦那瘦长的身子，清俊的面庞，炯炯有神的目光，潇洒的举止，慷慨豪爽的气质，风雅的谈吐，他是多么熟悉啊，至今还历历如绘，时时

浮现眼前。

谢奉琦的妻子刘氏详细地向熊克武诉说了他被捕杀的经过：叙府起义失败后，知府宋联奎电告全川悬重赏捉拿谢奉琦。去年三月有人来谢家向谢密告，风声很紧，内部出了叛徒，清吏正在四处捕人，要他赶快躲避。谢不同意。过了几天，有个叫汪蔚然的来谢家。汪系党人，故不怀疑。谢出面接待，还请他住在家里。汪蔚然说先到外面谈谈，谢便和他一同去茶馆。刚一落座，预先埋伏好的便衣就在谢背上横砍一刀，然后把他绑架而去。

谢奉琦被押到叙府后，宋联奎亲自坐堂审讯。谢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但当宋要他交出党人名单时，他却怒目冷对，闭口不答。宋又软硬兼施，对谢说，“只要交出同党名单，我不仅保释你出狱，还将赠以重金；如执迷不悟，死在旦夕！”谢挺胸答道：“我死，归耳，何惧？且自我作之，自我任之，何必党？汝实汉族，而甘北面事胡虏乎？若有人心，速反正，从我去，否则有死而已。”

刘氏谈到这里，眼泪象断线珠似的直往下掉。

停了一会，刘氏继续说道，谢奉琦被捕时，有奸人密报清吏，说他有飞檐走壁之功，因此在赴刑场时，凶残的清吏竟在谢颈下的肩胛骨上贯以铁索，锁系而行。谢却若无其事，态度从容，沿途演说，鼓吹革命。观者莫不感动，不少人暗暗落泪。临难时谢又索笔赋绝命诗一首，死时才20岁！

刘氏从抽屉里拿出谢奉琦亲笔书写的绝命诗，递给熊克武。

熊克武用微颤的手接过绝命诗，目睹那刚劲的字迹，低首轻轻吟诵：

中原多故祸燃眉，草泽人怀复国思。
我志未酬民益愤，还将万弩射胡儿。

吟罢这用热血写下的绝命诗，熊克武沉默了一会，然后沉重而坚定地对刘氏说：“奉琦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奉琦未竟之志我们一定要完成！”

其他同志还告诉熊克武，同志们发现汪蔚然是叛徒后，由于泸、叙的同志还很多，怕他再出卖人，就警告他：“你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熊克武、余英还在，决不会饶恕你，你能逃出他们的手掌心吗？”这个叛徒一吓就跑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1909年1月，熊克武在广安石笋河小学召开骨干会议，具体落实起义计划。会议决定：起义定在2月10日天黑时进行。

熊克武对起义作了如下安排：

整个起义队伍分两路行动。

一路由余英指挥，召集渠河运铁的船帮400人，在东门外河街集合待命。廖腾霄、陈云九、肖绍先、彭正纲等于天黑前先组织几十个同志潜伏城内夺取保安营的枪械，得手后，迅速控制东门，鸣枪为号，以便余英率领大部队进城，彻底解决保安营。

另一路由他自己带队，由秦炳、王松廷、易中、兰孝先、何宗绪、雷大河、陈旭九等召集邻县同志在北门外河坝聚齐。伪装团队解送“犯人”，混入城中。这路起义队伍的任务是攻打知州衙门，夺取行政首脑机关。

2月10日下午，正在待命发难之时，熊克武叫刘慎终去余英处联络，他回来说：“糟了！长太爷（余与蛇同音，故呼余英为长太爷）在茶馆被弟兄们包围了，弟兄们说‘喊我们来办事，讲好每天发400文钱，至今一文不给，搞的是什么名堂。’”

熊克武立即赶去，对茶馆里的弟兄们说：“山不转，路转；朝不见，夕见，我们都是江湖上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大家放心，钱一定要给，事情也要办，只要钱一运到就补给大家，事成后，还将论功行赏。”熊克武一席话，总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了。

这时，余英已走开，熊克武要刘慎终去通知他按原计划立刻行动。交代完后，他便飞奔河坝，带领队伍直趋州署。

熊克武率队走进州署，令何宗绪放了一个猫儿炮（土炮）作信号。然后，短枪齐发，门卫应声倒地，大家齐声呐喊冲进二堂，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原来在州署值班的堂勇不多，一听枪响全都吓得躲起来了。

保安营就在州署的坡下。这时还没有传来一点枪炮炸弹声音，熊克武很感奇怪，又想到如果保安营的人包围上来，内外夹击，那就不好办了。他只得临时改变计划，不再继续留在州署搜捕知州，立即转攻保安营。保安营的门卫也同州署的门卫一样不堪一击，熊克武率队突破头门后，便和秦炳、王松廷各带数人分头搜索两边营房。有的房间空无一人，有的房间只有少数士兵躲在墙角发抖，一见熊克武便跪在地下直喊：“大爷饶命，大爷饶命。”熊克武派了几个兄弟，把投降的士兵集中关押在一个屋子，然后又派何宗绪、雷太和、兰孝先等带领战士们占据通往保安营的要道，堵住回营的官兵，另派王松廷去与余英联系，要他迅速率大队来保安营拿取枪械。

突然，州署堂鼓咚咚敲响，熊克武一听便知道这是敌人传集救兵的信号。他判断余英那边一定出了事，而自己这一边人太少，不能久留，必须火速转移。于是他命令陈旭光、何宗绪等立即带领队伍从西门撤出城外，设法与余英取得联系，他和易中、秦炳在后掩护。果然不出熊克武所料，当他们三人刚离开保安营大门，从州署方面便来了一群手持刀叉等武器的人。熊克武怕开枪惊动远近，不便掩护，就用马刀抵挡了一阵，砍伤了几个追在前面的人，后面的追兵溃散了。这时熊克武定睛四望，一片漆黑，已看不见秦炳和易中的踪影。他心里一紧，深一脚，浅一脚，沿街寻找。除了黑沉沉的房檐、屋壁，阴森森的长街外，什么也没有，夜海茫茫，在什么地方去寻找他俩呢？这里不是久留

之地，必须马上离开！熊克武急促地向西门走去。

余英一路人马，由于“茶馆风波”，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立即关闭了东门，全体出动，四处警戒，余英率领的大队伍根本无法进入城里，会党兄弟四散离去。

而先行转移的陈旭光、何宗绪等则被警察和保安营包围。敌众我寡，大家只得分头突围，好在是天黑夜战，左冲右杀，敌人摸不清虚实，经过一番苦斗，大部分同志冲出了城。

熊克武行至西门时，见两个兵丁正在关闭城门。他一个箭步跨上去顺势砍翻一个，另一个被这突入其来的一击吓得脸青面黑，不敢动弹，熊克武乘势冲出城门。

这时下起了濛濛细雨，熊克武经过半夜拼杀，身体已十分困倦，他冒着刺骨的寒风，以顽强的毅力，在泥泞的山路上向左边方向走了20多里，才在一个小庙里坐下来。他把马刀藏在庙里，手枪揣在贴身的衣服里，稍事喘息，便又顺着小路向顺庆（即今南充）方向走去。到达顺庆时天已大亮，腹内饥肠辘辘，身上一文不名的熊克武只好脱下身上穿的小皮袄卖了4元钱，买了一点东西充饥，余下的留着做盘缠（旅费）。恰好秦炳和彭正纲两人也来到顺庆，熊克武向他们问及广安情况和同志们的下落，他们也不清楚。熊克武想到成都是省会所在地，同志很多，脱险的同志也必然要到那里躲避，决定带着秦炳、彭正纲一同上成都，策划今后的行动。

广安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这次总算打了一场硬仗，还曾一度占领州署和巡防营营地，造了革命声势，扩大了革命影响，也使革命同志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

熊克武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临危不惧、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使敌人胆战心惊。他从此名震川北，给广大群众以很大鼓舞。

四、嘉定悲歌

广安起义失败后，脱险同志先后到达成都，他们跟成都的同志一起商议，认为目前仍在风头上，以暂避一时为好。

熊克武便带着秦显忠、秦炳、彭正纲等人返回家乡井研，分散住在可靠的同志家里。他住在离家60里的三江党人宋为章家。

这次住在宋为章家，是他最近几年来最清闲的日子了，除了断断续续读一些报章杂志外，便无事可做，虽然离家只有五六十里，但却有家不能回，只能在院内活动，十分寂寞。唯一给他慰藉的便是酒，他开始对酒感兴趣了，以致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常一个人自斟自饮，思绪万千。虽然斗争残酷激烈，有好几次都险些送了命，但他却为自己能够参加这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而庆幸！

然而，他毕竟是血肉之躯，是有感情的生灵。他怀念已逝的母亲，想念为他承受风险的父亲，更思念血脉相通、心心相印、时时顾盼着自己的爱妻。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他觉得对自己的妻子关照得太少、太少。

一次他边喝酒，边思考，情不自禁地提起笔，在住屋的墙壁上挥毫写下了三首诗：

一

叱咤风云孰敢当， 俆身一笑我登场。
年来幻梦图山会， 几世英雄几代王。

二

男儿有志壮游东， 意气鲸吞万代虹。
拯救同胞心欲赤， 直摸胡首剑光红。

三

别后罗衾谁共暖，相思肠断五更中。
燕子伤春无限事，登高次第数秋风。①

这三首诗表达了熊克武“叱咤风云”的革命豪情，拼将热血救中华的凌云壮志，以及对妻子的眷眷深情。

到了5月中旬，熊克武见外面风声稍平息了一些，又开始了活动。他请宋为章通过井研联络站分别通知井研、仁寿、荣县、嘉定一带的革命同志到荣县方家冲但家院开会，讨论今后的斗争。

6月初，他带着秦显忠、秦炳、彭正纲前往方家冲开会。当他们在荣县和井研交界的东林场吃早饭时，听见街上行人传说：(井研)县官张化南亲自带兵来收“叶子秆”捐税(市上买卖桑叶要经官秤收捐税)。熊克武想，为了收点秤捐，何劳县太爷的大驾，必须警惕。他吩咐大家马上离开，手枪装上子弹，准备应变。

他们一到但家，就接到县警察所所长曾冠送来的密信：“县官怕革命党人在境内闹事，故意亲自带兵下来，想吓住革命党人，并不敢乱动，勿惊恐。”熊克武接信后，心里踏实了，仍然按照原订计划在但家召集同志们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余英、廖腾霄、但懋庚、曹受宜、程德藩、徐岱宗、周石如等。会上决定在嘉定、屏山组织武装起义。

熊克武是这样分析当时形势的：清廷正在嘉定、屏山附近各县调动25个巡防营围剿凉山的彝族，后防军力空虚。如两地同时起事，清廷更顾及不暇，易于取得成功。这一带地方的革命同志很多，信心很大，斗志很强，有担负起发难的力量。有一部分地方团练的武装，已为同志所掌握，因此，在这一带发动武装起义有很好的基础。另外，这一带会党人数众多，龙头大爷王松廷倾向革命，起义时，可以利用帮会的力量壮大声势。

会上，推定税钟麟和杨世尊分别负责嘉定、屏山起义的准备工作。熊克武和其他人分赴各县联络同志，奔赴两地参加起义。

熊克武化装为教员，龚祝三化装为脚夫，俩人同时上路，到川南及川东各地联络革命同志。他们见到各县同志并没有因为前几次起义失败而灰心丧气，革命热情很高，心里十分高兴。

熊克武和龚祝三投宿于富顺客栈时，看见10余名靖川营兵坐在客栈门口喝茶（当时客栈多兼营茶饭馆业），他们上下打量了一下龚祝三，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主人贵姓？龚祝三不加思索，坦然而答，然后随着店小二挑着铺盖卷径直到店内去了。熊克武立刻警惕起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特别叫了几个好菜，坐到茶座上去吃饭，故意表示很阔绰。

不久，一个士兵从店内带出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人，熊克武一看是龙海云。龙海云虽然不是同盟会会员，但参加过泸州、叙府起义，也算同志。这个兵用眼睛瞧着熊克武问龙海云：“你看是不是他？”

龙答：“不是。”

兵问：“看清楚啰，是就是，不要替人背包！”

龙答：“不是就不是嘛！”

由于没有得到线索，这个兵又把龙海云押进店内去了，其余的兵也走了，只留下了3个人监视。不久，进店内去的兵都出来吃饭来了。熊克武回客房时见关龙海云的房间没有上锁，他闪进去，急忙把捆龙海云的绳子解下来，低声说道：“门没有上锁，可想法逃到荣昌风高铺杨亚东那里找卢春旭先生。”

熊克武对富顺的大小街道都十分熟悉，他知道客店斜对面的教育会有后门，就装着进去找朋友，从后门出城过河直奔隆昌去了。熊克武叫教育会姓张的同志去通知龚祝三，叫他马上离开客栈，另行改装，到荣昌相会。

傍晚，熊克武刚进隆昌城，偶遇好友郑辉武。郑热情地拉着熊

克武到城门旁边的茶馆去喝茶。他俩刚进茶馆，那十来个靖川营的兵也赶到了。他们问岗警：“你们看见有两个人一路，其中一个是挑油布被盖卷的没有？”岗警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没有看到。兵士们说：“难道飞上了天？快买灯笼去追。”

熊克武知道他们是在追捕自己，但他并不害怕，仍从容不迫地坐在茶馆喝茶，与郑辉武摆龙门阵。直到天黑，他才离开隆昌，绕小路，星夜飞奔荣昌。

这时的熊克武身强力壮，一天能行两三百里，不歇气，不喝水，不吃饭，同志们都叫他“铁脚板”。他就凭这种顽强的忍耐精神，在各地同志的掩护下，经常把追捕他的敌人甩掉。这次追捕他的靖川营兵也就是被这样甩掉了的。当时川南一带的老百姓把熊克武说得很“神”，说他来无踪，去无影，有穿墙越屋、飞檐走壁的本领。

第二天一早，熊克武到达了荣昌县风高铺，找到同盟会党人杨亚东。熊克武与他商谈，由他出资在重庆开个小客店作为交通栈，以便掩护来往同志并传递消息。杨亚东不仅慷慨应承，而且还愿与熊克武一起去重庆办理此事。

不幸，就在熊克武和杨亚东商谈妥当后的第三天，杨患心肌梗塞，突然死亡。

熊克武叫龚祝三留在风高铺协助料理杨亚东的后事。他独自一人前往遂宁。在遂宁找同盟会党人周均时的父亲（四川棉纱帮大商人，倾向革命）借了几百两银子，作为起义的费用。

当时筹措起义经费是很困难的，熊克武从遂宁返回井研后，利用各种关系，在家乡募集资金。党人邹国宾听说后，断然卖掉全部田产房屋，获银200两，全部交给熊克武。熊要他留下一部分安排家庭生活，他慨然说道：“没有国，何以有家，救国乃当务之急也。”

熊克武返回井研后，税联三等人告诉他，嘉定童家场团练局新

领到枪30支，子弹3000发。熊克武当即决定要把这批枪弹弄到手。他听说教练长王九皋是当地具有强烈反满思想的会党头目，于是派刘均斋亲自前往距井研60里的嘉定童家场，以会党的名义去拜访王。

刘均斋面见王九皋，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要借用童家场团练的枪弹攻打嘉定州。王九皋满口答应，拍着胸口说：“包在我身上。”

熊克武又赶到嘉定与余英进一步商定起义计划，决定于1909年12月13日夺取童家场、白马场、土主场、板桥溪等处团练局的枪弹，到手后即到新场关帝庙集中，然后全力袭取嘉定。由余英负责统领指挥。

熊克武和余英商议妥当后，前往叙府组织力量，待嘉定起义成功后，合力攻取屏山。

这时，童家场接连几天都在演戏，看戏的群众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参加起义的同志便混杂在观众之中。

13日晨由税钟麟、秦炳、程德藩、曹笃、朱翥、税联三、但维周、但尧阶、但懋权、姚本光、陈道、朱国经等率领数百人，分路夺取童家场、白马场、土主场、板桥溪等处团练局的枪弹。

13日这天，童家场教练长王九皋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按照训练计划，先集合士兵持枪操练，然后把枪架在操场上，并把子弹挂在枪上。除留下一个执勤士兵守护外，所有士兵都进教室听课。

劫取童家场枪弹的起义人员分为两队，一队由程德藩、廖腾霄带领，负责掩护；一队由宋为章带领，持大刀、土枪直接夺枪。只听得上堂号一吹，起义人员蜂拥而上，迅速夺走了团练局的全部枪弹。

枪弹得手后，为了掩人耳目，程德藩建议在路上仍打上团练局的旗子开路，同时假捆数人，大队随后押送，由王九皋率领部

分团丁走在前面。这样他们顺利来到新场关帝庙。

劫取白马场、土主场、板桥溪等地团练局枪弹的起义队伍，也很顺利地把枪弹夺到了手，先后来到关帝庙。几路起义队伍共获得步枪、快枪100多支，子弹上万发。

余英13日晨带了一批人先行来到关帝庙，布置好警戒后，立即准备酒食，犒劳夺枪同志。

几路起义队伍会聚关帝庙，余英在欢庆夺枪胜利的酒会上，高高举起一大碗酒，用洪钟般的声音正式宣布起义，进取嘉定。

新场离嘉定很近，只有15华里。由于起义队伍在新场耽误太久，嘉定官府获得消息后立即派兵沿江把守，在进入沟儿口渡口两侧的山坡上驻扎了重兵。起义队伍将到沟儿口，远远地便看见两侧的山坡上布满了兵丁，袭取嘉定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下一步如何行动，大家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攻犍为，有的主张攻屏山，迟迟不能决断。最后大家同意税钟麟的意见，立即派人通知熊克武、杨世尊，按预定计划合力攻取屏山。

议决后，起义队伍迅速向屏山开赴。赶到西坝时，天色已晚，大家十分疲惫，在西坝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队伍继续起程，行至屏山与沐川交界的宋家场时，嘉定清军就追上来了，起义队伍只好就地迎战。仗打得非常激烈，刚击溃嘉定清军，忽然从马边又开来一支清军，起义队伍受两路清军夹击，不得已，向屏山方向撤退。中途又遇上雷波押解课银的队伍，双方又发生战斗。此时，起义队伍已被清军团团围住。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一直坚持到天黑，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击毙上百清兵，才突围四散。

在这次战斗中华本初等数十名同志英勇牺牲，邹国宾等百余人身受重伤被俘。

被俘同志中，被解送到犍为杀害的有税联三、邹国宾、毛长馨、程德藩等；被解送到马边杀害的有曹受宜、但懋权、萧澄清、

熊弼烈、余滋甫、宋作桢、黄麟等；被解送到嘉定杀害的有王九皋、郭子清、赵金山、唐子云等。

嘉定起义，轰轰烈烈，宋家场遭遇战惊心动魄，血肉横飞。虽然死难同志多达200余人，但起义同志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被俘后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将永留人间。

12月15日，熊克武在叙府得到余英派人送来的密信，要他立即带领叙府同志合攻屏山。

熊克武正准备带领队伍出发，忽于17日得到屏山传来的消息：“14日余英带领数百同志从嘉定行至宋家场，与清军遭遇，激战终日，起义队伍大部被歼，余英带领部分同志冲出重围，不知去向，生死不明。”

熊克武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心如刀绞，痛苦至极，他闭门不出，一个人一杯酒接一杯酒的喝。他一边喝酒，一边流泪，一边呼喊余英的名字。这时他才深深地感到革命的不易，革命道路的坎坷艰难。

但熊克武毕竟是一条硬汉子。此时，中山先生的教导鼓舞了他：“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我辈应该有这种坚强的信心，又要有不怕失败，百折不挠的勇气，还要有舍生取义，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他深感在挫折和失败面前，作为四川同盟会主盟人的自己，更应坚定不动摇，带领同志们为实现烈士未竟之志继续战斗。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在同志们最需要领导的时候，自己怎么能躺下来，怎么能苟且偷生，一醉了之呢？

为了不使同志们遭受无谓的牺牲，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制定了以下应变措施，分别通知各地同志。

1. 暂停武装斗争，将枪支弹药存放安全处。
2. 被清廷悬赏捉拿的同志迅速转移他省，骨干成员也须分散隐蔽。
3. 安抚好死难同志的家属。

4. 警惕叛徒，一经发现，格杀无论。

熊克武略作安排后，即带着13岁的秦显忠离开叙府，径直前往屏山。

临行时，同志们都劝他暂时避一下，他沉痛而坚定的说道：“起义遭到这样大的失败，许多同志已经含恨于九泉之下，荩臣兄又生死不明，群龙无首，各地同志都在望着我啊！我怎么能丢下大家，丢下革命事业，而图苟免呢？”

熊克武来到屏山，有的同志已经转移，有的同志已经被捕下狱，幸免于难的同志见到他真是又惊又喜，劝他赶快离开，告诉他说，这里风声很紧，城门口正贴着告示，悬重赏捉拿他。前几天，廖腾霄、邱德臣、饶青云、丁海山等已被捕下狱，杨世尊也被他叔父出卖给官府了。

熊克武的到来，对屏山同志是很大的鼓舞，他们向熊表示：“请锦帆兄放心，我们宁可死也决不会丢掉革命气节。”

熊克武离开屏山后，前往犍为，在路过宋家场时，他特意到余英带领队伍鏖战过的地方去凭吊牺牲的同志，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到达犍为，同志们十分沉痛地告诉他：在宋家场负伤被捕的税联三、邹国宾、程德藩、毛长馨等同志，前几天在犍为游街示众后，被敌人全部杀害了。他们很英勇，在押赴刑场时仍昂首挺胸，神色自若，痛斥鞑虏。程德藩虽然两腿负伤，临刑时，仍盘坐于地，索笔疾书，写了两首绝命诗：

一

烈士惜名不惜身，茫茫宇宙甚昏沉。
西风洒尽英雄泪，莫把河山付外人。

二

沧海茫茫接九阙，当前天日惨昏沉。

腥羶未洗中原毒，成败何关死后名。
失足已知群害马，断头谁与吊青绳。
满腔热血沉黄土，化作啼鹃唤国魂。

围观群众见此情景，无不动情下泪，都说他是一条好汉，纷纷出钱棺殓。

熊克武听完同志们的血泪诉说，心里十分难过，忿忿地说道：“敌人杀害了我们多少好同志啊！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志报仇！”

1910年1月上旬，熊克武来到嘉定。

嘉定的同志看到熊克武在敌人的悬赏追捕中，不仅没有退避，还亲到重点清剿搜捕的地区来打探情况，指示工作，安抚死者家属，大家都很佩服他。他的行动，给了同志们很大的鼓舞。

熊克武把嘉定的工作作了必要的交代和处理后，返回家乡井研。

这次起义，井研牺牲的同志特别多，他深感内疚，忍受着心灵的巨大创痛，去逐家安抚死者家属。当时，曾冠仍任警察所长，他给熊克武的活动以很大方便。

熊克武来到邹国宾家，见他的妻子刘氏和三个年幼的女儿挤在一间破茅棚里，心里一酸，眼泪簌簌的掉了下来。他把邹国宾的遗书交给了刘氏，书云：

刘氏爱妻：

宋家场战败被执，愧对井研父老，吾事毕矣，望善将儿女抚养成人，以驱逐鞑虏，振兴中华为志。

邹国宾己酉十二月

临别时，熊克武交给刘氏10两银子，嘱她做个小生意度日。

熊克武正准备秘密返家看看自己的亲人，忽接曾冠送来的密信：“余英被执，正从云南大关押赴叙府。”

他立即带着秦显忠直奔叙府。

当他们赶到叙府时，听见城里的人议论纷纷，说余大爷在云南占山为王，反对官府，被手下人出卖，落入官府手中，明天就要押到叙府了。

第二天一早，熊克武在北门外找了一个茶馆坐下，打探情况。到了中午，他看见沿金沙江进城的路道上，人越挤越多，人们怀着好奇心，争先恐后，来看余英这位传奇式的英雄。

熊克武走出茶馆，挤进人群，他多想再看看余英英武的面庞，再听听他洪钟般的声音啊！

过了一会，只见一长队荷枪实弹的清兵在前开路，接着看见一辆马车上载着一个木制的囚笼，缓缓而来，囚笼上挂满了红绸红布。远远看去，整个囚笼好似一团在风雨如晦的寒夜中滚动的灿烂火球。

囚笼两旁各有一队荷枪实弹、手提钢刀的兵勇。

熊克武见余英昂然站立笼中，正滔滔不绝地向群众揭露异族统治的罪恶，宣传革命道义，号召群众起来埋葬腐朽的清王朝，为建立民主共和而斗争。那洪亮的声音犹如震撼大地的雷霆，唤人觉醒，催人奋斗。

目睹这悲壮的场面，熊克武既振奋，更难过，他为党人中有这样的同志而自豪，也为同盟会中即将失去一位精英而悲戚。他的心在哭泣，在颤抖。他暗暗发誓：就是赴汤蹈火，也要救出余英。

想到这里，熊克武拉着呆站在那里的秦显忠离开了人群。他放眼望去，山道上那如潮的人流，囚笼中那飞扬的红绸，倒映在金沙江飞湍的碧波绿水之中。此情此景，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惊心动魄！

熊克武叫秦显忠立即前往嘉定通知10来个同志带上武器前来叙府。他自己留在叙府，和当地同志讨论劫狱计划。

过了几天，嘉定同志陆续来到叙府。熊克武正准备行动，忽然接到知府衙门里党人送来消息：“余大爷于昨晚被秘密处决！”

熊克武顿时晕倒在地，好一会才慢慢地醒过来。只见同志们低垂着头，在痛苦的啜泣。

秦显忠把余英临难时留下的一首诗送到熊克武手上。那苍劲有力的字迹，熊克武是多么熟悉啊：

牡丹初放却先残，未捣黄龙死不甘。

我本为民兼为国，拼将热血洒红毡。

熊克武两眼久久地停伫在纸上，那薄薄的纸片仿佛化成了余英武的形象，他那轩昂的气宇，风采的神情，炯炯有神的目光，不断在熊克武眼前翩飞。

过了两天，熊克武的心绪才平静下来，他安排好叙府的工作，又带着秦显忠上成都。

熊克武到达成都，向成都的同志报告了嘉定起义的经过及善后处置情况。成都同志对熊克武这种善始善终的工作态度，这种对同志、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由衷敬佩。

成都同志向熊克武建议：嘉定起义，牺牲太多，元气大伤。武装斗争应暂停一时。你应当出省向总部建议选择一个重要地方，集中主要力量，发动一次全国规模的武装起义。现在许多同志都已离开川省，你出省后，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全国的武装起义。

熊克武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于1910年春，肩负四川同盟会党人的重托，离开四川去上海，去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注释：

①载井研县志办《井研县文史参考资料》第4期。

这三首诗是县志办王宗鼎同志在三江公社一个姓宋的社员家发现的，并作了如下说明：

“题写壁诗的房屋，原是熊克武好友宋为章的家。宋是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前马边战役中壮烈牺牲。

经过四川几次起义失败后，为躲避清军缉拿，熊克武来到宋家隐藏。虽然当时母亲病故，也不敢归家，诗中流露了伤感之情，也抒发了他推翻满清王朝的雄心壮志。

写诗的时间，是宣统二年，即1910年。”

熊克武的八弟熊达成同志在《回忆二哥熊克武》（《四川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一文中曾将这三首诗和王宗鼎同志的说明附记于后。

我们对这段说明文字有如下意见：

1. 关于邱氏的逝世时间。

1984年6月，马宣伟同志在北京访问熊克武亲属廖望月时了解到，熊克武生母邱氏在熊克武留学日本前即已病逝。邱氏病逝后，熊克武由婢娘代管，婢娘待熊克武不好，这是熊克武到成都考官费留学日本未取后，即不愿返回井研的原因之一。

1984年7月，周富道同志到井研，由王宗鼎同志陪同前往研经镇访问，据了解熊家情况的老人回忆，邱氏在熊克武小时便已去逝，与熊克武夫人所谈大体吻合。

因此，邱氏逝世的时间不应是1910年，而应在1906年以前。

2. 对第三首诗内容的理解。

“说明”认为第三首诗是因母亲病故而作，“流露了伤感之情”。

细品此诗，如因母亲病故而作，怎么起首两句便是“别后罗衾谁共暖，相思肠断五更中”呢？旧时“罗衾共暖”指夫妻的恩爱之情，“相思肠断”指夫妻的思念之情。

因此，我们认为这首诗不是“因母亲病故而作”，而是为思念自己的妻子陈静芬而写。

从诗的后两句看，“燕子伤春”形象地写出了革命遭到的挫败。但作者在失败面前，在敌人的残酷镇压面前，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悲观颓唐。“登高次第数秋风”，我们从这明快的情调中，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者开朗旷达的性格，对革命事业满怀必胜的信念么？

我们认为从全诗来看，感情是健康的，情调是明快的，还不能说流露

的是“伤感之情”。

另外，王宗鼎同志把这三首诗误断为是两首。而把二三首合在一起，认为是一首律诗。其实，这是三首绝句，各有一个完整的画面和意境。

第一、二首诗是述志，格调高昂豪放。第三首是抒情，于绵绵情思中播发出清新明快的情调。

以上意见，我们曾和王宗鼎同志交换过，他基本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另作说明。

第三章 广州起义，九死一生

一、筹备起义

1910年夏，熊克武避过清政府的搜捕，来到上海。不久，又偕同几位四川同志和留学日本结识的好友一道，辗转来到香港，在跑马地35号见到了黄兴。

黄兴异常兴奋地告诉他们：“孙中山先生已决定在广东再次发动起义，你们来得正是时候！”说完，他从抽屉里取出中山先生3月14日发给他的电文和3月28日写给他的长信，递给熊克武。熊克武一气读完，又传递给吴玉章、但懋辛等人。大家阅后，无不欢欣鼓舞，跃跃欲试。

黄兴还告诉大家，中山先生正为这次起义在海外四处筹款。他给大家分配了任务：熊克武、但懋辛、井勿幕联络同志，选好骨干，组织起义力量；吴玉章前往日本负责购运枪弹。

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在南洋马来半岛槟榔屿四间街寓所内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槟榔屿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应中山先生电约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槟榔屿、怡保、芙蓉和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孙中山先生分析了整个革命形势，并针对部分同志中存在的悲观主义思想指出：“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并表示：“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

吾当力任设法。”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

黄兴于1911年1月18日返回香港，向熊克武详细介绍了槟榔屿会议的情况，立即着手筹建起义指挥部。1月底，正式成立了组织领导广州起义的指挥中心——“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指挥中心设在跑马地35号；另在百花街设实行部，专门制造起义时所用的炸弹，并准备暗杀用具，由方声洞等负责。

统筹部成立后，熊克武向黄兴建议，通知同盟会党人、著名的“炸弹大王”喻培伦（四川内江人），火速前来香港帮助制造炸弹。喻培伦接到通知，不顾身残体弱（他在一次试制炸药中，手臂和眼睛被炸伤，三个指头被炸断），迅速赶来香港，在中环摆花路设立了制造和储存炸弹的机关。

这时，革命党人陆续云集广州，他们有的以做生意作掩护，有的扮成夫妻，有的临时组成一个家庭，分散住在广州城内。

熊克武被分配在交通课，联络各地同志。此外，他还没日没夜地协助喻培伦制造炸弹和进行试验。

熊克武在没有开发的、人迹罕至的九龙荒滩上为喻培伦选择了一个试验地点，暗中试验引爆，帮助喻培伦总结试验的经验教训。

在试制炸弹中，他们感到最头痛的是引爆问题。用火点燃导火绳，然后扔出去，不是在空中就爆炸了，便是熄了火，成了“死弹”。经熊克武和喻培伦反复琢磨，终于试制出了用安全火柴代替导火绳的新式引爆炸弹。这种炸弹，不用火点引线，只要撞到投击目标，便自动爆炸。

熊克武和喻培伦携带着这种新式炸弹来到试验点，喻培伦面对广漠的荒滩，无垠的大海，一挥左手，火光闪处，轰隆一声巨响，烟尘碎石四处飞溅，海滩上炸开一个大窟窿。熊克武高兴得紧紧抱住喻培伦，跳着说：“成啦！成啦！”果然，后来在广州起义的武装斗争中，这种炸弹个个准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给了贪

生怕死的清军以很大的威胁！

2月初，黄兴派熊克武带队与但懋辛、喻培伦、李文甫、林直勉等人到广州调查城内外地形、交通路线和重要机关的地址，要求绘成简图。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是一个顽固凶恶的家伙，他是四川人，在他统领的部队中四川人很多。熊克武抓住这一线索，设法通过同志中川人开展活动。

经广州市一区警察局巡官李天钧和广州河南警察局巡官邹有章的介绍，熊克武结识了水师营同乡王书记，探听到了一些广东水师布防的情况。王书记还主动告诉熊克武：“观音山炮台是旗人把守的，他们唯利是图，在炮台里卖鸦片烟，还聚赌抽头。”他邀请熊克武一行去炮台喝茶，看广州市的风景。

2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天气晴朗，熊克武带着但懋辛、喻培伦随水师营王书记、警察局巡官李天钧、邹有章等人，披着熹微的晨光，越过相传是西汉征和年间交州刺史罗宏所建的石蹬道，沿着石级登上了观音山炮台。

观音山炮台，又称“四方炮台”，座落在背倚白云山，南临珠江水的观音山翻龙岗顶，建于清初，长宽约48米，高7米，内设大小炮20多门，是广州城防的重要据点。

熊克武登上炮台，放眼望去，广州市尽收眼底，西江、北江、东江宛如三条宝蓝色的玉带束着绿树葱笼、繁花点点的广州城，在那飘荡的玉带之上千帆张张，百舸争流。他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多么可爱的广州，多么美丽的水上城市！”

到炮台后，王书记抢着办招待，泡了几碗茶，买了许多糖果糕点，大家边喝茶、边摆家乡龙门阵，摆得津津有味。熊克武一边在谈笑风生地摆龙门阵，一边暗暗地记下了各门炮的位置。

喝了一阵茶后，王书记又领着他们参观大炮，熊克武便暗中示意但懋辛、喻培伦同去，他们借此机会分别检查了几门大炮。

在检查中他们发现炮虽是旧式的，但还可以射击。

王书记还领他们参观了炮台侧边的一幢五层楼房，这座楼房一向归驻守骑兵看守，只要交纳一枚铜币，便可登楼观光。

熊克武登上顶楼，站在平台上向北远眺，那便是著名的白云山，俊俏多姿的群峰拱卫着高耸入云的摩星岭。观音山顶，一座气势雄伟的五层楼房在阳光照射下，正熠熠发着光，这便是名著广州的“镇海楼”。

面对“镇海楼”，熊克武很自然地想到了明代雄镇海疆、使倭寇闻风丧胆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他默默地告诫自己：克武啊，克武，应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与清廷作殊死的斗争。

2月中旬，熊克武依靠当地同志，顺利完成了在广州的实地调查任务。返回香港后，黄兴专门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熊克武在汇报中建议发难时首先占领观音山炮台。他说：“届时只要多拿些钱贿赂驻守楼房的骑兵，多派一些同志上去，便可唾手占领炮台。事成以放炮为号，踞高临下，攻总督府就容易了。倘若攻总督府受挫，退亦有路。”许多同志都认为熊克武的建议可行，唯独洪承点坚决反对，他充满豪气和自信地说道：“革命党人举事有进无退，且无所谓成败，亦不应先发此议，使参加者生顾虑之心。”熊克武这一可行之策，就这样被搁置一旁。

黄兴又派熊克武带着喻培伦、但懋辛等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作好现场准备工作。熊克武在总督署附近租了一幢房子，挂了一块吴公馆的牌子，作发动起义时用；又在广州河南岸的溪峡，地僻人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选租了一幢合用的民房，挂起但公馆的牌子，作为交通站和制造炸弹的地方。

安排妥当，喻培伦便开始在广州日夜赶制炸弹，熊克武有空就帮助碾炸药。只用了个把月工夫，便做了半磅、一磅、两磅重的炸弹300多个，由熊克武冒着危险，分批运到吴公馆内储藏。

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备，“统筹部”已组成一支拥有800人的“先

锋”队，在广州设立了38处秘密据点，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大致联络就绪。

4月8日(农历三月初十日)，熊克武赶回香港参加黄兴在统筹部召集的重要会议。会上，大家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广州举事，拟制了八路进袭的战斗计划，一致推举黄兴、赵声为革命军正副总司令。

同日，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等许多官吏前往广州城外燕塘观看飞机表演，刚从南洋霹雳埠锡矿返回广州的工人温生才闻此消息，来到城门外一个茶馆里，从上午一直守候到傍晚，忽见大批卫队簇拥着一乘华丽的大轿，喝道而来。他立即从茶馆冲出，拔出六响手枪，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开枪，连发4弹。卫队、轿夫见状，惊逃四散。孚琦毙命后，他才从容回城。不幸在途中被巡警捕获。

由于孚琦被杀，清军严加戒备，加上枪械又未按期全部运到，因此起义决定延期至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进行。

4月15日，熊克武刚行至惠爱街闹市，便见清军押着温生才经过惠爱街前往刑场。

熊克武站在人群中，用钦佩的目光望着身材高大壮实的温生才，只见他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神色自如地边走边对着街道两旁的人群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身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目睹乐观旷达、视死如归的温生才，有的群众在啧啧赞叹，“真是一条英雄好汉！”，有的在唏嘘哭泣。面对此情此景，熊克武情不自禁地说道：“真是虽死犹生啊！”

二、血战粤城

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后，立即在小东营五号——一幢四进三

间的青砖民房里建立了起义的秘密指挥部，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这里距离清政府的两广总督署不过500步。

正值紧要关头，由于内奸告密，风声泄露，甚至报纸也登载了“乱党准备起事”的消息。督署派出大批清兵日夜巡逻，四出搜捕，情势十分紧张。

起义指挥部的储备课长胡毅生和编辑课长陈炯明等人在气势汹汹的反革命淫威面前忽生畏惧，要求起义改期；姚雨平也故意向黄兴要枪500支，存心刁难。黄兴无奈，下令除负责的基干外，其余300名“先锋”队员由赵声全部带回港九，免遭敌人搜捕。

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熊克武立即在但公馆召集四川的几位同志开会商讨对策。熊克武刚向大家宣布总部作出的起义暂缓举行的决定，大家便火爆似的一下议论开了，指责总部首脑贪生怕死，要求起义如期举行。认为如果起义不如期举行，不仅对不起大量捐资的海外华侨，还可能遭到许多无谓的牺牲。

喻培伦自告奋勇地说道：“我要亲自往见黄兴，我们四川同志是有骨气的，指挥部要撤，我们也要干，不杀张鸣歧，无以谢国人！”

喻培伦向黄兴传达了熊克武的意见，痛陈利害说：“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的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于今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个大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再则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并坚决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听了大为激动，决定集会同志数十人，杀张鸣歧以谢国人。

4月26日，姚雨平、陈炯明又向黄兴报告：新调来的顺德三营，哨官中十之八九系同志（事后证明，陈、姚的报告并不可靠）。

于是黄兴最后确定27日下午5时半发难，并于当日下午急电香港：“母病，急速带通草。”这是令党人急速来广州起事的暗语。由于时间太紧迫，刚返港的300余同志实难于27日乘早班船全部赶到，即电请推迟一天。黄兴因部署已定，决定不再更改。

由于这样一再改期，一切部署全被打乱，人数大减，不得不放弃八路进兵的计划，改用擒贼先擒王之计，集中力量兵分两路攻打总督署，活捉两广总督张鸣歧。

27日早，黄兴因为还没有得到香港同志晚来一天的消息，便派熊克武和方声洞、林时爽去接船，准备把他们分批带进城内安顿。船到了，人却没有来，熊克武只得叫方声洞和林时爽先回城报告情况。他独自怀着一线希望，一直等到下午3时半，才失望地赶回指挥部。进南门时，碰着林直勉戴一副黑眼镜坐着轿子出城，接着又遇见陈炯明。因时间紧迫，熊克武要陈炯明带路走捷径赶回指挥部。陈仅指点了一下方向便匆匆地出城了。当时熊克武还以为这两人另有特别任务，后来才知道他俩临阵脱逃，做了可耻的逃兵。

这天，小东营5号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布置得像办喜事的样子，广西、广东、湖南、四川以及华侨各路同志打扮成贺喜的客人，兴高采烈，陆续到来。

下午4时，黄兴把大家召集起来，作了战前的鼓动演讲。他痛心疾首地谈到：“鸦片战争以来，满洲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老百姓，弄得中国暗无天日。如果不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推翻，亡国之祸即在目前。”他满怀激情地说：“革命一定会成功，革命一成功，就要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人人有田种，就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和满清政府的压迫，大家都可自由幸福地生活了。”

在黄兴演说的激励下，群情鼓舞，个个摩拳擦掌。当即发放枪械。正在发放时，朱执信赶到，他当即剪掉长衫下截加入起义队伍。

正在这时，熊克武赶回小东营指挥部。同志们见他赶回来了，众口齐声地问：“到了没有？”熊克武看见同志们已全副武装，正在吃面包，精神抖擞地候令出发，感到在这紧要关头不能浇同志们的冷水，便简单地回答：“我刚进城。”黄兴心里明白，便催熊克武赶紧回吴公馆，准时出动。

熊克武回到吴公馆，喻培伦、但懋辛、饶国梁、秦炳等4人还在那里。此时，何克夫又带来花县11位同志。他们都是农民，没有打过仗，不会用手枪。熊克武急叫但懋辛教这些同志实弹瞄准射击，他自己忙着去给大家张罗饭食。

喻培伦身残体弱，出发前熊克武和同志们都劝他不要去。熊克武对他说：“你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教给别人，这对革命大有好处。”他固执地断然拒绝说：“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制炸弹，现在自己做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有的同志还说：“不少你一个人啊！”他却倔强自信地说：“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熊克武心里明白，这并不是言过其实，论抛炸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他确实比谁都高一着。同志们还要劝他，他索性慷慨激昂地宣称：“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应当为前驱，决不退缩。”熊克武见说不服他，只好让他一同去参加战斗。

当时的行动计划是，由黄兴亲自率领百余人直攻总督署前门，熊克武率领小分队负责袭击督署后门。

下午5时半，熊克武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小分队队员已带好武器，扎好标记准备出发时，忽然听到枪声响了。大家一手拿短枪，一手拿大刀，把炸弹装满口袋，喻培伦还在脖子上挂着一个装炸弹的筐子，在熊克武的带领下飞步前进。

熊克武所率小分队刚到达督署后面。喻培伦对着围墙就扔了一颗炸弹，墙裂但未炸穿，熊克武赶急飞步上前，将一个10磅重的炸弹塞进裂隙，才把墙壁爆了簸箕大一个洞，一时烟雾弥漫，但懋辛首先冲进去，不幸左臂中了一弹，但仍顽强地随大家蜂拥而

入。枪子与炸弹齐飞，杀得警卫的清兵四散逃命。

熊克武带领小分队从后花厅一直打到二堂，见厅署空无一人，张鸣歧不知去向。至堂院，碰见几十名广东同志，熊克武便上前询问前门战况，打听黄兴的消息，因语言不通，他们只是瞪大眼睛急得直是摇头。熊克武遂带领大家直趋东西辕门，见陈尸累累，清兵和起义同志的尸体混在一起，仅李文甫和林时爽同志的遗体尚能辨认。熊克武见此情景，知黄兴所率队伍损失很大，便带着在堂院碰见的十几个广东同志一起离开督署直奔督练公所，希望能在那里与黄兴率领的队伍合并，一起作战。

他们进到莲塘街北口，碰上了清军水师。熊克武对着清军大声喊：“同胞，打不得！我们是革命党，请派代表过来交涉。”清军即停下来，也没有打枪，似乎犹豫不定。喻培伦又接着喊：“把枪放下来，速派代表出来！”清军既不放下枪，也不答话。喻培伦等得不耐烦，甩了一个炸弹过去，清军还击了一排枪。大家迅速分散于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负伤的同志就搬运炸弹，或代装子弹。

熊克武扶着受伤的但懋辛，继续指挥战斗，仗打得分外艰苦。

喻培伦单人攀登屋顶，利用有利位置，等清军冲过来时，猛投炸弹。

在熊克武机动灵活的指挥下，在同志们英勇顽强的阻击下，小分队连续打退了清军的几次冲锋，敌人死伤不少，再也不敢逞凶了。双方在原阵地上相持至半夜。

熊克武判断：清军是企图等待天明，再发动总攻。他思忖，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小分队只有凭借黑夜掩护，分散阻击，才有可能突围，等到天明就有被围歼的危险。他和大家商定分批退却，且战且走，从小北门越城而出，去找新军联系，并吩咐广东的莫纪彭向居民借梯子。梯子借到后，由两个抬梯子的广东同志带路，

小分队向小北门方向撤退。

三、死里求生

熊克武带领小分队的同志穿过几条街巷，快到小北门时，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原来掉在后面的部分同志经过警察分所门口时，被警察队发现，打起来了。队伍被切成了两段，后面的同志已无法跟上来。

这时，城楼上的卫兵望见了他们，大声问：“什么人！”并放了两枪。抬梯子的同志向横巷内穿过，后面的同志跟着穿过。熊克武穿过巷口，快到城墙边时，和他在一起的，除抬梯子的两位同志外，只剩下但懋辛、饶国梁、秦炳、罗允、莫纪彭、张梅生6人了。他们在此等了好一会，后面的同志还是没有跟上，只听见远远的枪声和炸弹声。于是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在城墙附近芦苇丛中摸索前进时，熊克武扶着但懋辛紧跟在抬梯子的同志后面，其他同志在芦苇丛中又和熊克武失掉了联系。

到了城墙边，抬梯子的同志把毛巾标记扯下来，顺着坡往城墙上爬去，熊克武听见他们与卫兵叽哩咕噜说了一阵，许久无动静。他以为他们办好交涉，会转身来引大家一起走，谁知这两人一去便不回来了。

熊克武不敢再在原地呆了，沿着城墙脚，溜到距城楼较远的地方坐下来。过了一会，熊克武叫但懋辛就坐在那里，他自己沿着城墙脚延伸探索，探索了好几个地方，发现都有清兵把守。他仍不死心，便往更远处延伸，快爬到坡顶，在接近城墙的地方，忽然从城墙右边走过来两个清兵，在熊克武头顶上坐下来，并返身连枪带刺刀往土坡上一插，刺刀嚓地一下从熊克武耳边擦过。熊克武紧贴土坡伏着一动不动，大气也不敢出。忽然一只手触到他的脚板，他一惊，一仰身，准备拼搏，身子便往下直滑，这才发

现是但懋辛，两人一起滚下坡来。

上面的兵听见有响声，一个说：“也夜夜（什么东西）！”一个说：“狗仔哦！”熊克武听了才大松一口气。

他俩只好转回原地，坐以待机。熊克武对但说：“刚才好险，我差点死在那两个清兵的刺刀下了。”

这时，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珠江上敌舰时而向城北放出灯光照射，城墙上的清兵也不时向黑暗处放排枪，他俩正坐在陡壁下，死角很大，枪是打不到的。

探照灯照过来时，他俩借着灯光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池塘。眼看快要天亮了，但懋辛提议说：“算了！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跳水自杀吧！”熊克武身体微颤了一下，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但感叹道：“只有此路了，总比当俘虏、受敌人凌辱强！”

熊克武望着微微泛出鱼肚白的天空，望着阴森的城墙，想到谢奉琦临难不避，视死如归的高大身影，耳边仿佛响起了他低沉而坚定的话语：“不幸无成，丈夫死则死耳，……且事败而图苟免，非勇，吾方以节义声天下，振民懦，劝来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熊克武同意了但懋辛的主张，和但从土坡上滑下来，走到池塘边纵身往下跳去，哪知池塘里的水还淹不到脚背。

这一跳使他俩顿然清醒过来，意识到现在还不是非死不可的时候，应当活下去，为死者报仇！

他俩又转回原地，发现右侧有一排平房，围墙不过一人多高，像是工人宿舍。熊克武喜出望外地指着那一排平房对但说：“有救了，老百姓大多是同情革命党人的，等一下哪一家先开门我们就钻进那家去。”

拂晓时，中间一家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人，屋里摆着许多桌椅，像是教蒙童的老师。但懋辛走上去用不三不四的广东话向他办交涉。熊克武以为谈妥了，提脚向室内跨去，那人顿时变脸，一把把熊克武推出门去，嘎的一声把门紧紧关上。

他俩看情形不对，转身出巷，躲进一个公共厕所。但懋辛说：“我两人一路出去，两人都危险，我是光头，又负了伤，行动不便，你把毛辫子和扎起的衣裳放下来，把有血的袜子脱了不要，去东一区找巡官李天钧，他会想办法让你返回香港。你告诉李带一套制服，假装搜查革命党到厕所来，以便我化装逃走，并以拍手为号，我一定在厕所躲着不走。”

熊克武想了想，看来只有这一条办法了。他向但懋辛说了声“留神点！”便走出了厕所。

这时，熊克武疲劳极了，饥饿极了，硬着头皮走进一老百姓家求食。老乡一眼就看出他是干什么的，但却不怕受牵连，还用普通话与他交谈，亲切热情地请他坐下来休息，又叫他刷去满身污迹，并给他弄了些东西来吃。临走时，那老乡又硬拿出一套干净衣服叫他换了再走。熊克武深受感动：老百姓对革命党人是多么热爱和关心啊！

离开老乡家，熊克武径直向东一区警察局走去，顺利地找到了李天钧，把情况向他简要地谈了谈，叫他赶快解救但懋辛。李天钧立即派人把熊克武送到河南邹有章处，由邹代熊克武买好船票，这样熊克武才脱险回到香港。

李天钧临事胆怯，他把熊克武送出广州后，便丢下但懋辛不管了。直到5月3日，风声稍松，但懋辛经过一番改装后，假冒邹有章的名写了一张请李天钧到长堤东方酒家叙谈的条子，带着斗笠，冒着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径直往东一区找李天钧，一方面想打听熊克武的下落，一方面想请李设法把自己送到香港去。不幸但懋辛刚到警察所，便被敌人发现，被送到巡警道衙门关押。

审问中，但懋辛一直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不屈不挠，不卑不亢，保持了革命者应有的气节。

巡警道道台王秉恩是四川成都人，他圆滑世故，老于官场，由

于但懋辛的案子牵涉到他的下属李天钧和邹有章，他怕负用人不当之责而丢官罢职，于是敷衍上司，假说但系主动“自首”，最后将但懋辛“押送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约束”。

这次起义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相差太悬殊而失败，总共牺牲80余位同志。事后收殓遗骸72具，由党人潘达微营葬于白云山麓的黄花岗。

对这次悲烈的起义，孙中山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

参加这次起义的四川同志共5人，除熊克武、但懋辛两人幸存外，饶国梁、喻培伦、秦炳3人均在突围时力尽被俘。他们被俘后，宁死不屈，壮烈献身，表现了革命党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

第四章 组建蜀军，率师返川

一、奔赴陕、鄂

广州起义失败后，熊克武从香港回到上海。

刘亚休告诉熊克武，前不久文渊（井勿幕字文渊）兄从上海返回陕西时，留下话说：“如锦帆兄来上海，请他赴陕西协助革命。”刘亚休还告诉熊克武：“听文渊兄说，陕西哥老会在新军中颇有势力，‘刀客’也大都倾向革命，只是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缺乏好的军事指挥员。”

熊克武和刘亚休、赵铁桥等人分析认为：陕西地处西北一隅，一向不为清廷注意，一旦起事易于成功。陕西得手，可进图四川，扼制武汉三镇，利于造成全国形势。

大家都支持熊克武前往陕西探探虚实，如有用武之地，即来信通知他们一同前往。

熊克武从上海乘船到汉口，又从汉口乘汽车到郑州，从郑州换乘火车到洛阳，然后从洛阳坐了八九天马车才到达西安。

在西安，熊克武见到了友人井勿幕和四川党人杨兆蓉。由井勿幕出面，把熊克武安排在建本学校任教。

建本学校革命空气很浓，不仅教职员中，就是学生中，革命党人都是很多的。

不久，井勿幕得到同盟会总部的通知，决定在农历八、九月

间，在全国各地同时发动武装起义。

八月下旬，井勿幕在建本学校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胡景翼、钱鼎、熊克武等。会议决定于十月六日在西安发动起义。

由于走漏了消息，驻防西安的清军防范甚严，难以举事，于是临时改变计划，由熊克武和钱鼎继续留在西安策动新军起义，并勿幕、胡景翼则前往渭北组织“刀客”发难。

安排停当，熊克武即发信给在日本的四川党人任鸿隽，在上海的刘亚休、赵铁桥等，希望他们协助陕西同志购买武器，并安全运到陕西。然后，他便深入到新军官兵中去做发动工作。

局面刚刚打开，武汉起义发生了。

熊克武闻讯，仅向钱鼎作了简单的交代，便匆匆奔赴武汉参加起义。

刚到汉阳，熊克武遇到党人陈一夔代表川路公司来武汉查帐。陈告诉熊，黄兴已到武汉，被推为战时总司令。熊克武便和陈一夔一块前往汉口歆生路满春茶园总司令部面见黄兴。

黄兴见到熊克武，喜出望外，打趣地说：“我们又在战火纷飞中相见了。”

这时，冯国璋正指挥北洋清兵猛攻汉口，武昌吃紧。来不及寒暄，黄兴即摆开地图向熊克武介绍武汉三镇的战况，以及全国的战争形势。

熊克武听完黄兴的介绍，深感局势严重。他沉思了好一会，说道：北洋陆军久经训练，装备精良，增援部队还在不断开来，我军已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今之计，只是催促上海及苏、浙、粤各路联军，急取南京，方可解武汉一围。

黄兴认为熊克武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但无可奈何地说道：“找不到能担当此任的合适人选啊！”

熊克武自告奋勇：“克强兄，我去怎么样？”

黄兴十分感慨：“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候，都承你关照，那就偏劳你了。”

熊克武很快离开了汉口，和陈一夔一同急赴上海。

到上海后，他立即向中部同盟会总部和沪军都督陈其美报告了武汉起义的情况，要求陈其美联络苏、浙、粤各路民军，急取南京，以解武汉之危。

二、组 建 蜀 军

武汉起义发生后，四川党人纷纷由日本、南洋、天津、北京各地聚集上海。大家常在四川路大德里聚会交谈，认为现在各省联军还未攻下镇江，进占南京不知何时，即使南京收复了，武汉也仅仅是进取北京长程的第一站，各省联军踊跃参加，川省不可落后，应该赶快组织一支军队，积极参加。

原则虽已确定，而领导军队的人选问题，大家心目中却都是一张白纸，至于军费、军械、军官、兵员种种问题，更谈不到了。

熊克武的到来使大家喜出望外，一致公推他担负组织蜀军的任务。熊克武欣然同意，并在上海沪西大王庙设立了临时办事处，进行蜀军的筹建工作。

不久，黄金鳌也从爪哇回到上海，积极协助熊克武进行筹建蜀军的工作，他还和熊克武各出1000元作车旅费，邀集在各地的四川同志来沪组建蜀军。当时，保定军官学校学生吕超、张成孝等电告熊克武，望他能设法筹集路费，以便组织同学南下参加北伐。熊克武接电后当即兑款相助。

川籍党人在上海的人数骤增，为了加强组织领导，以利开展革命活动，熊克武建议在上海成立四川同盟会旅沪支部。大家积极支持熊克武的建议，于是召开会议。会上，大家公推任鸿隽为

四川同盟会旅沪支部主席，熊克武为军务部长，彭家珍为副部长，黄金鳌为总务部长，陈一夔为财政部长，郭蔚华为庶务。机构建立起来，熊克武便在上海成都路正式挂出了蜀军办事处的招牌。

后来彭家珍主动提出回北方去策动清军起义。彭家珍走后，组建蜀军的任务更多地落到了熊克武身上。

要建蜀军，摆在熊克武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筹措经费。

他曾多次要求同盟会总部拨发经费，然而总部只是空架子，哪来款项拨给他筹建蜀军。他曾请求沪军都督陈其美大力相助。陈其美刚任都督，战事又急，连应付自己军队的开支都困难，虽然也拨了一些经费和物资给熊克武，但却少得可怜，无济于事。

熊克武正一筹莫展之际，有人向他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待将来军事平定后由四川的新政府如数拨还。并告诉他，公司存款中有兰格志股票一种，系某国石油公司股票，是现在市面上极为稳定的有价证券，价值170余万元，由在沪蜀商童子钧、陈少谷两人保管。只要把兰格志股票弄到手，组建蜀军所需款项就全部解决了。

于是熊克武派童子钧的弟弟、党人童慎如偕同黄金鳌前去做工作。经多次商谈，童子钧、陈少谷均以款项甚巨，不敢负责为理由，婉言拒绝。这样经费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

正在这时，黎元洪的卫队长、川人黄祯祥，在武汉战役中受伤，到上海就医，也有组织军队的企图。他跑到童子钧处声称奉有大元帅的命令，威胁童子钧交出股票。童子钧本意是倾向熊克武组建蜀军，现在看见黄祯祥来势粗猛，不得已答应邀集旅沪四川同乡人士召开会议，共同解决。

在蜀商公所开会之日，黄祯祥带领武装兵一班人到会，在大家议论未决之时，不由分说，喝令军士将童子钧扣留，关押在一间屋内，他自己却大步离去。

参加会议的人被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惊慌失措，一轰而

散。

淡春谷见此情景，立即往告沪军都督陈其美，陈立刻派武装兵一排交淡春谷率领，去营救童子钧。

淡是文人，军队到手却不知如何举步，赶快跑去向熊克武报告。熊克武即派王子騤去带队。

王子騤是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参加过沪军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役，有带兵作战的经验。

王子騤接到命令，立即随淡春谷带领这一排人前往。他们赶到蜀商公所时已是深夜。王子騤派两个班在外面警戒，自己带一个班进去。

这时，黄桢祥带来的一班人三三两两坐在地上谈天，只有一两人在宅内看守童子钧。

王子騤向看守童子钧的士兵大声说道：“奉都督府命令将童子钧交我带回，你们各自回营。”

这一班人听了站起身来，将闷坐卧室内的童子钧交与来人，行了军礼，整队出门而去。

王子騤安慰童子钧几句后，率领队伍一起出门。到了华洋交界处，与童子钧各自分手。

这一幕不伤皮肉的全武行，不料倒发生了很大作用。

第二天上午，与童子钧共同保管股票的陈少谷跑到大德里找熊克武，一脚入室，便大声说道：“昨天的事，你们真好，说干就干，我们佩服极了。公司的兰格志股票我们决心全数交你们使用，不过这乃川路股款，非我辈私有，现民国已经成立，蜀军隶属政府，因此，只要中央政府愿作主担保，我们即行交出，以供军用。”

熊克武立即到沪军都督府，请陈其美速将蜀商商董的要求电呈孙大总统，以待批复。

1912年1月9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电告沪川路公司管

款员汪燮卿、管理折据员童子钧、陈少谷；中央政府特“委派黄复生、熊克武二员到沪接收路款”，令他们“妥速将所存川路股款，一律清算，点交黄、熊二员接收。”“事关军务，幸勿迟延。”并告诉他们，政府“念该款本系商股，若有私人借用，事前既易起纷争，事后恐难于归还。不如改由中央政府照数给与公债证券，似此办法，既有裨于大局，复无损于商本。”俟交收清楚，即由财政部发给公债证券，以昭信用，而重商股。”

经费问题经过一番周折，在孙中山先生的亲自过问下总算解决了。

下一步便是向外商购买军火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为了集思广益，熊克武召集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大家认为，运输便利迅速，首推日本，决定以日商为对象。

王子騤对于军械品种的选择、质量的鉴定都较熟悉，而且他的日本话说得相当纯熟，熊克武责成他出面与日商交涉。

那时日本大仓洋行在上海设有分行，专门售卖军械和军用物品。王子騤了解到黄兴（当时刚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前两天才向该行订购过一批军械，并了解到所订军械的大概价格。随即，他胸有成竹地前往大仓洋行，越过华买办这一关，以日语直接与洋行大班谈判。说明需要军械种类，但目前尚无现金，以兰格志股票抵押作保，于一定期限内用现金无息收回。

大班回答说：“物品的有无和多少，我们不能决定，须电东京总行请示，兰格志股票样品请交来，以凭调查是否当地有价证券。”

过了一天，大仓大班向王子騤回话说：“东京来电说：‘新式步枪不能出售，只能出售俄式步枪。机关枪和山炮可出售新式的，其他所需军用物品都可照办。’”并说：“股票已经调查，确是有价证券，可作担保，望即以各项需要数目告我。”谈妥后，王子騤立即向熊克武作了汇报。

熊克武和大家共同议定购步枪2000支，配子弹200万发，机关枪12挺，山炮6门。另外还有手枪、望远镜、子弹盒、指挥刀、战刀，等等。

其后，王子騤又与大仓洋行交涉。双方议定总价格25万余元，以股票数十万元交该公司作保证，限一年期满以现金收回，不付利息。

临到签字时，大仓大班忽又提出：“你们的军队既是准备北伐，便是流动无定的，将来抵押期满，我们寻觅负责人颇不容易，应该由地方长官加一书面担保，才有着落。”

熊克武对日方这种双重担保的过分要求很是恼怒，不愿接受。但转念一想，北伐大事迫在眉睫，也只好勉强答应了。

找谁担保呢？熊克武很自然的想到了川籍现任江苏都督兼南京临时政府内政部长程德全，认为他最恰当，但又苦于四川党人与他素无交往。

适值川人赵尧生先生从北京迁往上海，他与程交谊甚深，黄复生又是赵尧生的学生。这样，熊克武便派黄复生前往赵尧生处，请求他为此事赴南京一行。他欣然应允。

熊克武派王子騤、黄复生陪同赵尧生到南京会见程德全，说明来意。程满口答应，并说：“锦帆我是知道的，今由他组军北伐，我没有不赞助的。”饮食招待后，程写好担保书，加盖私章关防。这件事顺利解决了。

购械的正式合同由熊克武、黄金鳌、王子騤签字，并约定日期，由日本轮船负责将全部货物一次运到南京下关码头交货。

不久，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即正式行文授熊克武为左将军蜀军总司令，并赋予组建蜀军的全权。

为了协调各方关系，熊克武将司令部下面各级官佐的人选，交大家共同拟议，由他委任。蜀军的各级组织机构很顺利地建全起来。

同时，熊克武派出尚传义、彭远耀、邹延薰等前往宜昌、夔府、万县、忠州等地招练士兵。这些县的县知事大都是同盟会会员，均竭力支持赞助，士兵火饷，全部由当地县府筹垫，按照南京陆军部规定发给，因此招练士兵的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

全军士兵的呢制军服、皮鞋、皮带、饭盒、背囊等装备在上海订购，熊克武苦于现款拮据，价款无着。适逢蜀军政府派张懋隆携款数万元到武汉买枪不成，来到上海。熊克武即和他商定在此款内拨出一部分应用。军需用品也解决了。

为了节省开支，熊克武规定，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级军官，一律每月只支银20元。

一切准备就绪，熊克武率领蜀军由上海开赴南京，将蜀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马道街前清总督吴棠遗族的住宅。

不久，日轮运军械到达下关，熊克武亲率同志们到码头监护卸运。

当时蜀军在宜昌招募的士兵经过初步训练，已有一营开驻南京。

熊克武所率蜀军整装待发，正准备出师北伐。南北和议定局，北伐停止。

2月13日，当孙中山得悉清帝退位诏书及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报后，为了实践让总统职位给袁的诺言，向南京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作总统。

15日晚，黄兴约熊克武长谈。

他如释重负地对熊说：“吾辈十余年出身入死，兢兢业业所追求者，在推翻满族统治，建立五族共和，民主政治，现今目的已经达到，我辈也算克尽厥职了。”

熊克武提醒他说：“席儒先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袁世凯老谋深算，是一个谲诡奸诈，口是心非的野心家。’我们对袁应保持警惕，还是走一步，看一步为好。”

黄兴没有争辩。他对熊说：“陆军部已请示孙大总统，决定由你率领蜀军返川。回川后，你的任务一是调和成、渝两个军政府之间的争执；一是注意西藏问题，英国最近正乘势向西藏进兵，妄图把西藏分裂出去，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是协助地方政府维持社会秩序，严禁贪污不法。”他接着说：目前政府财力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仍准备拨给蜀军10万元作返川费用。

过了几天，孙中山在总统府接见熊克武。

孙中山关切地问道：“陆军部决定蜀军返川一事，克强兄已与锦帆兄谈过了吧。”

熊答：“克强兄前几天已告诉我了。我们准备2月底启程，轮船也已订包妥当。”

孙中山推心置腹地对熊说：“为了实践诺言，我已把大总统位让给了袁世凯。我们革命党人，不应为个人争权利，应为全体同胞谋幸福。”

孙中山停了一会，略为思索了一下，继续说：“目前对袁世凯有种种议论，我们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南方的革命同志一定要牢牢地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旦有事，方能应付。”

熊答：“对先生的教导，一定铭记在心。”

熊克武告诉中山先生，在南京的全体四川同志，为了寄托哀思，告慰忠魂，拟于22日召开追悼大会。他请中山先生写一篇祭文，届时颂读。

中山先生欣然答应了熊克武的请求。

22日上午9时，蜀军全体官兵及旅宁的四川同志，在马道街蜀军总司令部召开大会，追悼为创立民国而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蜀中烈士。

会议由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主持。

孙中山以大总统的身份参加追悼会，诵读了祭文。

熊克武听着孙中山先生那一唱三叹、哀惋凄清的吟诵，心潮

起伏，思绪万千。嘉定起义的悲壮情景，谢奉琦、余英、喻培伦、彭家珍等烈士的音容笑貌，与自己相处的历历往事，又一幕幕、一桩桩清晰地出现在他眼前。“岷江泱泱，蜀山峨峨”，烈士英名，将与天地齐寿，与日月争光！

“魂兮归来，瞑目九原，呜呼哀哉！”中山先生诵读至此，已气断声吞，熊克武也已泪流满面，整个会场一片唏嘘哭泣之声……。

三、率师返川

23日上午，熊克武率领军容严整的蜀军至南京下关码头乘轮返川。

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均亲到码头送行。送行的还有参议院川省议员张懋隆、吴玉章、周代本、总统府秘书处川籍同志李肇甫、任鸿隽，印铸局长黄复生等。

轮船行至汉口，熊克武专程过江拜访了鄂军都督黎元洪。

驻汉口日本军司令部主动派武官上轮船邀请熊克武检阅他们的军队。仪节颇为隆重。检阅式开始时，日军司令官侃侃致词，希望“日中亲善”，以后两军“切取联系”，等等。

熊克武心里明白，日军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在自己面前摆摆威风，并以联络感情为幌子，企图控制蜀军，为己所用罢了。

到达宜昌后，蜀军总司令部设在四川铁路公司驻宜办事处。

时春水未发，川江仅有的一艘数十吨的蜀通轮还不能上行，蜀军候轮，在宜昌滞留了好几日。熊克武利用这一空隙，抓紧时间整训军队。

在上海时，熊克武的一个广东朋友把原在上海制造局任工头的梁载基介绍给他随同入川。梁载基是一个十分能干的武器制造

家。临行时，梁载基设法在制造局取得许多黄色炸药，制成炸弹。为了发挥这批炸弹的威力，熊克武在宜昌招募青年学生百余人，士兵120人，组成义士团，学习使用这一武器，任命颜德基为义士团团长，曾宝森为参谋。

到3月中旬，春水仍未发，人心思归，加之军队久置途中困难亦多，熊克武决定全体乘木船溯江西上，人员和辎重共分乘大船100余艘。

当时川鄂政局初定，川江一带时有股匪出没，许多商船留宜不敢前进，至此便相率尾随大军后面，求其保护。

时值春暖花开，晨光熹微，片片朝霞撒落江中，鳞鳞碧波泛着淡淡的红光，春天的江水是多么惹人喜爱啊。熊克武站在江边，望着即将启航的浩荡船队，心潮澎湃，不禁想起1910年隆冬时节，自己只身单枪冒着凛冽的寒风，四处躲避清军追捕，冒险探监，愤然离开四川的情景，那时多么盼望革命党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啊！仅一年工夫，看，眼前这一队队威武雄壮、正列队上船的战士，不正是革命党人自己的军队么！

和煦的春风伴随着长长的船队启航了。那首尾衔接十数里的船队，好似蠕动在碧江清波中蜿蜒无尽的长龙，橹工纤夫，耶许之声相闻，旌旗飞动，蔚为壮观。目睹这一切，熊克武轻轻地赞叹道：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熊克武率领蜀军刚进入四川境内的巫山县，便有党人前来向他揭发下川东都督刘汉卿的问题。熊克武立即派出暗探前往万县了解刘的情况。

刘汉卿大约50来岁，方面大耳，腰圆体肥，像个怀胎妇人，外号“刘罗汉”。他原是盐防管带，拥有巡防军1000余人。此人老奸巨猾，善观时势。辛亥冬，见清廷大势将去，经与县人熊峰、潘大道密谋，突于11月25日宣布反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窃据了下川东都督的要职。他反正后，旧性不改，仍继续贪污作恶，残

杀革命党人，民愤很大。

熊克武行至奉节时，接到但懋辛派人送来的密函，谓：“‘三·二九’广州举事失利，余九死一生，通过种种艰难，才得以反归四川。目前川局复杂，川督尹昌衡手下的军团长胡景伊，即将出任重庆镇抚府总长，此人狡猾奸诈，已秘密唆使刘汉卿袭击蜀军。前途暗礁甚多，望兄行事小心。”

万县也有党人前来报告，说刘汉卿正在紧急调遣巡防军入城。

其实，熊克武已在万县组建了一个营，装备整齐，武器精良，军纪严明，战斗力很强。

熊克武分析，刘汉卿不敢明火执杖的在万县与蜀军较量。他对蜀军或拉拢，或暗中捣鬼，如此而已。

当熊克武泰然自若乘船来到万县时，便见刘汉卿带着都督府的大小官员亲往码头迎接，笑容可掬，礼节甚隆。当晚还在都督府举行盛大宴会，为熊克武洗尘。

在宴会上，刘一杯接一杯地给熊克武敬酒，左一个总司令，右一个总司令，殷情献媚。熊克武对他那套市侩作风十分反感。酒至半酣，刘满脸堆笑，对熊耳语道：“小人特意从云南采办了10箱烟土孝敬总司令。哈哈，小意思，小意思。”

熊感到自己的尊严受了很大的侮辱，严肃地说道：“孙大总统曾三令五申，严禁贩卖鸦片，刘都督难道不知道吗？执法犯法，何以服众？”

刘自知捅了漏子，脸刷的一下就变白了，连连点头说：“刘某知罪，刘某知罪！还望总司令海涵，还望总司令海涵！”

刘又别有用心的把蜀军司令部安排在城内迎宾馆，企图暗害熊克武，吞并蜀军。没想到亦被熊拒绝。熊带着嘲讽的口吻说：“我们是革命军队，官兵平等相处，官不离兵，兵不离官。”

熊克武到万县后，把司令部设在郊外的部队驻地——白崖书

院。

过了几天，刘汉卿打听到不少人在向熊克武告他的“黑状”，老羞成怒，准备于4月10日夜对蜀军进行突然袭击。

这一消息被熊获悉。熊克武决定提前行动，以最短时间解决刘汉卿。

10日拂晓，熊克武一声令下，蜀军全部出动，万县城内外军号齐鸣，震天动地，新式山炮大显威风，发发命中巡防军营地，仅半天工夫，刘的巡防军便被全部打垮。

刘只身一人逃到离万县城10余里的天成寨，追兵还不曾赶到，他就被寨上人民绑缚起来，解回万县。

随即，熊克武在城外田野召开群众大会，对刘汉卿进行公开审判。宣布罪状后，立即执行枪决。军官刘剑公恨刘汉卿残杀同志，拔出战刀，将他首级割下，设灵追祭被他残杀的烈士。

蜀军刚返川，便全歼了刘汉卿巡防军，取得了万县大捷，给四川党人撑了腰，解了恨。四川党人对这支军队寄予很大希望，对统率这支军队的熊克武十分钦佩。3月22日，蜀军尚在万县，重庆镇府总长夏之时即电告四川都督尹昌衡，已任命熊克武为重庆镇抚府师长。夏在电文中对熊在推翻帝制的伟大斗争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说他：“经验有素，夙著贤能，吾川十年以来光复事业，皆所缔造，备极艰难。广州之役，血濡弹雨，疮痍横身，旋同黄陆军总长屡谋光复……武汉起事，又适来沪，编练蜀军，为鄂应援……凡此伟绩洪勋，久动人宇。”明确表示：“重庆镇抚府师长，即以克武充任。”并说：“令下之日，群情欢跃，镇我东南，实钦阃外。”

4月11日胡景伊匆匆奔赴重庆，12日迫不及待地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出任“蜀军镇抚府总长”，立即视事。

4月20日，熊克武带领蜀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由万县乘“蜀通”轮抵渝。

船刚停靠朝天门码头，党人曹笃立即上船报告熊克武：“胡景伊已在朝天门一带布置了重兵，并在城上安放了许多大炮，扬言不准蜀军一兵一卒进城。”

不一会，胡景伊派来的代表也来到船上，道貌岸然地对熊说：“城内乃商业中心，不宜驻军；市民刚经变乱，对军队尤存戒惧之心，为安定地方计，请蜀军勿入城内。”并讨好卖乖地说：“胡总长对贵军颇为敬重，关切，已划定仅与重庆城一江之隔的江北县城作为贵军驻地，全部军需用品，概由镇抚府解决。”

熊克武对此人的来意是一清二楚的。为了避免冲突，不使市民受到惊扰，他立即命令“蜀通”轮开往长江北岸，亲自将部队带入江北县城，把司令部设在县城高处的吕祖阁。同时规定：严禁士兵入重庆城，官佐前往重庆城探望亲友须一律穿便服。

熊克武到渝时，成渝两军政府已签订合并条约，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已率队到成都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张到成都后闻熊克武已率蜀军到渝，便派朱之洪急返重庆面见熊克武。

朱之洪向熊克武详细说明了成渝两军政府合并的原因和经过，并说：“四川军政府任命的重庆镇抚府总长胡景伊已来渝视事，望锦帆兄能与他合作。

熊克武开门见山对朱之洪说：“我刚从南京回来，外面的情形我是知道的。南北议和和让位给袁世凯，并非先生的本意，因为临时约法是管不住袁世凯的。于今成渝合并，所凭借的仍然是一纸协议书，将来怕要吃亏，难免有后悔的一天！”

朱之洪急忙解释说：“文澜（胡景伊的别号）无他，是可以同我们合作的。”

对胡景伊，熊克武是深知其人的。

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镀金回国后，曾在四川武备学堂任教，后在广西任新军协统。辛亥广西起义时，开始众推胡为都督，胡胆小观望，才改推布政使王芝祥为都督。胡见所部

响应义军，弃职逃跑了。王芝祥曾电请黎元洪下令通缉他。胡到上海后，想插足领导蜀军，被大家轰走了，灰溜溜回到四川。回川后，靠着与尹昌衡的老关系，才又攀上军团长宝座。

因此，熊克武对朱之洪的解释只是不以为然的莞尔一笑，别有风趣地说道：“我倒是很愿与文澜合作，只是拒人于城门之外，尊容难见，怎么言合作呢？”一席话弄得朱之洪十分尴尬。

熊克武到渝后，同盟会总部任命他为四川支部长。

由于熊克武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干净利落地全歼了刘汉卿千余巡防军，因此，声威大震。同时这也引起了一批旧军官和政客的忌恨，在胡景伊的挑动下，他们到处散布熊克武的谣言，说他拥兵自重，私蓄野心。

熊克武对此十分气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于5月10日致电川督尹昌衡，要他通电全川澄清谣言，杜绝谤讟，电谓：

克武在外成军，发难于成渝两地尚未光复之日，百计经营，……年来间关奔走，所为非私，此心同于皎日。而噩耗频传，或谓克武树党组兵，疑忌一生，谗谤纷乱。当此满目疮痍之日，正吾民待苏之秋，同心合作，犹恐不支，深心怀疑，势必两歧。外人得以乘虚，开揖门之盗，分御外之力。一朝之祸偶成，千古之羞难洗！……望即通告全川，杜绝谤讟，庶免风鹤兴警，父老难安枕席，大局幸甚。

熊克武的这篇电文，对胡景伊一类谣言制造者是当头一棒。

由于蜀军实力雄厚，重庆地区同盟会党人的力量亦很强，因此，胡景伊要想坐稳重庆镇抚府总长的位子，不能不依靠熊克武。他见攻击熊克武的谣言谤语遭到熊的坚决还击，便故作惊疑，貌似诚挚地对熊说：“我刚抵渝，不知有人竟至如此中伤于锦帆兄，真是岂有此理！我一定要认真查办此事。锦帆兄你受委屈

了。”不久，他又向尹昌衡保荐熊克武作第五镇镇长(即师长)，以图消除熊对他的疑虑。

熊克武不愿与胡景伊合作，迟迟不就镇长职。

胡景伊便利用各法团对熊克武的信任，要求他们派代表去恳请熊就任。朱之洪、梅也愚、董麟书等人，都曾先后劝过熊克武。

董麟书诚恳地对熊克武说：“人有权利心，名誉心和责任心，对你来说，以总司令而俯就镇长，实无权利和名誉可言，希望以眷念桑梓的责任心为重，勉就新职。”

熊克武想到，既然群众明白我的实情，如此信任我，再固执己见、意气用事就不好了。

6月，尹昌衡率军西征，急招胡景伊返成都任护理都督。四川军政府同时决定撤销重庆镇抚府，任命熊克武任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任命黄金鳌为川东宣慰使，驻守重庆。实行军民分治。

从此，重庆政局使得暂时安定。

10月，袁世凯为了让其忠实走狗胡景伊独揽四川的军政大权，以咨询边防民事的空头衔相许，将张培爵调往北京。这时张培爵还没有看透胡景伊，对袁世凯政府也抱有幻想，决定前往北京任职，邀谢持随同前往。

张培爵和谢持路过重庆时，熊克武一再劝阻他俩，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北京、四川都是一样，不会相信我们的。我们都留在四川，只要同心协力，总可以为桑梓做点事情；有第五师在，他们不敢为难我们。”“这次调京觐见，我看是胡文澜(即胡景伊)捣的鬼，最好是借故不去，我总觉不放心啊！”

张培爵对熊克武的忠告听不进去，坚持要去北京。

果不出熊克武所料，张培爵到北京后，竟被袁世凯派特务杀害，客死异地。

胡景伊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为了感激袁世凯的恩德，便于对抗国民党，亲自在四川发起组织共和党，自任支部长，并把拥有军权的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第四师师长刘存厚也拉了进去。

1913年2月，四川省议会在成都召开首次会议，议员共140人，国民党占70席，共和党占60席，进步党占10席。

熊克武这时任国民党四川支部长，经他提名，国民党推出杨庶堪为议长候选人。共和党推朱大鏞、进步党推胡骏为候选人。

2月26日，议会选举议长，杨庶堪和朱大鏞各得54票，胡骏只得10票。于是依法重选。经几次开票，结果各党票数都无变动。

3月11日举行最后复选。胡景伊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核心人物杨庶堪作议长，除与进步党暗通声气，达成妥协外，临到选举的时候，又派大批军警将会场包围起来，对议员进行威胁。结果，胡骏以64票当选议长，朱大鏞和国民党的唐宗尧被选为副议长，杨庶堪落选。

面对这种枪口下的选举，熊克武十分气愤，他对但懋辛、吴秉钧等人说：“胡景伊如此践踏民意，真是欺人太甚，如果不除掉他，民怨怎么能平，民气如何能张！”但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熊克武只好把这口气咽了下去。

熊克武很清楚，从个人来说，早在组建蜀军时，胡景伊就与自己结下疙瘩；从对国民党人来说，胡景伊一直把坚持革命的国民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胡时时在寻岔子，找机会，企图把自己搞掉，把坚持革命的第五师搞掉。然而，这时的熊克武已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的锻炼，变得比较成熟了。他表面上对胡景伊恭顺，对他的挑剔沉静应付，怨而不露，不让胡捡过拿错。

熊克武越是这样，胡景伊越是恼怒，他对熊克武所领第五师的上报文件，不论对与不对，都要批驳一通，大骂一顿。据都督府秘书向外传说：“自胡到任后，只有第五师最守纪律，凡事都遵

督令而行，事后必具呈报，而胡督对别师的公文可以不看，而第五师的非亲阅不可，不论正确与否，总是批‘驳斥’。”

面对明争暗斗、危机四伏的川局，面对袁世凯反动面目的日趋暴露，熊克武凭着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较量已不可避免。他迅速整编军队，按照新的建制，将第五师改编为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1个工辎兵营，并将蜀军将弁学堂速成班中的优秀毕业生刘伯承、郑经武、张志芳、高建勋等编入第五师，以加强中下级军官的力量。

第五章 兴师讨袁，沦落海外

一、挥师西指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巩固窃据的政权，为复辟封建帝制扫清道路，对革命党人进行了疯狂的迫害和屠杀。

1913年3月，袁世凯一手炮制了谋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反革命案件。

不久，他又非法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作为他发动内战、镇压革命力量的经费。

6月，他又公然下令解除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国民党人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发动反革命内战。

面对袁世凯的镇压和屠杀，为了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挫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反革命阴谋，孙中山先生号召各省革命党人举兵反袁。

熊克武热烈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进行反袁的武装准备。

为了利用矛盾，争取受袁世凯排斥的尹昌衡同自己一道举兵反袁，熊克武特派吕超、傅常、章武赴雅安面见尹昌衡。

吕超向尹昌衡陈述利害说：袁世凯对南方各省都督都是不信任的，已下令解除江西、安徽、广东省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

民的职务，已内定以胡景伊替代他的督军位。吕超还向尹转达了熊克武的意见：“锦帆望尹公能审时度势，无论从国家前途计，从个人名位计，都应和国民党人站在一起，反对袁世凯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胡景伊。”

尹昌衡觉悟到自己出师西征，让胡景伊作护理都督是上了胡的当，于是领着军队匆匆从雅安赶回成都与胡算帐。

同时，熊克武又派在成都的汪蜀宇、谭创之、余龙、张尊等人联络省议会、军队、报馆，揭露胡景伊玩弄的阴谋诡计，并指令张百祥组织“国事维持会”，公开倡议迎尹拒胡。

胡景伊心虚，跑到昭觉寺躲起来，向袁世凯求救，密奏“国民党在川勾结尹昌衡谋乱”。

袁世凯这时正积极准备用武力镇压国民党，胡景伊正是他在四川的得力打手。当他得到胡的密奏后，立即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改任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并严令尹赶快离省赴川边视事。

尹昌衡既想回任都督，又不愿与国民党合作，既恨胡景伊，又想抱着袁世凯的大腿向上爬，只好忍气吞声将所率部队驻扎双流一带。

胡景伊得到袁世凯支持后，立即返回都督府，急调大批部队进入省城镇压国民党，与尹昌衡相抗衡。他命令军警查封国民党成都党部，逮捕《民报》总编辑谭创之。杀害党人张捷先、徐回天、李俊侠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为了稳住尹昌衡，又派陆军部的王右瑜到成都向尹颁发勋章，以嘉奖他在西征中所立下的功劳。尹在失望之余能得到这点点安慰，也就卷旗息鼓了。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并发表讨袁通电。

消息传到重庆，熊克武十分欣喜，他等待已久、时时关注的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立即邀集重庆的国民

党负责人和五师师部的同志共同开会研究出兵讨袁事宜。

会上，杨庶堪、朱之洪、卢师谛等人提出要讨伐袁世凯，非先除掉胡景伊不可。他们指出，胡是袁在四川的忠实爪牙，他处心积虑，力图消灭国民党势力，还几面布防，已对五师采取了包围形势。如果不先除掉胡景伊，解除后患，讨袁也就无从谈起。熊克武和但懋辛则主张东下讨袁。熊克武申述理由说：“第五师有9000人，兵强械利，有力量拿下宜昌、沙市、攻进湖北。这样才可能与江西、安徽、南京的讨袁军一同会师北伐，而讨袁成功，胡景伊也就不打自倒了。”双方争论了很长时间，后来熊克武觉得对方的主张也有一定道理，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决定首先讨胡，然后再挥师东下，与南方数省的革命同志会师北伐。

为了最后争取尹昌衡讨伐胡景伊，会议结束后，熊克武再次派吕超、傅常、章武赴成都联络尹昌衡。

7月19日，王右瑜从北京到成都为尹昌衡送勋章。他是熊克武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路经重庆时，他专门到五师师部拜访熊克武。老友相逢，分外亲热。熊克武当晚设宴为他洗尘，陪同有但懋辛、吴秉钧、李蔚如等。

席间，大家开怀畅饮，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王右瑜告诉熊克武，在京时袁世凯撤销了南方三都督后，四川同乡在袁政府当职的人漏出消息，说袁世凯认为必须铲除革命党的一切力量，才能为所欲为。胡景伊乘此密电袁氏，商洽编遣第五师的办法。在京的周道刚、徐孝刚等与胡氏相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知道确实消息后，作了协商，大家认为第五师兵精械利，干部多半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军队的风纪又好，与川军各师相比，都较优越，目前明知第五师很难立脚，让胡氏任意处理，实在可惜。经大家计议，如第五师同志们能认清自己的处境，不去盲目硬拼，吃眼前亏，又能望保全实力，不被胡景伊宰割的话，那只有熊师长抢先密电陆军部请求辞职。然后再由有关

方面与陆军部商妥，委周道刚为师长，直属中央陆军部，使胡氏无法反对。这样周可利用第五师的力量为将来反对胡氏之用，我们也可利用周来保全实力为它日之用。

王右瑜还对熊克武说：“南方数省虽已通电反袁，但兵力弱，意见很不统一，在段芝贵、冯国璋、张勋等所率北军的攻击下，已节节失利，必败无疑。”他劝熊克武不要盲目硬拼，来日方长。

熊克武当即回答王右瑜说：“右瑜兄，我们是革命之师，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到底，矢志不渝，决不能苟安一隅，任袁贼践踏民主，恣意横行。我们已经决定讨胡，决不改变。北京同乡爱护五师，给他们打个电报，和缓一下内外夹击的局势，是可以考虑的。但必须和同志们商量，由杨庶堪起草电稿，以防内部发生误会。”

第二天，熊克武约杨庶堪商谈。

熊对杨说：“准备先给北方政府发一辞职电文，以为缓兵之计，待军队部署就绪后，出其不意攻击胡景伊，方为万全。”

取得杨的同意后，熊克武面请杨代拟辞职电文。为避免消息泄漏，他又嘱杨于7月21日去南岸老君洞决定大计。

杨庶堪拟好电文后将此事告诉了朱之洪，朱绰号“三吵吵”，是著名的“大炮”，他一下就把熊克武要辞师长职的事传开了。

22号晚，师部张副官气喘吁吁地跑到老君洞，向熊克武密报说：同盟会同志们和五师旅、团级的官长今天在将军祠开会，朱三爷报告熊师长要辞职，理由是因胡都督电袁世凯要取消第五师。大家听了，很是气愤，决议力阻熊师长事先辞职，如胡氏下令撤换熊师长，全师官兵一定奋起反抗，不惜牺牲。并提出此事是王右瑜由北京来引起的，他是袁世凯派来的说客，他与袁世凯联络的密电本已落在朱三爷手上，大家表示届时一定要杀掉王先生以泄愤。并怀疑主张师长辞职的是但懋辛、李蔚如等官佐，拟议

发动时要将这几个人杀掉。还拟定了出兵计划：北路由团长范綦率部经遂宁攻成都，中路由旅长龙光率部由永川攻隆昌，又另分两支攻泸州，然后再攻成都。并提出如师长赞成出兵就不说，否则也将师长关起，仍打出熊字旗以资号召。

熊克武听了张副官的汇报，只淡淡一笑。第二天早晨他同但懋辛、杨庶堪等人返回师部，当晚在司令部召开全师军官会议。

熊克武在会上态度平和地说：“听说你们中的许多人昨天在将军祠开会商量讨伐胡景伊，这很好嘛。不过事前应告诉我一声，我也好参加呀。声讨袁世凯、胡景伊，维护共和，伸张正义，我和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否则，我们还是什么革命党人呢！”

他信赖地看了看大家，然后继续说：“今天我请诸位来，就是要向大家解释清楚关于我电告北京政府提出辞去师长一事。我这样做是以退为进，有意迷惑袁世凯，待军队部署就绪，出其不意攻击胡景伊，不是不干了。右瑜兄是在京同乡，为了爱护我师，使我师不受胡氏掌握，受托而来同我商量，完全出于善意，不能怪他。”

熊克武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然后严肃地说道：“现在同志们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责无旁贷，决心与同志们一道干下去，从现在起大家应速作准备，将所部集中待命，事先务秘密进行，我们拟先开战而后宣布。”

熊克武问大家有无异议，大家回答说：“只要干就没有话说了。”

经过一番紧急准备，举兵的各项事宜大体安排就绪。

7月底，熊克武在师部召集重庆同盟会负责人、第五师师部及旅团级官长联席会议，正式决定通电全国，宣告四川独立。

会上，大家一致推举熊克武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杨庶堪为民政长，刘植藩为军政部长兼参谋长，但懋辛为副参谋长。会议决定委托杨庶堪拟定讨袁通电，公开宣布讨袁。

会上，对讨伐胡景伊的作战计划发生争论。杨庶堪提出分兵出击的书面意见，熊克武不赞同，认为这是使力量过于分散的主张。他向大家解释说：“胡景伊拥有一、二、三、四4个师，敌我的力量是四与一之比，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怎么能分散兵力呢，应该集中全力，直捣成都，先破老巢，速战速决，才有胜利的把握。”杨庶堪等人却认为孤军深入，太冒险，不赞成。经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把部队分为4个支队。

第一支队委旅长龙光为支队长，以永川为据点，由前卫司令吕超、团长方化南率部从永川出发，经荣昌、隆昌直取泸州；江防司令余际唐和川东观察使黄金鳌率部从水路经合江攻泸州，消灭敌军战斗力最强的由周俊所率的第一师。第二支队以团长范蓁为支队长，从合川经遂宁攻取成都。第三支队长由李树勋担任。第四支队长由参谋长刘植藩兼，分拒滇黔两军。

这时，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也在到处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解决熊克武。他指示北京参谋部电告黎元洪，要他派兵进驻夔府、万县之间，以扼制熊克武，切断四川和湖南的联络。

驻防泸州的第一师师长周俊也急电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向袁世凯献策夹击熊克武，说什么：

请大总统增派北军驻扎鄂境之利川、建始一带，遥为声援，牵掣渝城。设一旦有事，本师紧扼下川南师管区域，上可以为成都策应，下可以控制川东。第四师严防省城，以守为战，两面夹击，或可以制其死命。”

二、全川震响

袁世凯对熊克武的攻击尚未部署就绪，熊克武已抢先行动

了。

8月1日，熊克武命龙光先行率部队进驻永川。

此时，重庆高等分厅监察官马柱首、重庆警厅长张经纶、川东观察使赵一德，以及蓝炳成、况春发等公开跳出来破坏起义。他们收买了一批地痞无赖，在街头起哄闹事，并亲自带领一群所谓“社会贤达”，到五师师部请愿，要求“息兵”。

熊克武当机立断，令卫队将马柱首、张经纶、赵一德、蓝炳成等人全部逮捕，立即枪决。这样社会秩序才恢复正常，起义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7月底，吕超在双流面见尹昌衡后迅速返回重庆，向熊克武汇报说：尹昌衡虽想回任都督，但不愿和我们合作去反对袁世凯和胡景伊，他和胡景伊一样想投靠袁世凯往上爬，听说他和胡一直还有秘密联系。因此，争取尹昌衡反袁是不可能的。

熊克武告诉吕超，龙光已率队赴永川，作战命令已带走。由他任第一支队的前敌司令，要他赶快赴永川就职。

8月4日，熊克武、杨庶堪正式发表通电，宣布重庆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

同日，熊克武正式就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发表《誓师文》和《告四川军界同胞文》。

熊克武在这两个重要文件中，历数袁世凯和胡景伊“蔑我宪纲，叛我民国，戕我义士，虐我公民……纵奸佞以招权贿，吸膏血以饱贪婪”的滔天罪行(《誓师文》)，深刻论述了讨袁和讨胡的相互关系，指出：“克武宣告独立，发誓讨袁，本拟载兵东下，接应民军，与独立诸省会师北伐，生擒袁逆。惟念胡景伊助桀为虐，毒害川民，狡诈专横，罪不容逭。目前直接讨胡，即以间接讨袁。(《告四川军界同胞文》)要求各部所经之处“闾阎不犯秋毫”，对胁从“须事宽宥”，只严惩冥顽不化的“元恶”(《誓师文》)。最后，热情洋溢，满怀豪情地激励全体官兵：“师直则壮，何敌不摧”，“试

覩天意所趋，风云来会；仰看义旗所指，日月为新。成他日凯旋之勋，奋此际疆场之事，尊尚军人荣誉，万户侯何足道哉！”（誓师文）

随着这两个文件的发表，讨袁各军立即奔赴前线，癸丑反袁战争的序幕拉开了。

余际唐所率水师浩浩荡荡沿长江南岸溯流而上，从江津朱家沱迅速进取至合江的王场、白米场、望龙场一带，所向披靡，战事顺利。

方化南、周官和率领的讨袁军在但懋辛所督之下，在永川、泸州之间的立石站击败敌军张鹏午旅。

讨袁军路经泸州所属立石、云锦、石马、兆雅各乡镇时，地方同志和团防组织群众纷起欢迎，并主动代办军粮接济。讨袁军沿途无阻，进展甚速。

8月11日，吕超率所部进抵隆昌，与敌吴成礼团展开激战，营长李锡荣、排长马辉义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牺牲在战场上。

8月14日晚，敌团里的同盟会党人、营长吴行光、贺重熙、梁渡经秘密策划，暗地里在城内外紧急放枪，将吴成礼骗至吴行光营击杀，然后率部起义，迎请吕超部队入城。

吕超部队攻下隆昌后，挥师向泸州挺进，在石洞与但懋辛所督之师相会，直抵与泸州隔水相望的小市。

在争夺小市五峰顶据点的激战中，营长唐思位，连长周杰、熊崇镛，排长李文凯身先士卒，率领战士冲锋在前，先后阵亡。有一连长右手提枪，领兵进攻，敌军弹如雨下，忽一弹击中右臂，手枪落地，旋用左手拾枪，大呼前进，扑倒在敌人阵地上。

摧毁敌人五峰顶据点后，泸城已在讨袁军的控制之下，除一江之外，已无险可守。周骏成惊弓之鸟，他惊呼讨袁军“凶焰太大，盘踞川东一带，面积又广”，哀恳黎元洪“迅派北军驰援”。

同时，泸州党人席乾生、邓西林、罗肇图、黄子休与随营书记姚星莹等，在一师参谋长李哲的支持下，在城内暗中活动部队，积极组织内应。后虽被周骏察觉，将李哲等人枪杀，但泸州军心已动摇，指日即可攻下，周骏逃到泸州上游的纳溪县躲藏起来。

9月8日，周骏向袁世凯发出哀恳电，哭诉求援，说什么“职师血战逾月，拼死支持，各方警报纷至沓来，彻夜不休，请饷请械，无法应付”，“援军未至，饷弹俱罄”，“泪竭声嘶，多方抚慰，皇天后土，实鉴此衷”。

这时，讨袁军营长周官和已进克内江，候泸州攻下，即会师西指成都。

北路战场，开始时小受挫折，当第二路支队长范藻率领部队进抵合川时，团长周国桢自以为是，不听指挥，分兵去攻顺庆。这时，号称模范团长的王陵基，亲率两个团，从遂宁领兵出发，昼夜兼程，直扑合川，气势汹汹，合川危在旦夕。

熊克武闻讯后，立即带着王子骞火速奔赴合川重新部署兵力，在大河坝一带设下埋伏，干净利落地围歼王陵基一个团的兵力。然后乘胜进击，迅速攻克潼南、遂宁、顺庆等地。

战争一打响，熊克武便住在总司令部，日夜守在电话机旁。他既要运筹全局，协调各部兵力，又要批阅电文，发布战争进展消息，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常常彻夜不眠，困了就喝上一瓶酒提提精神。

熊克武所率讨袁军兴起后，全川震响，各地民军乘时而起，相继派人来重庆与熊克武联系。

邹杰在酉阳，孙洪震、张百祥等在保宁，张天宝在绵阳，张品三在广汉，王天杰、赵述尧等在荣县，谢伯诚、汪蜀宇等在中江，他们高举义旗，配合讨袁军攻击川军。

当他面对如火如荼的四川战局，听到不断传来的李烈钧、黄

兴等的败闻，熊克武既深感忧虑，也间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矜喜的神情。

川督胡景伊在讨袁军的凌厉攻击下，一面以川内4个师的兵力相抵挡，一面向袁世凯急电求援。

袁世凯火速调动滇、黔、陕、甘、鄂五省军队“会剿”四川讨袁军。

8月14日，袁世凯急电川督胡景伊，在对熊克武进行了一系列恶毒攻击后，即宣布褫革他的“军官军职”，并责成胡景伊“饬所部严拿惩办”。还告诉胡，他已命令“湖北都督黎元洪、陕西都督张凤翙、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同兜剿，迅荡逆氛，勿任蔓延”。

三、忍侮出走

就在泸州即将被攻下的紧急关头，滇、黔军已奉袁世凯之令，迅速入川作战，一部由黄毓成统率，突陷綦江，进至重庆南岸黄桷桠；一部由叶荃统率，抵达宜宾；陕军张钫已率部进抵奉节，鄂军也已进驻施南利川，两军正向万县进逼，甘军孔繁锦已进驻川甘边境，跃跃欲试。王陵基补充兵员和械弹后，再次沿遂宁而下，攻取合川，率师向重庆推进。重庆大营四面受敌，岌岌可危。

形势十分紧迫，熊克武在重庆日夜焦思。为了维护根本，他决定一方面守城待援，一方面急召第一支队速回重庆固守，以死殉城。他电令但懋辛、吕超率部返渝，留邹有章、李天钧所部驻扎合江、江津，余际唐部回守江口。

部队正在迅速回撤，但重庆已危在旦夕，回援已来不及了，全城人心惶惶。此时，重庆总商会邀请各国驻重庆领事出面恳请熊克武。他们婉言陈述说：眼下前方已回援不及，重庆人烟稠密，经不起炮轰和大火之灾，愿悯念无辜的人民。

正好前江西省都督府参谋长陈泽沛、国会议员萧宅三从省外来到重庆，他们也劝熊克武：外面大势已去，现在兵临城下，渝城无兵可守，前线的部队又回援不及，不必再打了。

熊克武听着这一席席哀恳的话语，诚挚的忠告，心里阵阵难过。难道能眼睁睁让独夫民贼袁世凯的阴谋就此得逞？难道千百万为“共和”而牺牲的烈士的血就此白流？难道四川党人在极度艰难困苦之中积聚起来的第五师革命力量，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毁于一旦？想到这些，他心如刀绞。熊克武一双布满血丝的焦灼的眼睛，望着那一幢幢高高低低、鳞次栉比的楼房，他仿佛看见了它们在战火中化成一片瓦砾，几十万无辜的山城父老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熊克武死战的决心动摇了。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三大主义皆基于民”。自己几年来出身入死，为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中华共和而奋斗，不正是为了四万万同胞的幸福么？只要能使繁华的山城免遭战争的浩劫，只要能使几十万生灵免遭杀戮，一时的成败利钝，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革命的道路艰难曲折，袁世凯倒行逆施，背叛共和，背叛人民，好景长不了！想到这一切，熊克武抑郁的心情开展了一些，平静了一些。

过了好一会，他噙着眼泪，沉痛地说：“为了几十万山城父老的安危，我不能不接受你们的恳请，但我不能丢掉部队不管。”陈泽沛，萧宅三当即表示愿意代替熊克武妥善办理善后工作。

事已至此，熊克武只好命令军需处会同商会将全部公款、军需、军实点交给陈、萧，并规定发给官兵回家路费。

一切安排妥当，熊克武和刘光烈临走前，前往民政长杨庶堪家相约同行。杨庶堪十分为难地对熊克武说：“感谢锦帆兄对弟的一片深情，你军务如此繁忙，处境如此困厄，还亲来关心我，真是惶愧！只是我上有老父老母，如自己孑然离去，恐父母担惊受怕。锦帆兄，你们不要担心我，先走一步罢，待我安置好老父

母再来追你们。”熊克武流着眼泪继续劝他：“兄目标太大，妇孺皆知，万一有什么差错怎么办呢？”杨仍执意不走，熊克武见他决意留下，也就不便勉强，只说了声：“沧白兄，你要多多保重，多加小心啊！”便挥泪离去。

杨庶堪曾在《癸丑遇难纪事二百韵补作》中记其事：

熊谓：“君勿尔，妇孺咸君知，万一小有失，谁膺此差池。”
语罢声已塞，泪下犹哽糜。”

另在《癸丑杂诗十首》之二中也十分具体生动地记下了当时他俩离别时的情景：

一念慈亲万虑灰，泥行徒步望门回；临歧一掬交情泪
(敌军越三百梯，已决议出走。余意必归禀老亲乃行，锦帆谓余：兄目标大，未宜自疏。言时泪随声堕)，使我心肝到死摧。

9月11日深夜，南岸敌军的照明灯划破夜空，频频升起，稀朗的枪声时隐时没，敌军的先头部队已进抵市郊磁器口，即将进城。

熊克武正带着几名卫兵，偕同余际唐、吴景英、童显汉、王子騤、张冲等人，仅各带银币十数枚，含着眼泪，辞别留下的同志，由东水门出城，乘木船东下。

船行至石堡寨附近，熊克武怕自己名声太著，牵连随行同志，便携带便衣卫兵三四名登岸，约定在上海相会。临别时王子騤知熊克武所携钱币甚微，慷慨解下自己最心爱的金表链相赠，以表患难与共的一片情谊。

辞别同志后，熊克武即由黔北转湘西，经汉口到上海，然后

去日本。

四、沦落海外

战事刚停，袁世凯立即布告全国，除将熊克武和杨庶堪列为首要犯外，还另列名单108人，要求“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地方长官，通饬所属，一体按名严行查拿，务获究办，勿使漏网。”这是多么野蛮无耻的血腥镇压！

熊克武到东京后，不久杨庶堪也来到东京，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竟至抱头大哭了一场。过了好一会，熊克武才拍着杨庶堪的肩头说：“渝城一别，我还以为你遇难了呢，没想到你还活着，我们又在东洋相会了。”

杨庶堪无限感慨地说：“也是九死一生啊？”

不久，吕超、谢持、龙光、黄复生等也先后来到日本，熊克武对他们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

熊克武到东京后，即谒见孙中山先生，向他详细汇报了四川讨袁的经过。

中山先生对四川的讨袁战争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熊克武不要在失败面前灰心，不要被袁世凯一时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应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百折不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中山先生还对四川在反袁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们的亲属及其参加反袁斗争的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中山先生给熊克武分析了癸丑讨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这次讨袁失败是由于“党内行动不一致，没有一个通盘计划，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领导机构，上级指示不能得到贯彻”所造成的。鉴于此，中山先生告诉熊克武，他准备改组国民党，组建中华革命党，并指着熊说：“你要参加，你是四川领导人之一，还应转约相识的同志也参加。”

熊克武当即向中山先生表示：“我一定参加。并及时向相识的同志转达您的意见。”他还向中山先生建议说：“讨袁失败后，来东京的川省同志不少，希望先生和他们面谈，要加以安慰鼓励。即使目前有同志不愿参加中华革命党，也不一定就是反对先生，他们隔些时候也会参加的。如果有同志实在不愿参加中华革命党，也不要过分勉强。我相信将来先生有什么计划和行动，他们也会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来参加的，这同样是在先生的领导下搞革命。请先生不必过虑。”

临别时，中山先生特别叮嘱熊克武，要他在方便的时候约请四川同志面谈。”

熊克武回去向大家报告了中山先生接见他的情况，并转告大家，中山先生还准备接见四川的同志。

大家听了都十分兴奋。惟独谢持发出异议，说什么“我不上伟人的衙门！”熊克武劝他道：“你还没去怎么知道是伟人衙门呢？先去看看嘛，如果真是伟人衙门，下次不再去好了。”

这样谢持才没有再说什么了。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涣散无力的国民党，面对袁世凯的胡作非为，已经失去号召力，已不可能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了；而在军事上，起兵反袁的各省之间也缺乏统一指挥，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内外勾结、残酷镇压下，以反袁为目标的第二次革命完全失败了。

当时，孙中山还不能全面、正确地总结二次革命的教训，他把这次革命的失败仅仅归咎于党内“诸同志意见不齐，缺乏统一”，“各为其是”，“全不听我之号令”，并认为黄兴在这个问题上负有一定责任。

为此，孙中山先生在日本重新建立中华革命党，以便集结革命力量，策划反对袁世凯的“三次革命”，他在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明确规定：“入党时均须立誓约，按指印，绝对服从总

理。”

杨庶堪和谢持积极赞助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革命党，很快得到中山先生的信任，成了中华革命党的核心成员。

黄兴、邹鲁、李根源等人当时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被袁世凯表面的气势汹汹所迷惑，认为目前处于革命低潮，不宜开展革命的实际行动，以免作无谓的牺牲。他们以反对立誓约、按指印为借口，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在对待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在党内表面化了。

熊克武当时对中山先生是以革命领袖来崇拜、信仰的；对黄兴则是以领导者和朋友来看待、敬重的。因此，还在筹建中华革命党时，熊克武便发出过这样的呼吁：“孙、黄二公，只能合，不能分，合起来力量还嫌不够，一分就更无法了。”

黄兴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治病时，熊克武在各省同志为黄兴举行的欢送宴会上真挚地对黄兴说：“希望克强先生早日恢复健康，回到东京，协助总理领导我们革命。”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尽管熊克武在思想认识上比较倾向黄兴，但为了维护中山先生的声誉，他仍决定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于7月8日前往筑地精养轩参加了成立大会。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部分由于对反袁丧失信心而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会员，以李根源、钮永建、邹鲁等为首，在东京组成欧事研究会。

熊克武一则关注欧战的发展，一则与欧事研究会的许多成员交谊甚厚，感情比较接近，因而也参加了欧事研究会。

熊克武参加欧事研究会后，便很少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因此与中山先生的关系日渐疏远。

实际上，欧事研究会的许多成员，大多是空言革命；孙中山先生尽管在当时革命遭到极大挫折、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积极

组织力量，坚持反袁斗争，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四川的多数同志都是中华革命党的积极拥护者，因此，熊克武与四川来的同志也日益疏远，产生了隔阂，引起了四川同志对他的不满和非议。

由于熊克武过于自信，他根本想不到四川同志会对他有所非议和不满。当有人告诉他，谢持、杨庶堪、石青阳等许多同志对他都很有意见时，他非常吃惊，感到不可理解，始而不信，继而想：“谢持、庶堪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志了，虽小有芥蒂，完全可以当面说清。”他哪里想到，他和杨、谢等同志的分歧，是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一次，他找到杨、谢，以略带不满和责难的口气，询问他俩对自己的看法。他俩感到很为难，只好顾左右而言它，一笑置之。

当时吕超正少年气盛，他听杨庶堪谈起熊克武责问的情形后，火冒三丈，说：“好，要端就端开来说。”

吕超一气之下写了一封长信寄给熊克武。信中言词颇为激烈，指责他起兵反袁前未与滇、黔军进行很好联络，“临阵又仓皇弃军，独走东渡，视部属如路人”，对善后诸事的处理也未能尽到一个主帅应尽之责，并尖锐地抨击说：四川的反袁斗争是“主帅负同志”，而同志却没有“负主帅”。

吕超的这封信，虽然言词激烈，但许多意见还是很中肯的。熊克武当时太自信，因此，不可能把这封信作为明鉴，来检查自己在总揽全局，部署兵力，应付事变，对待部属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熊克武读罢吕超的信，非常抵触，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并为自己作了如下辩护：

“四川反袁战争的失败，我作为主帅，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就当时情形论，我军孤处无援，江西、南京也都相继失败，四川

怎么可能支撑得了呢？至于滇、黔军，以当时情形而论，怎么可能与革命派取一致立场，共同反袁呢？而对后事的处理，自己确实未能尽到全部责任，当时战线拉得那样长，在敌人快速推进，迅速包围渝城的形势下，怎么可能顾及远离自己的同志，这一切大家都是了解的，但却得不到谅解，竟遭如此责难，怎不叫人痛心呢？”

这沉重的打击，使熊克武心灰意冷。为了摆脱内心的苦闷，避开同志的责难，他于1914年冬应余际唐之约，迁到日本镰仓居住。

不久，黄复生在东京患重病，口鼻随时流血，非常危险，熊克武闻讯，很焦虑，将他接到镰仓一块居住。在熊克武的悉心照顾下，黄复生的病情总算被控制住了。

为了把黄复生的病彻底治好，熊克武写信给住在横滨的龚振鹏，向他打听横滨有无好医生。

很巧，有一位瑞士著名医生路过横滨，龚立即写了回信，叫黄复生赶快到横滨就医。黄复生到横滨后并未就医，径直回上海去了。

龚振鹏不放心，赶到镰仓问熊克武究竟是怎么回事，黄回上海去干嘛。

这完全出乎熊克武的意料，他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他回上海去干什么。”

龚于是对熊说：“难怪黄复生临走时对我说。叫我不跟你说。”

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既重感情而又自负的熊克武。在辛亥革命前的武装斗争中，他曾和黄复生同生死，共患难，是非常知己的战友。没有想到，如今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竟在同志间的情感上，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不可愈合的裂痕。他觉得同志们太不近情理，太不理解自己了。他感到空虚、孤寂，精神失去了依托，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时时袭击着他。从这以后，他经常一

个人跑到小料理店去喝酒，有时一喝就是半天，想借此摆脱郁结在心中的苦闷。

友人龚振鹏和林虎见熊克武在日本的处境很不好，于是邀约他去南洋游历。为了摆脱苦恼，熊克武怀着愤懑之心和一腔怨气，于1914年冬离开了镰仓，途经神户，前往南洋。

在神户逗留期间，他意外地碰到了好友但懋辛。但从上海来，准备到东京去玩。

自癸丑之役失败后，两人便天各一方，如今邂逅相逢，熊克武有多少心里话要向他倾诉，有多少怨忿要向他发泄啊！

他俩从癸丑之役谈到目前的革命形势及流落在外的同志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从同盟会谈到中华革命党；从孙中山和黄兴的分歧，谈到四川党人之间的矛盾，做人的艰难；从袁世凯的专横，谈到革命的不易。他俩推心置腹，谈得是那么投机，看法是那么一致。

临别时，除互道保重外，但懋辛特别叮嘱熊克武，希望他心胸开朗一些，不要自己找气来怄。

熊克武到南洋的第一站是新加坡，住在华侨张永福家，和他住在一起的除龚振鹏、林虎外，还有余际唐、李烈钧。

他们在新加坡无事可干，便天天到海边游泳。那湛蓝的海水，壮阔的日出，澎湃的海涛，灰白的风帆，弄潮的海鸥，戏水的孩童，是那么合谐地编织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多么有声有色，有景有情啊！

他们游困了，便躺在沙滩上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只有这时，他们才觉着自己是一个十分幸福的自由人。然而只要一离开海边，那对国事的忧愁便又涌上心头。他们毕竟是一群忧国爱民的革命者！

在新加坡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到马来半岛的吉隆坡、槟榔屿等地住了一段时间。

熊克武在南洋期间，曾和柏文蔚、李根源、陈炯明、林虎等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以发展国内水利为名，在南洋华侨中筹款，以备日后革命之用。

“路漫漫其修远”，熊克武在南洋苦闷、彷徨地思索着、探寻着中国革命的道路。

第六章 护国反袁，胜利返渝

一、奔 赴 云 南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利令智昏，自以为大权在握，可以随心所欲地为非作歹了。

他悍然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的活动。

他公开宣布废除《临时约法》。他公然承认日本政府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他指使御用的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投票”，拥护他称帝。

他为了牢固控制川、滇、黔，于1915年8月任命自己的亲信、与西南各省军政首脑均有联系的陈宦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将胡景伊调北京另行安排。

袁世凯通过上述一系列密锣紧鼓的活动，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于1915年12月12日迫不及待地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皇帝”，并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改元“洪宪”。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反袁护国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兴起。

面对反袁斗争的新形势，亡命日本、上海等地的四川国民党人纷纷要求消除往昔的隔阂，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由朱之洪出面，于1915年2月，邀约支持熊克武的但懋辛、

刘光烈、陈一夔和反对熊克武的卢师谛、吕超、向传义、石青阳、宋辑先等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合作讨袁的问题。

会上但懋辛首先谈道：目前除袁世凯把我们视为眼中钉外，满清的帝制余孽，立宪派和其他一些党派，都是反对我们的。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我认为孙中山和黄兴两位先生首先要团结起来，在四川锦帆兄和沧白兄要捐弃前嫌，精诚合作，断不可分裂。

卢师谛紧接着问道：“依你的意见，究竟应该如何下手呢？”

但懋辛回答说：我看袁世凯早迟要作皇帝，他只要一跨上皇帝的宝座，就必然遭到大多数国人的反对。为了培植和加强我们的力量，我们应在边远地区发动，因为边远地区消息不灵通，交通不方便，新起的力量，不容易被敌人察觉，等到敌人知道了，我们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力量，到那时就不易扑灭了。而目前最好的去处是云南。

但懋辛正兴致勃勃地回答卢师谛提出的问题，宋辑先却忽然横放一炮，质问但说：“那些空话都用不着谈了，现在既要革命，试问熊克武究竟有好多钱？我们这边有好多钱，大家拿出来共同使用。”

但懋辛坦然回答道：“据我所知，熊克武癸丑讨袁失败离开重庆时，军需处长吴秉钧交了10万元浚川源银行券给大川通商号的童子钧储存，是准备革命时用的。童子钧现正住在上海，你们都认得，可以去问好了。”

宋辑先还不死心，又转问陈一夔：“你是熊派往上海的交通处长，究竟兑有多少钱存在你处？”

陈一夔不软不硬地回答了他一句：“要买东西才兑钱来，并无存款。”

宋辑先讨了个没趣，火冒三丈，横蛮无理地说：“你们都说假话，根本不配作革命党，根本不配谈合作，我们还是各搞各

的。”

但懋辛和陈一夔也不示弱，挖苦了宋辑先几句，于是互相争吵起来，几乎动武。

他们的粗暴行动，受到与会同志的强烈谴责。大家认为，从今以后，每个同志都不能再闹意气了，应不计旧怨，求同存异，团结反袁。

这时，熊克武虽身居南洋，却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对袁世凯为实现其称帝野心而玩弄的种种伎俩十分气愤，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十分忧虑。

在他读到孙中山先生1915年3月给南洋革命党人的信后，抑郁的心情舒展了许多。中山先生在信中写道：“弟睹祖国之濒危，与海内外同胞所受之苦痛，以为非急倒彼恶政府，无以挽救，而往事之失，则当引为鉴戒。……”熊克武深深地感到：中山先生的话是对的，目睹祖国的濒危，海内外同胞所受的苦痛，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过去的党内分歧，只要大家都能捐弃前嫌，引以为戒，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大敌当前，国事为重啊！

袁世凯同意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到南洋，熊克武更感到国内局势的严重。他扪心自问：在这样紧迫的时刻，我熊克武能甘居海外坐视不管吗？不！

熊克武开始奔走于南洋各地，四处联络同志，筹措经费，准备返回祖国参加战斗。

1915年9月初，熊克武从新加坡乘船回到上海。

在上海他很快与但懋辛联系上了。他对但说：“在南洋的同志们极注意帝制问题，大家派我回上海来了解一下情况，以便准备届时发难，声罪致讨。”并要但懋辛过几天和他一块返回南洋，与大家一起商讨反袁事宜。

就在他俩已预购好船票，即将动身返南洋时，一天，但懋辛

从外面回来告诉熊克武，他路经老靶子路遂初精舍门前，正遇着中国公学成立时的校长郑孝胥送孙洪伊出门，郑对他悄声说：“我刚才听刚从南京回来的孙洪伊说‘袁世凯急于要做皇帝，已令各省于今年12月以前召集代表会议，以投票方式强迫赞成君主立宪。一俟大多数省分投票之后，就先期成立大典筹备处，决定于明年元旦改元登基。’孙还说‘对袁世凯当皇帝，冯国璋是不赞成的，而且王士珍、段祺瑞等，内心也是反对的。’”郑还鼓动说：“你们革命党是根本反对帝制的，南京不久要开会投票，你何不联络你们的同志，届时去打炸弹破坏会场，使冯国璋有所借口，劝袁终止称帝。”

但懋辛告诉熊克武，他当即回答郑说：“袁做皇帝，我们一定要把他打倒，不仅事先打炸弹而已。”

熊克武听完但的叙述后，沉思了一会，对但说：“以郑某所说的情形来判断，时间紧迫，应及时行动，不可再转新加坡去了。”

随后，熊克武和但懋辛又一块去找党人李根源商量。但懋辛向熊、李介绍说，他曾于夏间找周官和、郭昌明到昆明去探察军政界的动向及一般舆论，他们回来说，云南赞成帝制的太少，尤其是军界的中下层，十之八九都反对。8月间，云南军队中又派了一个叫董干臣的团长到上海来打听革命党人对帝制的反应。听说还到日本去见了孙中山先生。

李根源建议道：李烈钧曾任过云南讲武学校教官，兼兵备道提调，在云南军官中有一定的基础，又是唐继尧的好友，一定要约他同去。另派钮永建到广西联络陆荣廷，要陆在云南讨袁时起而响应。

熊克武立即写信给李烈钧，望他同赴云南，兴师讨袁。

11月初，熊克武得李烈钧电，要他立即到香港聚齐，一同前往昆明。

熊克武偕李蔚如、张冲、余际唐、刘国佐，及陕西的井勿幕、

徐惟一、郝达庭、阎静斋等人同去香港，暂留但懋辛在上海组织一部分同志由长江潜回四川，策动军队，组织义军响应起义。

熊克武到香港后遇见卢师谛、张煦等10余人。

卢师谛告诉熊克武，他们是奉中山先生之命由日本回川发动起义的，因缺乏旅费，无法动身。

熊克武热情地为他们代借路费，邀约他们结伴往昆明取道回四川。他们婉言谢绝了熊的约请，径直回四川去了。

12月初，熊克武一行人从香港出发，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转河内至老街，正准备从老街出发赴云南时，唐继尧派人来联系，说蔡锷要从北京来云南商讨反袁事宜，希望熊克武他们等到蔡锷脱险后，再到云南。

他们在老街住了好几天仍不见动静，大家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熊克武请李烈钧电督唐继尧。

李烈钧在电文中十分尖锐地说：“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街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闻关于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

这时，蔡锷已经脱离危险。唐继尧接到李烈钧电报后，立即派其弟唐继虞和亲信部属邓泰中前往老街迎请熊克武一行，并作了许多疏通解释工作。

熊克武于12月10日抵昆明。为了避风声，唐继尧把他单独安排在邓泰中家住。

但懋辛和邹有章、王维纲、彭远耀、傅常等于12月18日赶到昆明。

当晚，唐继尧亲自领着但懋辛到邓泰中家拜访熊克武。

唐一见熊便抱愧地说：“癸丑之役，滇黔军对锦公多有冒犯，还望海涵！”

熊克武笑着回答：“蓂赓兄，见外了，梁山好汉，越打越亲热。大家要捐弃前嫌，团结合作，以反袁大局为重。”

唐接着说：“我们偏居一隅，消息闭塞，不知外面各界反对帝制的情况如何。”

熊克武给他打气道：“对袁称帝，舆论上是普遍反对的；照军事上看，只要云南出兵，把袁军能战部队牵制在四川、两广一带，各地摇旗呐喊，袁氏就垮了。”

唐又说：“蔡松公已由神户向香港出发，不日可到昆明。”

但懋辛趁此插话：“李根源劝由唐公先通电宣布反对袁氏称帝，俟蔡公到后再联名通电出兵如何？”

唐回答：“不行，因与松坡公早有计划，必待他来，才能知道一切情况，才便于发动。”

12月19日，蔡锷同戴戡、王伯群等到达昆明。

当晚，唐继尧即在五华山都督府宴请到昆明的重要来客和他的重要将领。在座的外地来客有蔡锷、戴戡、王伯群、李烈钧、周官和、但懋辛；本地高级官员有云南按察使任可澄、滇军将领罗佩金、黄毓成、邓泰中等共约二三十人。

宴前先行开会，洽商讨袁问题。

唐继尧和蔡锷有意把熊克武先行隐藏在会议室隔壁的书房中，以观动静。

会议开始，先由唐继尧介绍参加会议的人员，并对袁氏背叛民国、帝制自为的种种罪恶行径进行了揭发控诉。唐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云南有声罪致讨的责任。”正因此，“我们早与蔡公进行了联络，并商定了起兵反袁的计划，今蔡公已到，请蔡公将外边的情况谈谈。”

熊克武坐在书房的藤椅上，专注地听着蔡锷的讲话。蔡说“我在统率办事处时，各省一些督理军务长官上表称臣，请袁做皇帝的文件，陆军总长王士珍看后即递给我看，大家都是抱心非的态度，都怀疑这个皇帝是否做得成。至于一般的人，则没有不反对的。所以只要云南起义，闻风响应者必多，袁氏一定被打倒。

保卫民国，重造共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必出其不意，从速发动。”

熊克武听着蔡锷鼓舞人心、催人战斗，而又娓娓道来的话语，心里十分亢奋。

有一部分军官仍然还有一些疑虑，他们询问道：“川军是否愿意和我们合作，熊克武的态度如何？”

蔡锷哈哈一笑，说：“请在座诸位放心，孙中山先生已派熊克武回川活动，各方面联络已经成熟，熊本人已代表四川义军前来欢迎我们了！”说完，蔡把侧门打开，熊克武情绪激昂地来到大家面前，向大家拱手致意。

他的出场，事出意外，大家先是一惊，随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举行宴会。大家互相敬酒，互相劝勉，互道祝贺，洋溢着团结、热烈的气氛。

12月21、22日，熊克武、但懋辛、李烈钧等参加了在唐继尧和蔡锷的主持下，在护国寺召开的滇军上校以上军官和省级各机关长官联席会议。商讨起兵反袁事宜。

会上通过了《为申讨袁世凯致各省通电》。决定将起义军定名为“中华民国护国军”。决定由唐继尧留守昆明，任云南都督，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

接着，蔡锷宣布出兵四川的具体部署：

正面由他本人率赵又新、顾品珍两个梯团，经贵州毕节，从永宁进攻泸州。

戴戡任右翼军总司令，回贵阳联络贵州护国使刘显世，驱逐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后，率领黔军由綦江向重庆进攻。

左翼总司令暂不设，由刘云峰梯团先行出发，经昭通、盐津迅速占领叙府。

任命邓泰中支队为先头部队。

在两天的会议中熊克武很少发言，他在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冷静地思索着四川国民党人在护国战争中如何才能协调与其它党派的关系，与滇、黔同志的关系，以便发挥更大作用。

当蔡锷宣布总司令部及各梯团、支队的任命名单时，他听得特别认真。他没想到唐继尧和蔡锷竟没有对四川国民党人作任何安排。正疑惑不解时，唐继尧来到他身边，热情地对他说：“这次不便对四川同志作安排，希望熊师长谅解。是否熊师长可带领一块来的四川同志随第一支队同时出发，以便进入川境时能召集旧属帮助作战，到那时再行对四川同志进行安排也不迟，不知熊师长意下如何。”

熊克武很清楚，这明明是排斥四川国民党人，怕四川国民党人掌握了实际的权力，于他们不利。他很想直言以告，但转念一想，既然是干革命，何必把个人及党派的名位看得过重，让人耻笑。于是便爽快地回答唐继尧说：“惟命是听！”

会议结束时，熊克武与参加会议的同志一块表示讨袁决心，乃歃血为盟，共同宣誓，誓词为：

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二、进军四川

12月23日晨，熊克武头戴红边帽，身着护国军军装，背着背包，佩着手枪，显得分外有精神。他领着四川同志，告别了前来送行的李烈钧、方声涛等人，随邓泰中支队出发了。这支小分队在前卫部队中担任着打前站的重要任务。

从昆明到叙府，大小24站，几乎全是山区，错落的奇峰，陡峭的石壁，嶙峋的怪石，参天的古柏，飞湍的急流，随时可见。山路崎岖，又值寒冬腊月，冰雪凝滑，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特别是从昆明到昭通的6站路最不好走。

熊克武带领小分队行进到东川时，得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已于25日联名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讨袁。

1916年1月10日前后，先头部队越过重重关山，顺利到达昭通。

到了昭通，熊克武获悉第二支队和梯团部已出发跟进，并催促第一支队飞速前进，如遇敌抵抗，可相机进攻，不要等梯团部的命令，但必须随时报告。

1月15日，第一支队到达盐津老雅滩，越过滩头新场即与四川交界。据报，四川界陡峭的燕子坡上及右侧马耳朵梁子上均有敌人。

熊克武安排小分队的同志一面分头去和当地居民联系，侦察敌情，了解地形及道路，一面宣传起义讨伐袁贼的道理。群众对袁世凯称帝是深恶痛绝的，听了小分队同志的宣传后，纷纷奔走相告，有的还自告奋勇，主动提出担任向导，引队伍走捷路打敌人。

第一支队在熊克武小分队的大力协助下，很快部署就绪，迅速向敌人阵地发起进攻。不半日就把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突破了。从此跟踪追击，所向披靡，直抵横江。敌军退到金沙江的安边场，隔河而阵。

熊克武带领小分队到达横江时，受到横江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自发聚集在道路两旁，端茶送水，高呼“民国万岁”！

当地士绅李乐伦、曾俊生、曾益周等，得知带队的是熊师长，非常兴奋。他们围着熊克武说：“癸丑反袁，我们正准备组织义军响应，锦公已离开四川。我们这一带，五师的同志很多，大家听

说袁世凯要当皇帝，都气得不得了，盼着你早点回来，领着他们讨袁逆。”

过了一天，李乐伦带着一个身着军装，身材魁梧的年轻汉子来见熊克武。李告诉那人：“这便是在癸丑反袁中打得周骏屁滚尿流的熊师长。”

年轻人一听，肃然起敬，赶忙立正，向熊克武敬了一个举手礼。

李向熊克武介绍说：“他叫曾一清，是巡防军连长，痛恨袁世凯称帝，决心带领他的弟兄们前来报效锦公。”

熊克武十分高兴，拍着曾一清的肩头说：“是条汉子！”

从此，熊克武才有了一连自己直接掌握的持九子毛瑟枪的队伍。

在横江时，杨蓁率领的第二支队也赶到了，熊克武就和他们一块商量进攻安边的计划。

杨支队长自以为到迟，愿率部在金沙江上游的娄东一带选择地方渡河，从背面袭击敌人，要一支队隔江佯攻牵制敌人。按照此计划，第一支队和敌人打了整整一天炮战。

入夜，熊克武感觉敌人的应声枪太少，于是派人找来但懋辛和曾连长商议。

熊问曾：“在你的士兵中有没有本地人。”

曾答：“奉命来防御滇军时，就在横江一带募集了10多名新兵补原来的缺额。”

熊克武叫曾立即去问问这些新兵中有没有弄过船的桡夫子。

曾连长到士兵中去问过以后，转来报告熊克武：“有四五个兵会划船。”并说：“下游10多里有一个渡口，有一支小船，但不知被敌人弄过去没有。”

熊克武听了曾连长的报告，暗自高兴，叫他选三四个人到渡口查看，对岸如有敌人则船必不在，如船在，对岸一定不会有敌

人，就可乘夜渡江，并叮嘱道：“一定要避开敌人的哨兵警戒线，从小路绕到安边场后面侦察敌人跑了没有，务必在拂晓前到达，最好派一名有军事知识的排长同去。”

天刚亮，河边上人声鼎沸，熊克武立即赶到河边，看见曾连长和几个兵把对岸的船都撑过来了。曾连长向熊克武报告说：“敌人已经跑了，赶快过河！”

熊克武带领部队渡过横江，顺利地占领了安边。

大部队需要经过一些时间才能渡完，而且要等第二支队和梯团部到达后才能决定进攻叙府计划。熊克武便抓紧这段空隙时间，组织了两个侦察小分队，分路侦察敌情。

一路由张冲带队，由李乐伦当向导，化装成土人，搭乘商船，沿横江而下，相机进止。

一路由王维纲带领，由曾俊生作向导，从陆路侦察而进，如有敌情，专人回报。

第二天，熊克武收到陆路方面的回报：柏树溪一带已无敌军。

但水路方面却毫无消息。

直到第三天早上第二支队才陆续到达。

熊克武向梯团部报告，愿带领小分队继续向柏树溪进发。梯团部批准了他的报告，并决定派第一营营长李文汉率队随同前行。

熊克武刚率队至场口，便见王维纲气喘吁吁地迎头跑来，报告说：“我们从横江顺流而下，于1月21日赶到叙府，上岸一打听，才知道敌人早就逃离叙府了，我们已在叙府等了一两天了，见我们的队伍毫无影响，才赶来欢迎。”

熊克武闻讯异常兴奋，同李营长率部直奔叙府。

川南重镇叙府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护国军占领了。

熊克武到叙府后才了解到，驻防泸州一带的是伍祥桢混成旅，

伍系云南人，他不愿对故乡子弟兵作战，所以令其部属节节退却，撤离叙府，径直退到自流井驻防。

昆明到叙府，大小24站，徒步行走也需要24天。熊克武所率打前站的小分队精明干练，机智勇敢，不怕牺牲，注意联系当地群众，第一支队进军十分顺利，仅用28天就占领了叙府，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第一梯团全部到达叙府后，即派兵扼守城外的真武山、翠屏山等处要隘，并在吊黄楼架起浮桥，预备向自流井进攻。

熊克武奉命驻守翠屏山。

袁世凯闻叙府失守，十分惊恐，下令撤去伍祥桢川南镇守使职，并严令伍祥桢率部收复叙府，戴罪图功。四川督军陈宦，亦悬赏50万元奖励部属，令其夺回叙府。

熊克武进驻叙府后，川南震响，五师旧部及各地方团队，纷纷前来叙府请熊克武收编。

原蜀军将弁学堂学员蔡时敏和熊缓勋，时任江安县警备队正副队长，他俩闻熊克武树帜川南，兴师讨袁，十分欣喜，立即带领警备队全体人员，开赴叙府，加入熊克武部。

况场团练队长倪焕文，安岳团防队长蓝太猷等，均率队前往叙府，请求收编。

受中山先生委派，先行回川，在川南泥溪、蕨溪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吕超，遵循中山先生“往事之失，则当引为鉴戒”的教导，捐弃前嫌，顾全大局，带着自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组建的队伍，来到叙府，加入熊克武部。

熊克武真是喜出望外，望着英武敦厚的吕超，十分感动地说：“汉群（吕超字汉群）兄，我们又走在一起了，让我们携手合作，一起来雪癸丑之耻吧。”

熊克武的队伍迅速扩大，部队的整编和命名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熊克武向刘云峰梯团长商洽，拟将所属部队命名为“护国军四川义勇军”。刘初时认为尚可。但这一意见却遭到杨蓁支队长的有意刁难。他对刘云峰说：“如称护国军，就应当用云南的名义，而四川来的团队用外省的名义，又似觉不妥。熊部的命名，待考虑稳妥后，再定吧。”刘云峰也就将此事搁下来了。

为了便于管理，熊克武只好暂时把收编的部队分成两个支队，分别由周官和及吕超带领。

不久，叙府争夺战全面展开。

自流井敌军大部在白花场、打铁坳一带集中，向宗场前进，欲夺回叙府。

刘梯团长命令熊克武率队迎击。

熊克武立即带领队伍潜伏在宗场附近的丘陵里。

敌人刚出宗场，即遭熊军伏击，伤亡惨重，忙退回白花场。

熊克武马上请邓支队长带领全队追击敌人。护国军一鼓作气，迅速占领了白花场，进逼自流井。

谁知部队行进到打铁坳，梯团部却发来命令，不许孤军深入，并令折回宗场坚守阵地。这样便长了敌军的威风。

敌人主动向护国军阵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护国军只好采取守势，完全打成了阵地战。

每次少则战一天一夜，多则战两天两夜，一直在宗场一带打拉锯战。

随后，敌人改变战术，分三路进击，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开来。而护国军只有一个梯团，虽然指挥灵活，左右逢源，一次又一次各个击破了进攻之敌。然而仗打得十分艰苦，“阵地弹壳，堆积寸余”，死伤甚众。

护国军战斗兵越来越少了，由云南招募补充又很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川军已迫在眉睫，刘梯团长才请命蔡锷，由唐继尧委任熊克武为护国军四川招讨军司令。

熊克武接到委任命令后，立即正式成立司令部，但懋辛任参谋长，李蔚如任参谋兼军法长，郑奠望任秘书长，余际唐任军需处长，张冲任副官长，另设一筹饷处，处长为吴适君。下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为周官和，第二支队长为吕超，司令部直属两个独立连，其中一个连是清一色的洋台枪，大约有六七十支，这就算是炮队。

当时处在非常时期，官兵同开一锅饭，也就无所谓薪饷，官兵关系十分融洽。

四川招讨军是四川革命党人在四川群众大力支持和拥护下组织建立的一支军队，它从无到有，诞生于反袁战争的烽烟烈火之中。

1916年2月中旬，招讨军刚刚建立，敌人便分三路向驻守在叙府一带的反袁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游牛屎碥是朱敦武统领的数营巡防军；下游白塔山是北军的冯玉祥混成旅；正面是川军钟志鸿旅。

当时熊克武率领的招讨军和邓泰中支队驻防于上游牛屎碥一带，战斗首先从这里打响。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向招讨军发起猛烈进攻，但在熊克武沉着镇静的指挥下，经过一次又一次激烈战斗，终于把朱敦武统领的巡防军击溃。

第二天，正面之敌又大肆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天黑，直到二更以后。

这时梯团部传来命令说：昨天下午白塔山方面的敌人向我进攻，我军只有一个营守御，万难支持，要求招讨军和邓泰中支队全部退守南岸。

熊克武和但懋辛商量：这时敌军正在夜袭我防区，如突然撤退，被敌跟追，损失就太大了。此时邓泰中正困倦地睡熟了，呼之不应，熊当机处置，叫但懋辛拟一回报，请梯团长令杨蓁支队长率队立即开来前线，于拂晓前到达，届时声称援兵到了，并予

反攻，将敌击溃，然后再行撤退。

不久，杨蓁率队赶到，熊克武立即传令全线反攻，出敌不意，不到20分钟，敌军全部溃退。

熊克武迅即率领招讨军偕同杨蓁带领的两个营向右侧驰援白塔山，让正面队伍顺利撤回南岸。

傍晚，白塔山之敌被护国军击溃。

熊克武怀着胜利的喜悦带领队伍迎着落日晚霞徐徐撤回南岸。

这时，进攻泸州的主力部队，因兰田坝战役失利，纳溪被敌包围。蔡锷闻讯后感到局势严重，急令刘云峰第一梯团派兵两营前往增援。

刘梯团长马上召集邓泰中、杨蓁和熊克武、但懋辛去秘商。两个支队长诉苦说：“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各营伤亡都很大，补充也不够，不要说抽两营走，就是不抽，如遇敌进攻，恐怕也难以支持。我们又不能不服从总司令的命令，如何决定请梯团长决定。”

刘云峰感到很为难。梯团部参谋长张璧建议说：“就遵令派两营下去。”刘梯团长又征求熊克武的意见。

熊克武从全局出发，恳切地说：“泸州战役是蔡总司令亲自指挥，那里战争的得失，关系全局，比叙府重要。为了稳定阵线，打败敌人，不如只留一营在叙，其余四营全部下去，使那边速获胜利，叙府之危也就不足虑了。主力开拔后，我们剩下的少量部队可沿江而守，敌人来进攻，我们能守多久就守多久，以待下面打胜仗。万一守不住，我们可退到横江，与敌隔河而阵，亦可多熬时日，以观变化。”

杨蓁越听越气。待熊谈完后竟至大发雷霆，乱骂一通，连说“那我不管”。

刘云峰在熊克武的支持下，直接找各营面谈，讲明情况，讲

明支援泸州战斗的重要意义，营长们都表示坚决服从命令，赴泸参战。

两个支队长十分固执，负气不去。

刘云峰即令四个营火速开赴大洲驿增援，仅留田钟谷一营和熊克武带领的四川招讨军守卫叙府。

援军赶到，蔡锷如虎添翼，重新布置兵力，于2月19日指挥全军分三路向敌军反击。在护国军的进攻下，敌军伤亡惨重，护国军取得了纳溪保卫战的胜利。

四个营主力离开不久，冯玉祥偕同伍祥桢率部3000余人，前来攻取叙府。

3月1日，熊克武、田钟谷率领护国军在观斗山、吹火山、赤岩山、吊黄楼一带与敌军展开激战，尽管众寡悬殊，仍坚持了一整天。

入夜，熊克武正亲自带领战士们守卫在沿江一带，城内派人来说：“两个支队长不主战，已经负气而去，梯团部亦随即撤退，至于招讨军何去何从，请熊司令自己处理。”

熊克武很清楚，无论从人员来看，从武器装备来看，滇军撤走后，招讨军是不可能守住叙府的。如不迅速撤走，不仅叙府保不住，还会全军覆没。他和司令部的官佐简要地交换意见后，即下令沿江守兵，尾随滇军陆续撤退到横江，并叮嘱各部在撤退时，一定要留下少数官兵坚守阵地，至夜半12时才能后撤。

3月2日，熊克武和田钟谷带领护国军顺利撤到横江。

同日，冯玉祥和伍祥桢率部进占叙府。伍祥桢在当天即以十万火急电向陈宦报喜。

熊克武和田钟谷两人到横江把部队安置好后，推心置腹地作了一次长谈。

田钟谷对熊说：“杨映波（杨森的别号）大怪你们吹牛皮，说什么反对帝制，冯国璋都赞成，陆荣廷一定会响应起义，现在云南

打了两个多月的仗，广西不但不响应，而且还放龙觐光攻入了剥隘及云南的开化，临安一带都震动了。他要回昆明向唐建议，取消独立，把你们一批吹牛的乱党杀了来立功赎罪。”

熊轻蔑地反问道：“他们这样做何以对蔡总司令呢？还配作革命军人吗？”

田慨然说道：“我也是这样想，所以特别留此，不跟他们一路走，请你们注意。”

熊进而问道：“你打算走哪里？”

田答：“将同梯团部驻盐津县，听候蔡总司令的命令。”

杨蓁和邓泰中走到昭通大关时，即被唐继尧打电阻止回昆明，还把他俩臭骂了一顿。

不久，熊克武继续带着队伍前进，以后择地驻扎在筠连、庆符一带，把司令部设在建武城。后又把司令部移驻庆符县的沙河驿。

由于南方数省讨袁军纷纷兴起，护国运动迅速向前发展，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抱住大总统位置不放。护国军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川督陈宦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被迫与蔡锷达成停战协定。

这时，起义的滇、黔、粤、桂、浙五省联合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处理“军国重事”，唐继尧任军务院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时唐继尧尚在云南，由岑春煊代行抚军长职。

熊克武进驻沙河驿后，川战已基本停息，部队得以休整，兵员得以补充，战斗力得到较好的恢复。

3月下旬，熊克武率领招讨军刚进驻建武城，并勿幕便要求到大洲驿去见蔡锷，熊克武派了两个卫兵随同前往，并将招讨军退出叙府后的情形，写了一份报告请他代呈蔡锷。

4月初，井勿幕给熊克武写来一封信，除报告外面的形势

外，告诉熊，他要回陕西策动督军陈树藩独立反袁。

5月初，熊克武派但懋辛到大洲驿谒见蔡锷，派郝大衡和刘光烈到成都劝说陈宦反袁。

但懋辛向蔡锷报告了部队退出叙府后的详细情形，并向蔡锷询问省外对袁世凯的态度。

蔡热情地接待了但，还问及招讨军编制情况。

但回答说：“我们至今仍只两个支队，我们主张充实，但不愿虚张。”蔡点头称是。

蔡因患喉结核，即命秘书李子畅向但介绍省内外情况。

刘光烈和郝大衡于5月10日抵达成都，住悦来旅馆。

12日，《国民公报》记者前往采访。

问：（二君）何日由何处启程。

刘答：5月3号由庆符沙河驿启程。

.....

问：熊司令率军若干驻何处。

刘答：约5000人，驻扎叙南、李庄、兴文、建武、南溪一带。

.....

问：来省宗旨如何。

刘答：与陈将军联络，谋一致之进行。

问：熊司令对于大局之意见。

郝答：熊司令并无权利思想，故招兵不多，投效及招安军多所裁汰，不愿再发生战端，湘西、广东现闻仍有战事，甚望一致停止，息兵宁民。

1916年5月22日陈宦正式宣布四川独立。

就在陈宦宣布独立之后两天，袁世凯即任命周骏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借以图陈。当时周骏正率部驻扎在资中、内江、隆昌、永川一带，接到袁的任命后，即派王陵基率五营西上，

进攻成都。

5月底，熊克武奉命扼守富顺，以防泸州的张敬尧派兵西上，援助周骏。

熊克武刚驻防富顺，连续接到报警，距自流井40里的毛头铺、牛伏渡一带均遭匪劫。

熊克武立即亲自率队往赴毛头铺，将2000余股匪击散，并将“肥猪圈”打破，救出“肥猪”数十人，妇女100余人。至此以后，富顺治安秩序才得到好转，人心安定下来。

这时，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周骏，为了笼络川军将领，以实现其用武力从陈宦手中攫取川政的野心，提出所谓“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

周骏还派人到富顺游说熊克武，望熊帮助参战，至少望熊保持中立。当即遭到熊克武的痛斥。

6月6日，熊克武电告在成都的刘光烈、郝大衡等人“周师受袁伪命，拥兵西行，川局前途，悚然可畏，现已躬率全军移防资内，厉兵秣马，以备不虞。”

同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袁世凯忧惧而死，可耻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6月7日，蔡锷在给唐继尧、刘显世、戴戡报告川局的文电中，对熊克武的为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熊深明大义，于周骏举动，甚为愤慨。”但蔡锷对熊部的实力估计不足，认为“熊、张所部，其实力均难独立作战。”

6月15日，熊克武又电告刘光烈、郝大衡等人“顷奉都督命令，开赴前敌，业已派队前进，并以奇兵抄袭王逆（即王陵基）后路。”

6月25日，蔡锷派罗佩金率顾品珍梯团往援成都。援军未到，陈宦已支持不住，于6月26日逃出成都，王陵基、周骏相继入城。周骏自为都督。

这时罗佩金向熊克武传达蔡锷的指示：“周骏、王陵基竟然奉袁世凯的伪命，率兵上成都攻陈宦，陈不战而逃，现在非打下成都驱逐周、王不可。”并令顾品珍梯团攻资中，雷飙梯团攻内江，熊克武招讨军攻隆昌，要求三路军队分头出发，互相联络，互相支援。

隆昌之敌，系刘湘所属的陈允彝团。陈号称“陈蛮子”，是刘旅的精锐，武器好又能战，实力远远超过招讨军。但招讨军师出有名，官兵团结，斗志昂扬，又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战争一开始，在熊克武所率招讨军的凌厉攻击下，很快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敌人只好边打边退，招讨军节节胜利，步步进逼。临近隆昌时，熊克武把总预备队两个独立连带上前线，把六七十支洋台枪集中在一起，向进入隆昌要道上的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很快把敌人的据点摧毁了。

天刚黑，招讨军已进抵隆昌近郊，与敌相持至晚上10时左右，这时负隅顽抗的敌军突然反攻，大炮、机枪乱轰起来。拂晓，敌军弃城向荣昌、永川退去。熊克武立即命令周官和率领所属支部跟踪追击。

第二天，熊克武得到内江消息，驻守内江的汉军陈营长，经我们的同志谢思九的策动已开城投降。

雷飙已率所属梯团去助攻资中，要熊克武率领招讨军赶紧跟进，战斗任务是从沱江东岸击敌之背。熊克武率部到达时，资中之敌已败溃。熊克武继续率队向成都挺进，到简阳时，闻刘存厚部于6月30日进入成都，周骏不战而逃。不久，罗佩金率顾品珍、雷飙两个梯团也相继进入成都，并令招讨军驻防简阳担任警备后路的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驻川的北洋军队深感不安，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决定退出四川。

7月6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袁世凯死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宣布继续遵行《临时约法》，决定于8月1日召开旧国会，并于7月14日，正式发表了惩办帝制祸首令。护国军的主要领导人认为：“护国军提出之主要条款，已完全达到目的。衡量全国事势，应与段公同心协力，共济时艰。”唐继尧便以抚军长的名义，于北京政府发表惩办帝制祸首令的同一天，宣布撤消军务院。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目标的护国战争到此结束了。

这时，熊克武率领招讨军奉命正驻扎在简阳一带。

熊克武刚率部至简阳，便惊闻陈其美于5月18日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爪牙杀害。他悲愤填膺，怀着沉痛的心情，奋笔疾书，写了一幅“悼陈英士（陈其美字英士）”的挽联，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其挽联为：

君原一介书生，不避艰辛，不憾浮言，竟令元恶震惊，
群奸侧目。

我本同仇故旧，誓除浊垢。无辜素志，藉慰英雄遗恨，
烈士孤忠。

不久，熊克武得到来自川南一些地区的报告，一些地方的股匪利用他在川人中的威望，打出招讨军的旗帜，为非作歹，鱼肉人民。

熊克武对此十分气愤，即电泸州行营蔡都督，请求转告各地军民长官，对“如有用招讨军名义，行为不合正轨者，准各地军民长，严行惩办，勿稍徇。”

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后，熊克武在简阳召集军队领导开会，商讨今后如何自处。

他在会上提出：“袁世凯已倒，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应

该如何自处才是，望诸位多多发表意见。”

但懋辛发言说：“由于护国战争期间，发现种种矛盾现象，来日困难甚多，应该战战栗栗，随客观变化，采取办法以求适应。而在目前，则应采取谦逊态度，自请解散部队，卸解军职，较为适宜。”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癸丑讨袁之失败，已经吃过了无计划、无统一布置、无统一领导指挥的亏。这次的情况比癸丑之役还糟，进步党着了先鞭，成了西南讨袁的主体，梁启超成了指导西南的首脑人物。国民党则因改组中华革命党引起分裂，显得十分涣散。国民党的落后局面已成，要想补救，困难不小。”目前“无论川军客军，他们的政治趋向各有不同，谁是与我们合作的朋友，殊难判明。与其在夹缝中讨生活，不免于受宰割，不如先行辞职，解散部队，善刀而藏。况且我们做到了战争相终始，酬答了我们倒袁的素心，重建共和，正是国民党人的义务，不是言功。”

熊克武及其与会同志都认为但的意见很中肯。

7月21日，蔡锷从泸州出发，前往成都就任督军兼省长职。

熊克武闻讯，即将辞职的呈文和部队的编制表册准备好，以待蔡锷路经简阳时一并呈送给他。

蔡锷路过简阳时，熊克武带领司令部全体人员出城欢迎。

一见面，蔡锷便拉着熊克武的手夸奖说：“这次我所经过的地方，民众都说你的部队军纪非常好！不错！锦帆兄真是治军有方。”

熊克武概略地向蔡锷报告了招讨军建立的经过，然后将辞职的呈文和部队编制表册面交蔡锷。

蔡问：“招讨军现有多少军队？”

熊答：“仍只有两个支队。”

蔡说：“那好。”并劝慰熊克武：“现在万不能说告退，从四川

局势来看，今后仰仗于你的事甚多。”蔡当即将呈文退还熊，嘱咐他立即到省，再行详商办法。熊克武也就不便再推辞，与但懋辛同赴成都。

三、胜利返渝

在护国战争中，由于熊克武能顾全大局，而且办事严谨，治军有方，不居功，不争权，给蔡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熊克武到成都不久，蔡锷便约他和但懋辛、罗佩金一同面谈。

蔡提出川东起义的地方势力甚多，望熊去整理。并要熊任川军第一师师长，问熊有意见没有。熊很感为难，沉默不语，但见此情景，便坦率地说：“该师是原十七镇的底子，两次讨袁都与革命的第五师作战，这样做恐不相宜。”

蔡问：“那用谁好呢？”

熊克武向蔡锷叙述了该师历史后建议道：“是否可找周道刚作师长。”

蔡说：“好！”接着诚恳地对熊说：“我现在拟先保荐你作重庆镇守使，编师事情待以后与鎔轩（罗佩金别号）洽商办理。”并推心置腹地说：“中央方面原要我进京入阁视事，后又要我把川事整理就绪才去。以后我到省城清查档案，感觉四川关系西南太大，而今后全国的问题正多，不知如何变化，不如将西南整理好了，可以转移全国的局势。我立即就要去日本就医，以便早日回川就职，决心不到中央做事了。”最后叮嘱说：“川事暂由鎔轩与循若协商整理。锦机先生，你是四川人，务望特别帮助，川东事务严重，尤望耐心处理。”

熊克武诚恳地表示：“现在军事结束了，我曾面陈总司令解除职务，总司令不允，既然总司令认为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请

派我到雷、马、屏、峨等川边地区搞点垦殖工作。重庆是一个商埠，对于练兵驻军均不合宜。镇守使这个职务是地方行政长官，对我来说，也不合适。”

蔡劝熊道：“锦帆兄，你就不要再推了，重庆这个烂摊子非你去收拾不可。说实话，想去重庆的人很多，比如，刘存厚就想去重庆，但我不放心，怕他纵容部队乱搞，反而无法收拾。望锦帆兄顾念渝城父老，以大局为重。”

8月7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

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赴日本治病。

蔡锷离开成都后，罗佩金约熊克武和但懋辛就编师事宜一同去面商。罗说：“关于四川各军编师事，已由蔡公电周道刚回川领导第一师，第二师师长仍然是刘存厚，第三师师长是钟体道。第四师谁任师长还需洽商，因陈宦独立时委了杨维为第一师师长，卢师谛为第四师师长，这次拟合编成为第四师。第五师师长就由锦帆兄兼任。可是中央规定四川只允许仍编三个师一个混成旅，如今已有五个师，将来一定要缩编的。如锦帆兄到川东改编地方部队，最好将所有杂枪仍旧还地方，如编多了，缩编时要发生困难。”并说：“松坡公临行前还十分夸奖你，说你‘经过半年多的战争，仍然是两个支队，而且在隆昌还能作战，认为你是国家人才。’今后四川事务还望兄多加支持。”最后嘱咐道：“如锦帆兄无另外之事，望尽早启程赴任，重庆方面一应事宜，均等待着你去处理。”

熊克武正准备启程东下，发生了杨维与卢师谛关于一、四师合并改编的争执，谁任师长二人一直相持不下。于是罗佩金希望熊克武再留几天，从中进行调解。而杨、卢二人与熊克武均是同盟会老友，都希望熊克武能为自己向罗善为说词。

熊对此事很感棘手，但他考虑到，决不能因这类事引起同志间的怨仇，造成党内的分裂。于是，同意留下作疏通工作。

他对二人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由于杨维曾当过四川省巡警总督，此次所组织的反袁起义队伍中，警务界人员又最多，宜归还警界安置。

经熊克武反复劝解，杨维接受了熊的意见。他对熊说：“只要不编归第四师，而部下又有安置，本人可以退让。”

罗佩金亦同意对杨另外任用。此事费了10多天功夫，才算告一段落。

诸事处置就绪，熊克武于8月下旬启程，9月10日到达重庆近郊白市驿。

到达白市驿，熊克武立即召见全体官兵，对应守之军纪，一一作了交代。

重庆各界得到新任镇守使熊克武已抵白市驿的消息，于11号晨，纷纷赶往浮图关欢迎，除本城绅商数百人外，尚有各学堂学生千余人，观者如潮，舆马塞途，盛极一时。

9月11日午后，熊克武带领着在护国战争中崛起的，转战千里，威震川南的新编第五师来到浮图关。

这时，他的心情是多么喜悦啊！忆往昔，就是在三年前的今天，他在袁世凯调遣的五省军队的会剿下，全军覆没，挥泪离开重庆。他在苦闷、彷徨中探索反袁斗争的道路；他在云贵高原跨入护国军的队列，投入如火如荼的反袁战争，转战于川南山区，长江之滨，从无到有地建起了四川护国讨军。三年后的今天，他又带领着重新组建的第五师，迈着整齐的步伐，威武雄壮地回到了渝城。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看眼前，那一队队、一排排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情绪是那么热烈，态度是那么真诚，对自己寄予着多大的希望啊！

面对成千上万的欢迎群众，熊克武举止庄重，态度谦和，向他们频频点头致敬。

进城后，熊克武带着随行人员暂住九尺坎魏姓洋房。巴县知

事当即派了数名警备队员前往该住所听差，熊克武即令撤去。一时街谈巷议，莫不称赞他不闹官场派头。

为了安定民心，熊克武很快发布了六言韵告：

本使业已就任，责在地方安宁，克因分兵治匪，当使
萑苻宁清，军队素严约束，决不扰害人民，川东一切疾苦，
业向政府备陈，总期元气早复，不使困苦重经，深望各安
本业，幸勿扰攘自惊，特此推诚相告，其各曲谅此心。”

熊克武首先编组师司令部和镇守使署人员。在编制中，他以国民党人为基础，不分亲疏，不计前怨，把凡是符合条件的国民党人均安排在重要岗位上，顾全了大局，体现了团结。

熊克武到渝不久，参加过癸丑反袁的同志，纷纷前来向他反映：癸丑失败后，胡景伊大兴党狱，杀人抄家，惨无人道，逼得我们骨肉天涯，生离死别。今反袁虽获胜利，我们得以重返故里，但家中财产，已荡然无存，生活无着。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主持公道：退赔被抄没的财产，以免冻馁之苦。

熊克武对他们的艰难处境，十分同情，感到新政府有责任敦促有关方面尽快退赔其被抄没的财产，帮助他们解决好生计。他即向代都督罗佩金报告此事，并请罗行文各方，敦促解决。

罗亦重视此事，很快将熊克武的报告批复各地，要求各地设立专门机构查处此事，一经核实，即行退赔。

不久，财政部发来通令，谓“未拍卖者发还，已拍卖者勿庸置议。”

熊克武对此十分气愤，立即上书中央政府，分函朝野诸公。他在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义正词严地批驳财政部的通令，指出，事实上，这些同志的财产，早被胡景伊者流拍卖殆尽，因此财政部的通令，实际上是断绝了“先烈遗族与志士身家 所赖以生以养

者”，“国家日言抚恤，何以于其固有之物犹靳而不予，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也”。他希望中山先生，凭借其崇高威望，登高一呼，促成政府收回通令，圆满解决此事。

熊克武返渝后曾写《挽护国死难诸烈士联文》以悼念在护国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志士。《联文》曰：

功成一将，万骨皆枯回首看，泸、叙、隆、资、内好头颅，与其羨生荣，不如念死者苦。

义师遍隅，全局已定放声哭，滇、黔、桂、粤、湘诸将校，但知今之果，尤须记昔之因。

朱德同志在《辛亥回忆》一文中对熊克武所率领的四川招讨军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在四川也有同盟军与我们同时起义。他们凭着群众的拥护，采用了游击战术，利用山川，以少胜多，还是打了许多胜仗。

第七章 响应护法，主持川政

一、左 右 逢 源

护国战争结束后，四川的政治局面极其复杂，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锐。就政治而言，由北方的专制统治，转变为滇、黔人的共治，四川人并没有掌握自己的省政；就党派而言，由帝制派陈宦的独霸，转变为以罗佩金为首的国民党与以戴戡为首的进步党的分权。罗的后台为唐继尧，戴的后台为梁启超。

这就引起了旧川军的不满。

为了争夺四川的军政大权，督军罗佩金与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从1917年4月18日开始，在成都展开激战，滇军战败，罗佩金被迫退出成都。

战争结束，罗、刘两人均被北京政府免职，责令听候查办，由省长戴戡兼督军。

戴戡十分清楚，不削弱刘存厚的力量就不可能牢固掌握四川军政大权，而刘存厚攫取四川军政大权之心也并没有死，这样刘、戴双方于7月5日开始又在成都展开了激战，戴戡被困皇城，在城破无援的情况下，被迫于7月17日向刘存厚交出督军和省长印，率黔军撤离成都。戴戡退至仁寿路上，被刘存厚部重重包围，走投无路，被迫拔枪自杀。

罗佩金所率滇军虽被刘存厚击败，退出成都，但实力并未受

到损失，因此当刘、戴之战兴起后，罗佩金便以武装调停为名，打击刘存厚的军队，向成都方向反扑，战争在叙府、泸州、资阳、内江、乐山、眉山、青神、井研、仁寿一带时断时续地展开，有时还进行得十分激烈。

北京政府派王人文为查办使，来川查办。王是一个不敢负责的人，虽然他对成都战事内幕相当清楚，但却没有胆量和办法进行查办，坐困重庆。熊克武对川滇黔军内讧是不赞成的。他竭力主张不要扩大事态，呼吁川滇黔三方坐下来谈判，自行商量解决办法，以免招引北军入川。

一天，熊克武和川东道尹修翰青、中国银行特派员唐士行、商会会长温友松等，去王人文处赴宴。席间，大家都很焦虑地谈到成都巷战，要求王迅速解决。

王人文说：“刘存厚不去，滇黔方面的气不会平。那么，他走之后，谁来干呢？”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突然面向熊克武：“镇守使，你来好不好？”

为了稳定川局，熊克武诚恳地回答说：“不行，北京方面对我不放心，有顾虑。再说，旧川军对我也不是没有意见。蔡松坡就曾要我收容第一师旧部，我没有同意，当时就推荐周道刚了。”

王人文想了一下，然后对熊说：“周道刚拿到北方去，当然可以通得过，但是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北方还是要考虑的。好不好，推荐的电报上你出个名字。”

熊克武回答：“不必了，你是查办使，职权所在。我们推荐周道刚，可以维持目前的川局，你根据这个意见发出电报，在电文里也可以提到，据了解，熊某等也完全同意，你看这样行不行？”

王表示可以这样办。

为了调解几方关系，熊克武又约周道刚去内江与顾品珍会

晤。

熊先行出发，等他行至距内江60里的双凤驿时，听说北京已公布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周已急返重庆，熊克武也只好折回重庆，并派人告诉顾品珍：“事情发生变故，容日后再谈。”

7月24日，周道刚在重庆正式就任督军职。

熊克武在旅途中即已患病，因此，周就任督军职时，他没有能前去道贺。于是社会上谣传熊对周作督军有意见，周也顿生疑虑，对此耿耿于怀。

面对四川局势，周道刚感到，刘、罗、戴纠纷不能解决，他的督军地位是不牢靠的。因此，他受任后，即电北京政府，请派员对刘、罗、戴问题进行彻底查究。

段祺瑞为了直接控制四川，趁此机会派他的亲信长江上游巡阅使吴光新兼四川查办使，率数旅之众来川。

周道刚开始是欢迎吴光新来川的，他想利用吴的权势压制刘存厚，驱除滇、黔军，以顺利接任四川督军。后来他从北京方面得悉，吴光新名为查办，实来督川的消息后，便恐慌起来，但又不敢公开反对。

狡猾的周道刚终于想出了两个阻吴入川的办法。

一是在吴到来之前，联络旧川军，攻击滇、黔军，把刘、罗、戴之战，进一步扩大为川、滇、黔战争，使吴望而生畏，不敢来川查办。

为此，他命令熊克武调兵5个营参加对滇、黔军作战。

熊故作不解的问：“何以不等查办使来？”

周露骨地说：“你不知道，他哪里是来查办，是来夺督军位子的。”

熊明确对周说：“要第五师打讨袁友军，是办不到的。”

另一个办法是假装关心吴，劝吴不要入川。周道刚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入川必须经过第五师的防地，熊克武态度暧昧，贸然入

川，恐发生意外变故。

周道刚的这一招，确实起了一些作用。吴光新在宜昌停留了1个多月，迟迟不动，后在段祺瑞的一再催促下，才率队入川。

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形势，熊克武与五师同志再三斟酌，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调解双方休战不成，我们也决不卷入战争的漩涡，加重人民的灾难。更重要的是，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段祺瑞必定要增派大军来川，武装调停，这样一来，四川又将成为北洋军阀宰割的天下，问题就更严重了。

认识统一后，熊克武作出决定：将第五师主力撤离重庆，集中在长江南岸，由但懋辛全权指挥。自己带少数卫队暂留重庆，随机应变，对付周、吴，看形势如何变化，再筹对策。

同志们虽然赞同熊克武的安排，但对他的安全却非常担心。熊克武乐观地向大家解释说：“正因为我军主力在外面，他们暗算我不能不有所顾虑，请大家放心吧。”

吴光新率领北军即将到达重庆时，刘存厚即电告段祺瑞，请求北军入川，到渝为止，勿再前进，以免引起川军的疑虑。吴光新于10月24日到达重庆后，也就不敢贸然前进了。

1917年7月1日，段祺瑞导演了一幕张勋复辟的丑剧。以后，段祺瑞又坚持废弃《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孙中山先生为了保卫共和，保卫《临时约法》，决定开展“护法运动”。

8月下旬，孙中山先生运筹联络，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于9月10日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护法运动”的新篇章。

唐继尧生性阴险狡猾，他一方面拒不接受元帅职，以便暗中观望，好向执政的冯国璋讨价还价；一方面又表示拥护“护法”，以便利用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发展自己在西南的实力。

中山先生为顾全“护法”大局，于10月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先生为专使送元帅印到昆明，联络唐继尧出师北伐。唐却提出先占川南，再行北伐。并借此机会重新组织滇、川、黔靖国联军，以示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他自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委贵州督军刘显世为副总司令，任命顾品珍为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贵州方面则以王文华为前敌总司令，派袁祖铭率先遣队，分道进攻四川。

谢持、卢仲琳等川籍国会议员，亦电告熊克武、但懋辛等川军将领，望联络滇、黔军，共同护法。

这时，周道刚再次出面动员熊克武参加对滇黔军的作战。熊克武对孙中山先生“护法”的号召是积极支持的，已暗中指示所属部队配合滇黔军作战。因此，熊克武当然不会买周道刚的帐，毫不客气地回答周说：“第五师还戴着红边边帽（护国军军帽），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周道刚杵了一鼻子灰，恼羞成怒，扬言赶走滇、黔军后，即消灭第五师。

战争全面展开后，周道刚电告北京政府，调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调旧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接任重庆镇守使，又密电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叫他拒绝交出镇守使职，使熊两头落空。

当时战争在资中、内江、隆昌、泸州一带进行得很激烈，钟体道一时不能到渝接事。

熊克武为了麻痹周道刚，亲自将镇守使印信送给周，并向周表示近期内即要离渝赴任。

吴光新却不同意将熊克武调离重庆。他质问周道刚：“在这样紧张困难的时候，撵走熊克武是不行的，会出乱子。为什么要这样干，真是不解命意。”他还马上打电报给段祺瑞，请收回成令。

这样，熊克武留任重庆。

吴光新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对熊有什么好感，完全是为了他自己。因为，在重庆维持熊和周的均势，而又有矛盾的局面，

他才有戏可唱；否则，重庆完全在周的势力控制下，他就难于立脚，戏也唱不下去了。

周道刚一计不成，转而请求吴光新派兵助战。熊克武却建议吴光新“先查后办”，“秉公调处”，“以免四川再受战祸之苦”，意在阻吴助周，一方面减轻滇、黔军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熊克武担心如果吴卷入战争漩涡，北军势必源源开来，战争扩大后，地方的糜烂，将不堪设想。在吴光新看来，熊克武的主张正好合他“坐收渔人之利”的私意，于是振振有词地拒绝了周的要求。

周道刚又进而向吴光新献策，说熊克武系革命党，始终是北方的后患，应该合力铲除他。而吴却另有打算，即利用熊、周的矛盾，互相牵制，便于从中摆布，同时吴也不肯为了周去打熊，而牺牲自己的实力。因此没有采纳周的献计。

一天，吴光新的副官长、国民党员马麟暗示熊克武：“身边没有兵是不行的，还是调点队伍回来吧。”熊立即意识到话中有话，连夜调了两连兵进城加强防卫。

由于熊克武的大军就驻扎在重庆附近，周道刚不敢下手加害熊克武，熊虽孤处渝城，却能得以安然自处。

熊克武在暗中却派人通知但懋辛派部队到四川边境迎滇黔军入川，同时在内江布防阻击周师增援重庆。

11月下旬，黔军已进逼重庆南岸，此时石青阳率领的汤子模等部正在强攻长生桥。滇军顾品珍亲率部队从江津强渡长江，进至白市驿，重庆处于滇黔军和第五师的重兵包围之中。熊克武立即密派薛勋石与黔军联系，派刘亚休与滇军联系，商量进城事宜。

12月3日白天，吴光新已闻南岸枪声，城中也不断有流弹飞入。于是他号称要亲赴南岸督师，命令警察厅集中大小木船备用。天黑不久，吴即率队上船，凡部属所通过的街道，一律警戒，断绝交通。

深夜，南岸川军打回紧急电话向周道刚告急，周十分惊诧，在电话中问：“吴总司令已亲自率队前来督战，何以尚未到达。”

答云：“不但总司令未到，前线北军也已完全撤退。”

周又挂电话问水警，才知道吴光新已率部乘船东下。周仓皇无措，立即率少数卫队出城逃走。城中秩序大乱。

重庆总商会立即于12月4日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人急赴镇守使衙门，请熊克武调派部队维持治安，以使重庆免遭浩劫。

熊克武接受了总商会的恳请，同意肩负起维持市内秩序的责任，并立即电调城外军队入城，会同巡警队，分布各大街口维持秩序，还以重庆镇守使名义出示布告，安定民心。

12月4日，黔军支队长袁祖铭和川军总指挥石青阳，率队进入重庆。

5日，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也兼程赶到重庆，设司令部于川东师范学校。

吴光新乘船东逃，熊克武电令驻防涪陵、万县等地的五师部队拦击。

吴损失惨重，辎重全失。

向传义旅还拾缴得吴光新大礼服一套，袁世凯称帝时赏赐给吴的五狮指挥刀一柄，足见其出逃之狼狈。

吴光新逃回宜昌后，悔恨交集，致电熊克武，内有“鞭弭周旋，颇添滋味”一语，其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

12月7日，李烈钧电熊克武，对熊在与周道刚、吴光新周旋中表现出的多谋善断和对北军的多方牵制，颇为钦佩，并叮嘱道：“川、滇、黔唇齿相依”，望他与滇、黔军融洽相处，共同护法。

孙中山先生也电熊克武，对他“斡旋川局，维持地方秩序，使义师所至，匕鬯无惊”的周密策划，及身处敌穴，而能左右逢源，

应付各方的从容沉静态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希望他进一步“奖率军旅，统筹大计，努力进取，贯彻始终”。并叮嘱道：“川、滇、黔唇齿相依，谊等一体，……务宜通力合作，以厚实力，会师东下，进规归宜。”

二、矢心护法

为了维护国本，熊克武于1917年12月13日正式通电护法。

紧接着熊克武在重庆召集顾品珍、赵又新、王文华等川、滇、黔各军将领举行会议。会上，大家都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护法主张。为了加强三省的团结合作，推唐继尧为联军总司令，刘显世为副总司令，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

北京政府对在四川的失败并不甘心，为了继续控制四川，在周道刚逃离重庆仅15天，又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1918年1月9日，熊克武通电各方在重庆正式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

熊克武在通电中明确表示，自己虽是“駘弩之材”，但决心“糜躯报国”，一定“矢心护法”。态度十分坚决！

10日，章太炎与议员郭宇镜、张志群等一行5人抵重庆。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熊克武便结识了太炎先生，对他的文章和为人一向很钦佩，此闻太炎先生光临重庆，十分高兴，亲自前往离重庆40里的鹿角场相迎。各界人士千余人则齐集太平门外等候。

11日，章太炎电告中山先生，认为成都“平定当不在远”。“川中人心，多归熊镇守使，其军实亦较前大有增加，川定尚有余力东下”。

12日，重庆军政绅商学各界，在商会隆重欢迎太炎先生及随员，同时庆祝太炎先生50寿辰。会议由熊克武主持。他在会上对太炎先生的道德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

16日，孙中山先生致电章太炎，以军政府名义正式委任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在电文中赞扬熊：“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询吾党难得之士。”希望他“执行励其破除顾虑，提兵进取，安国乃所以得川也”。

当时，由于刘存厚已成为北京政府委任的四川督军，张澜为四川省长，他们忠于北京政府，孙中山即电函章太炎，令熊克武率领四川靖国各军出师讨刘。

1月上旬，熊克武根据中山先生的指示在重庆召集川、滇、黔各军将领开会，决定分兵三路进攻成都，讨伐“甘心附北毁法”的刘存厚。东路由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两部负责；中路由黔军袁祖铭、王天培两部负责；北路由但懋辛率所部吕超、喻培棣负责，各路分道进军。

驻雅安川军刘成勋，驻嘉定川军陈洪范，亦电熊克武响应靖国，并率部向成都方面进展。

周道刚师驻永川的刘湘旅，亦表示愿意接受熊克武的调遣。

刘存厚分兵5路迎战。中路，由徐孝刚率第一师在内江一带抵抗；右翼，由舒荣衡、汪可权两旅在荣昌、威远一带抵抗；左翼，由钟体道率第三师在安岳、乐至一带抵抗；刘成勋率所部在自流井、嘉定、叙府之间抵抗；独立旅旅长杨肇钖和边军彭斗胜率部在遂宁、合川一带抵抗。

为了最后规劝刘存厚弃北向南，一致护法，熊克武曾于2月7日致电刘存厚，谓：

今但言引退，不言向南，已足令人惶惑。而冯为段所胁迫，仓卒出京，行至蚌埠，又为倪所阻还。京中已极机陧，而兄犹秉承中央，偏重北京，愈令人疑兄无向南诚意。至遂宁、安岳、内江、自流井、叙府、阆中、盐亭皆联军所占领区域，而欲认为中心地带，颇难得各军同意。前曾由贵代表赵铁桥

君等电述情形，当荷鉴察。要之宣布护法，为吾人良心上应尽之责任，只待议和条件之成立，而始宣布，已觉轻视大义。若并向南之意均讳而不言，而惟以督军问题私相授受，是不啻以不肖之心待人，克武虽薄德寡能，亦何致不识廉耻，开诚布公，一致护法，惟兄实图利之。

刘存厚断然拒绝了熊的敦劝。

熊克武随即命令所属各部，展开了对刘的猛烈攻击。

由于刘存厚在军事上处于孤立，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内部又急剧分化，因此招架不住靖国军的凌厉攻击，迅速溃败，但懋辛所率部队，所向披靡，由小川北直逼成都。

这时，刘存厚有五六千受伤官兵正在凤凰山军医院治疗，他们得到部队在川北失败，熊克武部已逼近成都的消息，纷纷涌入北较场督军衙门索饷，大吵大闹，弄得刘存厚手足无措，无法应付。

此时，熊克武部已越过中江与金堂交界的柏树坳。刘存厚闻讯后，在内外交迫之下，仓皇从北较场后门逃离成都。

2月20日，吕超团首先攻入成都。

为安定人心，熊克武立即电令但懋辛暂行省长职，吕超暂任成都卫戍司令，并随即由重庆启程，绕北道赴成都。

在胜利的形势下，熊克武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26日向省内外各方发出的通电中，既痛切而又诚恳地说道：

默察川省年余战争，始祸之原，皆由于争权攘利，互相利用，以至于今，战血未干，可为殷鉴。克武因是兢兢业业，不敢稍存希冀，秉义而行，不识其他。……目前川局虽定，国难未宁，此刻宜以军事为亟，不能拘牵常例。克武为维持现状计，应即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名义，执行军民政

权，以符西南护法之实，想亦我联军总、副司令及各友军、义军将领、川军各师旅长之深许。

并明确表示：“一俟国家依法解决，克武即行引退，以明素志。”

3月8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望熊“即刻日就职视事，肃清余逆，分命师旅，会师大江，以集大勋，而竟护法之责。”

3月10日，熊克武顺利抵达成都。

《国民公报》随即发表《勉熊锦帆》时评，满怀热望地劝勉熊克武：

熊锦帆兼领军民政务，治内对外，责一身，此正努力图功之时，当非志得意满之日也，熊君勉乎哉！勤慎治事，诚信对人，人未有不服，而事未有弗理者，幸好为之，以慰民望。

3月13日，成都军、政、警、绅、商、学各界在悦来茶园集会，欢迎熊克武赴省城。会议热烈、隆重。

3月14日，熊克武发布布告，宣布执行军民政事。同时，还发布了安民告示，要求“工商各勤所业，士庶各安其生，切勿惊惶自扰，切勿观望逡巡，弥补已往过失，徐图善后经营。”并向省城父老表示：“誓当保障群伦，回复旧时元气。”

4月，熊克武派吕超率喻培棣、王维纲、彭远耀等部与石青阳、颜德基等部配合，追击刘存厚、钟体道。

6月9日，熊军进入广元，刘存厚败退陕南，在段祺瑞的庇护下，设四川督军署于汉中。张澜设四川省长行署于北京。

至此，四川以打击北京政府在四川的忠实代理人刘存厚为目标的“护法”之役，算是胜利结束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人

第一次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

三、主持川政

辛亥革命后，四川历经癸丑之役、护国之役、护法之役，连年处在战乱之中，人民长期遭受抢夺骚扰、横征暴敛之害，生活十分痛苦。

熊克武执掌四川军民两政后，为了整理川局，整顿军队，恢复地方秩序，减轻人民负担，振兴实业，于1918年5月，在成都召开靖国各军首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但懋辛、刘湘、刘成勋、吕超、向传义、陈洪范、黄复生、石青阳等人。

会议开始，由熊克武提出会议讨论大纲。与会人员就熊克武所提会议讨论大纲进行了反复讨论，形成了以下决议案：

1. 军费案：决不增加川人负担，如军需必须增加，应向中央设法。
2. 编制案：已编师旅者，由督署派员检阅，未编者，以九五通用快枪为限，由督署派员编定，以4个月为限。
3. 剿匪案：各军未编制前，暂由局部切实清乡，并切实规定改良团警办法，及剿匪奖励条例。俟军队编制后，再实行大清乡，另订根本办法。严禁哥老及种烟，提倡实业。
4. 交通案：无线电由督署规划办理，筑路由现役兵去工作。
5. 川边案：对西藏的叛乱，无和谈可言，应增加边军的饷械，加派军队进行镇压。
6. 营房案：营房至少需容驻1个团军队。
7. 汉军案：决定对全部汉军进行改编。
8. 偕行社案：按军事集成条规斟酌办理，于社内设偕兵会，另办废兵院，收容伤残士兵。

上述决议案是熊克武治理四川的纲领。为了贯彻实施上述决

议，熊克武花了很多的力气，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缩编军队

四川连年战祸，不断扩军。南方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号召全国起义护法，各地义军，所在飙起，旗号不一、队伍都是临时招编而成，枪支复杂，人数众多。另外，旧川军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也趁战事混乱大量招编队伍，强行提取地方团警的枪支，致使四川军队恶性膨胀。这样一来，军费开支连年大幅度增长，而且无定准，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护法战争一结束，摆在熊克武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缩编队伍。而在当时拥兵自重、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历史条件下，要缩编各军事头目的武力是十分艰难的。为了稳定局势，熊克武仍以极大的魄力，开展了这一工作。

1918年2月24日，吕超团刚攻下成都，熊克武尚在赴成都途中，为了制止各地军事头目趁混乱之机，招编地方武装和土匪来扩大自己的实力，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的名义，电告各军负责人禁止招抚地方武装和土匪。

3月5日，熊克武行至资中，又发电给各军负责人，重申禁止招匪令。

接着，又通令禁止各军提团警枪支。

熊克武刚到成都，便召集在成都的军官开会商讨收束军队的有关事宜，为缩编军队作准备。同时，他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名义，发表了《告川中军界文》。该文从减轻人民疾苦，军队编制实情，稳定川局等6个方面，反复陈辞，指出必须坚决裁减军队，要求军界中的各级官佐从4个方面做好说服解释工作。最后，熊克武焦思竭虑、推心置腹地对军界同人说道：

本总司令自维德薄，素怀谦谨，当前川局凋敝，……人民望治，有如云霓，此后整顿财政，计划清乡，澄清吏治，恢复元气，均以此次改编问题为入手，因循既有所不可，武

断实心所未安，是用披沥肝胆，以正告于我亲爱之军界同人，无相猜忌，无相构煽，恪遵命令，以保川局，则多难兴邦，剥极必复。

10月，熊克武在成都正式召开整军会议，确定缩编军队，编制条件一律以快枪为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与各方面反复商讨，终于把各路川军缩编为8个师，1个全川江防军司令，1个混成旅。

但懋辛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驻防成都；刘湘为第二师师长，驻防合川；向传义为第三师师长，驻防德阳；刘成勋为第四师师长，驻防新津；吕超为第五师师长，驻防绵阳；石青阳为第六师师长，驻防顺庆；颜德基为第七师师长，驻防绥定；陈洪范为第八师师长，驻防嘉定；重庆镇守使余际唐为全川江防军司令，军队驻扎在涪陵、綦江、南川、邻水一带；张冲为第二混成旅旅长。此外，属于新川军的黄复生、卢师谛仅有1旅之众，不够编师条件，故任命黄复生为川东道尹，卢师谛仍以护法军名义领其众。

通过整编军队，军饷才有了确定的数目标准，老百姓沉重的军费负担才有所减轻。

（二）实行清乡

四川由于战乱频繁，盗匪趁机蜂起，抢劫财物，掳人勒赎，十分猖獗。富豪巨商有的逃走，有的搬进寨堡，尚能幸免，而小商之家，便成了土匪抢劫的主要对象，弄得十室九空，广大群众朝不虑夕，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整顿治安，消灭匪患，熊克武布告全川军民，责令驻军，会同地方知事，实行清乡。

为了争取多数，打击顽匪，熊克武专门制定了《剿匪条例》。条例规定，缴枪投诚者准予自新，不咎既往，并按照所缴枪支折

价，作为改营小工商业的资本。对负隅顽抗的匪徒，由驻军长官，会同地方知事，限期搜剿，以军队为主力，地方团防警备队协助。除当场击毙之匪以外，生擒者一律交县知事，依照惩治匪盗条例惩处。

另外，鉴于各县过去报请法院核办的匪案，甚为拖延，常有数月不能办一匪者，不足以寒匪胆而快人心，熊克武特设四川警备总司令部，自己兼任总司令。各县办匪案件，一律报警备总司令部，由执法处按照惩治匪盗条例，迅速核办，不得延搁。

1918年5月，熊克武亲自宣布彭县大恶棍戴鸿畴违令招抚，扰害地方，在彭县、郫县、崇宁县肆行抢掠，根据刑事条例，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熊克武亲自抓清乡，因此，《剿匪条例》下达仅半年，通过多方努力，全川盗匪基本上肃清了。

(三)停止苛捐杂税

由于连年战乱，各县军队皆自立税收标准，除截留粮税正额外，还有筹借、垫支等各种名目，向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索取额外巨款。大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被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倾家荡产。

熊克武任督军后，明令取消苛捐杂税，禁止向人民借垫筹款，明确规定纳粮上税标准，由各县税收机关统收。驻军军费，由督军署军需课按月发给各军预算内分期领款凭单，县知事所需行政费，由财政厅按月发给领款凭单，统向当地税收机关领取款项。这样不仅建立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也减省了总缴总拨的财务手续，人民只负责上缴正额粮税，其它苛捐杂税免除了，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1919年10月，熊克武发现有的军队在防区内用拨款凭单预征1920年粮税，为此他专门指示督军署责成财政厅通知各地严加制止。

(四)折价收回销毁纸币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浚川源银行(四川地方银行)发行的军用券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四川发出的大量纸币，都是不能兑换现金的纸币，这种不能兑换的劣币充斥市场，造成了币价贬值，物价上涨，市场波动甚大，人民生活极不安定。熊克武到成都执事时，原来1元面额的纸币已经贬值到只值硬币三四角，有的地区甚至贬到只值硬币2角8到3角，而且还在逐日低落。

与此同时，四川原来流通城乡的辅币——铜元，在清末，最初只有1枚当10文、20文两种；民国以来，各地贪官污吏为了图利，改铸每枚当50文的铜元；依附北洋军阀的刘存厚占据成都后，只图贪厚利，不顾人民死活，另铸1枚当200文的铜元。这样一来，把流通城乡的辅币也弄得十分紊乱，人民日用所需的零星小商品价格，也一天天飞涨起来，广大群众怨声载道，叫苦不迭。

为了安定人民生活，平衡财政收支，必须稳定金融，这是摆在熊克武面前的当务之急。

他首先下令停止铸造当200文的铜元，把已铸的全部收回销毁，另改铸当50文的铜元，流通市面。对于纸币，根据当时币值和物价情况，确定首先提高纸币币值，把原来1元面额的纸币，折合为硬币——银元5角。规定凡国家、地方的收支出入一律以七成硬币、三成纸币配合使用，然后把收入的三成纸币裁角缴库。这样，市面流通的纸币逐渐减少，纸币币值稳定而不再低落。1918年6月，熊克武令官印局局长刘永年销毁印刷浚川源券石板，不再生产纸币。币值稳定后，市场价格得以平定，人民生活安定下来。仅一年，各种纸币全部回收完，全部销毁，这样日趋稳定的市场得到了巩固。

(五)振兴实业

四川交通不便，工业较为落后，为了振兴实业，推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熊克武在任督军期间作了以下工作：

1. 整顿兵工厂，任命吴秉钧任兵工厂厂长，调五师军械长梁载基任督工。在吴秉钧和梁载基的组织领导下，经过整顿，兵工厂所出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还能仿制当时的著名利器——德国“自来德”手枪。制造子弹，需用白药，白药的主要原料是硫酸，而硫酸一直是从国外进口，由于运输困难，购价昂贵，给子弹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梁载基用土法试造，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成功地制出了硫酸，保证了生产子弹的原料供应。

2. 规划筹备在四川开办钢铁厂，聘请任鸿隽为钢铁厂筹备主任，派他先行赴美国购买办钢铁厂所需的各种机械设备。这些机器虽然陆续运回了四川，但由于时局骤变，熊克武办钢厂的志愿尚未实现便去职了。

3. 计划首先修筑成渝公路，以利交通。聘技师设计，派人勘测路线，要求各地分段建筑。亦因时局变迁，成渝公路刚开始修建，便停下了。

(六) 重视教育，兴办学堂

熊克武刚到成都任督军不久，就委托但懋辛召集成都各中学校长开会，要求各校尽快开学。与各中学校长一同商讨关于开学的有关事宜。熊克武亲自批示拨款3万元给成都各官立学校，以改善办学条件。他还请任鸿隽在美国代购了一整套理化实验仪器，送给成都南较场四川高等学堂，惜因轮船失事，仪器全部被损失了。

为了培养陆军基层军官，熊克武于1919年在成都开办了“四川陆军讲武堂”。“讲武堂”分设学员班和学生班。学员班由部队保送现役军官学习，一年半毕业；学生班招收中学毕业生，学习两年。熊克武自兼堂长。他经常前往讲武堂给学生讲话，晓以南北敌我对立形势，教育学生为革命努力学好军事。有时，他还和学生同食，勉励学生毕业到部队后要与士卒同甘共苦。后来，熊克

武将该校的毕业生编在第二混成旅任官佐，使第二混成旅成为名震全川的能征善战之师。

此外，熊克武依法召集四川省议会，把它作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以树民主国家的基础。

他还在全川开展了禁烟工作，对私种和贩卖鸦片的土豪进行坚决打击。

熊克武任督军后，所采取的以上种种措施，都是巩固政权与改善人民生活所必须的，也是当时人民的迫切希望。因此从1918年至1920年，四川的局面和人民生活是辛亥革命以来最稳定的时期。熊克武在治川上作出的贡献，是应当给予恰当肯定的。

熊克武任督军期间，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尊严方面也作了许多努力。

清朝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清吏软弱糊涂，竟让英法两国擅自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熊克武主持川政后，日本特派员草政吉于1918年9月14日持北京政府外交部公文见熊克武，谓：奉本国政府电令成立成都日本领事馆，遭到熊的断然拒绝。熊明确回答这位自称“日本领事”的人：“英法两领事馆系既成事实，已难挽回，但后来者则必须杜绝。”并说：“设立领事馆事关国际交涉，可自向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请求，四川省政府不便办理。”此人自讨没趣，但仍赖在成都不走。

1919年“双十节”，熊克武宴请外宾，草政吉虽同被邀请，但熊指示在请帖和座席签条上只称某先生，弄得他很是败兴。

一天，这个所谓“日本领事”乘轿出门，轿后灯笼上硃书“日本领事馆”5个大字，四川交涉署长刘逸仙在熊克武的思想影响下，派人在大街上将轿子拦住，硬把灯笼提走，弄得此人狼狈不堪。

由于熊克武坚决不同意日本在成都非法设立领事馆，日本方面只得偷偷把“日本领事馆”的招牌挂在金河街某公馆二门内，一直不敢公开挂出来。

1919年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爆发。

5月25日，成都绅、学、商各界召开万人大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熊克武对成都人民的这一爱国行动给予了积极热情的支持，还派员临视，派出军警协助维持秩序。会后，熊克武不仅将会议实况及时电告广州军政府，而且在电文中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电谓：

自日人以强硬态度，要挟欧洲和会，攫夺我山东之各种特权，消息传播，全国震惊。此间舆论，尤为愤激。本月25日，成都绅、学、商各界，特开大会，到者万人。当经本署派员临视，秩序甚为整严。据该会议决，争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电请欧洲和平会议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各条。随即特派代表来署哀恳，根据本日议决二项，通电全国，并称青岛虽租与德人，而领土主权，本属于我。初无待日人之交还，且我既对德宣战，则两国所定条约，应归无效。凡属敌人在我国内之租借地及一切债权特权，应由我直接收回，更无特留某部交日人继承之理等语。武(即熊克武)意我国为协约国之一，乃反受最不平等之处分，后此将何以立国。此事关系全国存亡，非寻常外交可比。务望主张我国专使对于此等处分，严词拒绝；并一面设法挽救。临电无任迫切。

8月21日，熊克武又电请军政府电告北廷，务将中日密约，宣示国人，共谋挽救。电文如下：

阅悉外报载中日条约情形，利害之巨，不仅关于山东一省，北方为军阀把持，宁易期其觉悟。我西南各省，以护法救国自任仔肩，最宜早图自决之道，惟有淬万精神，团结一气，不以和议之幸成而变易初衷，内之策庶政之进行，外之动烈强之官听，转危为安，在此一举。并请军府电告北方，

务将此项密约，宣示国人，共谋挽救，一线生机，庶不致断绝于冥冥之中也。谨抒愚见，伏冀裁择。克武叩。敬申。

虽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北京政府慑于全国舆论的威力未敢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攫取山东半岛的阴谋遭到暂时挫败，但它贼心未死，趁北京政府频频发动内战，财政拮据之机，于9月初又派芳泽来华，与北京政府进行秘密谈判，企图以借款6000万元为诱饵，诱使北京政府同意由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种种特权。这笔肮脏的交易在报上披露后，再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熊克武亦于9月16日电告广东军政府，痛斥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丑恶行径。

他在电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

日人……近复利吾国财政艰窘，拟以借款小惠，达彼阴谋，凡我国人，同深愤激。夫木必先腐而后虫生，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吾国近数年来与日本各种密约，无不丧权辱国，致酿亡征，皆由当局中少数宥小恩专政权，甘心卖国所致。

他呼吁军政府作出最大努力，制止北京政府与日本达成丧权辱国的协定“以杜后患”。

11月16日，福州学生在街头进行抵制日货宣传，日本暴徒数十人别有用心地持械寻衅，击伤学生7人、市民多人，击毙警察1名，造成“福州惨案”。事件发生后，日本领事馆不仅公开出面庇护凶手，日本政府甚至把兵舰开到福州，用武力相威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熊克武义愤填膺，于12月18日与杨庶堪联衔电北京政府，义正词严地谴责道：“似此显肆暴行，不顾邦交，将置我国权于何地？现在群情愤怒，义不受辱，万一酿成巨

变，殊非东亚和平之福。”并严厉警告北京政府：“自青岛问题发生，外交失败，国民对于政府已觉失望，此次若再事退让，人心将不可收拾，鱼烂土崩，谁执其咎。”要求北京政府：“严重抗议，据理力争，保国权而杜后患，刷国耻以谢人民，存亡之机，系于一发，……尤望一致筹帷，用御外侮。”

以上电文充分表达了熊克武反帝爱国、维护祖国独立和尊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熊克武反对帝国主义，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上。

熊克武在川期间一直牢记着他从南京率领蜀军返川时，黄兴对他的叮嘱：“川边还会有事，英国人进逼川边是个大问题，安定四川要先抓川边。”因此，他自1912年返川后，对川边问题一直很关心。

熊克武作督军后，即着手整理川边事务。

1919年9月中旬与藏军达成暂行停战协定。

熊克武很清楚，边藏纠纷是英帝挑起的，而争端发生后，英帝又别有用心地出面调停，妄图把藏军用武力侵夺的四川边境的大片土地划归西藏管辖，以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洞察其奸，于9月18日电嘱北京政府，在与英帝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决不可受骗上当，电谓：

惟查川藏划界，关系国家主权，至为重大，藏既属我，边更无论，奚有外人置喙之地，即以解决中英悬案为言，要以不失原有界址为第一要义，……正约虽申明西藏仍为中国领土，然边藏界限有内外之分，况外人窥藏有年，今日为边保得一分界地，即异日为藏减少一分纠葛。此次交涉，总以争回上年失地为主。

并明确表示：

此间已准备实力，为廓清边围计划，执戈卫国，义弗敢辞。

为了补充边防军的军用物资，改善其生活待遇，熊克武于11月25日，发给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子弹6万发，饷银3万圆，并勉励守边将士全力以赴，防御藏乱。

为了加强川藏边防力量，熊克武又于1919年5月任命第四师师长刘成勋为筹边督办，派少将王祺昌在川边设立筹边处，以协调陈、刘两部的关系。

为了“保固腹地，控驭徼外”，粉碎英帝妄图假手藏人鲸吞川边的罪恶阴谋，彻底解决川藏边境问题，熊克武经反复思索，于1920年1月1日电广州军政府，建议另设西康省。

此外，熊克武还对西藏和川边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料，作了系统的搜集整理，以备与英使交涉。

熊克武在治川期间，错误也是不少的，其主要错误是被迫确立了四川防区制。

所谓防区制，就是各个军阀在所驻防的区域内，不仅可以截留税款，把持捐税，任意征发，而且可以委任行政财政官吏，对百姓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每个防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本是当时南北对峙、军阀割据时期的必然现象，但在四川，使之形成制度，则是1918年熊克武在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时，令各师饷款就地划拨而确定的。

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举兵讨伐依附北洋军阀的刘存厚时，仅有一师兵力，他之所以能凭借一师之力攻下成都，主要是得到了滇、黔军的支持。在他取得对刘存厚用兵的胜利，以靖国各军总司令名义兼摄四川军民两政时，作了极大的努力，才

把川军缩编为8个师。而以援川名义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的滇、黔军却多达3万余人，占据着川东及川南富庶之区的26个县。从当时熊克武的实际权力看，不仅对川军不能完全控制，对滇黔军更是无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为了保持四川的暂时平定，只好让主客军各部暂驻原地不动，并于1919年4月，明令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决定在主客各军所驻地域，划分税款，自行向各县提用，与为粮饷之需。这样，四川的防区制经熊克武确认完全形成了。

起初，各军在所辖防区内，只是就地划饷，后来，逐渐变成就地筹饷。于是借垫预征，苛捐杂税，敲骨吸髓，层出不穷，有增无已。

熊克武任督军后，虽然明令取消苛捐杂税，并采取了许多措施，开始时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们贪欲的不断膨胀，熊克武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军阀们在自己辖区内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熊克武也就无法控制和约束了。

狡黠的军阀们看清了有防区便有军费；有军费，就能不断扩军；实力扩大，又可争夺防区。致使四川境内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四川人民受尽了兵燹之苦。追根溯源，熊克武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八章 同志成仇，血战千里

一、同 志 分 道

早在1914年熊克武癸丑讨袁失败后亡命日本时，便和同时流亡日本的四川国民党人杨庶堪、谢持、吕超等发生了矛盾。他因倾向黄兴，与孙中山先生也产生了隔阂，不久熊便离开日本，前往南洋，这样便和孙中山先生愈来愈疏远了。

四川护法战争兴起时，由于熊克武尚任重庆镇守使，处境危恶，为了应付各方，未便公开表示态度，直到护法滇、黔军进占重庆后，才正式通电护法，因此，孙中山先生当时对熊克武是否诚心护法存有戒心。直到章太炎先生到重庆了解熊的政治态度，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后，孙中山先生才正式委任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

护法战争在四川刚取得全面胜利，唐继尧为了拉拢熊克武，不请示护法军军政府，便擅自于2月25日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孙中山对熊克武仍不放心，因此又于2月27日以护法军政府名义电命吕超为成都卫戍总司令，兼暂行代理四川督军。

当孙中山得知唐继尧独行其是，已任命熊克武为督军兼省长时，对此颇有异议。立即于3月2日接连发出两电，一电发给石青阳、章太炎、黄复生，卢师谛等，一电发给黔军总司令王文

华，竭力主张军民分治，并推荐杨庶堪任四川省省长，以扼制熊克武的权力。

孙中山先生在给王文华的电文中这样写道：

嗣得唐莫帅有电，已令熊总司令克武任川督兼省长，川人治川，谁曰不宜。惟川督一职，宜得各方之同情，且为全川之推许，再由军政府任命，庶能辑睦联军，共击武汉，以定中原。锦帆资望，谁曰不宜？但莫帅独行己见，又未见就元帅之职，遽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挟征服之威，足生反应之患。况军民分治，实为今之要图，川局甫定，未可再蹈军民混合之覆辙。

3月4日，孙中山又电告在上海的杨庶堪，望其兼程返川任省长，联合黄、卢、陈、吕等军，收拾川局，电谓：

有日接唐莫赓电云：任锦帆为督军兼省长，唐本云南督军，何能任命四川督军省长？惟此间又不能反对，因复电云：已电询川中各军意见，至省长，则主由民选。又电黄、卢、石等，嘱其一面公举川督，请军府任命，一面疏通省议会，火速一致选举执事为省长。望兼程反蜀，联合黄、卢、陈、吕等军，收拾川局，迟恐锦帆权力日增，黄、卢不足以抗，款事另电告。文。

当孙中山先生以护法军政府名义正式任命熊克武为督军时，熊克武却于3月27日电复孙中山先生拒绝就任督军职，请军政府收回成命。

杨庶堪为了避免和熊克武直接发生冲突，一直滞留上海，不愿返川就职，后经各方函电催促，才于1918年8月19日由上海抵

达重庆，于10月12日在重庆宣布就任省长职，直到11月6日才到省垣接省长印，处理政事。

时值省一届议会届满改选，在这期间，围绕选举省议会正副议长，熊克武和杨庶堪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暗斗。熊提出李肇甫、熊峯为省议长候选人，杨提出朱之洪、郭崇矩为省议长候选人。选举结果，李肇甫当选议长，熊峯、郭崇矩当选副议长，而杨庶堪最信任的朱之洪却落选了。这样熊克武就把省议会控制在自己手里，杨庶堪在省里势孤力微，处处受到扼制。

杨庶堪为了扭转这种孤微的处境，曾电告军政府，请委任廖仲恺来川任财政厅长，蒋介石来川任省警务处长。

军政府于1919年4月21日正式任命廖仲恺为省财政厅长后，孙中山先生复以私人名义电告四川党人向楚等，望协同廖仲恺切实计划财政方案。

这时廖仲恺已行至宜昌，熊克武却暗中指使省议会熊峯、程理权、罗叔玉等议员电告广州军政府，反对廖仲恺来川任财政厅长，廖只好又折回广州。

警务处长杨维，也向杨庶堪表示反对蒋介石任省警务处长，并表示不受调动。

这时蒋已行至重庆，住大梁子“优胜旅馆”。

为了不使蒋介石过分难堪，熊克武指示江防军总司令余际唐送200元路费给蒋，礼貌地打发蒋返回广东。

蒋介石初来四川便杵了一鼻子灰，从此对熊克武耿耿于怀。

熊克武还以督军名义，强行接收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武装。通过整军编师，调拨饷械，对孙中山先生支持的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等进行扼制和打击。以黄、卢所率义军不足编师条件为借口，不允编师，仅委旅长之职，对石青阳的师长职也一直拖到1919年才任命。对他们所率部队的饷械接济，更多所限制。石青阳、黄复生曾多次向杨庶堪反映军饷困难，从未得到过盐款

补助。杨曾为此事多次与熊洽谈，熊均置之不理。

这样熊克武和杨、石、卢、黄、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关系越来越紧张。

孙中山先生曾致函卢师谛等人，希望他们对蜀中军事“勿以小挫失而遽怀灰心，毅力坚持，以谋进取”。指出：“至和议声浪，现已日趋日近，而废督裁兵之计划，尤为多数所主张，将来当可成为现实。届时文必当设法为川中同志保留一部分军队，以固西陲实力。此时吾诸同志在川者宜注意巩固现在地盘，谋切实之发展。”

孙中山还于1919年2月4日电告谢持：“黄（复生）、刘、颜（德基）、石（青阳）诸部苟能设法维持，必须保存之也。”

二、联军会议

护法战争结束时，顾品珍统领的滇军第一军，赵又新统领的滇军第二军，以及滇军第八军叶荃部，分别驻扎在四川的简阳、资中、内江、隆昌、自贡、荣县、永川、泸州、叙府、川北南部、川东的万县、夔府等地。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率领两个师的兵力驻扎在重庆、綦江、南川一带。

护法战争结束后，唐继尧的图川野心迅速暴露，驻川滇、黔军亦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俨然以“征服者”自居。

四川督军署和省署的军政令不能达于滇、黔军辖区。滇、黔军可以在辖区内随意撤换地方官吏，征收捐税，贩卖鸦片，态度十分傲慢、骄横。

为了让滇、黔军进一步控制四川，唐继尧要熊克武让出重庆镇守使职务以授王文华，设四川军务会办以授赵又新，设叙、泸镇守使以授顾品珍，设夔、万镇守使以授叶荃。唐的这一系列无理要求，遭到熊克武婉言拒绝。

1918年8月，唐继尧以商讨北伐方案为名，电令熊克武必须赴重庆参加川、滇、黔三省联军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熊克武拒绝唐攘夺四川权利的要求后，为胁迫熊克武，以实现其征服四川的阴谋而设下的鸿门宴。熊对此深具戒心，对可能出现的险恶局面，作了应变部署。指令但懋辛镇守后方，并通令四川各地，在他离省后，四川军民两政由但懋辛全权负责。对省垣及川西北军事安排亦作了紧急处理。

8月20日，熊克武宴请成都政绅商学各界代表及省议会议员，告诉他们自己将赴重庆参加三省联军会议。

22日，熊克武又在成都少城公园宴别各军将领、省府各机关人员。

熊克武在这两次会上，反复向大家表示，自己决不改变护法初衷，决不改变“川人治川”的主张，一定要维护川人利益。

25日，熊克武离开成都，临行前专门发表了赴渝参加联军会议的通电，重申拥护护法和川人治川的主张。随同熊克武前往的有参谋长李蔚如，政务厅长刘光烈，秘书长黄圣祥，国会议员熊斐然、刘辅周、李维纶等。

熊克武对赴渝路线也采取了安全措施。鉴于东路已控制在滇军重兵之手，便由川北绕行赴渝。为途间戒备起见，专门调了一个警卫营，1个机枪连作为护卫。

9月1日熊克武行抵遂宁，9月3日从遂宁登舟出发，走水路赴渝，于9月6日到达重庆。

唐继尧本人虽于9月10日抵达綦江，但却滞留綦江达1周之久。他在綦江故意透露出接北京某议员的来电，谓：“新国会决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望西南诸省表示同意，南北即可媾和，川事委唐解决。”他还假惺惺地透露其回电内容：“川事川人自主，早有宣言，锦帆忠信可亲，当共提挈，硕交已成，决非佞邪可能构陷。”以示对熊克武的友好。

其实，唐在綦江滞留的真实目的是对川军各部进行分化收买，使熊陷于孤立，以便就范。杨庶堪、黄复生、石青阳、夏之时等均曾派代表到綦江谒唐。熊克武也曾派其参谋长李蔚如前往，以便观察一切，以谋对策。

9月17日，唐继尧到达重庆。

唐到渝之日，全城戒严，各码头的渡船均勒令停靠对岸海棠溪。从太平门至学院衙门行辕，沿途断绝交通，每一铺户站一武装哨兵。临街商铺，一律勒令关门。唐抵海棠溪，鸣礼炮21响。唐渡江经太平门入城，仪仗甚盛，前列为护卫骑兵；次为御用的“佽飞军”，头带钢盔，身背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再次是掌旗官，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唐”字。后面接着唐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内放着绣龙金黄褥靠垫，轿后为唐座骑黄骠马，紫金鞍。殿后是其护卫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唐入城后，即乘其黄骠座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进入行辕。

性情桀骜、不甘人下的熊克武目睹这一光怪陆离的场面，目睹唐继尧盛气凌人、目空一切，俨然以皇帝的姿态驾临渝城的丑恶表演，深深地感到来者不善，一场严重的较量已迫在眉睫。

当晚，唐继尧邀请熊克武到行辕商谈。熊到时，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和杨庶堪等人已先在坐。

熊克武坐定后，唐继尧从袖内拿出已由他和刘显世两人先行签了字的《滇、川、黔三省同盟计划书》即“准备北伐案”，交熊阅。

书中列举四川的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富庶地区，全都用来作滇、黔两军防地，仅以面积计算，即占全省三分之二。

又指定四川所有盐税、关税、烟酒等税，概充联军军饷。

并决定四川兵工、造币两厂，统归联军管辖支配。

意见书合盘托出了唐继尧鲸吞四川的野心。

熊克武阅后，一言未发，心里十分愠怒。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态度鲜明而又口气和缓地说道：“北伐我完全赞同，出兵出款，四川应该努力去做，兵工厂也应该尽量供给械弹，但全省厘税和兵工厂归总部直接掌管，这样重大事件要经省议会通过，我作不了主，即使我个人同意也没有用。”

熊又转过来问杨庶堪：“财政是属省署的职权，杨省长你看怎么样？”

唐继尧当即讥讽熊克武：“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识者一笑。”

杨庶堪却不置可否，始终不发一言。

会议陷入僵局，唐继尧只得无可奈何地说：“望锦帆兄下去和川中同志多多商量，以后再从长计议。”

过了两天，唐继尧又召请熊克武继续会谈。唐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锦帆兄来，主要是研究联军的饷款问题。”停了一会，唐若无其事地说：“根据《计划书》规定，四川每月应协济滇、黔军军饷，每饷成旅6万元，该不会有困难吧。”

熊克武直截了当地问唐继尧：“其总数究竟需要好多？”

滇军提出每月需要32万元，黔军提出需要28万元，以年计共达600余万元。

熊克武明确表示四川无力负担如此巨款。

经反复协商，滇军方面坚持不少，黔军则减为每月23万元。

最后，这些要求遭熊断然拒绝，未等会议结束，熊克武便愤然离开了行辕。

过了几天，黄复生又来从中转圜，约熊克武再往唐处从长计议。

熊、黄于午后2时来到唐继尧的行辕，唐故意摆架子，一直

到6时才出来接见。

一见面，唐就要态度，大发脾气说：“今天若再谈不好，我就要走了。”

熊克武竭力克制自己，请他多住几日，从缓商议。

在商谈中，熊克武声明：“对滇、黔军的协饷，出自四川人民，我个人负不起这一责任，可否把协商问题，提交四川省参议会讨论？”

唐悍然说：“不行，四川省参议会也不能负此责任。”

熊抗争道：“省参议会系代表四川民意，他们都负不起责，我一人何能担负？”

唐见熊态度强硬，于是转换话题，将他准备对四川各师编制，各道尹，包括夔关监督的预拟人事安排告诉熊：石青阳为川军第三师师长，颜德基为川军第六师师长，卢师谛为川军第七师师长，陈炳堃为夔关监督，夏之时为川南道道尹等，强迫熊克武立即同意。

熊克武一则洞察其奸，再则执意排斥支持孙中山先生的石、颜、黄、卢，因此，固执地坚持编师应以实有枪支多寡为标准。他申辩说，石、颜、卢诸部不合编师要求，不能编师。

此时滇军各军师旅长一齐向熊发动进攻。尽管如此，熊也仅同意任命石青阳、颜德基两人为师长，其它要求均未接受。

谈判从夜间8时开始，一直到深夜3时。熊离开唐处，还未回到行营，唐任命石、颜为师长的训令已先送到，以造成不承认也得承认的既成事实。

唐继尧为了在川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为了挽回他图川阴谋受挫的面子，遂于9月28日在行辕举行了隆重的军政府总裁就职典礼。

典礼结束时，唐继尧宣布援鄂援陕军事部署，并于10月2日发表各路指挥命令：

军事会议业经决定，所有各路军队，不能不有统率指挥之人员，兹特决定：湘西各路军统归联军刘副总司令指挥；援陕各路军队，除叶（荃）姚（以介）两军直辖本部外，其余统归熊总司令克武就近指挥；援鄂各路军队暂以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本部总参谋长顾品珍临时指挥，兼与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会商办理。以上各路，仍统属联军总司令部，特电知照。

唐继尧的这一援鄂援陕的军事部署，不仅限制了熊克武的指挥权，而且把熊封锁在川西一隅。

联军会议召开以前，唐继尧满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只要在会上对熊略施压力，就可能使熊上他的圈套，在《计划书》上签字，他就可在重庆设立联军总部。以联帅名义统摄三省，作名符其实的“西霸王”。他完全没有料到，熊克武竟是如此的桀骜不驯，这使他大失所望，极为扫兴，颓丧，故于1919年1月8日怏怏离渝，返回云南，转而策划倒熊活动。

熊克武对唐继尧在联军会议期间盛气凌人、飞扬跋扈的横蛮态度和种种丑恶表演，一直极为愤慨，以后唐继尧发动讨熊战争时，熊在讨唐电文中，回述重庆会议经过时愤怒地谴责说：

似此毁法败度，乱政侵政，灭绝信义，捐弃廉耻之事，谈者犹将色变，而唐氏竟甘为之。其居心不过欲劫持克武以巧夺川省军政、民政、财政耳。防地久假不归，协饷月数十万，川人积不能平，而克武每为曲护，惟终不忍使川人百战所争之国法及独立自主之人格，自我破坏，故于唐氏无理要求，不得不誓死拒绝。

面对唐继尧咄咄逼人的气势，熊克武感到，只有团结党内同

志，联合川中各方面力量，才能对付唐继尧对四川的兼并。

熊克武在联军会议期间曾先后7次找杨庶堪恳谈，向杨恳切表示：“我们都是军政府任命的四川军政首长，又是久共患难的朋友，应该真诚合作，做点事业。应捐弃往昔的嫌怨，共同维持好川局。”邀他同到成都一起宣誓就职。

杨庶堪对熊克武是否表里如一一时还把握不准，因此，对熊的提议不置可否。

为了联络川军将领，作好反对唐继尧的军事部署，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变化，熊克武于1918年10月8日以部署援陕为名，绕川北返成都，临行前一再叮嘱杨庶堪尽快赴成都。

熊克武行至合川，立即拍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杨庶堪，再致竭诚欢迎之意；一封给各军将领，说明重庆会议情况和欢迎杨的态度。

熊克武刚离开重庆，省议员刘扬、魏奉之、范春膏、游盛祥等便对杨庶堪说：“熊离渝后，一定会发电反对你。”怂恿杨立即在重庆宣誓就职。

正在这时，杨维从成都发来反对杨任省长的电报。

这促使杨庶堪在重庆匆匆宣誓就任省长职。

杨庶堪刚宣誓就职，便接到熊克武的欢迎电，深感内疚，于是亲笔给熊克武写了一封长信，剖白自己在渝就任省长的衷曲，并派吴梅修把信专程送给熊克武。杨在信中解释道：

至于宣布期间，弟之愚忱，心待兄合川电至，乃议及此。不图兄以繁剧之故，稍稽时日，此间人闻兄已离合川，而电犹未到，则哗然迫我，责诮随之。于是，始不获已，乃从其请。当夜有人得隼高，雨笠先日发书，谓兄饬拟两电，一促就职，一宣告解除。弟□□人，吾因言锦公非相忘者，今果如何，诸公之举，徒使我隐愧故人，嗤其急切耳。至得

兄两电，群情贴服，弟尤读之渐感。何故人之厚，而我乃不免为贪竞者流也。密电所商数事，尤见推诚，弟唯黾勉，图报国家，以酬吾兄隆挚之至情。天日在上，非弟为谀词以相恬人。

并向熊表示：

有一害兄之事，弟绝不为此，可自誓者。兄如终不以弟为不可教，则望命驾早返成都，以便商承一切，且示吾二人绝非如当世所疑者，则非独吾川之幸，西南大局实利赖之。

杨庶堪的信真诚相见，推心置腹，感人至深，这本来是熊、杨和解的一个很好转机，但由于熊克武对杨在渝就省长职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不能谅解，于是两人的矛盾竟至愈演愈烈。

10月21日，熊克武行至潼川。

潼川为川北重镇，是进入陕西的要道，熊克武决定在潼川设置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行署，督率一切。

熊克武在潼川行署期间，平武、青川、中坝、绵阳一带绅民纷纷奔诉，告发驻防平武、青川一带的援陕第四路总司令丁厚堂（原系四川巨匪），在防区内抽取烟税，贩卖烟土，并在中坝私造浚川源券，改造货币。还于阴历八月二十八日纵令右翼司令胡炳文，在平武一带统兵抄劫数昼夜，城乡百余里，洗劫一空。

熊克武查证落实后，命令第五师七旅旅长王维纲率部驰赴中坝，于11月12日将丁厚堂、胡炳文等人逮捕，并电令在绵阳公开处决。

熊克武在潼川防务部署就绪后，于11月19日启程返回成都。

为了争取民心，安定地方秩序，熊克武对驻川各军队和各地

方官吏提出了严格要求，发出电令：

此次赴渝一行，沿途见闻，吾民颠连困苦之状，初无以减于昔日。一隅且然，他方可知，拊膺自责，慚悚无地。凡百有司，必有奉行不力之处，民心可畏，宁不深思。嗣后各该司令及师旅长等，出征者务宜奋勇以图功，居守者力求清匪以安民，严束部队，一意治军，无干涉于行政，以启上陵下替之风。而各该县知事等，尤须励精图治，洁己奉公，地方一日未安，是皆守土者之责，无或怠荒，致于严谴，从此一心一德，共谋福利，忧劳可以兴国，庶几其在于兹，仰即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为了粉碎唐继尧挑拨川军各部的阴谋，熊克武于1919年2月22日召集高级军官会议，统一川军编制，促进新旧川军的团结，提出了“川省内政，川人自主”的口号。

四川的军事首领们，由于扩地称雄受到滇黔军的钳制，因此，对“川人自主”的口号很感兴趣；而广大群众，由于憎恶滇、黔军，也易于接受这一口号。

三、川东烟案

唐继尧为了兼并四川，大量派兵入川，还武装贩运鸦片，牟取暴利。唐派遣叶荃部陈兵下川东，控制夔、万，以便让烟土顺利外运。

驻扎在川东万县、涪陵等地的黄复生、卢师谛为厚利所引诱，肆意包庇种烟，勒征烟捐。

当地群众曾多次向督署、省府告发此事。

一些外国传教士乘船东下，见长江两岸广种罂粟，拍下许多

照片，交送广州军政府请求查处。

北京政府驻扎在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为了贬低广州军政府在政治上的威信，借此大做文章。1919年4月27日他发出感电通告全国，把川东一带种植鸦片、勒征烟捐的情况公诸于世，尖刻地嘲讽说：“川东官吏军队破坏烟禁，究竟受何人之旨，抽收烟捐，以养何等之兵？”

一时舆论大哗，纷纷谴责，弄得岑春煊和熊克武均很难堪。

岑春煊以军政府名义命令四川查办。

熊克武随即任命但懋辛为查烟督办，赴川东查办烟案。

但懋辛很为难地对熊说：“烟案查的问题不难，办的问题却很有为难的地方，因为劝种收捐是由卢师谛、黄复生两人所为，卢曾亲到涪陵提倡，黄也至垫江直接指导，查了又将怎么办呢？”

熊克武毫不妥协地指示但懋辛：“先查明地方官吏和土劣勾结，因派收烟捐，而逼死人命的一切案件，把情节重大、民愤最深的就地处办，以平民怨，至于卢、黄两人违犯法纪，容后呈报军政府处理。”

但懋辛立即带领萧抟云一营部队作为护卫，去下川东的长寿、垫江、涪陵、丰都等县，进行查究。

当时军政府副官长张群致电岑春煊：“川东一带广种烟苗，勒索捐税，万民嗟怨。群自宜昌上驶，亦见两岸繁英硕果，累然千里。熊督以此举关系护法之荣辱成败，已派员查办。群意拟请钧座密据吴光新电，在政务会议提议，电令熊督严密彻究，依法惩办。熊督便于认真执行。”

谢持十分担心军政府明令查办，会危及黄、卢，于是急电黄、卢，说什么“锦帆已密电军府严办兄与锡卿种烟勒捐罪矣”。熊克武这样做的用心在于借此消灭民军和削弱旧川军势力，并以此为借口攻击滇、黔军，嘱黄、卢勿为熊所算。他还密嘱黄、卢与滇、黔、吕超、刘湘、刘成勋等部取得联络，早作部署。

在这期间，谢持还多次电告黄复生、卢锡卿、杨庶堪：“默察大势，南北皆内讧，大乱必作。”“国将大乱，川已兆端。”嘱他们尽快作好武装倒熊的准备，“去锦帆后，则废督军，以民政还地方，以军事进图大局。”

熊克武查办下川东烟案，必然触犯唐继尧的利益，唐对此也十分恼怒。

唐继尧为了扰乱查办种烟案，竟于9月底令驻万县滇军旅长田钟谷会同复查。

为了避免扩大事态，但懋辛电告唐继尧、熊克武请专令田钟谷负责查办的责任。熊同意了但的请求。

但懋辛根据熊克武的布置，在返成都途中前往泸州会晤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前往简阳会晤第一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是唐继尧的心腹，但访赵只不过是敷衍场面，访顾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着。顾与唐继尧有矛盾，早有回师滇南，取唐而代之的企图，因此在四川倾向熊。顾部雄踞资、简，靠近成都，如能与顾合作，打开东面门户，则可以进退自如，战争的主动权便可操在熊手中。但在简阳与顾相晤谈得极为投机，还和顾结拜为兄弟。

四、投靠云阶

为了对付唐继尧的兼并和川内的反对派，摆脱孤危的处境，熊克武决定投靠岑春煊。

岑春煊字云阶，是在桂系军阀的武力和政学会等国民党右翼分子的支持下，在排挤孙中山以后，爬上军政府主席总裁宝座的。

在排挤孙中山先生的问题上，熊克武和岑春煊站在同一立场上。

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会议制，孙中山为此愤然离粤的消息传到四川，

熊克武闻讯，不仅不仗义执言，支持孙中山先生，反而电广州军政府，对其改组进行祝贺。电文如下：

国会现依法定手续，修改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政务总裁，俾我护法各省得以早定统一，舆情允洽，率土归心。溯自国会解散，元首幽废，大法伦夷，一载于兹。各省义师迭兴，正谊赖以不坠。继以统一之构成未能臻完备，护法精神致难贯彻。今幸诸公改组告成，壁垒一新，内政外交，咸归提挈。克武远在西陲，奉电较迟，喟喟之情，信深向往。伏望冀公、干老、秩老、悦公即日宣布就职。惟闻中山先生已赴日本，不识确否？少川、西林先生均未在粤，尤望秩老及日、悦两公专舰奉迓，早日莅粤，共襄大政，以慰群情。克武自当势力尷行，敬效驰驱。

这是熊克武投靠岑春煊的见面礼。

1919年2月9日，熊克武发出通电，正式就任军政府委任的督军职。熊在通电中，反复表白自己对军政府竭尽忠诚之意。说什么军政府是“受国会委托，摄行大总统职权”，委任自己作督军“实本爱护桑梓之忱，初非护戴私人之意。”表示“克武窃念军府委托之重，既不敢固违川省军民责望之诚，亦不容强抑。”自己一定“远抒军府西顾之忧，藉补年来未尽之责。”

1918年11月，南北政府开始进行和议。熊克武委派刘光烈作为议和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在会议期间，熊克武通过刘光烈和岑春煊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由于岑春煊禀承陆荣廷等桂系军阀的旨意，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私派代表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因此引起了军政府各方人士的愤慨。旧国会议员于1919年10月对岑提出不信任案，弄得岑下不了台，只好通电辞职。

正当各方舆论愤怒谴责岑春煊之时，熊克武却公开站出来为岑大唱赞歌，并对仗义执言之士横加指责。他在发给岑春煊的挽留电文中说：

云老(即岑春煊)崇德硕望，举国同钦，此次戮力护法，纪初群贤，筹应万方，宅心良苦，七省义师，方倚为长城。北廷卖国，神奸久矣，侧目嫉视，而莫敢报怨，乃国会诸公，必欲于此时指责而击去也，武(即熊克武)诚大惑不解也。……《传》不云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问事之成败，而苛责于人，究于国家奚益也，岂惟无益且有害。克武僻处西陲，耳目闭塞，然以愚虑所及，果令军政府改组，云老去位，旦暮之间，必生危险。

克武诚愿云老勉为其难，无存退志，希望诸公一致挽留，奠定危局。至于军政府改组之议，尤望国会诸公审慎。言有尽而意无穷，惟冀鉴其愚款，俯予采纳，则厚幸矣！临电不胜悲痛。

五、战在眉前

1919年9月孙中山决定派大元帅府参议巴县人张左丞以慰劳四川各军名义，返川联络石、黄、颜、卢、吕、杨与滇、黔军结成反熊联盟，武力去熊。

孙中山于9月8日分别给吕超、颜德基和黄复生、石青阳、卢师谛发出两电，告诉他们：“兹嘱张左丞兄归川，接洽一切，此间情形，左丞多能言之，当能面罄，手此奉闻，并颂毅祉。”

11月20日，谢持又电告黄复生、卢锡卿：

左丞还川，系与两兄商定联络青阳、德基、汉群、育仁

及川军实行废督，听中山命令解决大局，务望秘密进行。

张左丞回到四川后，先到万县密晤卢师谛，继到重庆密会黄复生，后到南充、达县，密访石青阳、颜德基，传达孙中山旨意，商量“倒熊”的具体行动。张左丞还把中山的意见密函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嘱与四川的杨庶堪、吕超、黄复生、卢师谛诸人配合，将熊除掉。

1920年3月17日，孙中山先生进一步明确电告唐继尧：“奠定西南，必须合川、滇、黔全力图之。然熊克武不去，则不能纾后顾之忧。弃熊计划，已令向、石、颜、卢、刘、廖各同志早作准备，想已与兄接洽，今当促其速举。请兄令驻川滇、黔军助而促之，熊可一挥而去也。熊去，则督率川军可以指挥如意矣。”

就在张左丞返川前后，岑春煊也派出自己的心腹陈祖基秘密入川加强与熊克武的联系，开展分化滇、黔军的工作。他曾专程去简阳密晤顾品珍，传达岑春煊望顾联合熊克武共谋倒唐的旨意，并许顾，倒唐成功，即以军政府名义委顾为滇督。顾向陈表达了自己的倒唐决心，望陈转达岑春煊，致意熊克武，务遵守与其商定的成约。

1920年春，唐继尧挟川、滇、黔军的优势力量，联络黄、卢、石、颜等，发动“倒熊”已逐渐公开，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倒熊”方面，对发难时间，主张不一，一派主张提早行动，在阴历年内就向熊开火，一枪下马。另一派则主张稍留情面，俟开年二月熊为父生辰举办寿诞后，再行“送客”，因当时南北各方为熊父祝寿的使者均已在途，成都将出现南北政治折衷的场面。他们认为过早发动“倒熊”，会招致省内外各方责难，不如把时间推迟为有利。

赵又新曾于1920年3月18日致电唐继尧驱除熊克武必用全力。他对熊克武作了这样的分析：

锦帆自入成都以来，两载于兹，对于每月所入之盐款，拥为厚资，兵工厂则日夜赶造，约计所积款项已达2000万以上，枪支子弹，储蓄甚多。而自奉俭约，家庭状况故我依然，外则表示本色，内则坚忍精详，一往无前，为历来川中执政者第一有心计之人。故川中各军久议去之，彼则置若罔闻，自持稳健。邓旅不服编制，而卒就范围；吕师早起嫌疑，而从容不迫。其居心阴险，手腕灵活，实为当前强硬之敌。

并告诫唐继尧：

故不欲去之则已，如欲去之，必用全力，未可以轻易视之。且恐川中各军实力不足，而旧川军派复为所利用，则将来之战争视线反萃集于我滇、黔军，此亦不能不虑及者也。

唐继尧在复电中称赞赵又新“所见极是”，叮嘱赵“我滇、黔军对于川事，自非下大决心，有大准备，不能轻于一发。”“我军均须切实整理，庶能随机应变也。”

这时，熊克武也在抓紧时间联络川军各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

在旧川军中，第二师师长刘湘、第四师师长刘成勋、第二混成旅旅长陈洪范，都是大邑人，很自然构成一个系统，他们与滇、黔军颇不一致，历来主张不能以四川人打四川人。

熊克武为了团结这三部分力量，先推荐刘成勋任四川边务督办，任陈洪范为四川陆军第八师师长。

向传义的第三师只有刘斌一个旅，熊遂将川军第一独立旅旅长邓锡侯改编为第三师第五旅旅长，以组成整师建制，并将邓旅调驻成都，以示信赖。将邓旅所留下的眉山、彭山、丹棱、青神等县防务，交与第六旅旅长刘斌，以巩固成都南面阵地，构成为坚强的外围防御线。

恰在这形势紧迫时，出乎熊克武意外，被他视为心腹，委以北门锁钥，镇守绵阳的第五师师长吕超，突然谋叛，背熊投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年3月，第六师师长石青阳和第七师师长颜德基，为争夺营山防地发生武装冲突，熊据报，即派吕超为查办大员前往营山查处此事。吕超到达顺庆后，正准备约同石、颜一同到营山查处时，孙中山先生派赴四川的代表张左丞偕同黄复生、卢师谛来到顺庆，密谋“倒熊”。吕超在黄、卢、石、颜的拉拢下，同意一致“倒熊”，并达成协议，许吕“倒熊”成功后为川军总司令。

3月23日，吕超电复熊克武，报告调处情况，谓：“与石、颜两师长会于营山，一经面剖，芥蒂悉除。”熊正庆兵患已解，殊不知吕超已叛已而去。

吕超在顺庆会议之后，认为他充当川军总司令的时机已经成熟，回到绵阳即约第三师师长向传义密商，要向支持他“倒熊”。向传义建议约但懋辛来德阳协商，取得一致，以和平方式迫熊下台。吕同意，由向给但发密电，约但与吕会于德阳。

大约4月9日，但懋辛在督军公署刚得到向发来的密电，恰巧熊克武也来到督署，但立即将来电交与熊阅看。熊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这一突然变化，当即和但研究，认为现已处于危急关头，滇、黔军纠合黄、卢、石、颜各部以谋我，卢师谛已迫不及待，其所派杨春芳率领的11个支队已开到顺庆，会同石青阳部，向潼南前进，会攻成都，一场战争的较量迫在眉睫。现又变生于肘腋之间。

熊克武当时考虑，所辖一、三、五3个师，吕超蓄谋叛变，难于挽回，向传义的第三师首鼠两端，但懋辛所领的第一师也不巩固，有把握控制的仅有两个团，远在重庆的余际唐江防军，虽号称20个营，作战能力不强，又处于滇、黔两军包围之中。与“倒熊”力量比较，强弱悬殊，熊方没有可以一战的把握。

在这瞬息万变的恶劣形势面前，熊克武认为不如变被动为主动，以退为进。他当机立断地对但说：“明日我与你一路去德阳与吕汉群谈判，将督军职权交给他，谈判得好，我一面通电辞职，一面请军政府委吕继任四川督军，以保持我们本身力量的团结。”

第二天，熊克武与但懋辛一道骑马奔赴德阳。行经广汉，熊又约向传义同行。他们三人到达德阳时天已快黑了。

当晚，吕超置酒相待。

熊对吕说：“此次四川政潮，均由我所引起。西南团结，决不可少，为了避免战祸，安定川局，我愿自行引退，决心离川去上海。”并向吕表示：“我去职后，定将督军交汉群兄继任。”熊又对但说：“交接手续就请怒刚兄代为办理。”吕超同意了这一意见。

熊、但、向三人整整谈了一个通宵，到鸡鸣破晓后，三人才匆匆驰马离去。

熊克武返成都后，又约但懋辛一同秘密前往简阳，与顾品珍密会于石经寺。熊同意补助顾饷款30万元，支持他倒唐，负责补充武器弹药。

熊克武刚返成都，杨庶堪便不辞而别了。

4月17日，熊克武通电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

熊解职通电一出，唐继尧即于4月21日向其驻川各将领发出马电：

熊虽通电辞职，未必真有决心。度其用意，必有藉辞职以为缓兵之计，使我不即进攻，得以从容准备……为解决川局迅速出兵计，此时同盟各军，应遵照原电计划，积极进行。一面由川军各将领联衔发一通电，略谓：一、声明熊既通电辞职，自其通电之日起，各军即认其不能再有统御资格。二、声明大局艰危，应速出兵，川军林立，不可无长，公推汉群为川军总司令，甫澄为副司令，以资统御。三、声明自

林、伍辞职后，政务会议不足法定人数，无任免之权。四、声明川军原隶属国联军范围，即熊前总川局，亦由联军司令委任，催促就职。似此措辞，觉对内对外，均极正大。此间接到通电，立即正式委任，并以通电宣布，则熊虽欲不退，已不可能。万一彼竟敢违抗，滇、黔当以全力加入，一致声讨，以免因循坐误，转生枝节。漏笔以待，勿失良机。

熊的辞职电和唐的来电使川省局势迅即陷于混乱。“倒熊同盟”方面，在唐的支配下，正在秣马厉兵；关心川事的各方面亦奔走调处，期化戾气为祥和。

成都人民因深受刘、罗、戴混战之苦，对滇、黔军颇为反感，因此纷纷挽留熊克武。

四川省议会议长李肇甫、副议长熊峰、郭崇矩于4月21日联袂访熊，恳切挽留，谓“国事未定，不宜引退。”并同时发出挽留通电。

成都各界还于4月22日举行万人国民大会，一致挽留熊克武，并致函全川各县，谓：“吾蜀易一督，即发生一次战争，人民却受一次痛苦。”

四川耆老徐炯、宋芸子等在致熊函中，亦谓：“读弟辞职之电，至为骇异，盖弟一举足，则四川动摇矣。”

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及湘、桂、粤、闽，均来电恳切慰留熊克武。认为：“蜀中自丙辰以降，扰攘频仍，幸赖锦公夷平大难，长才毅力，薄海同饮，保障西南，厥功尤伟。”望熊“勿怀去志，上以赞军府护法未竟之力，下以慰海内苍生求治之望。”

岑春煊在挽留电中还表示愿尽力相助，说什么：“煊与兄利害相共，但使一息尚存，决不坐视也。”

熊克武辞职以后，北道的黄、卢、石、顾等尚不敢轻举妄动，近在咫尺的吕超，亦迟迟不敢称兵“倒熊”。

川军第四师师长刘成勋，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鉴于唐继尧对四川的蚕食鲸吞，接受熊克武川人治川的主张，愿团结一致对外。

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拥有重兵雄据合川，初为唐继尧的甘言所引诱，后侦知唐所许川军总司令职务已改给吕超。刘湘受了愚弄，心里十分怨恨，怒骂说：“你吕超把我刘湘扎‘把子’耍，还想当督军，没那么杷合（便宜）。”

这时，熊克武的督军署顾问赵萼生、刘成勋的代表周绍芝、陈洪范的代表刘连舫相继来到合川，劝刘湘共御滇、黔军。

刘湘于是派参谋长胡春田去成都与刘成勋、陈洪范的代表举行三方会议，决定支持熊克武，联兵讨唐。

熊克武暗许驱逐滇、黔军后，让刘湘任川军总司令。他还拨给刘湘饷款20万元，子弹40万发，交胡济同押解回合川。

4月30日，吕超按照唐继尧4月21日来电要求发出讨熊通电，“勒令熊氏即日交代，听候查办。如敢违抗，即由川、滇、黔各军一致进讨。”

为了说服吕超放弃倒熊，共同御敌，熊克武于4月30日派向传义及刘成勋的代表张际云、陈洪范的代表冷寅东一道去德阳劝说吕超改变态度，与唐继尧告绝，以维护川人利益。

吕超经向传义等人劝说，“倒熊”意念发生动摇，于是与刘成勋、陈洪范、向传义于5月4日联衔声明：“由顺庆发出攻讦督军陷日通电（即4月30日讨熊通电），成勋等均列名其内，不胜骇异。……陷电显系有人意图破坏川局，窃名攻讦，勋等实未与闻，伏气鉴覆。”

吕超等5月4日电一出，唐继尧于5月8日急电滇、黔驻川各将领，谓：“既有障碍，则我滇、黔处理之方，即不能不详加考虑。”唐委吕超、刘湘为川军总、副司令的电令只好停发，并立即采取了下面三项应变措施：“一、由民军运动，笼络吕、刘，使之一致，如果不致变计，仍即明令委任，照迭电所订计划进行。

二、若吕、刘变而附熊，则民军之势孤危，我滇、黔必以强硬态度，保全民军势力。三、田梯团仍应上驶，留驻重庆，以期兵力团结。若顺庆方面有战争，即并拨驰援，均极便利。”

这时，颜德基在萧静轩、陈凤石的劝说下，也不再坚持“倒熊”，并电告熊：“此次政潮，德基实不在列，拥护之心，始终不贰。”

与此同时，军政府于5月4日补选熊克武为总裁的消息传到四川。

粤、桂各方也决计援川，驻粤滇军第六军李根源亦准备经广西回滇袭唐之后，与顾品珍返滇“倒唐”，遥相呼应。

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熊克武抵御滇、黔军的力量迅速由劣势转为优势，以熊克武为中心，联合各部川军抗衡滇、黔军的局面业已形成，熊克武于5月4日通电宣布复职。

驻防重庆的黔军立即于午后2时，宣布全市戒严。黔军参谋长朱绍良公开声明：“川局若川军不能解决，滇、黔当然不能坐视。”

六、血战千里

5月9日晚，在黔军监视之下困居重庆的江防司令余际唐化装轿夫混出重庆，到达部队驻地，准备调集所部反攻。余出走后，黔军立即尾追，在江北、邻水一带首先向川军开火，川东地区的战斗打响了。

5月11日，唐继尧正式发布对吕超、刘湘的任命令。在遂宁的卢师谛、石青阳等，以吕超、刘湘名义发出就任川军总、副司令的通电，同时用总司令名义发号施令，发动“倒熊”战争。

在此情况下，熊克武于1920年5月21日发出第一个马电，谴责唐继尧、刘显世任命吕超为川军总司令。

同日又发出率师申讨唐继尧祸川的第二个马电。将唐继尧侵略四川的事实及最后指示吕超造乱的4月21日马电的内容全盘披露出来。并向全川军民发布唐继尧祸川事实布告。

一时舆论激昂，纷起响应。

《国民公报》25日的社论指出：“唐继尧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我们川省”。

四川省议会30日发出的讨唐通电亦说唐“攘乱祸邻，以争伯主，与日本何异，而荒妄过之。”

省议会同日致各将领电说唐“举我四川军民，置彼势力范围之下，既悉据我膏腴，复间离我将领，人虽甚懦，亦复难堪！”

此类文电，在当时发生很大影响，鼓舞了拥熊各军的士气，换得了广大川民对熊克武的同情和支持。

5月22日，熊克武下达进攻令，与滇、黔军的战幕全面拉开。熊克武的军事部署是：

一、由但懋辛任中路总司令，率第一师第一旅喻培棣部及第三师第五旅邓锡侯部，对驻简阳、资中的滇军顾品珍部作战。

二、以刘成勋为南路总司令，率所部及第八师的刘文辉支队，对自流井、富顺方面的滇军赵又新军作战。

三、以刘湘为北路总司令，率所部会同余际唐所领的江防军，对重庆方面的黔军作战。

四、以吕超为北路总司令，巩固北面防线。

五、以第三师、第一师的一部及张冲的督军公署警卫团，在德阳、中江方面警戒，以防吕超叛变。

六、以向传义为左翼军总司令，陈洪范为右翼军总司令。

但懋辛担任中路作战指挥，令向传义师的邓锡侯旅为前锋，向简阳攻击。由于熊克武与顾品珍已取得默契，因此顾不愿作战，并连续发出通电宣布与唐继尧脱离关系，谓：“此间同是国家军队，岂能舍公谊而徇私情。我滇军将士决非滇督唐公关系而始受

川政府之优待，川政府亦非滇督唐公之私情而后优待我滇军将士。近日唐氏诸多失当，珍未尝不竭力劝阻，不过因阶级秩序所攸关，未便明与相攻讦耳。”“展转筹帷”“宁可负良友，不可负国家，兹特宣言，与唐告绝。”因此当但懋辛指挥部队进攻时，顾品珍便陆续让出简阳、资阳、资中、内江一线，向叙、泸退走，准备回师讨唐。

顾率部退守隆昌时，因赵又新、田钟谷、胡若愚部专意拥唐，他们的军队在泸州、永川、荣昌一线集中后，迫顾一同反攻。唐继尧亦来电严斥顾，限期他收复各城市，否则按军法从事。但部在荣昌的李市镇、高峰寺一带与顾、赵两军展开激战。但军力量渐感不支，被迫退至内江。滇军乘胜来攻，但军再退至资中。最后但部由甑子场向安岳方面撤走。

南路的刘成勋部队在进占自流井后，没有按计划尾追滇军，而是移师内江，与但懋辛部汇合，在双凤驿与敌军相遇，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刘不战而溃，退回新津。

熊克武部中路、南路两军失败之前，北路总司令刘湘所率部队已失利。

在刘湘还未暴露拥熊面目时，曾派代表王海平到重庆与滇、黔军联系，等候分领“倒熊”军费，得银锭、银元20万元，用木船运至合川。船已离渝上驶，黔军王文华得知刘湘变计消息，派兵一旅追截，船进峡口，仍紧追不舍，驻守峡口的刘湘部队从两岸开枪向黔军射击，黔军猛攻峡口，营长刘荣成战死，刘湘部不支退走，黔军乘势夺占合川。

刘湘率军回援，夺回合川及铜梁、璧山、大足各县，乘胜进攻重庆，先头部队已越过歌乐山高店子险隘，直抵距城西40里的磁器口。

这时黔军增援部队骤至，刘湘攻势顿挫，撤围退走。

与刘湘会合的江防军余际唐部亦相继战败。川东北地区全部

陷落。刘湘部旅长萧常德在撤退途中，率全旅投属吕超，由吕委为师长。

成都北面的吕超，见熊部各路失利，决意放弃观望态度，将潼川、中江等处防区让与滇军田钟谷及石青阳、卢师谛等部驻扎，又向对方接济子弹，并撤出青川、平武防区，密召滇军叶荃部入川。吕超还在潼南、遂宁一带不断袭击余际唐、杨森的部队。但懋辛曾于6月19日致函劝阻吕超说：“吾弟被石、卢等之推拥，唐继尧之伪命，不过欲得督军耳。其实，锦公辞职时，曾密电保执事继任。即此次对唐作战后，仍以此位界之执事，此亦育仁所共闻也。吾弟舍此不图，集重兵于太镇以攻遂宁，声言报复二师。……其实弟一举一动，只欠一篇讨熊檄文耳。”

由于中、东、南三路作战失利，成都四面受敌，熊克武被迫于7月10日撤离成都，退守潼川。

吕超、叶荃等部尾追至潼川，熊又率部退集保宁（即阆中）。

这时，滇军久战力疲，有待补充整顿，又值时疫流行，不利战争，双方遂处于休战状态。

熊克武虽然暂时失利，但实力并未削弱，结集于保宁的兵力计有4个师之众，不下3万人。

从熊克武7月10日离开成都时给军政府的电文中可以看出，熊虽身处逆境，但对战争的前景却充满必胜的信心。

此间战事突然变化，克武为暂时缓急便利起见，已于蒸日率部出城，待罪川北，一俟部伍集中，整饬既定，仍当背城一战，与敌一决雌雄，俾弥盖于万一。再此次战事，自开战迄今，时阅月余，而各军皆上下一心，毫无怨怼，兹因交通不便形势参差之故，应接偶然不及，致一方面微有失利，然现统一实力，约略损失十之二三，尽有余勇可鼓，兹不过计划偶然未周，当非一蹶不振。前途尚远，图

报方长。

7月18日，吕超率队进入成都。第二天便发出就任川军总司令通电，并电请杨庶堪回省主持民政。

吕任川军总司令后，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及国会来川组织政府，并任命向传义为第一军军长，卢师谛为第二军军长，石青阳为第三军军长。

8月17日，国会议员在昆明开会议决，将国会及军政府移设重庆。孙中山先生还曾电告四川省议会，对“反熊”所取得的胜利给予热情的赞扬，并表示自己亦将来川继续坚持斗争。

熊克武退守保宁后，各部即在保宁集结整顿。

为了张扬张飞的忠肝义胆，表明自己决心效法张飞，与退守保宁的将士同生死，共患难，熊克武曾在此地张飞庙亲题一匾，书：“义烈足式”，字体庄严大方，遒劲有力。落款四川督军熊克武，中华民国九年庚申秋。

为充实反攻力量，熊克武将但懋辛和刘湘两部扩编为两军，任命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

熊克武在保宁休息整编期间，刘湘、杨森等向熊克武建议联络避处陕南的川军刘存厚，共击滇、黔军。

熊采纳众议，派代表李新琪前往汉中联络。

李离开时，熊一再叮嘱说：“商谈与刘联合抗击滇、黔军的先决条件是刘存厚只能以四川人的身分参加我们这一边，若是拿北方任命的督军头衔和我们合作，那是绝对不行的。至于以后个人的出处问题，留待战后大家共同商量决定。”

李在与刘存厚的会谈中，将熊的意见如实相告，刘表示同意。

于是，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由他自兼总司令，委田颂尧为靖川军第一路司令，唐廷牧为靖川军第二路司令，赖心辉为

川北边防司令。

熊克武联合刘存厚返川，深恐各方产生疑虑，特于3月15日电告刘光烈，说明情况，望其疏解，电谓：

查积之此次回川，先将督军及二十一、二两军称号取消，称靖川军总司令及靖川军若干师，纯为驱逐滇、黔，敬恭桑梓，并无北方气味，渗透其间。应即认为友军，不可稍存芥蒂。各方若生疑虑，并烦妥为解释，是幸。

当然，熊克武对刘还是有一定警惕的，因此在转入反攻前夕，即电告刘光烈：

刘积之回川，对我实无善意，复以段氏失败，利害上不能不与为一时之结合，深恐其入川以后，为唐氏及吕超等所利诱，复生变化，刻刻注意积之……惟此人权利心重，若直系倚而信之，仍非四川之福也。仍望于直、皖和议进行附件中设法制之。”

孙中山先生得知熊克武与刘存厚相互勾结，意欲组织反攻的消息后，于8月23日致电颜德基，敦促他迅速出师，戡定熊氏，电谓：

川局复变，甚诧！熊（克武）、刘（存厚）勾结，何以竟未防及？今事已至此，惟有迅速出师，协同戡定。吾人之驱逐熊氏者，实因于救川救国之计，根本不能相容。今既干戈相见，更无所用其犹豫，以陷入进退失据之境。

吕超进驻成都后，滇、黔军奉唐继尧之命重提四川兵工厂及

全省厘税统归联军总部接管的旧案，要求除滇、黔军原驻重庆、泸州、资中、叙府、简阳等重要地区外，增划重庆全部、万县、自流井等新防地。这样，四川的军事要地和富庶之区便全被滇、黔军占去了，这使“倒熊”的川军与滇、黔军的尖锐矛盾更无法调和。

熊克武各方面准备就绪后，默察各方情势，“胜算之操，确有把握”，便于8月24日再次发表声讨唐继尧、吕超等的通电。并于同日致电岑春煊，谓：“已于昨今两日开始运动，与刘存厚军分道进攻绵阳、潼川、拟以迅雷之势，恢复成都。并密令三、四、八师相机攻击”。由于所需饷弹较困难，熊恳请岑春煊“接济小款，以维现状，代借大款，以为善后。”

从8月23日开始，熊克武和刘存厚分道展开全面反击。

刘存厚的靖川军以田颂尧部为前锋，自宁羌、阳平关突入川境，击破大巴山七盘关、天雄关及葭萌关吕超部彭远耀旅防守阵线，占领广元、昭化，继续进攻剑门关，占领剑阁城。接着在柳泉、武连驿、大庙山、梓潼各地，连续击破吕超所属之卢占魁、彭远耀两部的联合防线，于9月1日占领绵阳。

熊克武分兵三路反攻，以杨森为中路，喻培棣为左路，张冲为右路，以杨部旅长王紫骥为前敌总指挥。中路由保潼大道进兵，左路由罗板桥一带进兵，右路由苍溪、梓潼进兵，同趋潼川。张冲军距离较远，冒雨行3日始到。中路杨森王旅，为了争先到达，命令士兵跑步前进。

驻潼川的彭远耀旅见来势凶猛，遂全部撤离；杨森部于9月1日上午10时进驻潼川县城，左右两路亦相继进驻潼川。

两部配合，初战告捷。刘存厚进驻广元，熊克武进驻潼川。两人相约会于苍溪县城，面商进一步合作计划。

在会谈中，熊克武提出作战方案：集中力量，先行进取成都，再进取叙府、泸州，歼灭滇军主力。然后会攻重庆，消灭川

东一带黔军及石、颜、黄等部。

双方决定以杨森为前敌各军总指挥，刘湘、但懋辛、杨森等部协同田颂尧部进取成都，余际唐部进取顺庆，指向重庆，以为策应。

田颂尧部占领绵阳后，继续南进。刘湘、杨森部亦由潼川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

驻广汉、什邡的第三师师长向传义，原为熊部蜀军基干，向与吕超系陆军小学同学，这时左右为难，遂通电辞职，将所属部队交邓锡侯、刘斌接统。

随着战争的迅猛发展，邓锡侯倒向刘存厚，刘委其为靖川军第六路司令。

这时，向传义部刘斌旅何光烈团，在德阳宣布附熊，熊克武委何为川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刘斌即率所部郭嗣芬团让开川北大道，撤退至彭县，由刘存厚委为靖川军第十师师长。

刘存厚旧部舒云衢也在温江文家场宣布就任靖川军第二师师长兼右翼总司令。

刘湘旧部萧常德旅长，投吕超后升任师长，此时也通电响应靖川。

这样一来，熊、刘两部声势大振，合力共取成都。

9月6日，熊克武部杨森、张冲、唐式遵、王缵绪等部先后进入成都。

熊克武立即派参谋长李郁生先驰赴成都，处置督军署日常事务，任刘成勋为成都卫戍总司令。

川军各部进驻成都后，立即进行会商，决定遵照熊克武指示，趁着有利时机，迅速追击滇军。

顾品珍、赵又新见川军各部会集成都，便在龙泉山集中滇军主力，准备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凭藉张飞营天险，构筑坚固阵

地，在这里与川军各部决战。

滇军方面使用的兵力合计63个营。

川军方面投入的兵力合计53个营。

这是一场关系全局的会战。熊克武虽身处潼关，但由于四川的前途，川军的命运，个人的成败荣辱，都与这一决战紧紧连在一起，因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智，都投入了这场会战之中。

他认真听取参谋部对敌我形势的报告，仔细研究，反复推敲作战方案。

在审查作战方案中，他感到川军投入会战的兵力不够，为了取得决胜的把握，他立即命令第六路王思忠、刘汉鼎、张煜3个纵队6个营；第一路田颂尧部8个营；第五路刘斌部5个营；张成孝旅6个营；陈国栋旅6个营，立即行动，配合主力作战。

他要求前线随时将战情报告总司令部。

从9月8日开始，川军中路杨师、唐旅，攻击前进，迅即从大面铺推进到龙泉驿，继又占领山泉铺，在仰攻张飞营时，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杨、唐两部损失颇大。

14日，滇军开始反攻，山泉铺复为滇军夺回，滇军直抵成都郊外，川军退回城中。

熊克武得到滇军回攻成都的报告，十分焦虑，他辗转思之，反复比较，认为川军尽管暂时受挫，但实力并未受到太大损失，尚有攻击能力；滇军尽管气势汹汹，但缺乏兵员和给养补充，已为强弩之末。因此，他除电令刘湘固守成都外，还要求他组织部队，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击。

18日晚，刘湘在北较场召集川军将领会商，制定反攻计划。

19日，川军开始突围反攻，与滇军展开肉搏战、拉锯战，激战两天两夜，于21日完全击溃成都近郊的滇军，战争始告一段落。

滇军在成都被击溃，企图退守龙泉山据险顽抗，川军乘胜猛攻，占领龙泉铺、张飞营，滇军全面溃退。

川军迅速占领简阳、资阳、资中、内江、自流井、隆昌、富顺。

滇军全部退至叙、泸一带。

10月18日，川军攻占泸州，困守泸州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因逃走不及被击毙。

顾品珍部退到资中、内江后，无心再战，待滇军败退至泸州时，便率部由纳溪过河，返回云南。

攻下泸、叙，熊克武即令川军乘胜前进，追歼滇、黔军和吕超部。

10月15日，熊部张冲旅刘伯承团攻克重庆。

余际唐师袁旅也将嘉陵江左岸一带吕、卢、石、黄诸军驱走，进抵江北。吕超等不得归渝，退守涪陵。

以后吕超、卢师谛、石青阳等，绕道湖南去上海，遗部为各军收编。

10月13日，杨庶堪通电辞四川省长职，随同黄复生等离渝去上海。

在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熊克武电约刘存厚在距潼川84里，距绵阳60里的葫芦溪相会。

熊于10月14日先到，刘于15日上午到。

刘到后熊克武即在行辕设宴欢迎。午后，两人均得到光复重庆的捷报。熊又邀刘相晤，一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在谈到川局时，熊克武痛心地说：“滇黔祸川，战乱不已，我川民长期处于水火之中，真是苦矣！”

停了一会，他接着说：“积之兄，今后，我们都不要把个人的权利看得过重，而应顾念桑梓，共同维持好川局。我在战前，已对川军将领表示，一俟战争结束，川局安定，即行引退。”

刘存厚此行的目的，是打算与熊讨价还价，共分胜利果实。他甚至还妄图向熊游说，支持他恢复督军职，由他向北京政府保荐熊作省长。他听熊如此一说，虽话到嘴边，也不便再启齿了。

16日晨，刘邀熊到其行辕赴宴。宴毕，二人分赴成都、重庆。

10月30日，熊克武抵达重庆，把四川督军公署暂设在渝城。

旷日持久、纵横数千里的川、滇、黔大混战至此告结束。

熊克武后来在总结这场大血战的教训时，曾十分内疚的说，这是“一场自相残杀的大战”，“这次战争，在战场上是胜利了，但同志变为仇人，人民遭受祸害，在政治上是失败了。我是愿负一定责任的，惶愧无已！”

第九章 斡旋川局，奉命讨贼

一、倡导自治

熊克武从1920年由夏至冬，历时半年，几经挫折，好不容易才取得了驱逐滇、黔军的胜利，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战后局面却更加纷纭复杂，更难应付。

熊克武所统领的川军刚攻下重庆9天，支持孙中山的粤军便于1920年10月22日占领了惠州，并继续向广州推进。

10月2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发表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与岑春煊、陆荣廷等私订“和约”，指出：“以法理论，七总裁缺其四，广州已无军政府，岑、陆私人签订之条约，直等废纸，绝对不生效力。”

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军政府于10月24日宣布解体。

熊克武的四川督军系岑春煊所把持的军政府任命，这样以来，熊便无所依托了。

从省内形势来看，率领靖川军返川的刘存厚，原系北京政府任命的督军，他刚返成都，便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四川督军署招牌，与熊克武相抗衡。

另外，在这场战争中崛起的刘湘，与熊克武也是貌合神离。

熊克武的左右，对熊在政治上何去何从，也主张不一。有的主张拥护北方统一，熊的参谋长李郁生却坚决反对，他劝诫熊

说：“与其贸然赞成统一，毋宁挟自主有力省份之资格，与彼周旋，否则，先自卑屈，徒以辱。”刘光烈在战事未结束时，就曾从上海来电劝熊克武：“战了则倡各县自治，归省倡省自治。”

自1920年下半年起，各省人士主张自治和废除督军的声浪甚高，为了推动各省的自治运动，在北京的15个省区的人还分别组成了自治运动会，由各省自治运动会推举代表成立了15省的各省自治联合会。

11月13日，四川在北京的议员、学生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召开了“四川自治期成会”成立大会，通过了由周昌鸿、罗承烈、何恩枢、范复诚等134人提出的《四川自治意见书》。《意见书》全面阐述了他们关于四川自治的主张，提出了四川自治的具体方案。

此时，吴玉章、李伯申、邓懋修等，亦正在发动各县代表，组织全川自治联合会，以推动四川的自治运动。

熊克武在谋士们的筹划下，为了顺应当时全国呼声甚高的自治潮流，为了反对外省军阀进入四川，稳定川局，决定在四川实行自治自主。

《东方杂志》1921年1月号的《半月大事记》中曾指出：熊克武为了“顺应潮流，尊崇民意，抵抗外省军事侵略，宣称尽速起草宪法”。

11月10日前后，熊克武在渝主持召开善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但懋辛、刘湘、赖心辉、田颂尧、陈国栋、邓锡侯等将领。会议于11月13日作出解决川局善后办法的意见。

12月10日，在熊克武的授意和支持下，川军将领再次在重庆集会，提出川省自治主张，他们分别电告熊克武、刘存厚两人，请他们在5日内表明态度。电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四川实行自治的理由。

其一：“欲脱离南北战争之旋涡，……调解(南北)双方之纠葛，

促成国家之统一，……吾川之宜实行自治。”

其二：“今日吾国必先有良好之民治，而后有良好之政府；必先有巩固之地方，然后有巩固之中央。此以对国家而言，吾川宜实行自治。”

其三：“目前国家时多混沌，川事亟待解决。内则势力成各方之对抗，外则滇黔冀卷土之重来。苟非自求多福，何以安内攘外？……舍川人合力自谋，实无以维持目前之现状而图将来之发展。此以对内政言，吾川之宜实行自治。”

理由十分冠冕堂皇，娓娓动听。

电文结束时，向熊克武和刘存厚发出了最后通牒：

两公如有政见，请即明白宣布，速解川局。倘荷赞同，即请联衔直电全国，以定吾川施政之方针，而予天下之共见。伫候明诲，请期五日。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对于川军将领发出的上述电报，熊克武立即回电赞成，并于12月30日正式发表通电，解除督军职，电谓：

默察川人，因此次战争，自决精神，愈益显著，从政之士，又多为拥护民治主义之流，知必能同心同德，光大自治新局，武虽解职，退为平民，亦当与阁省人士，共相欣忭者也。

熊克武通电解除督军职务后，随即离开重庆城前往北碚北温泉养病，以观察时局的变化。

1921年1月8日，刘湘和但懋辛分别代表一二两军发出通电，支持四川自治。

但懋辛为了支持川省自治，还用白绸制成大手巾，亲笔提印

在手巾上，全军尉级以上官佐，每人赠送一张，以示勉励，题词为：

为今之计，只有两途，不愿自治，便降海吴。

二者择一，为主为奴，严颜有言，降将蜀无。

共体斯意，其各勉乎！

同时旅京川人和旅沪川人组织的“四川自治期成会”也迭电四川，拥护自治，并出版《四川自治旬刊》、《新四川杂志》，鼓吹川省自治，促其早日实现。

在熊克武的号召下，在川内外各种势力的推动下，四川省议会亦通电宣布自治。

依附北京政府、梦寐以求督军职的封建军阀刘存厚，却通电反对四川自治，并从外交、交通、财赋、边防四个方面申诉四川不宜实行自治的理由。

为了扰乱川局，刘存厚还一面明电北京政府保举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以示拉拢；一面密电北京政府分别任命川军各师长为9个镇守使，企图分散他们，削弱熊克武的实力。

北京政府内阁总理靳云鹏并不打听熊克武、刘湘两方面的态度，擅自于12月24日在其主持的国务会议上决定以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并按刘存厚的意见任命四川9个镇守使。

为了笼络熊克武、刘湘，北京政府还发布了以下嘉奖令：

四川督军刘存厚着传令嘉奖；省长熊克武授以勋二位，重庆护军使刘湘授以勋四位。

北京政府的任命令传到重庆后，熊克武立即发表通电，拒不接受，从“辱及克武个人之人格”，“辱及全川将士之人格”，“辱

及(全川)7000万人之人格”三个方面严加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政府“惟注意于私人权利之分配”的险恶用心在于“挑拨各省内战，使川人无所逃命”。

熊克武在电文中明确向北京政府表明了自己对于川省政局以及今后趋向的主张：

川人固始终护法，惟于有名无实之护法，未敢苟同，希望统一，惟于朝三暮四之统一，未敢盲附。且川人以为护法统一皆属抽象名词，不若根据事实自求解决方法。如今日宪制问题，南与北皆无召集宪法会议之能力，亦即无制定宪法之能力。不若径由各省先制定省自治根本法，以济其穷。又如今日各省割据之局，南与北皆无打破之能力，亦即无统驭之能力。不若径由各省人民收回政权，直接推翻少数专制，间接即打破各省割据之局。以是故川人对于南北双方虽不愿为左右袒，而亦不稍存敌视之心，对于各省不仅维持亲睦之谊，更当确实联络，使省与省相互关系日益密切。庶几他日联省建国，根据各省宪以制定国宪，以组织联省政府。是又应求全国共同谅解者也。

紧接着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及所属师旅长于1921年1月21日发出通电，响应熊克武号召，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佐任，认为污辱川军人格。

这时成都学生也纷纷要求川省自治，他们走向街头向市民进行宣传。反对川省自治的刘存厚恼羞成怒，竟然派出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这样成都的学生纷纷来到重庆，“成都学生联合会”亦迁渝办公。他们来渝后一方面通电宣布刘存厚殴打逮捕学生的罪状，一方面向有关当局泣诉，以期得到援助。

一时舆论大哗，群情激昂，纷纷向熊克武发来函电，恳其大

张挞伐，驱逐刘存厚。

熊克武默察全川局势，认为一心想作督军的刘存厚已成众矢之的，不趁此机会驱逐刘，便会养痈遗患，不可能实行“川省自治”。

熊克武立即从北碚赶回重庆与但懋辛、刘湘等计议用武力驱逐刘存厚。

熊克武取得在渝川军将领的一致意见后，于1921年2月18日与刘湘、刘成勋联衔通电宣布刘存厚的罪状。

在军事上熊克武决计分兵三路进击成都。

熊克武的第一军由北路进攻，刘湘的第二军由东路进攻，刘成勋的第三军由西路进攻。东路刘湘连克资州、内江，刘存厚军邓锡侯、田颂尧节节败退。北路刘存厚恃以作战的边防军赖心辉突然倒戈，与一军汇合直压新都。二路再克简阳。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见大势已去，退到新繁、彭县一带，成都孤立无援。

2月21日，刘存厚率残部放弃成都退到广汉、绵阳。

3月中旬刘部被二军击败，由保宁退至陕西宁羌一带，刘做“流亡督军”去了。

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脱离刘存厚军取得熊克武同意，仍留四川。

一、二、三军联合驱逐刘存厚出境之后，熊克武即对川军将领明确表示：自己在与唐继尧作战前即曾宣言“俟对滇、黔战事结束，决心辞去督军职务”。在与刘存厚作战前又发表通电辞去督军职。今两战均已结束，自己决当引退，并推刘湘为川军总司令，管理四川军民两政。

在熊克武的授意下，1921年6月6日，川军将领在重庆开会，推举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并于24日推刘湘兼四川省长，杨森继任第二军军长。

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职，发表自

治宣言。

其实，熊克武在四川实行自治也不过是从军人中推举一个军头作总司令以代替督军，并推举这位总司令兼任省长实行“军民合治”，因此，四川的所谓“自治”，当然不可能是人民的自治，只不过是军人的自主，是武夫的专制统治而已。

熊克武之所以把四川的军政大权交给旧川军的代表人物刘湘，是因为经过川滇黔大战，国民党内部相互争斗火并，自己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元气大伤，尽管取得险胜，但其实力已不可能控制纷乱的四川局势了。而刘湘等旧川军却在川滇黔大战中迅速崛起，其实力足以与熊克武相抗衡。加之，刘存厚仍蹙处陕南觊觎着督军职。在这种情况下，熊克武为了保持四川的暂时安宁，恢复自己的元气，发展自己的实力，以图将来，只好违心地把四川的军政大权交给刘湘，以求得和旧川军的暂时妥协。然而，刘湘是不愿与熊克武平分秋色的，他的目标是：一统天下，独霸四川！

刘既主持四川军民两政，理应到省会所在地就任新职，方符体制。然而，刘的秘书长杜少裳却告诫刘湘说：“重庆为四川重镇，绾毂西南，又为经济中心，在此割据时期，当以重庆为事业基地，不可远离基地，受人控制。”

刘的高参张斯可也提醒刘说：“熊虽下野，如我们同住省门，凡百措施，自必向熊请示，且我们的军队，分驻重庆附近，如到成都就职，万一变起仓卒，何能应付？”

刘坦率地向他们表示：“熊克武，我是搞不过他的，但我决心不让重庆。”

7月下旬，孙中山派石青阳返川疏通与熊克武的关系。

石青阳恳切地劝熊：“锦帆兄，我们都是多年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了，广州国会非常会议，已于今年5月选举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希望兄能和中山先生取一致态度。”

熊克武脸上略带愠色道：“不是我不要先生，是先生不要我。也不是先生不要我，是有人在先生面前谈不要我。”

石青阳开导熊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谈了，我们现在应该团结一致。假若先生再任命你，你干不干？”

熊克武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由于自己倡导川省自治，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举兵驱逐刘存厚，已和北京政府彻底闹翻。再看川局，刘湘势力日大，与自己貌合神离，根本无法统驭，迟早终将兵戎相见。想到这些，他感到孤危，感到仅凭自己的力量支持川局，是不可能的。同时，他也在引咎自责。跟随中山先生革命，本是自己的初衷，由于自己意气用事，竟至把同志当成仇人，才把国民党人掌握的四川葬送了。而中山先生却不计前嫌，主动派人来疏解，扪心自问，他感到惶愧。

他沉默了好一会，才回答石青阳说：“只要先生不嫌弃我，今后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二、运 等 援 鄂

驱逐刘存厚出川境后，四川局势表面上虽较稳定，但新旧川军的内部矛盾并未消除。

适值北方直、皖战争刚终止，直系吴佩孚虽获新胜，但内部仍未安定，依附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久据湖北，势力脆弱，湖北许多人士正在多方运动驱逐王占元。王知悉后，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许多无辜居民亦惨遭杀害。

野心勃勃的赵恒惕见有机可乘，立即派人来川与熊克武密商倒王。

当时熊克武认为，湖南赵恒惕早行自治，较有民众基础，如能联合湖南，共同出兵湖北，驱逐王占元，帮助湖北实行自治，把四川与湖南、湖北连成一片，既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又

可与北方相抗衡。同时熊克武在驱逐刘存厚以后，对川军内部矛盾必将迅即激化亦深有警觉，为了避免新旧川军在省内发生火并，只有出兵湖北一途。因此，熊克武欣然同意与赵恒惕联合出兵湖北。

熊克武借替旅长张冲主婚之便，离开重庆去到夔府。6月3日，又由夔府乘轮东下，亲去长沙和赵恒惕秘密商定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

路过汉口时他受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盛大欢迎。

熊克武到长沙后，和赵恒惕商议妥当，由湖南出兵，直趋武汉，四川出兵，直攻宜昌。

熊克武从长沙返回，在汉口上安宁轮回川时，王占元、孙传芳尚蒙在鼓里，二人亲上轮船送行。

熊克武回到重庆后即与刘湘商议援鄂事宜。

这时刘湘已背着熊克武派出王陵基前往洛阳谒见吴佩孚，希望得到吴的支持，此时王尚未回来，因此，刘湘对熊的建议只是敷衍应付。

王陵基到洛阳后，吴佩孚不理不睬，态度傲慢，没把刘湘放在眼里。王陵基自讨没趣，悻悻返回重庆，向刘湘作了汇报，鼓动刘湘出兵援鄂。

熊克武见刘湘态度暧昧，而战机又不允许久拖不决，于是向刘湘提出，自己以援鄂军总司令名义率师援鄂。

刘湘在投靠吴佩孚杵了一鼻子灰后，十分恼怒，已有对鄂用兵之意，又怕熊克武通过援鄂，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声望，于己不利，于是决定自兼援鄂军总司令。

1921年7月26日，赵恒惕率师攻鄂，直逼武汉，王占元逃走。

吴佩孚急忙派兵南下，于8月27日把湘军全部赶出湖北，9月1日，赵恒惕在江贞兵舰上和吴佩孚签订停战和约。

8月中旬，以刘湘为援鄂军总司令，以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

挥，以但懋辛为第二路总指挥，川军一、二两军联合出兵攻鄂。

川军迅速占领湖北巴东县后，即分兵三路进攻宜昌。

就在宜昌即将被攻下之时，日、美、英三国水兵却公开帮助北兵防守阵地。三国领事也直接出面调停，以延缓川军进攻宜昌的时日，好让吴佩孚抓紧时间调遣援兵。

从9月18日开始，至27日，川军与北军血战10日，终于不支，先后退出南津关、平善坝、南沱，“援鄂”战争遂告失败。

“援鄂”战争的失败，对熊克武的打击是很大的。他没想到，自己苦心经营数月之久的“援鄂”战争竟如是而终。他担心，随着“援鄂”战争的失败，川局将更加动荡不安，无法收拾。

不久，熊克武得到消息，刘湘背着但懋辛，私自派张梓芳作为川省代表到宜昌，与吴佩孚的代表孙传芳签订了《川鄂联防协定》。熊克武还听说，双方秘密商定，如果孙传芳受到攻击，则刘湘出兵援助；川内如发生战争，孙传芳则出兵援助刘湘。

听到这些消息，熊克武分析，刘湘一定是打算吃掉一军，投靠北京政府，放开手脚做“四川王”。

熊克武深感局势严重，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应付刘湘的挑战，他一面电告但懋辛，望他提高警惕，团结其他川军，共同对付刘湘。一方面派王子骞到广东向中山先生面呈一切，作深刻反省，以期得到广州军政府的支持。

熊克武把各方面安排妥当后，决计暂避一时，回井研视亲，以观察川局今后的发展。

三、击 溃 刘 湘

1921年12月，孙中山抵桂林，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王子骞闻讯，立即赶到桂林面见中山先生。

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王子骞，询问道：“锦帆为什么与炎午

(赵恒惕字炎午)搞联省自治，反对我北伐?”

王子骞解释说：“锦帆搞联省自治是权宜之计，与赵恒惕不同。他是为了抵制北洋军的侵入，保住四川这块地盘。锦帆是愿意跟随先生革命的。”

中山先生很高兴，当即对王子骞说：“我即将在这里召开北伐军事会议，你就留在这里代表锦帆参加军事会议吧。”

刘湘派来参加军事会议的代表见王子骞也前来参加，公开在会上表示反对，抗议说：“熊锦帆已经下野了，他没有资格派代表。川军总司令是刘湘，我是刘总司令派来的代表，只有我才有资格代表刘湘。”

孙中山先生既冷静又毫不妥协地向大家解释：“是我以大元帅的名义叫王子骞同志代表锦帆出席会议。”

刘湘的代表无可奈何。

熊克武虽身居盐井垮，但仍时时关注着川局的发展，关注着一、二军的动向。援鄂刚失败，刘湘不与熊克武商量，突然发动援陕，令一军第二混成旅张冲部由川北入陕，第一师喻培棣部仍留巫峡。

熊克武闻讯，立即电告但懋辛：刘湘援陕是假，企图分割瓦解一军是实。要但揭露其阴谋，严词拒绝。

但懋辛即发电质问刘湘：“援陕何名？分割使用一军部队其意安在？”

刘湘接电，自知理亏，才中止了援陕计划。

不久，又传来消息：第二军唐式遵师，由宜昌退回后，竟出兵争夺夔府，为避免引起内战，但懋辛已移驻绥定。唐式遵进占夔府后，又夺去一军二混成旅防区里的大宁盐场，以扼制一军饷源。

熊克武很清楚，这是刘湘在有意进行战争挑衅，他对但懋辛为了避免扩大事态而采取的克制态度感到满意。

旋即，但懋辛电告熊克武，刘湘邀他到重庆商讨裁兵方案。

熊电告但：四川兵多，人民负担甚重，军队应缩编裁减，但各军裁减数额，应是平等的，要警惕刘湘以裁减名义，削弱一军。

但懋辛到重庆后，即与刘湘就裁军问题进行反复商讨，最后达成了如下协议：“第一军应裁编驻忠州之杨春芳旅，由一师喻培棟、二师唐式遵监督执行。第二军应裁编驻彭水的汤子模旅，由二军袁彬、李樾森两混成旅执行。”

这是刘湘设下的消灭一军的险恶圈套。

在达成裁军协议后，刘湘即下达命令，饬部队迅速开始行动。

杨春芳部为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所属之独立旅。但懋辛向刘湘提出，为了利于裁编，须亲往达县与余际唐洽商，并就便指挥第一师执行任务。

经刘同意，但乃离渝去达县。

但懋辛刚到达县，即接到杨春芳拍给余际唐的电报，谓二军军长杨森派员来忠州密报说：“但军长到达县，将令一、六两师武力围编他的部队，叫他率部开到南岸，再绕道去泸州，可以保存其部队和名位。”又说：“同时李树勋亦派员来，叫他将部队开驻石柱，将来可编入李部。”

但接电后，对里面的虚实一时不能判定，未给杨春芳复电。他另电重庆一军军部，饬密探二军究竟，速详报。

杨春芳未得达县复电，正疑虑揣测不安，而第一师部队又已陆续开入忠州，他遂信杨森之密告属实，星夜率部过河，投靠杨森。

但懋辛接到重庆第一军军部复电，始知刘湘阴谋的整个计划，系借改编杨、汤两旅为名，先诱调第一师到忠县，在杨春芳旅拉过南岸向石柱开拔时，即命一师跟踪追击，待一师过河，然后以李樾森、袁彬两混成旅，会同杨、汤两部击灭一师；同时，第二

师唐式遵部进占忠州，阻止一军第六师驰援。待将一师全部解决，再回师攻击六师和二混成旅，并逼迫驻顺庆的第五师何光烈部投降。这样就达到全部消灭第一军的目的。

风云突变。但懋辛立即将上述情况电告熊克武。

熊回电旨：立即命令各部，迅速作好战斗准备，但要沉静以待，按兵不动，让刘湘开第一枪，以争取主动，必要时，可发通电，揭露刘的阴谋。并告但他立即返回成都联络各友军，准备武力支援。

但懋辛根据熊克武的意见，令驻忠州的第一师，在杨春芳旅过河南逃时，按兵不动；令驻开县的张冲旅，驻梁山的余际唐师，监视驻万县的第二军第二师的行动，如唐师继续向忠县移动，即尾随其后。

刘湘果然迭电催第一师向石柱方向追击。

喻培棣回答说：“已有李樾森、袁彬两旅在石柱，足以消灭叛旅，我师新从鄂西撤回，似应稍加整顿。”

刘湘不同意，仍屡电催促。

但迫不得已，将刘湘企图消灭一军的阴谋向各友军揭露，并质问刘湘。一时舆论大哗，刘湘只得作罢。

援鄂失败，成都各军对刘湘出兵迟缓，坐失时机，有很大意见。现在见杨、汤裁编，又有所谓军事复员，对刘的所作所为更加不满。

熊克武从井研回到成都后，联合各军，密作倒刘部署。

他曾多次组织一军代表喻培棣，三军代表蒲泽东（刘成勋的参谋长），川边军代表萧伯豪（赖心辉的参谋长）及邓锡侯、田颂尧、刘斌三师长的代表田伯施等，在鼓楼南街喻培棣的住宅交换情报，商讨川事。

大家对刘湘在川的措施和种种坐大行为深表不满，一致赞同加强合作。他们请熊克武出来领导大家共同反对刘湘。

在各方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熊克武又和刘成勋面商，晓以利害，要求刘协同一军，共同反对刘湘。

刘成勋对诡谲多诈、野心勃勃的刘湘也深具戒心，于是向熊表示：“届时定与一军取一致态度。”

熊克武向刘成勋表示：自己决无权利之心，如倒刘成功，决将支持刘主持川政。他还建议说：邓锡侯、刘斌、田颂尧诸部防地褊狭，偏处一隅，饷粮维艰，可否将绵阳、绵竹，安县，德阳，交邓锡侯驻防；昭化、广元、剑阁，交刘斌驻防。这样田颂尧部便可全驻阆中、通江、南江、巴中诸县。

过了两天，刘成勋即派旅长洪幼三代表军部去慰问邓锡侯、刘斌、田颂尧诸部。

洪幼三在劳军会上分别向他们传达了刘成勋调整分区的意见，他们三人对刘成勋都深表感谢。

当时，邓锡侯正偏处阆中，一筹莫展，听了洪幼三的意见，大感好运来临，立即令部队陆续开拔，并与洪幼三一块赶赴德阳，邀约赖心辉一块赴成都感谢刘成勋。

刘成勋设盛宴欢迎，并邀熊克武同来赴宴。席间谈笑风生，大家十分融洽。邓、赖向熊克武和刘成勋表示：“二公今后如有用我们之处，一定惟命是听。”

至此，熊克武联合各军共同倒刘的计划已告完成。

熊克武与刘湘矛盾日益尖锐化后，支持熊克武的川军均与刘湘离异，刘的号令只能及所属各县，措施稍有不当，各军即纷电责难，刘感形势日非，穷于应付，遂于1922年5月24日通电辞职，声明将军民政务分别交王陵基、向楚处理。

刘湘名为辞职，实则是退居幕后，积极备战。

在刘湘辞职后，第二军军长杨森曾向一军表示愿意合作分掌四川军民两政，由但懋辛择选其一。

但立即将此事电告熊克武。

熊对杨深具戒心，复电但：“杨森虽领二军，但只能指挥其旧部，对整个二军不能控制，恐此议一成，引起他变，再则杨森并不是可以谈合作的人。”

但懋辛于是拒绝与杨森达成妥协。

杨见此计不成，又见刘湘决心发动战争，估计胜败均对自己有利，胜则可以收容一军，败则可以取刘而代之。于是杨森反过来极力主战，竭力怂恿刘湘乘一军不备，悉锐进攻，速战速决，一举击溃一军主力。

刘湘在长江两岸迅速集中兵力，拟由水、陆两路攻击第一军。事为住渝的一军参谋长陈道五得悉，立即派一副官化装水手携密函星夜赶至忠州，告诉住忠州的一师李蓉旅长，转电但懋辛。但得电后，急令一师迅速撤出忠州，移驻梁山，并令驻梁山的第六师派队掩护一师撤退。

7月9日，杨森正式宣布对一军作战。

7月10日，成都军事会议开幕，刘湘亦派有代表参加。

但懋辛通电会议各军并质问刘湘，谓：“二军攻击一军，究为何事？如为争占防地，忠州已不战而让出，何以继续向梁山追逼？”

在熊克武的策动下，参加会议的各军代表纷纷谴责刘湘不念桑梓，背信弃义，轻启战端，祸乱川局的罪行。

同日，一军第二混成旅撤出梁山，向大竹转进，退至渠县，并将主力集中顺庆、营山，缩小防线，以待决战。

杨森刚宣布向一军宣战，熊克武即与刘成勋进行了紧急磋商，希望刘出任川军总司令，统领各部讨伐杨森，挽救川局。

刘表示：“立即出兵协同一军作战。”

熊克武继而又和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诸部详细商讨了出兵事宜。

7月13日，刘成勋以川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杨森，任命邓

锡侯为北路司令，赖心辉为东路司令，又派川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张英率部即日东下，援助一军。

熊克武电告但懋辛，待讨杨军开到资中，一军便进行全面反攻。

这时石青阳已从广东返回四川，在西、秀、黔、彭召集旧部，重建队伍。

熊克武闻讯，请但懋辛派代表前去与石青阳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熊克武接受孙中山大总统的委任。

二、消除川军中革命同志间的陈见，大家团结一致，支持孙中山北伐。

三、石青阳服从熊克武指挥。

7月15日，赖心辉率部突破杨森重兵防卫的永川附近的老关口阵地，向重庆疾进。

此时，第二军虽仍在继续进攻第一军，但已成强弩之末。

7月下旬，唐式遵率部进攻营山，与余际唐师、邓经武旅、陈兰亭旅激战于静边寺，唐师亦大败。于是第二军各部纷纷溃退。一军迅速收复渠县、达县、梁山。

8月6日，赖心辉部突破浮图关，杨森被迫放弃重庆，匆促乘轮东下。

刘湘则由重庆城内迁至南岸王家沱日本租界又新丝厂，受到日本军官佐佐木的保护。

7日，赖、邓两部先后进入重庆，但懋辛亦率部随后赶到。

攻克重庆后，刘成勋怕刘湘发生意外，在取得熊克武同意后，即令刘文辉将他送回大邑县安仁镇闲居。

9月9日，一军张冲旅攻克万县，并迅速进至夔府。

这时，北军张汝明旅赶来应援二军，已有一团人在夔府登陆。正遇上多雾，一军有兵一连轻装来袭，经拖板间道冲进夔

关，枪声四起，杨军、客军立即溃乱，四散逃命。杨森孑然一身逃到宜昌，行李文件，丧失罄尽，状极狼狈。

孙中山先生对四川一向很关心，一直关注着川战局势的发展，对熊克武寄托着很大的希望。熊克武刚一获胜，中山先生满怀喜悦和厚望之情，接连写了两封信给他。

第一封信：

锦帆仁兄惠鉴：

顷闻川战已告结束，治平之机庶几已启，为国计为川计，皆不能无此期望。川乱亟矣，不但民生憔悴，即将士亦疲殆不堪。今日所急，在诸袍泽中各牺牲其意气，以同趋一鹄，庶兄弟之争可以终泯，而得以措手于民治也。战后所重，莫过于民生之培养，川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若能善用之，以开发实业，使生计优裕，则经济日以发展，政治现象随以安定，不惟为川省善后计当如是，即为民国建设计，亦舍此无先务也。兄若有意于此，文(孙文，即孙中山)当开示实业计划，并介绍专门人才，以助进行。兹因希闵(王子骞字希闵)兄回川之便，托带此信，惟裁察之。

此候
台绥！

孙文 8月28日

第二封信

锦帆兄鉴：囊奉手书，旋即裁答。

青阳函亟称，执事仍笃故谊，为之慰喜。国内近情略具致怒，蕴两兄笺，不更赘述。

执事以在野之身，斡旋蜀局，卒能有成，幸进而为建设之谋，以复西南往昔之盛，何庆如之！绍曾还川，特嘱存问，

惟进教不宣。

即颂

侍第！

孙文 8月29日

10月23日，在向育仁偕同戴季陶返川时，孙中山又请向把自己手书的信函面交熊克武。

锦帆兄大鉴：

育仁兄来，备述蜀中近况，与兄为国为省之努力，欣慰无已。十年来，国事不宁，蜀中尤备受痛苦，果能由此次战争之终结，得长治久安，则匪特蜀中之幸，民国前途亦获助不浅。关于蜀中发展整理，曾所未见，已言之在沪蜀中同人，并托育仁兄详细电致蜀中当局。兹更派戴季陶兄入川，与诸兄面究，惟近教之。尊伤痊否？尤念，希善护养，即询
痊安

孙文 10月23日

熊克武在《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自己捧读这一信函时的心情：

深感中山先生时以川局治乱，人民疾苦为念，而我党人则自相残杀，为害地方，这不仅完全违反中山先生的意旨，问良心岂能安乎？所幸同志们终为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所感化，痛觉前非，翻然悔悟，重新团结，为讨伐贿选总统曹锟而共同奋斗。

战事结束后，熊克武提议各军将领尽快召集军事会议，以解

决四川军民两政问题。

当时有人向熊克武建议：应支持但懋辛任川军总司令，刘成勋任四川省长，邓锡侯任重庆护军使，则人事安排，较为恰当，而刘成勋实力薄弱，如能出任省长，亦必满意。

赖心辉却向熊克武建议：刘总司令在川军中深孚众望，在反击刘湘中，功勋卓著，为了统一川政，不致政出多门，互相扯皮，拟刘总司令兼领军、民两政。

其实，赖向熊荐举刘成勋是别有用心的，他认为自己在驱逐刘存厚、反击刘湘中，都是打了硬仗，出了大力的，对川省军民两政，颇思染指，但由于资望太轻，自知无望，因此，很想拾一个炮货上台，等待时机，以图进取。

熊克武对以上两种意见的利弊作了认真的考虑和分析。

从但懋辛的资望和才干来看，但作川军总司令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但与自己是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这是众所周知的，如以但为总司令，恐引起舆论不满。更重要的是，一军实权必须掌握在可信赖的同志手中，一旦有变，才便于应付。因此熊克武认为但懋辛不作总司令仍率一军驻重庆以控制川东为好。刘成勋能力不强，自己住在成都能控制住他。控制住刘，川西也就控制住了，这样全川在实际上便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熊克武基于这样的考虑，决定让刘成勋兼领四川军民两政。

赖心辉还向熊克武建议：应废除军长制，以免野心家扩充军队，将来不好收拾。

熊克武考虑，杨森已垮，二军名义已不存在，刘成勋如主持军民两政，其军长职亦不必兼领，三军名义很容易撤销。但懋辛改任川东川防督办，一军名义亦可撤销。

熊克武对川政的重大人事和军队编制作好安排后，即请刘成勋以川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知四川各军于10月26日在成都召开四川军事善后会议。

会议根据熊克武的建议，作出如下决定：

- (一) 川省暂取自治态度，以促成国宪之合法统一。
- (二) 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在省宪未制定以前，刘以总司令兼管民政。
- (三) 废军长制，各师旅原有单位暂不变更。分期实行裁兵。
- (四) 破除防区，统一财政，限定从1923年1月开始实行。
- (五) 取消护商、清乡、公益等捐，以纾民困。
- (六) 继续开办钢铁厂，实行官商合办。
- (七) 兴办官办银行，整顿交通，划一军事教育，开办全省讲武堂、军事研究所和武学官书局。

正在这时，日本发生大地震，受灾甚巨。熊克武闻讯后，立即发动绅商各界募捐救灾，他本人与刘成勋等垫银5万元汇至日本，以救燃眉之急。

1923年1月4日，熊克武和刘成勋联名将川省赈济日本地震情形，电呈广州孙中山大元帅：

广州孙大元帅钧鉴：日本前次地震巨灾，川省早经通电募赈。惟筹募尚需时日，兹由克武、成勋筹垫银5万元助赈。以2万元赈济日本灾民，1.5万元赈济我国侨商及各省留日学生，1.5万元济川省留日学生。除筹汇交驻日中国公使分摊转发，余数陆续筹汇外，特电奉闻。熊克武、刘成勋叩支。

从这份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熊克武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对我国侨商及各省留日学生的关怀。

这时期熊克武虽未担任任何职务，闲处成都，但凡属重大问题，刘成勋均不敢擅自专决，必往商熊克武，而熊亦时时顾念川局，因此熊克武虽下野，但仍左右着四川局势。

四、川 战 重 开

1922年12月，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企图以武力强编第三军直属第四混成旅何金鳌的部队，以扩大自己的力量。何起而反抗。熊克武感到这一事件很严重，如不严厉处置，必将蔓延到各部队，造成新的川乱。因此，他建议刘成勋及时处置，不要手软。

刘成勋与陈国栋上下级之间的矛盾本来就很深，于是趁此机会于1923年1月29日电令解除陈的第七师师长职务。

熊克武还建议刘派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钲、第六混成旅旅长张成孝率部到永川协编陈国栋师。

陈见大兵压境，便与何金鳌讲和，何怕刘成勋解决陈师后，再来收拾自己，于是两人化敌为友，共同抗刘。

刘成勋电请赖心辉派兵协助。

陈国栋向第三师师长邓锡侯求援。

邓锡侯对废除军长制十分不满，自己的防区又与陈部相连，恐陈被解决后于己不利，于是企图乘此机会联合游击力量一气解决刘成勋，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因此，邓一面于2月3日电刘成勋，拥护解除陈国栋的职务，表示愿执行裁兵命令；一面却于2月5日发出以武力调解的通电，率部离重庆，驰赴永川援陈，与陈合兵围攻隆昌的蓝世钲旅。熊克武见事态越来越扩大，越来越严重，建议刘成勋任命赖心辉为总指挥，改编陈、何、邓三部。

驻资州的唐廷牧师，人枪皆不足成师，遂在邓锡侯的策动下，出兵援助邓、陈。

熊克武立即电告川东边防督办但懋辛出兵，迅速解决邓、陈、何。

2月中旬，邓、陈挥师西上，直逼成都，城内空虚，无兵出

御，只有闭城待援。

过了两天，赖心辉率领大部队由东路追到东门城外，陈、邓未作抵抗，便向北路退走，成都之危遂解。

赖心辉入城后，熊克武夸奖他：“兵贵神速，总指挥带兵有方，不愧是川军的中流砥柱。”并建议由他任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三军的两个师与边防军的三个师，向北路继续追击陈国栋、邓锡侯军。

在赖心辉所率部队的攻击下，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各部队从广汉经三台、阆中一直退到绵阳，被赖心辉指挥的六师大军围困在罗江一带，弹尽粮绝，处境十分困难。这时，他们想出了一条奇袭成都的计策。由邓锡侯亲自率队从德阳、什邡间小道，经中立军刘斌第十师边缘，直趋成都。

赖心辉在阵地一连三日不见敌兵动作，心有疑异，派探员侦察，方知邓、陈已由刘斌防区偷袭成都去了。赖于是率部昼夜兼程，回成都救援。

赖到达成都后，与刘成勋一起前往熊克武住所商议退敌之策，他俩要求熊调二混成旅西上解围。熊十分焦虑地说：“远水难救近火，大家还是另图良策解这燃眉之急吧！”

4月4日天刚明，陈遐龄的军队已进抵成都郊外，将西南两门包围，东门外亦扎满了刘文辉的军队，形势十分紧张。

熊克武与刘成勋、赖心辉等紧急商议：赖心辉与刘文辉交谊甚厚，由赖与刘文辉电商，请他让出东大路，使军队退出。

经赖与刘联系，刘同意让路，并愿暗中掩护。熊克武虽是下野之人，但因目标太大，遂与一军部队一同退驻遂宁。

刘成勋料敌不致害他，前往法国领事馆暂避，并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职。

4月11日，邓锡侯、陈国栋、刘文辉、田颂尧、唐廷牧、刘斌、陈遐龄、彭远耀等在成都外北的驷马桥得胜庵召集军事会议，

组织联军，推邓锡侯为联军总司令，并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谓：

刘总司令已通电下野，方期和平有日，乃熊克武、但懋辛等现仍盘踞东北两路，毫无悔祸之心。道路相传，彼等正勾结外援，意图反噬。不惜牺牲桑梓，破坏和平。……廷牧等为人民计，为军事计，若不预为之防，无以遏止寇患。但军事大计，统一为上。

五、奉命讨贼

川战重开、川东防务空虚，给吴佩孚侵川创造了有利条件。吴佩孚除助杨森回川外，还任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施宜镇守使赵荣华为援川军副总司令，率北军第八师两个混成旅，及黔军袁祖铭所率领的五个混成旅联合进兵川东，杨森任前敌总指挥。

3月8日，杨森率部由利川偷渡戴溪袭击万县。

杨森攻占万县后，于3月14日与刘存厚、陈遐龄、邓锡侯、田颂尧、刘斌、陈国栋、唐廷牧、刘文辉、彭远耀等联衔自万县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

随即，杨森率部由万县进占梁山、垫江，全力向重庆进逼。

4月初，杨森军与第一军在重庆下游10余里的寸滩、横梁子、人头山、鸳鸯桥等地激战。

为了保存实力，熊克武毅然决定，令但懋辛撤离重庆，集中遂宁，再图进取。

4月6日，杨森和赵荣华整队进入重庆。

4月中旬，第一军先后到达遂宁、潼川一带。熊克武召集但懋辛、赖心辉、余际唐等在潼南双江镇开会部署反攻。

熊克武在会上指出，目前拟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成都，然后

再图重庆。在军事部署上，他决定兵分三路：第一军第二混成旅和第一师的一部为右翼，进攻广汉，隔断入川的北军；由赖心辉率原有的边防军部队为左翼，从东路简阳进攻成都；以余际唐率第六师的一部、第一师的一部及其它部队为中路，从遂宁直攻成都。临时余病，由但懋辛亲自督师。

5月初，但懋辛率部由金堂县东南、沱江上游的淮口镇间道直趋成都。

与此同时，第一军第一师喻培棣部，第二混成旅张冲部，第八混成旅郑英部挺进中江、金堂，击败新都、广汉联军后，张冲旅直抵成都近郊。

孙中山先生为了支持熊克武，派孔庚和吕超为代表赴川助熊作战。

5月14日，熊克武率队进入成都。

进入成都后，熊克武立即出示布告，安定社会秩序，稳定民心，并令但懋辛、喻培棣立即率部追击向北退走的联军。

不久，但电告熊：挥师北上，所向披靡。已克绵阳，刘存厚及侵川陕军已向北溃退。

此时，杨森同北军大部由东路进逼成都，已达资州、简阳。熊克武召集在成都的将领开会商讨御敌办法，作出三项决议：

一、推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率一军全部，三军除留省任治安部队外的全部，以及他的边防军全部，向东路迎战。

二、械弹的补充是当务之急，需靠兵工厂接济，由熊克武亲自担任兵工厂督理。

三、军饷由刘成勋负责筹办。

熊克武任兵工厂督理后，即派梁载基任兵工厂会办，自己亦迁住厂内，夜以继日地督造械弹，补充前方作战各军。

为了粉碎曹锟、吴佩孚妄图用武力统一全国的阴谋，有效抵御吴佩孚入侵四川，孙中山大元帅于6月4日正式任命熊克武为

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赖心辉被任为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后，于6月7日率领部队向东大道前进御敌，因所率部队大多属一军，赖恐指挥困难，临出发时曾请示熊克武，派李蔚如偕自己同行。熊克武满口应承，赖偕李出发时，熊特别叮嘱李在前线一定要协调好一军与各部关系。

赖心辉所率部队在石盘铺与杨森及北军接触，由于开始未能固守住石盘铺，造成被动，节节败退，至龙泉山顶山泉铺、茶店子一带防御。

一天午后，李蔚如由山泉铺打来军用电话，请示熊克武：“我们看见对山敌军运动，增加了许多部队，明晨拂晓大有进攻之势，总指挥的意思，敌众我寡，今夜我军如不撤退，明晨与敌接触，欲退不能，牺牲必大，特向总司令请示。”

熊回答说：“对山敌军增加，自系实情，众寡不敌，亦是实情，明晨接触，不能安全退下，亦是意料之事。但是，山上还有险可守，尚有死里求生之路，退下坝来，无险可恃，断无生理，退与不退，都要牺牲。请转告我军，与其退下坝来作没办法之牺牲，不如在山上作有办法之牺牲，他们如果在山上牺牲，我决不辜负他们，我的手枪，时常带在身上的。”

赖说：“总司令如不同意退，非增加生力军不可。”

熊问：“增加何部？”

赖说：“第二混成旅。”

熊问：“二混成旅现在何处？”

赖说：“已到了养马河、周家场一带。”

熊说：“很好，养马河、周家场离龙泉山不远，速命传令兵骑马去传达我的命令：调二混成旅刘伯承、刘慕贤两个指挥官，限今夜12点钟前，不论那个刘指挥官，务必把第二混成旅全部带到山顶来，亲自与我通话，违即按军法从事。”

此次战役的成败关系着成都安危，熊克武不敢稍有懈怠，一

直守候在司令部听候消息。刘成勋、孔庚及省议会议长熊晓岩等均来到司令部打听消息。熊克武便在司令部招待大家用晚餐，借杯酒留连，以候第二混成旅的消息。

深夜11点钟以后，守电话的勤务兵报告，第二混成旅刘伯承指挥官请总司令接电话，满座闻此喜讯，皆大欢喜。

熊问刘：“部队到齐了没有？”

刘答：“先头部队已到，后续部队正在疾进。”

熊关切地说：“部队既已到了，他们过于疲劳，本应稍事休息，但前线情形紧急，仍以注意当前情况为妥。”

刘报告说：“我们得到敌人增加了许多兵力到前线的情报后，昼夜兼程，已有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熊鼓励说：“既是如此，你们就继续前进。”

这时，刘伯承仅率兵一营（还差一连）先行赶到阵地，而敌人大部已蜂涌向茶店子场口攻击前进，刘指挥立即督率该营加入战斗，将敌打退。

随即，熊又与赖通电话，叫赖照刘伯承的意见下达命令。

当夜，前方军情陆续由电话传达给守候在司令部的熊克武。

刘伯承用机枪队、炮兵团，防守柳沟铺山顶，把机枪安置在山顶正面，用大炮作掩护。其余部队，一部分摸过山沟，袭击杨森后方，截断与北兵的联络线，一部分防守山上要隘。

拂晓，攻击开始。在仰攻柳沟铺战斗中，北兵积尸，由沟脚起，高过山顶机关枪口。北兵踏尸而上，机枪位置亦移转两次高地，仗打得十分激烈，十分残酷。在击溃北军的进攻后，讨贼军在积尸内清理出100多名未死的北兵，派队押送到成都。

正当茶店子激战进行之时，但懋辛电告熊克武：已督率第六师赶到简阳对岸，正与北军隔河而战，周绍武团已在迎泉寺渡过沱江。

此时，驻守简阳的北军已来不及从中大路败退，只好忙乱地

从右侧小路溃逃。

第六师进占简阳后，飞速向茶店子前进，击敌之背。

此时敌人已全部从侧面向资阳溃退。

6月11日，袁祖铭正式通电就任吴佩孚所委川军前敌总司令职，他急率黔军万余来援，会师隆昌。

6月24日，刘成勋通电复任川军总司令职，并兼理民政。

7月15日，熊克武在成都就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发表就职通电，谓：

奉大元帅孙公电命，授以讨贼重任，议会诸公，各军将领，函电敦促，期望至殷。克武绵力薄材，曷克负荷，惟念于役革命，且二十年，目击艰危，未遑云补。川省父母之邦，今则寇骑凭陵，横施宰割。况复凶焰鸱张，变本加厉，黩武穷兵，犹未餍其欲壑，竟敢肇乱京师，觊觎非分。向所奉为法统，业已毁弃无余，有贼不除，国无宁宇！于此而犹怀委卸，非直邻于畏葸，抑且负我宗邦。谨即拜命视师，奖率部众，不负我大元帅委托盛意，摩顶放踵，所弗敢辞。

孙中山广州大本营，此时也对四川讨贼军发出训令，谓：

该总司令等赫赫振旅，兴师讨贼，不出旬日，成都克服，西北底定，远道闻之，至为嘉慰。惟东路余孽尚未能清，吾民日在水深火热之中，莫可获救，每一念及，隐忧如焚。今北变突兴，黎氏亡走，曹锟觊觎非分，不惜弁髦一切，自恃武力，凶威所播，足召灭亡，仰该总司令等迅速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藐法梗顽，不难平殄。

熊克武就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后，设总司令部于城内兵工厂，部内各处同时成立，仍委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

7月中旬，讨贼军突破杨森军和北军的沱江防线，杨森率部向泸州退却，北军向荣昌方面退却，黔军则向大足方面撤退。

讨贼军分三路追击：赖心辉的边防军和吕超、石青阳所率部队向泸州追击；第一军第一师喻培棣部及第八混成旅向荣昌、永川追击；但懋辛率第六师余际唐部及第二混成旅追击向大足败走的黔军。

杨森败退泸州后，原为一军旧部的杨春芳见杨森势穷，北军又遭惨败，立即派代表赴成都谒见熊克武，表示仍愿归旧主。

熊克武允所请，并同意保存杨春芳的师长名义。

商定后，熊克武即将此情电告吕超和石青阳。

这时，石青阳已率队进占泸州沱江对岸的玉蟾关，吕超已率部进占况家场方山，杨森被迫率部离泸，杨春芳欢迎讨贼军攻克泸州。

杨森等退至重庆，立即集结主力，以浮图关为左翼据点，沿嘉陵江层层配备力量，右翼则在悦来场一带凭险固守。

讨贼军分中、左、右三路向重庆紧逼。

7月25日，熊克武发表讨贼军布告，尖锐指出，四川征战历年不息，“究其乱源，则曹锟、吴佩孚诸人，实尸其咎”，号召川军各部“指除意见，共释前嫌”，相见以诚，捍卫川省，以粉碎曹、吴的武装侵略，积极配合孙中山大元帅进行北伐。

7月26日，由熊克武领衔，四川将领刘成勋、但懋辛、石青阳、吕超等联名电呈广州孙中山大元帅，请一致申讨曹、吴，并望从速组织合法政府，以维国本。

7月30日，杨森，邓锡侯、刘文辉、陈国栋、潘文华等亦发出通电，拥戴刘湘出山，推其为四川善后督办。

9月20日，讨贼军开始发动对重庆的进攻。杨军退守浮图关，

双方展开了浮图关攻守战。

这时，黔军袁祖铭见情势不佳，决计撤退，固守重庆的其余各军，军心亦极为动摇。

恰在这紧急关头，刘湘由宜宾搭“蜀亨”轮赶到重庆，在袁祖铭住所与杨森、袁祖铭、邓锡侯、陈国栋等召集守渝各军、师、旅长开会，重新布置固守重庆的防务，并许袁以重利。刘在会后立即出城视察防线，决心固守待援。同时，他不断地向吴佩孚哀告求援。

10月1日，熊克武、刘成勋等通电反对曹锟贿选。通电历数曹锟自民国以来的种种罪恶，彻底揭发了曹锟在贿选中的诡谋秽迹，种种丑态，明确表示不仅不承认曹锟这个贿选总统，而且将兴师讨伐。熊等在电文结束时义正辞严地指出：

在蜀民虽久苦锋镝，武、勋等亦愧乏将略，而师出戡乱，愿效前驱。上稽古训，大刑则用甲兵，敢告同胞，祸至幸勿缄默。

当时云南督军唐继尧^①在用兵贵州取得胜利之后，亦不满于曹锟、吴佩孚，加之袁祖铭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多次扬言要打回贵州，在此情况下，唐继尧表示愿与熊克武化敌为友，共同讨贼，并于8月初发出援熊通电。在征得熊克武的同意后，唐派遣滇军第二军军长胡若愚由贵州率12个团入川。胡率部于10月12、13两日相继到达重庆前线。

10月16日，滇军在正面突破杨军阵地，攻占桃子垭。左右两翼讨贼军亦同时发动猛攻，杨军向鸳鸯桥、两路口溃退，滇军、讨贼军跟踪攻占上述两地。固守浮图关的杨军，见大势已去，只好弃关退走，各军分向长寿、垫江、邻水方面败退。袁祖铭、杨森则奔上日轮“宜阳丸”号，向万县逃走。

讨贼军于10月16日占领重庆。熊克武和刘成勋11月8日联衔发出通缉杨森、邓锡侯、陈国栋电。

10月2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令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和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嘉奖光复重庆有功将士，令他们督率各军迅速肃清川境之敌。

不久，经熊克武举荐，孙中山任命在讨贼之役中战功卓著的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任命吕超为四川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石青阳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军总司令。

为了在财力上支援讨贼军，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电告熊克武：今后凡四川“应解中央之税款，统由该总司令委员经收，全数拨充出兵费用”。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以大元帅名义发出了惩治刘湘、杨森、袁祖铭等的命令。

11月6日，成都各界隆重举行慰劳讨贼军大会，熊克武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克武自幼就抱的革命思想，我所以革命，是革专横家的命，革满清帝国的命，非革我民国共和的命，曹锟现在又做起那专横式的总统，又要学袁世凯的样儿，无论如何，都要打倒他，非把他消灭不可。……那袁世凯当总统，我们大家都赞成他，最后要当皇帝，我们各省才又打他的，我们把那民国的招牌，在那仗火中又打出来，就是牺牲一切也是愿意的，才有推倒满清，打翻袁贼的举动。到了今天，民国已经12岁了，曹锟又要把民国作为他个人的所有权，我们还没有将障碍铲除尽，你们大家就来劳军，真是抱愧极了。就是打满清，打袁贼，亦非克武一个人的力量，是众人的力量，与克武有何益，还是与众人有益罢了。假使我们此次不打曹锟，为什么我们要打袁世凯，若是此回不打曹锟，我们中国都不

安宁，我们亦不算是爱国的男儿。……曹锟要想占据中国，非把我们四川先得到手不可，所以他命吴佩孚来打我们四川。……若是我们不把曹锟消灭，不是四川和南边几个省不安宁，就是中国也就危险了。……前敌各将士，听说今天在开劳军会，他们一定是很高兴的。克武代表前敌各将士，今天与我同胞父老道谢！道谢！要说劳军，尤当劳民，那么，前敌将士，听说有此盛举，他们更当勇往直前，顺流而下，才可免我们川省的祸。才得保我们中华的永远存在，才不负今天大家的厚望。那么，事在人为，克武愿与大家共勉。

熊克武的话音刚落，会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高呼“打倒贿选总统曹锟！”“打倒吴佩孚！”“坚决支持讨贼军把反对曹、吴的战争进行到底！”

熊克武参加劳军大会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六、讨 贼 失 败

讨贼军占领重庆，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内部却发生了意见分歧。

熊克武在就任讨贼军总司令不久，曾在私下许赖心辉，待讨贼成功，即电请大元帅任命他为四川省长。

攻占重庆后，赖便急于就任省长职，见熊没有表态，认为熊失言，于是对战事持观望态度。

熊因讨贼之战正在进行，还不宜对赖任省长一事表态，怕闹出新的乱子。为了稳定赖的情绪，他只得委赖在重庆代行总司令职。

另外，滇黔军与川军由于长期互相仇杀，其历史痕迹并未消

除，因此，在对北军用兵取得暂时胜利后，相互间的矛盾便突出起来，互相掣肘，各军都不愿去追击敌人。

熊克武也麻痹轻敌，只派石青阳部汤子模和周西成两师进行追击。两师在颜德基的配合下，追至丰都、垫江前数10里，即受阻停止待援。

曹锟、吴佩孚为收买川军将领继续替他攻打讨贼军，抢占四川地盘，对于战争失败的各军将领，一律不议处分，责成以功抵过，还特以北京政府名义委刘湘为嘉威将军，杨森为森威将军。吴佩孚还任命袁祖铭为长江上游总司令。

在吴佩孚的严令下，10月25日，杨森、刘湘约集在保宁的刘存厚，在黔边的袁祖铭，以及邓锡侯、陈国栋等，在万县会商反攻计划，决定分兵五路进行反攻。由湖北西运大批军火饷银到万县补充各军。

11月底，杨军、北军乘讨贼军攻势松劲的间隙，全力进行反攻。杨森等部由万县沿江而上，邓锡侯、陈国栋等部则由梁山直趋长寿。

直到这时，熊克武才令但懋辛率所部余际唐、喻培棣等前往抵御。到垫江后，因援军不至，械弹供应不上，但部节节败退至张关铁山。

熊克武又严令赖心辉、胡若愚率部兼程赴张关铁山增援。

交战双方主力于是聚集在张关铁山一带相持。

一天，熊、滇各军后侧突发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声，滇军由于疑心，即向后撤，讨贼军盲目继之，全线于是溃不成军。杨军旋即占领长寿、江北，急攻重庆。

熊军此时异常疲惫，军无战心，立即撤出重庆。

第一军第一、第六两师与石青阳部贺龙、周西成两师分路向川北撤退，赖心辉率边防军到铜梁后即向内江撤退，石青阳率汤子模一师和其它部队退守江津转合川，胡若愚部则渡江向贵州撤

退。

驻泸州的杨春芳，这时见熊克武领导的讨贼军失败了，便把吕超囚禁起来，又投归杨森，并与驻宜宾的刘文辉联成一气。讨贼军在川南站不住脚，先后撤出永川、荣昌、隆昌。杨春芳立即出兵向内江进逼。

张关铁山一役，熊军已成解体之势。刘湘、杨森等全力攻击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与刘成勋、赖心辉则秘密妥协。

熊克武尽管处境危恶，但想到孙中山先生的重托，四川同胞的期望，仍继续指挥一军坚持战斗。

此时，但懋辛赴成都医病，熊克武于1924年1月20日亲往潼川指挥。熊方兵力，第一师、第六师、第二混成旅及其它部队，以一部分固守成都外围，余皆在川北前线。

杨森攻占重庆后，由合川、遂宁大道向成都进攻，到乐至侦查悉熊克武在潼川督师，于是星夜率部直扑潼川。

1月27日，杨森率部至潼川附近的建林驿、安乐铺一带，防守潼川外围的一军鲁平洲，余顺筠部一经接触，便向两侧退走。

1月30日，杨军长驱入城。这天午后副官告诉熊克武，据传前线失利，我军后退。熊因未得到鲁、余的情报，恐系谣传，因此未动声色。

晚8时，熊克武正在行营与师长喻培棣、旅长周笃生等饮酒，忽闻枪声大作，周笃生大步流星跨出营门。他定睛一看，敌人已经逼近，急令卫队奋勇还击，自己带着少数卫队返回报信，熊克武迅即指挥大家由后门撤离行营，从盐务署背后直冲上城墙，缒城而出，始得脱险。

熊克武返回成都后，劝刘成勋将其第三军投入战斗。刘却以连年作战，民不堪命为托辞加以拒绝，并令所部由成都向西沿双流、新津、雅安移动，准备离开成都。

不久，熊克武得到消息，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他感谢孙中山先生对自己的信赖，衷心拥护中山先生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英明决策，由衷地敬佩中山先生的博大胸怀。他感到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希望，新的活力。

然而，面对气势汹汹的北兵，面对各怀异心、正在解体的讨贼军，他却十分惶愧，深感有负中山先生的重托，给中山先生苦心经营的北伐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于2月2日电孙中山，请求辞职，谓：

惟念受事已逾半载，军事仍无进步，实由克武才智浅短，督率无方。惟有引咎辞职，候明惩处，为督战不力者戒。并恳钧座迅简贤能，肩之重任。未奉明令以前，所有本军一切事宜，谨交赖总指挥负责……。

这时赖心辉正率部驻防资中，熊克武赶赴资中请赖心辉代行讨贼军总司令职。

殊不知，赖心辉已与杨森有了默契。

杨曾派代表秘密会见赖，对赖说：“我们打来时，只要你让开一条路，以后一定保举你在北洋政府里做官。”

因此，赖婉言拒绝了熊的恳请，告诉熊说他的军队连年征战，损失太大，已无力再战。并屯兵资中、内江不动。

袁祖铭、刘湘、杨森等率部抵成都外围，旋即占领牛市口、兵工厂、西河场、大面铺等地。

邓锡侯、陈国栋等部攻占茶店子，截断了熊军与东道的联系。

熊克武率军残部先退至双流，继退至仁寿、简阳，接着又向川南退走，由泸州渡河。刚退到南岸，但懋辛从成都扶病赶到，两人相见，悲喜交集，不胜感叹。

2月8日，刘湘、袁祖铭、杨森等进入成都。

赖心辉则于10日通电服从吴佩孚，请求二军勿再进攻，说什么：“此次行动，惟以积、甫两公命令是从，期早日促成统一，奠定川局。”

刘成勋部师、旅长亦通电表示与杨森军亲善。

孙中山对四川讨贼军遭受挫败十分焦虑，于2月9日电令湖北讨贼军总司令孔庚率部支援四川讨贼军，谓：

现在川战方急，寇焰滋长。该总司令报国情殷，同仇敌忾，务即淬励部属，会合川军，早定川局，进规武汉，尽军人之天职，期革命之成功。本大元帅有厚望焉。此令！

孔庚鞭长莫及，不可能及时率领部队来川协助熊克武作战。

2月中旬，熊克武率部向东南移动，准备截断蓉渝间联络，转攻重庆。占领成都各部甚为震惊，急推杨森镇守成都，刘湘、袁祖铭率部攻击熊军。

此时，熊军石青阳部汤子模、周西成两师乘虚向驻守川东的杨军发动进攻，曾一度占领永川、荣昌。

唐继尧亦电励熊克武临败无馁，准备再派滇军由松坎北上，与熊部联合进攻重庆。

刘湘、袁祖铭一面南下追击熊军，一面抽兵回援重庆。

从1924年2月下旬到4月上旬，熊克武率领讨贼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刘湘、袁祖铭的军队进行了多次战斗，以图进袭重庆，挽回败局，终因众寡相距太悬殊而失利。为了保存实力，熊克武只好于4月上旬率领部队退至贵州遵义休整。

注释：

①唐继尧于1922年回滇击败顾品珍后，重主云南，大肆扩军。贵州的卢焘在王文华的支持下，于1921年回黔驱逐了刘显世。袁祖铭派人在上海将王文华暗杀以后，又把周、王最亲近的何应钦系打跑了，于是袁同彭汉章、王天培等在贵州主持了政局。刘显世被逐到云南后，唐继尧又派其弟唐继禹率胡若愚等部用武力支持刘显世打回贵州，攻取了贵阳，于是唐继禹便和刘显世分掌贵州军民两政。袁祖铭离开贵州后，即投奔吴佩孚，后来又奉吴命，入侵四川。

第十章 组建联军，被囚虎门

一、组 建 联 军

1924年4月中旬，熊克武率领讨贼军由赤水到土城时，他深深地严责自己在讨贼之役中，有许多失误之处，致使胜利在握的局面被葬送掉了，愧对四川人民和孙中山先生。悲愤之下他病倒床榻。这时，石青阳、但懋辛、孔庚等向熊克武提出加强川、滇、黔三省合作，继续讨贼的意见。熊感到眼下讨贼军撤离川境，孤立无援，云南唐继尧又曾派军援川，表示愿同川军合作讨贼，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熊克武在征得刘显世同意率领讨贼军驻防遵义后，即派石青阳、但懋辛、孔庚前往贵阳与唐继禹、刘显世洽商川、滇、黔三省加强团结合作的事宜。先得到唐、刘的支持，后电商唐继尧，也得到赞同。于是他们在贵阳进一步商拟川、滇、黔联军协约草案。

当时，熊部称“讨贼军”，滇、黔军则称“建国军”，既然三省合组联军，必须有统一名称。经反复协商，决定采用“建国联军”称号，并拟就协约草案，分电唐继尧、熊克武核定。熊克武代表四川，刘显世代表贵州签字后，再由石、孔、但把草案带到昆明，交唐继尧签字。

唐继尧看罢协约草案，提出石青阳、但懋辛系全权代表，也

应签名。

最后，协约由唐继尧、熊克武、刘显世、石青阳、但懋辛5人签字生效。

建国联军协约的内容如下：

1. 为削平祸乱，建设国家起见，组织建国联军。
2. 建国联军先由川、滇、黔三省共同组织，其它省友军与联军处同一地位，抱同一宗旨的，依联军之许可得加入联军。
3. 建国联军公推总司令一人，副司令各省一人，前敌总司令一人，由总、副司令委各军指挥若干人。
4. 联军系列入动员计划，参加战斗者而言，其余各省内地留守之兵，不在此范围以内，在必要时须列入联军，应由总、副司令认可，会同委任。
5. 川、滇、黔三省联军一切军费饷糈及器械弹药的补充接济，在川局未定以前，暂由滇、黔两省负责筹措；川局定后，械弹的制造由川省负责，联军所需款项，由川省负担三分之二，滇、黔两省共同负担三分之一，其款由三省政府按月交由联军军费统筹处使用。
6. 联军任务，只以军事为限，其各省民政，概由各省地方官民自行处理，联军概不干涉。
7. 凡须各省会同办理事业，如交通经济等类，得由总、副司令提议商同各省地方官民，酌量办理。
8. 联军总、副司令对于各省人民有扶助其自治的义务，地方公益事宜，各总、副司令依人民的请求赞助之。
9. 联军组织及军事计划另订之。
10. 联军解散时期以国家统一告成，政治能循正轨后，由总、副司令与各省当局协议定之。
11. 协约分缮三张，由现组织联军的川、滇、黔三省军事首领或全权代表签字盖印，交换各执，即为有效。

协约签字生效之后，根据协约规定，三省共推唐继尧为建国联军总司令，刘显世为副总司令，熊克武为建国联军前敌各军总司令兼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

石青阳、但懋辛、孔庚三人将签订的协约携广州向孙中山先生汇报。

就在这时，江浙战争爆发。

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于1924年9月3日发表讨曹通电，并传檄西南各省，请共同出兵讨伐曹锟、吴佩孚。

9月10日，孙中山复电卢永祥，表示同意与其合作，共同讨伐曹、吴。

9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政务军事联合会议，推唐继尧为副元帅，电促唐就职，以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名义，克日兴师。

9月22日，唐继尧在云南正式宣布成立建国联军，他本人出任总司令，胡若愚任滇军总司令，熊克武任川军总司令兼前敌各军总司令，刘显世任黔军总司令，组建川滇黔联军第一至八军。

熊克武得孙中山委任为“建国联军前敌各军总司令”后，立即率领部队由贵州铜仁向湖南进发，准备先暂住湘西，待稍事休整之后，再分道攻取武汉。

湖南省长赵恒惕见熊部大军进入湘境，内心很不愿意，但又无可奈何。为了解除赵恒惕的疑虑，熊克武派人与赵反复交涉，赵自知军队实力不敌熊部，不敢公开绝裂，只好以敷衍应付的态度，同意熊部暂住。

曹锟和吴佩孚的大将、湖北督军萧耀南见熊克武率部入湘，慌了手脚，急忙联络鄂、赣、湘、闽、川五省，组织联防以抵御熊克武率领的建国联军。

11月18日，熊克武率领部队到达常德，设司令部于此，布防如下：

川军第一师喻培棣驻沅陵；第二师汤子模驻常德；第六师余

际唐驻沣州；第十四师郑经武驻辰川；第九混成旅贺龙、四川边防军第一旅张义卿、第二旅周朝武驻临沣；第三旅康俊武、第四旅罗观光、第五旅田义卿驻沣县；四川暂编陆军第一混成旅唐振铎、第二旅汤纯臣、第三旅刘稜驻石门。

熊克武于12月11日向常德各界人士代表发表演说，提出整理财政开支，以稳定物价，进行清乡剿匪，以稳定社会治安等主张。他的讲话深受与会代表欢迎。

接着，熊克武于12月21日在常德约集赵恒惕和湘军特科司令林芝宇的代表，以及川、滇、湘军将领开军事会议，共同商讨北伐事宜。会上，熊克武声明：我军来湘西，只是借道暂驻，决不干涉湘政，暂驻期间的军费，请湖南省拨源陵河木材税款供给。

熊克武知道自己的部队长途跋涉，加之粮饷两缺，容易军纪废弛，到常德后他立即通令全军，要求将士严格遵守军纪，不得侵犯百姓，勒索财物，违者按军法处置。同时，派出卫队日夜巡逻，维持社会治安。

由于熊克武采取了有力措施，因此，熊军到达常德后，常德市镇，秩序井然，市民安居乐业，一片兴旺景象。地方人民对熊克武颇有好感。

联军组建就绪，并取得了湘西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后，熊克武即于1925年1月11日就组建建国川军和就职日期以及印信等有关事宜呈报孙中山大元帅备案存查。

第二天，熊克武前往余际唐和刘稜两部驻地沣州、石门一带巡视，检阅新收编的军队。

在巡视石门时，为了缅怀死者，激励生者，熊克武指示为在反对吴佩孚入侵四川中死难的志士修建烈士纪念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在碑文中，他对在“曹、吴肇乱，出兵征斗”中牺牲的死难志士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对“天压凶德，曹民退位，囚于京师，吴氏丧师，彷徨信阳”，建国川军“师次常沣，士气益励”，革命

力量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勉励将士枕戈待旦，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熊克武重视军队建设和军事干部的培养，他在常德建立了“建国军干部学校”，自兼校长，由前蜀军第五师旅长龙光任监督，任孔维甫为教育长。学员来自由四川归队的尉级军官和各部编余军官，约600人，分为四队，训练时间定为6个月。以后军中把它称为“随营干部学校”。

“随营干部学校”于2月27日开学，熊克武亲自主持了开学典礼，发表讲话。他对前来参加学习的学员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诸位于此艰苦之余，尚能立志求学，热忱毅力，值得嘉许。”他指出：“整军整武，人才为重。”勉励学员成为整武建国的有用之材。

二、策 划 北 伐

熊克武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他与中山先生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当时革命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下，熊克武在探索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觉悟日益提高，认识到只有与共产党合作，跟随孙中山先生北伐，革命才有前途，所以他对中山先生惟命是听，先生对熊亦十分信任。

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决定接受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的邀请，于1924年11月2日前往北京“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

孙中山先生在临行前曾亲笔用英文写了一封密信给熊克武。信中写道：

……余此次北上，讨论南北统一大计，阻力很多，前途未可预料，但无论如何，仍需以武力为后盾。你为我党老同志，必能深明此意，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

孙中山先生北上时，但懋辛等也同时去北京。当时孙中山力主召开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张作霖却互相勾结，不同意中山先生的意见，另行主张召开善后会议。

孙中山先生因病重不起，派汪精卫同段、张洽商，汪精卫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召开善后会议。

熊克武得到开会通知后，即派张重民代表建国联军前敌各军总司令，但懋辛代表建国川军总司令出席会议。

南方代表提出应邀请职业团体参加，段祺瑞则坚决反对。在此情况下，为了揭露张、段借开善后会议以欺骗舆论的阴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5年1月31日根据孙中山先生指示，决定国民党拒绝参加会议。

熊克武得到通知后，急电张重民、但懋辛退出善后会议，同时勗勉将士，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出师北伐，并向川、滇、黔、湘前敌各军将士发布训令：

往岁曹吴擅权，祸国害民，群起义师，同声致讨，本军将士，效命驰驱，转战经年，备历艰苦，原期改建邦国，勉尽厥职，未敢稍懈。自黔入湘以来，已值曹吴覆败，决定善后会议，莫谋和平解决，方以国政可入常规，遂尽吾辈责任，屯师常沣，静候处置。会议已开，而临时执政府，高下在心，举措任忿，善后会议等于虚说，窃念时局纷扰，今昔悬殊，国是前途，尚多荆棘，凡我将士责任未尽，允宣三民主义精神，共图宣力国事，合行迫令，仰即转饬所部，切实遵明，务各贯彻初志，勉力前驱，用军全功，无往厚云。

河南总司令胡景翼是熊克武辛亥革命时在陕西结识的老朋友，熊克武进驻湘西以后，便派张冲、王子骞作代表到开封与胡部接洽，胡景翼对熊克武提出的出师北伐、攻取武汉的主张深表

赞同，还主动邀请在北京的但懋辛到开封进一步商讨联合攻取武汉的具体部署。熊克武即委但懋辛作商谈的全权代表。

但懋辛接电后，从北京赶至开封与胡景翼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两军应加强团结，全力整训部队，等待时机，安定大局，最后商定了四条具体办法：

一、双方认为萧耀南是曹、吴的残余，不能让其长久盘踞武汉，如能联合赵恒惕，则三面进攻，否则由胡、熊两军夹击，驱逐萧耀南；在行动前，对段祺瑞极端保密，待造成攻占武汉的既成事实后，段也就无可奈何了。

二、上述企图，如限于情势难以执行，则由胡联系驻荆、宜的王汝勤、卢金山等部，让熊军由沙市渡江，进驻襄樊与胡军靠拢，整训待时。

三、对驻洛阳的阙玉昆、张治公部，予以优容团结，以壮大力量，备为后用。

四、胡对熊部的械弹接济，因中间隔着吴佩孚残部，运输有困难，胡同意为熊成立一个混成旅，领导骨干由熊遴选，兵员、械弹、装备、粮饷由胡负责补充，情况许可时即归入熊军建制。

为了实现第三项，胡景翼曾请但懋辛、张冲去洛阳见阙玉昆，当面疏通双方隔膜。阙玉昆见但懋辛来团结河南各部极为高兴，由但懋辛介绍，阙、胡二人结为把兄弟。

不久，胡景翼又派陇海铁路局局长张季鸾为代表到常德拜会熊克武，接洽一切，熊克武复派曾通一到开封向胡景翼报聘。这样，胡、熊两军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这时，吴佩孚在鄂的残部向岳州、城陵矶增防，支使萧耀南拉拢赵恒惕，以接济械弹相许，怂恿赵部向熊克武发动进攻。

胡景翼在移驻河南时，曾与萧耀南相约，两军以武胜关为界，互不侵犯。胡景翼得知萧耀南支使赵恒惕对熊部用兵的消息后，立即发电警告萧：如赵对熊用兵，胡军将借道武胜关援熊。

这样，赵恒惕尽管对熊克武久据湘西十分恼怒，但由于胡景翼的抵制，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熊克武坚持北伐，在湘声望日著，这引起了北京政府的忧惧和赵恒惕的怨恨。段祺瑞为了拉拢熊克武，派其亲信周勃为全权代表，前往湘西与熊会谈。

周勃先到长沙与赵恒惕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周勃即由赵恒惕的心腹刘德裕陪同，前往常德与熊克武会谈。

在会谈中，周勃告诉熊克武，段执政准备召熊入京，给予相当地位，请熊劝令部队返回四川。

熊克武对段祺瑞执政府欲用高官厚禄收买自己，以阻止建国川军北伐的卑劣行为，十分气愤，他明确告诉周勃：“执政的官，我是不做的，湘西也决非建国川军久驻之地。”

周勃杵了一鼻子灰，刘德裕也自讨没趣，会谈不欢而散。

在湖南，被唐继尧委为沅陵镇守使的蔡矩猷和湘军特科司令林芝宇，由于反对赵恒惕倾向北洋政府，因此与赵矛盾很深。

熊克武入湘后，蔡、林相继率队归附熊，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出师北伐。熊便委蔡为联军第六军军长，令该军驻防铜仁、麻阳一带，并呈文报大元帅府核准；委林芝宇为建国联军湘军第一军总司令，安排该军驻防芷江、洪江一带。

熊克武接纳蔡、林更进一步激起了赵恒惕的怨恨。

为了最后争取赵恒惕，使北伐得以顺利进行，熊克武主动邀请赵恒惕于1925年2月21日面谈。会谈地点设在湘江芦林潭一艘兵舰上。

随同熊克武前往的有熊军驻湖南代表曾通一，随同赵恒惕前往的有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骏明、国会议员钟才宏等人。

会谈中，熊克武对赵提出两点意见：

一、劝赵同北洋军阀政府划清界限，尤其对吴佩孚不要采取

妥协态度。

二、要赵不妨碍联军北伐，如果赵能靠拢广东，参加北伐，配合进攻湖北吴佩孚的亲信萧耀南部，则更为欢迎。

熊克武坦率地向赵恒惕表明：联军只是在湘暂住，负责对湖南不侵犯。由于赵恒惕与北洋军阀有勾结，因此在会议中赵对熊提出的意见不作正面答复，却一再要求熊交出林、蔡。

熊克武听了赵恒惕的要求，暗想：不论林、蔡加入联军的动机如何，仅就他们表示愿意参加北伐这一点而论，也不能拒绝。至于将他俩交出，做出卖朋友、落井下石的事，就是杀了我熊克武的头，也是办不到的。

为了不伤和气，熊克武向赵恒惕保证说：“炎午兄（赵恒惕字炎午），林、蔡由联军指挥，绝不会对你不利，我向你负责。如果你走广东的路线，他们更会拥戴你！”

赵恒惕及随行人员认定熊克武的这些话是敷衍搪塞的空话，反问熊克武：“我们湖南的叛军可以得到四川军队的掩护，如果川军叛军杨森部在鄂西，也由别省军队掩护他们回川，锦帆兄又作何感想呢？”

熊克武也不甘示弱，回击说：“请问诸公，湖南境内能允许吴佩孚的部队驻扎，为什么对联军借道北伐，暂时屯驻竟如此责难？”

双方在芦林潭整整会谈了一昼夜，争论十分激烈，最后不欢而散。

三、中山逝世

正当此时，突然晴天霹雳，熊克武于3月13日在常德获悉自己最尊敬的师长孙中山先生于1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的噩耗。他悲痛难忍，痛哭失声，当即在总部召集所有军官哀悼，伏案执笔，

亲拟电文告联军各部：

顷接覃(13日)电：孙大元帅于又日(12日)在京逝世，惊闻噩耗，不胜悲痛，除急电吊唁，并派但军长懋辛代表联军助理丧事外，即令所部于电到之日停止办公及操一日，并下旗三日。

当天下午1时，熊克武又在总司令部召开军官会议，研究有关追悼计划，决定：

一、电北京孙公子科及国民党表示哀悼。
二、各机关一律领衔吊唁。
三、俟广州、北京来电报告如何举行追悼典礼，再开追悼会。

四、约上海某书局印孙大元帅遗像数万张。
五、成立追悼会筹备处。

接着，他以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兼建国军川、滇、黔联军前敌总司令的名义亲笔写了一幅挽联，电告在北京的但懋辛，挽联曰：

上台星遽陨，恸千里噩耗飞来，缟素三军歌楚些。
击楫志空存，愿指日中原底定，初无故礼告钟灵。

熊克武又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幅挽联，曰：

与民国性命相依，讨贼成功身遽死。失吾党创造先觉，
忧戈待旦泪频挥。

在熊克武的主持下，常德县举行了隆重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的追悼大会。

熊克武在悼词中追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40年，推翻了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满清专制统治，赶走了皇帝的丰功伟绩，赞扬了中山先生肃清在广东的各部叛军、统一广东的业绩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表示决心继承孙总理的北伐事业，“为主义奋斗”，以完成“先生未竟之志”。

这时，脚踏两只船的赵恒惕见孙中山先生去世，突然翻脸，于3月27日鼓动湖南省议会通过了《武力驱逐联军出境案》，限令联军两星期内出境，否则将用武力驱逐。《长沙日报》以特号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一消息。

赵恒惕同时下令叶开鑫、贺耀祖两师部队，由常德的德山方面向熊军进逼，并令驻保靖、乾城一带的陈渠珍部对熊军进行阻击。

为了避免与赵恒惕冲突，熊克武立即电告在北京的但懋辛，要他速往开封与胡景翼洽商。

但懋辛于4月10日到达开封，正准备第二天谒见胡景翼，没有想到，胡景翼竟因割疗疮，于4月11日病逝。

面对这一急遽变化的形势，熊克武原订的北伐计划完全落空。他心如刀绞，思绪十分烦乱，终日闷坐室内，拒绝接见任何人，反复地思虑着联军的去向，思虑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从4月15日开始，湖南省军与湘西熊克武部发生局部武装冲突。

熊克武为了最后规劝赵恒惕，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于5月18日通电全国，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电云：

武于民九解除四川督军职务，参加各省省宪运动，逾年而湘蜀有援鄂自治之师。又二年而大盗以贿选窃位，悍将以

武力乱国。武奉故大元帅命令，出发讨贼，组织建国诸军，并加入改组之中国国民党。前之省宪运动与援鄂自治，所以谋省民革命；而后之组织建国军与改组国民党，所以谋国民革命；其反抗国中军阀之割据及国际间帝国主义之侵略，前后初无二致。武以为今之大患，乃在中国反革命势力与国际间帝国主义之勾结。凡今国中革新党人，无论主张国民革命或省民革命，皆当通力合作，结为革命三派之大同盟。故武受任以来，一面服从故大元帅命令，一面仍尊重湘滇诸省之意思。委曲如此，盖惧为反革命者所操纵，致使国内战争延长至二三十年而未有已也。去岁武部入湘，曾得湖南省当局同意。频月以来，迭与赵省长炎公商讨，决议建国联军出境北伐，主客相谅，初无间言。乃自“决川”、“浚蜀”两寇舰仓卒入岳，而长常间之谣言四起，岳州悍将大张寿筵之日，亦即湘西联军飞电告警之时。此各消息，至为骇怪。武为国家计，为湘省计，当始终尽力于三派同盟之革命运动，虽备受压迫，亦惟有容忍逊避。盖主义既属相同，谊当始终维护，断不忍因故疑误，自相离异，又况湘蜀将士，夙共艰危，偶涉分歧，片言可解。如或反革命者另具阴谋，構衅一隅，流毒全国，则武为国讨贼，誓不与大盗悍将俱生。诸公致力改建，主张素同，尚望俯鉴愚忱，仗义执言，毋使亡命余丑，启其觊觎，实国家前途之至幸也。谨电奉达，伫闻明教。熊克武叩。巧。

从这份电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熊克武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以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思想觉悟有了显著进步，能敏锐地认识到：“当今之大患，乃在中国反革命势力与国际间帝国主义之勾结”，实属难能可贵。

在赵恒惕的武装挑衅面前，为了统一建国联军高级官佐的认

识，研究对策，熊克武在发表“五·一八”通电后，立即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熊克武先请陈道五参谋长报告湖南省议会决议，及赵恒惕调动部队袭击熊部的情况，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

蔡鍇猷首先发言，他愤懑地指出：赵恒惕翻脸背约，应该视同敌人，宜用武力占领湖南，然后再图北伐。并说：从现有联军的力量来看，攻下长沙是有把握的。表示自己愿作前驱。

余际唐接着发言说：孙大元帅逝世后，继任者为谁至今尚未得到广东消息，今后大局如何，怎样变化，尚不可知。他建议攻占湘西10县，贵州施南、铜仁、利川3县，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4县，共17个县，作为军队休养整训的根据地，然后静观大局变化，再图进取。

喻培棣则主张由湘西经黔、桂两省前往广东，他指出：广东是革命根据地，孙先生虽已逝世，胡汉民在代行大元帅职权，锦公同胡关系较深，革命部队投向革命策源地，不仅整补容易，政治意义也更重大。

熊克武边听大家的意见，边在进行思索分析，他认为前面两种意见实际上是一种割据思想，从小集团利益着眼，既不符合当前形势，也不符合革命利益。他很赞同喻培棣的意见。他的想法是：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府内部可能出现纠纷，即使大丧当前，勉强维持团结，也还有很多大政方针亟待决策。因此，当前南方最关键的问题，是加强政府领导机关，而不是夺取一省或几省的地盘。

熊克武发表了三条意见：

1. 如果大家要回四川去，他就离开部队，同大家分手，独自由上海到广东去。
2. 如果大家株守三省边区，他可以留在军中，但不挂任何名义。

3. 如果大家愿去广州，他愿为前驱，同大家一起走。经过反复商量，多数人表示愿意跟随熊克武前往广东。熊军在击溃了湘军陈渠珍部的阻击，从常德开赴保靖县后，熊克武即发布了去广州的命令，同时允许各部队保留选择去留的权利，结果，只有联军中的部分湘军没有南下。

四、奔赴广东

1925年6月，熊克武率领部队3万余众，取道贵州、广西边境，向广东进发。第一军余际唐部为先锋，第二军汤子模部紧跟前进。

部队刚出发，熊克武就派吴玉章前往广东向国民政府报告请命。当时代行大元帅职的胡汉民和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对熊率部来粤均极表欢迎。

从湘西到广东，行程近万里，要通过湘、黔、桂、粤四省地区的山岳地带，翻越巍峨险峻、高耸入云的越城、都庞、萌渚三岭。时值酷暑盛夏，在无根据地、无后勤保障的情况下，熊克武带领3万之众的队伍长途行军，确实困难重重。

首先是筹办给养困难，住地缺乏，部队不仅经常野营露宿，而且要负粮行军，寻找野菜充饥也是常有的事。加上，在盛暑酷热的季节中行军，大山密林之中常有山岚瘴气，通过这样的地带，疾病在军中蔓延，医药又极缺乏，不少官兵就这样被夺去了生命。

一次，随营干部学校监督龙光患病，自量必死，在道旁失声痛哭，幸被熊克武发现，立即将自己的坐马给他骑，龙光才幸免一死。

另外，行军地区多为少数民族住地，他们与汉人隔阂较深，如事前未做好工作，待大军一到，当地人不是逃避一空，使筹办

给养发生困难，就是躲藏在僻静道路上狙击掉队官兵。

为了取得沿途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熊克武在行军中严令各部切实遵守纪律，除筹办粮食外，绝不擅取民间任何什物。就是筹办粮食，亦应先派人委婉说服，必要时还可送给一些物品。在通过某地，遇少数民族赶集时，必须先通知当地负责人向群众传达解释，严禁官兵进入市场，以免发生惊扰。

由于军纪严明，熊军得到了沿途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对部队顺利行军起了一定的作用。熊军于1925年8月胜利抵达粤北。

在这次长途行军中，熊军遭受的损失亦不小：死亡约4000人，失散约2000多人，到达粤北时只有2万余人。

熊克武率部到达粤北后，即由国民政府指定连山、连南、阳山等县为联军驻地，司令部设连县，还指定广州广大路4号一幢三层楼房作为联军办事处。

熊克武刚到连县，广东省政府即派师长谭道源携款2万元，军服1万套前来劳军。

在劳军会上，谭道源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对久经锻炼、热忱革命的建国川军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表示广东政府一定尽快给建国川军补充弹药装备，粮饷也一定按官兵人数接济。

不久，廖仲恺偕同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连县劳军，鲍罗廷代表苏联政府赠送给建国川军1万元医药费。

鲍罗廷向熊克武介绍了当时苏联革命的情况和国际形势。他还十分关切地对熊说：“你远道行军劳顿，多休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以后请罗加佐夫将军给你详细介绍。”

廖仲恺到连山的当晚，与熊克武推心置腹地谈了整整一个通宵。

他向熊克武详细介绍了中山先生病中的情况，分析了南北斗争形势，认为北洋政府不得人心，从人心向背来看，对南方有利。

并满怀深情地向熊克武诉说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真诚援助。还向熊克武介绍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些同志的态度和言论。

整个谈话虽然充满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和乐观，但也偶尔流露出一些对当时政治中的暗流的担心。

在交谈中，熊克武特别对廖仲恺说：“恩煦（廖仲恺原名恩煦）兄，我初到广东，一切隔膜，对党中央内情，党内的种种暗流，还望兄多多赐教。”

廖仲恺苦笑着摇了摇头，他为了顾全大局，始终没有指明具体的人和事。只说：“你留心看看便知道了！”

廖仲恺劳军返回广州不久，便被帝国主义指使的国民党右派所杀害。这使刚到广东的熊克武受到很大的震动，引起了他对廖仲恺先生所指出的当时政治暗流的警惕，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担忧。

熊克武在连山时曾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李尔根写的。李尔根任重庆法国领事时即与熊相识，他在信中说：“‘沙基惨案’是英国人招惹出来的，与法国人无关，应当区别对待。”请熊向国民政府解释一下。另一封信是陈炯明写的，信一开头就说：“十余年来未通音信，……现兄初莅粤，情况不明，言行必要慎重。”

熊克武在连山把部队安排就绪后，国民政府即派伍云梯为代表前往连山接熊赴广州共商军事。

1925年9月19日，熊克武一行从连山启程，广东政府又派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桂花车到英德的连江口迎候。熊于9月24日到达广州。

当天晚上，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设宴为熊克武洗尘。

席间，熊克武将法国驻广州总领事和陈炯明写给他的两封信拿出交给他们看。

汪精卫看过陈炯明的信后不以为然地对熊说：“这封信算不了什么，对别人也许还有点作用，对你我老同志之间，难道还能

挑拨离间得了吗？”

蒋介石热情地邀请熊克武参观黄埔军校，并要熊届时发表演讲。熊克武当即答应前往，请蒋介石安排好后通知他。

熊克武到广州不久，便与喻培棣一同前往黄花岗72烈士墓祭奠死难烈士。

面对烈士陵墓，想到自广州起义14年来自己在奔波劳碌、东拼西杀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想到当前纷乱的政局，想到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须当努力”的教导，想到烈士牺牲时的那一张张期待的面容，熊克武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两人在墓前默哀伫立良久，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烈士陵墓。

以后，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单独设宴招待熊克武，席间，他假装关注地询问熊克武到广州后的打算。

熊坦率地说：“我不远千里而来，是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至于个人出处，一听政府安排。”

在此期间，苏联罗加佐夫将军受鲍罗廷顾问的委托，约请熊克武面谈。

他关切地对熊说：“你们这次走了很长的路，官兵行军都辛苦得很，先休整一段时间罢。”接着他问熊：“你能出多少兵北伐呢？”

熊回答说：“我的队伍有3万多人，待补充军实，即可投入战斗。”并说：“我把这支队伍带到广东来，是准备交给政府调遣的，任何人都可以指挥。”

罗加佐夫插话说：“作战期间，自己训练的部队，还是自己指挥比较方便，也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将来用兵还是要你独当一面。”

谈话告一段落，罗加佐夫带熊克武到另一间办公室，指着机密的军事地图给熊看，还对一些战略部署加以解说。

熊克武告辞时，罗加佐夫又送了些药品给熊克武个人和他的部队。

熊克武在广州期间海军司令欧阳苍生、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等人先后拜访过他。

熊克武偕同喻培棣回拜过汪精卫及其夫人陈碧君，回拜过欧阳苍生、谭延闿、朱培德等。

熊克武到达广州后的心情像女儿回到了娘家。广东政界的头面人物都是辛亥革命时的老同志，大家在一起非常亲热。另外，广州市民听说熊克武要出师北伐，非常拥护，素不相识的民众团体领袖纷纷前来拜访，表示敬意。还有人直率地对熊克武说：“黄兴在世时，不是推荐过你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吗？现在正是时候了。”

熊克武在一片赞扬声中真有些飘飘然了，自认为参加同盟会早，资望高，又有武力作后盾，统兵北伐理应当仁不让。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的一些军政人物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汪精卫以拉拢国民党内一批假左派为基础，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为基础，谭延闿以一批旧军人为基础，各怀野心，勾心斗角。熊克武是同盟会的老同志，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历史关系，又有自己的部队，因此他们都想拉拢熊，来壮大自己，排斥别人。熊克武刚到广州，对这一复杂的政治背景缺乏了解，从未表示过要站在哪一方，因此他们怀疑熊有独树一帜的野心。在蒋介石的串通下，汪、谭等决定联合起来搞掉熊，吃掉熊带来广东的川军，以壮大自己。

五、被 扣 虎 门

1925年10月3日（旧历八月中旬后的一天）上午，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来到联军办事处贺节，还带来了几瓶外国酒。

他们与熊克武一见面便佯装歉意地说：“昨天我们参加‘沙基惨案’52烈士国葬典礼去了，今天特来向你补贺中秋节。”

当时余际唐在场，他们5人便坐下来喝酒，席上谈笑风生，熊克武开怀畅饮。

蒋介石见熊已有几分醉意了，便对熊说：“今天下午国民政府要开会，研究联军的驻地及饷械问题”，要熊克武和余际唐去东山寓所参加会议。熊克武当即答应按时到会。

下午，熊克武和余际唐提前来到东山寓所。

熊克武到会议室见还没有另外的同志到会，便招呼余际唐坐下，点燃香烟边抽边等。

过了一会儿，一队荷枪实弹的卫兵突然闯进会议室，把他俩看押起来。

熊克武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

卫队长答：“特奉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的命令前来拘捕你。”

这时，谭延闿板着面孔出现在会议室，他宣布说：“你们被扣押了。”

熊克武一看窗外，四周布满了卫兵。他顿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上了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这帮阴谋家的圈套。

他面带愠色，用鄙夷的目光盯着谭延闿，冷冷地说道：“先生才去世5个月，尸骨未冷，便设下陷阱，坑害同志，相煎何急！”

谭延闿无话可说，昂然而去。

过了好一会，谭延闿又走进会议室，对熊克武说：“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请你给广大路川军办事处的人写张条子，要他们把武器全部上交给广州公安局，不然，于他们不利。”

熊克武思忖了一会儿，为了使办事处同志不致作无谓的牺牲，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以便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他掏出钢笔工整地写到：

黄爵高(办事处副官)同志：

现在发生非常误会！不日即可解释。所有广大路武器，全部交与来人封存取据。勿使外人知！诸同仁仍住广大路原寓不动。武。

傍晚，一队卫兵不由分说，把熊克武和余际唐押出东山寓所，由虎门要塞陈司令随同，用汽艇解往距广州70公里的虎门炮台。

与此同时，蒋、汪、谭等也以宴请为名，把喻培棣、王子骞，及机要秘书陈吉枝、丁毅音、吴庶咸等同时拘捕，一起解至虎门炮台。

虎门炮台分上横挡、下横挡两处，每处设1个炮台长，每个炮台长管10个炮长。熊克武和余际唐、喻培棣三人关在上横挡的一排三间平房里，左边一间为熊、喻、余三人居住，中间是客厅兼饭厅，在饭厅前的廊柱上贴有一张用毛笔写的标语“此系反革命犯人住地，同学们不要与他们谈话。”右边住的是一排看守的卫兵，其余人员均关在下横挡。

熊克武等人被押解至虎门炮台时，广州卫戍司令部即向警戒人员宣布：“这次押解来的全是国犯，要严密监视，不得随意接近。”

到虎门后，蒋介石、谭延闿等要熊克武写信给他的部队，要他们接受改编。熊克武为了让这支军队保存下来，以图将来，立即写了一个手令交给他们，谓：

此次被扣，不知何因，也无从究诘。余与诸袍泽由湘来粤，初衷原欲参加国民革命。如此既得政府改编，得遂革命之志，希望顺从政府旨意，接受改编。如有不愿者，可向政府请求解甲回乡，上养下育，各安生业。切勿以我为念，妄生是非，以免糜烂地方，玷辱部队之荣誉。

10月4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以广州国民政府名义，发布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通敌叛国罪状”的布告。

《布告》编造谎言，捏造证据，诬陷熊克武指使亲信但懋辛与陈炯明、林虎相勾结，“广布羽党，交通敌人，谋害国民政府”，说什么“罪状昭然，人证俱获，实难再事姑容。已饬广州卫戍司令将熊克武扣留，听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判。其随同谋乱人等，均一体缉拿归案讯办。”

10月6日，蒋介石等又胁迫熊克武的部下龙光为川军慰抚使。

7日，龙光持熊克武的手令前往连州接收川军。

9日，国民政府为熊克武通敌被扣，发表《告川军将士书》，要川军“切不可轻信谣言，无故惊扰”，“至于你们的给养，政府一定要替你们筹划的”，一定要“服从革命政府”。

蒋介石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拘捕熊克武，妄图利用龙光收编熊部，以扩大自己势力的阴谋，只能激起熊克武部属的愤怒。

龙光到连县宣布国民政府“告川军将士书”后，即遭到川军官兵的强烈反对。龙光亦有口难言，趁此返回广州交差了事。

龙光被轰走后，大家公推第二军军长汤子模为总指挥，向贵州撤退。蒋介石见熊克武部不肯接受改编，派出部队向熊军发动进攻，欲用武力迫使熊军就范。汤子模指挥部队边打边向后撤。

熊军撤出广东后，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到湖南被赵恒惕改编，一部分由汤子模带向贵州，途中汤被他的师长罗覲光杀害，少数回到四川，被杨森改编。

四川建国联军数万之众就这样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用极其卑鄙的手段毁掉了。

熊克武被捕后，各省营救电报纷纷发向广州国民政府，甚至连多年与熊克武为敌的人，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函电国民政府不许枉杀。

在熊克武被捕的当晚，国民政府就接到唐继尧从云南发来的“不准危害熊克武生命！”的十万火急电报。

但懋辛亦亲笔致函汪精卫，对强加给熊克武的种种“罪行”，一件一件地作了澄清。信写得入情入理，哀惋动人。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和蒋介石立即在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谭延闿、朱培德、欧阳苍生等均列席参加了会议。会上，蒋介石向与会者介绍了由他编造的熊克武通敌叛国的罪状，他狠毒地说：熊是“一只猛虎，既把他扣留了，就非杀不可，如果放虎还山，在坐诸君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并自鸣得意地说：此次“一弹未发，而平此大难，乃知行事贵在速决。如能罔计利害，斩截做去，则假革命派何难消灭净尽。今而后联治等派，庶几熄迹矣乎！”他主张立即处决熊克武，免得留下后患。

但由于各省、各界人士要求释放熊克武的呼声太高，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他怕造出乱子，不好收拾局面。因此，他发言说：“熊克武所犯罪应该杀，但有杀他资格的人（指孙中山先生）已经死了。”

谭延闿、朱培德、欧阳苍生等对是否立即除掉熊克武则不置可否，持中立态度。由于意见很不统一，当天会议未得出任何结果。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由汪精卫提议：把熊克武暂时幽禁起来，俟把他的部队彻底收编后再作处理。与会者一致赞同汪的提议。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1月6日，蒋介石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为了欺骗舆论，他在报告中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他所编造的熊克武勾结陈炯明通敌叛国，图谋颠覆广州国民政府的罪状。

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熊克武成立建国联军时，曾派但懋辛、石青阳、孔庚三人到广州向孙中山先生汇报，请求正式任命。但懋辛和陈炯明在1911年的广州起义中，同是筹办人之一，但懋辛的广东话说得不好，常请陈炯明作翻译，这样但、陈两人较为接近。但懋辛到广州后孙中山派他去东江劝陈翻然来归。孙中山还对但说：“只要陈炯明能写一个悔过书，就不加追究。”但懋辛到东江向陈作了许多说服工作，陈自知理亏，推诿说：“要林虎、洪兆麟等同意后才能答复。”但懋辛于是又单独去会林虎。林向但表示，他决不乘孙中山北伐之机而打广东。但懋辛完成任务后，便到韶关向孙中山先生作了汇报。

蒋介石别有用心地把此事编造成但受熊的差遣，前往东江与陈炯明密谋勾结，共图不轨，又把陈炯明给熊克武的信作了篡改，这样炮制出了熊克武与陈炯明勾结的罪状。这真是一件莫须有的罪案。

熊克武对这一切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心中十分坦然。他被囚后，曾向汪精卫、蒋介石严正声明：“我是无罪的人，如果认为我有罪，则应公开审判，把罪行公告全国，不公开审判，就这样关起来，是完全违法的。”

熊克武的秘书陈古枝关在虎门炮台时曾写了一首《上档当歌》，对蒋介石对他们的迫害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有力的控诉。

人人说是上档当，我今说是上档当(dàng，下同)，
倘若不是上档当，这当我们不该上。
上了莫明所以然，不杀不问又不放。
说是优侍不自由，说是犯人无罪状，
要是绑票不要钱，要是歇店不开帐，
虎门又不是虎牢，打算关齐哪一晌？
朝看门外激云涛，夜听枕上袭风浪，

初嫌此身受尘污，渐觉此心同月亮，
君看古来上当人，夏台羑里何坦荡；
又看给人上当人，到头自家怎么样？
纵今不作上当人，在外多些烦恼障，
倒是这里体察深，虎口余生增识量。
劝君莫作上当看，强于闭关作和尚，
涉想百千万亿人，人间地狱竟相抗，
伏虎降魔会有时，魔高一尺道千丈。

当时在上下横档担任警戒和监视的是蒋介石派来的黄埔军校入伍生队的两个连。其中有5个人是熊克武的旧部属，一个姓吴的原系熊部的军法官，他曾几次劝熊逃跑，表示甘愿作掩护。

熊克武坦然地对他说：“我原本无罪，是非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如果一逃，就会正中蒋介石的奸计，给他们以弄假成真的机会，我不同意。”

有一次姓吴的告诉熊：“他们可能利用入伍生的天真，搞一次暴乱，乘机加害于你。”

一天早晨，炮台上的勤务兵苏树泉、卢福全来对熊克武说炮台司令请他谈话，但他俩却把熊克武引到炮台的弹库里关起来，直到傍晚才把他放出来，对他说：“外面入伍生中发生了一场骚乱。”这样，熊克武才未被捣乱分子寻获，幸免于难。

吴某后来还替熊克武带出去一封信和一本日记。日记是带给吴玉章的。

吴玉章拿出熊克武的日记遍示广州诸同志，作为熊克武无罪的证明。

熊克武刚押解到虎门炮台时，担任警戒的入伍生连学员，只知道他是地位很高的“国犯”，究竟这位“国犯”是什么人呢？便不得而知了。有人甚至好奇地在厕所的板壁上写道：“你们是些什么

人呀？为什么关在这里呢？”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人竟公然在厕所板壁上回答道：“听说其中有个熊克武，熊是个好人，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待遇？”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熊克武的名字不久便传遍了入伍生连。入伍生连的学员逐渐了解了熊克武的情况后，对熊很尊敬，有的见到他还举手敬礼！

上横墙炮台台长赖秉春对熊克武等人很尊重，熊、余、喻三人的衣服，全部是由他的姨太太洗。他经常陪熊克武谈天，夜间还常常起来探视，并多次向熊克武声明不是来监视，而是担心他的安全，怕出暗害事件。

炮台士兵苏树泉从心里敬重熊克武，平时陪熊克武散步，帮他料理生活。

熊克武在被关押期间，深感自己过去始而奔走革命，继又忙于军政工作，一直没有宁日，很少读书，现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读点书。他在这期间读了不少中外史籍，系统阅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并作了笔记。他还坚持每天阅读报纸，了解国内外形势。

喻培棣平时性情急躁，被扣后心情更加不好，常发脾气，有时还与余际唐争吵。熊克武不断劝慰和开导他，要他加强修养。冷静对付一切事变，还劝他静下来用功读点书。

熊克武的老朋友徐鹤仙、赵铁桥、阎崇阶等人都曾千方百计地设法去虎门炮台探望他。

虎门要塞，低洼潮湿，熊克武被关押在这里15个月后，得了严重的风湿症。与他关在一起的同志都劝他请求外出医治。但他考虑到与自己关在一起的部属均是因自己而受的牵连，因此不愿意离开他们独自出去，风湿症便没有能够得到及时治疗，以致后来长期手脚麻木，竟成痼疾。

国府委员张静江曾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正式提案，要求释放熊

克武。他十分激忿地说：“把熊克武等老关在虎门，是什么意思？应该释放！”蒋介石和汪精卫没有作任何解释，只是说“应从缓议”。

1926年，熊克武的好友丁谷来上海替熊克武妻陈静芬清理家中文件，发现了孙中山先生去北京前夕用英文写给熊克武的亲笔密信。

熊妻认为此信对营救丈夫出险十分有利，于是托张群等人交到南京政府去。

蒋介石见到此信，很感棘手，陷害熊克武的阴谋已全部败露，不放不行了。

1927年初，赵铁桥亲到南昌再次向蒋介石提出释放熊克武的问题，蒋介石便借此下台，对赵说：“现在好了，没有事了，请他们出来吧！”随即，蒋介石与汪精卫联衔发电给留守广东的李济深，命令将关押在虎门的熊克武、余际唐、喻培棣等7人一律无罪释放。

1927年3月19日，欧阳苍生、李济深偕同赵铁桥乘兵舰驶往虎门要塞上横挡炮台，把熊克武等七人接回广州。李济深举行盛宴欢迎。

熊克武在广州住了一天，即乘火车去香港治病。与他一同前往的除余际唐、喻培棣等6人外，还有炮台士兵卢福全和苏树泉（苏以后一直跟随在熊克武身边，作熊的警卫员，直到熊逝世）。临行时，李济深馈赠了1万块毫洋给熊克武，并托欧阳苍生司令陪同护送熊克武到香港。

火车到达香港，但懋辛已在车站迎候。这对生死与共的患难之友，经过一番风风雨雨，终于又在一起了。

熊克武等开始住在旅馆里，以后因怕蒋介石暗害，便在香港凤辉台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熊克武一直在香港治疗了半年风湿关节炎，才返回上海。

为了感谢全国各界主持正义的人士对自己的营救，熊克武于1927年7月27日在上海《国民公报》上发表启示，对营救自己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全文如下：

曩以幽居，猥承当地英贤，海内外同志关照敦切，或函电疏解，或奔走斡旋。现经赐还，念之无任心感，惟道远不及一一肃候。谨此掬诚申谢，夙荷垂爱，更祈亮察是幸。

第十一章 抗日反蒋，迎接解放

一、不忘国事

1927年7月，熊克武从香港回到上海，旅沪四川友人黄复生、赵铁桥、黄季陆等均前往码头迎接。到码头迎接的还有上海著名医生臧伯庸和他的儿子臧佩鸣。

熊克武早年留学日本时，就和臧伯庸父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二人均由熊克武介绍加入同盟会。熊克武成立蜀军时，臧伯庸任军医处处长。反袁失败后，臧氏父子又前往日本继续学医，毕业后回国，在上海开业行医。开业时，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相赠，并在旁边注明“遵伯庸医院所嘱”。

熊克武见到臧伯庸，心情分外激动，他紧紧握住臧的手说：“我在马上时，你没有得到过我的好处，而今我落难了，你不仅去广州看我，今天还来接我，真是患难见知己啊。”

臧伯庸诚挚地回答：“治病是医生的责任，何况你我都是同盟会的老同志，何必说这些呢。”

熊克武长叹一声，悲愤的说道：“你能治病，而我却不能救国……”，说着，眼泪断线珠似的直淌。

熊克武回到上海后，把家眷安置在武定场，自己却和旧部属一起，住在武定路鸿庆里。

当时熊克武的腿部风湿关节炎仍很严重，一直卧床就医，起

居行动，均很困难。

臧伯庸亲自出诊，坚持为熊克武治病。为了宽慰熊克武，他还常和熊克武一块叙旧谈心。

一次，熊克武对臧说：“我率建国军到广东后，便患了关节炎，曾电约你来穗治病，听说你晚来了一步，我已被蒋汪拘捕了。算你走运，否则，你也会和我一同到虎门泡上两年。”

臧伯庸补充说：“我一接到你的电报，对医院事务略作安排，即赶来广州，径直前往广大路联军办事处。只见办事处周围岗哨林立，一打听，才知道你已被汪蒋拘捕，并正在搜捕同党。我一听，大吃一惊，只得乘原船返回上海。以后我曾去找过张群，请他设法营救，但没有成功。”

在臧伯庸的精心治疗下，熊克武的病一天天好转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去看望臧伯庸，向他探问熊克武的病情，并说：“蒋主席将去熊寓看望。”

臧回答说：“锦公大病初愈，恐怕见到中正先生会触起旧痛，对健康不利。若一定要见，请时间尽量短些。”

一天，蒋介石来到熊寓，杨虎、臧伯庸随同前往。

蒋介石一见到熊克武，故作热情地抢步上前，握住熊克武的手说：“锦公，受苦了，真是天大的误会！都是汪兆铭要处理你的。”

熊克武一面让坐，一面苦笑着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吧！”

蒋又假惺惺的问：“病体怎样？望多休养。”并说：“你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请开会时来出席。”然后进逼一步问道：“锦公今后有何打算？”

熊谨慎地回答：“我现在无一兵一卒，不问事了！”

蒋别有用心地说：“锦公人格，素为川人敬服，可否出国就医，并考察一段时间，回国后还要请你解决西南几省的事。”

蒋介石走后，熊克武的秘书陈古枝对熊说：“看来蒋介石还要

用你，因为他要掌握西南，如你不为他所用，终必要加害于你。”

熊推心置腹地对陈说：“蒋为人阴险狠毒，他把我们这批反对派都一一搞下去了，如今大权在握，终必搞独裁，实为民主之害，从此，恐国无宁日，而外患日急，祸且继踵而至矣。我之不与合作者，实非个人恩怨也。”

不久，汪精卫也来鸿庆里看望熊克武。一见面，汪强作镇静地说：“锦公受委屈了，真是生平第一憾事！生平第一憾事！都是蒋中正要处理你。”

熊克武答：“我克武自问对得起(中山)先生，对得起朋友，伤心事就不必再提及了。”

汪精卫听了熊克武的话，很是尴尬，应付几句后，便匆匆离去。

事后，熊克武对臧伯庸说道：“蒋把害我的责任推给汪，汪又推给蒋，两人好像在唱戏一样，真会耍手腕。”

又过了不久，蒋介石派人给熊克武送来大洋5万元，熊克武从中拿出2万元送给一些部下返川，帮助一些部下去学习，所余3万元，全部退还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为了拉拢熊克武，于1927年9月请熊克武出任国民政府委员。

1924年熊克武率部出川后，四川局势每况愈下，变得更加动荡、混乱。刘湘、刘文辉、袁祖铭、杨森、赖心辉、邓锡侯、郭汝栋等大小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争城掠地，相互拼杀，兵连祸结，战乱不已，老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平息战乱，安定川局，减轻人民负担，熊克武和旅沪川人黄复生、卢师谛、曹叔实、谢持、赵铁桥、黄季陆等于1928年2月27日上书国民政府，对于解决川事，发表了如下14条意见：

(一) 废除现行之一切害民的苛捐杂税，如烟苗税捐、窝捐、懒捐(不种烟者税捐之名)、过道捐之类。

(二) 田赋不得预征。

- (三) 严禁强派勒垫。
- (四) 中央应于最短期派员点验各军枪支，确定兵额及军需数。
- (五) 严禁私造枪械，扩充兵额。
- (六) 兵工厂须中央派人管理，避免争端，消弭战祸。
- (七) 由中央派员管理成渝造币厂，统一币制。
- (八) 严禁各军私行设厂铸造杂币、伪币。
- (九) 关税、印花税、烟酒税、盐税及一切税收机关，须由中央派员接收管理。
- (十) 保障教育经费独立，严禁军人干涉教育行政。四川全省肉厘，须照原案完全划充教育经费，不得扣留。
- (十一) 不得阻碍交通，任意扣用船车，以利商旅。
- (十二) 由各军平均抽调若干部队，加入北伐。
- (十三) 严禁军人干涉司法。
- (十四) 统一省政。

熊克武等人认为，上述14条是解决川省的“不容再缓之办法”。

熊克武对于西藏问题，历来十分关心，他与杨庶堪等人在提出解决川省问题的14条意见的同时，还向国民政府尖锐地提出了西藏问题：

民国以来，藏受英煽动，狡焉思逞，而英人侵藏之野心，又较往昔为甚，乃吾国历任边事之将领，率皆抚驭失宜，甚或干与川省内争，置边事于不顾，遂致川边30余县，陷沦于夷匪。其县城未失守者，不过数县。吾人为国防计，为发展西藏计，皆不能忽视而不思所以策之。

为此，熊克武等人又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5点意

见。

熊克武一贯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为了切切实实作一些造福社会、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他于1929年在上海和但懋辛一起再次创办中国公学，主要收川籍学生。家庭贫寒，只要有人介绍，有志于学的人，均可到中国公学读书，食宿亦可得到妥善解决。

1930年3月中旬，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事集团的将领鹿钟麟、黄绍竑等50余人，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同反蒋。

4月23日，冯玉祥以副总司令名义颁布命令，向蒋介石军队开战，空前规模的蒋、冯、阎军阀大混战全面展开。

战争开始阶段，蒋军屡战屡败，几乎全线动摇。平汉线的冯军把蒋军驱至漯河以南，津浦的阎军攻占了济南，李宗仁进军湖南，占领衡阳等地。

正值蒋军节节败退之时，熊克武从上海来到武汉。

蒋介石为了拉拢熊克武，于6月25日亲笔写信给熊，谓：

困难方殷，正是需用人才之际，兄为川籍领袖有年，何不揭竿而起，召集旧部，振臂而呼，而讨叛逆，振中央之垂危，奠国都之平安。并望兄竭诚拥护中央，弟以全力负担军实，国府任兄要职，镇摄鄂西各地。

熊克武已领教够了蒋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遂以病体之身，无法承命，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

蒋介石又竭力拉拢张学良，委张为海陆空军副司令，在张学良的武力支持下，才挽回了颓势，取得了对阎、冯用兵的胜利。

中原大战后，熊克武目睹战火烽烟的祖国大地，目睹凶险狠毒的蒋介石一天比一天更加得势，心情十分沉重，对祖国前途悲

观失望。在安排完旧部属后，他很快回到上海武定场与家人团聚，稍后，迁家至金神户路花园坊。

回到上海，他闭门谢客，不再过问国事，一切应酬均委托在上海经营实业的四弟熊哲帆代办。

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更加激烈，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要尽反革命政治手腕，对其内部的反对派，或进行笼络收买，或进行分化瓦解，残酷镇压。

1931年3月1日，蒋介石拘捕了胡汉民，把他软禁在汤山。

胡汉民和熊克武是留学日本的老同盟会会员，两人私谊较厚。熊听到胡被蒋介石逮捕，忧心如焚，径直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却不予理睬。

营救胡汉民失败后，熊克武恐遭蒋介石暗算，遂以治病为由，和但懋辛、喻培棣一同又一次含恨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之邦，前往日本神户暂住。

二、坚 持 抗 战

“九·一八”事变后，熊克武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面对危难的祖国，熊克武在神户这块“乐土”中再也居住不下去了。他感到居住在一个侵略自己国家的国家里，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他与喻培棣、但懋辛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准备回国参加抗战。

熊克武的日本好友在送行时不解地问他：“你在我 们这里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去？”

熊克武愤然答道：“你们日本政府要打我们中国，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回去！”

熊克武从日本经香港回国后，虽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蒋介石并没有安排他实际工作。他只好愤懑地闲居上海。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下，在广大群众抗日热情的鼓舞下，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将军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赴上海倾听各方对抗日救国的意见。

他亲往熊克武住宅与熊商谈。

熊克武对张学良谈道：“日寇气势汹汹，亡国灭族之祸，迫在眉前，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团结起来，共御外侮。”他希望张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日。

临别时，张学良向熊克武表示：“锦公之言，良当铭记于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此时，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的关头。为了推动抗战，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熊克武扶病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力主团结抗战。

当时，冯玉祥正好也在太原，两人邂逅相逢，分外高兴。

熊、冯二人在行馆推心置腹地作了长谈，回顾了自己军戎生活的坎坷历程，谈到了当前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

当两人谈及护国战争期间，双方在四川打仗的那段历史时，冯玉祥十分感慨地说：“我在川南被你包围。要是别人，我被捉住了，多亏你放我一条路！我们中国人，从今以后大家都不要打了！”熊克武也很有同感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一定不能再互相打来打去了，要团结一致打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于1937年8月13日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守军在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鼓舞下，多次粉碎日寇的大规模进攻，给了侵略军以重大打击，一直坚持了近90天。这就是著名的“淞沪抗战”。

当时，杨森亲率川军二十军开赴上海与日军血战。

在松沪抗战期间，熊克武、但懋辛等曾代表旅沪川人前往战火纷飞的二十军前沿阵地大场、蕴藻浜、陈家行等处劳军，

松沪抗战失败后，熊克武把家属送回四川，自己却只身到南京。当陈静芬劝他一块返川时，他严肃地对妻子说道：“我是政府的官员，在此国难时期，应与政府共存亡，政府在哪里，我就应该到哪里。”

熊克武在南京期间，经常前往川军营地看望官兵，向他们讲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时英勇斗争的动人故事，激励战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勇战斗。

上海失守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

熊克武仍坚持留住南京，直到12月12日，南京雨花台失守。

蒋介石撤退时未通知熊克武。熊克武幸遇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仓促跑来相告，才和但懋辛等当夜乘船撤离南京，前往武汉。

1938年5月8日，熊克武乘“民熙”轮由汉口抵重庆，同行的有许群立、周国干、王范东、喻培棣等。

下午5时，当“民熙”轮徐徐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驶进朝天门码头时，熊克武站在船弦，仰望巍然屹立的山城，思绪万千，感慨无限。这是他六进重庆城，四上朝天门码头了！

到朝天门欢迎熊克武的各机关团体代表约百余人，个人约五六百人。吕超、朱之洪、王岳生、黄复生、胡汝航、董庆伯、温少鹤等亲到码头欢迎，场面甚为热烈。

船靠码头，熊克武满面笑容，谦恭地走出船舱和前来欢迎的老朋友、各界代表一一握手致意。一上岸，即由随员向蜂拥奔来的记者散发了书面谈话。

熊克武在书面谈话中简要地叙述了自己此次返川的心情：

克武离川，忽忽十有五年，于党国毫无裨益，于个人智力体力，尤感衰退，一入夔门，愧感交集，乃承各界父老联

翩、枉迎，深谢之余，弥感惶悚。

接着分析了坚持抗战的有利形势，鼓励大家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

惟在外闻见所及，有即欲先为一言奉告者，即抗战必胜之信念与事实，愈确实而普遍，在首都陷落，……浅识者流不免相与惊疑。……于今半载，（敌）在各方，几无尺寸进展，而损失伤亡，不可计数。……抗战愈久，则我军生力愈增，定立于绝对不败之地。至军事而外。言外交，则我多助，而敌寡助；言人心，则我直壮，而敌屈老；言地利，则我据点无穷，而敌远疲深入；言民众，则我后援无限，而敌不逾8000万怨苦之民；言财力，则我为富有经济弹性之农业国，而敌为不耐持久停滞之工业国。荦荦大端，胜利判然，凡今日南北接近战区各省民众，虽村妪台舆，亦咸抱此信念。

然后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川军出川抗战的情况，对川军在抗战中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并望川中父老给予大力支援：

即吾川参加抗战，各军不下十余万人，无论在京沪，在晋鲁，在苏皖，自军师长以至兵夫，无不英勇壮烈，杀敌致果；如罗店大场之役，娘子关之役，汾阳之役，广德之役，芜湖之役，滕县之役，其最著者，而军纪之严明，官佐之廉洁，尤出外省人士意想之外，盖皆以为川军习于内战，勇武有余，纪律或未足也。最短期内，王方舟、王治易两集团军总司令，均将继邓主任及唐、潘、孙诸集团军总司令出川，加入抗敌，所望吾乡父老人士，各尽心力，踊跃争作后援，

俾得克日出师，为川军发扬光大荣誉，即为国家争取最后之胜利。

熊克武在重庆作了短暂的停留，即驱车经内江、自贡、荣县，返回家乡井研。

途经荣县时，四川著名学者赵熙亲自率领荣县各界人士列队到城外欢迎熊克武，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在宴会上，熊克武十分感慨地说：“四川经过战乱，今天又担当起抗战的重任，主要是四川有股正气在。”

赵熙在席间祝酒时说：“川人无一日忘锦公，若大旱之望云霓。”希望熊克武再主川政。

熊克武返回井研，见到了77岁高龄的老父。久别重逢，真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为了鼓励县里的青年求学上进，熊克武捐赠了2000元作为奖学金，县里还专门成立了熊锦公奖学金委员会。

熊克武仅在井研停住了数日，便辞别了家乡的亲人，赴成都。

熊克武到成都初住北新街64号。蒋介石派宪兵来作门卫，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熊克武知道蒋介石对他回川很不放心，处处更加谨慎。

不久，熊克武迁居布后街2号。熊克武的八弟熊达成隶书写得不错，熊克武请他提个庐名，做个牌子挂在门前。熊达成想，时值抗战，理应命名为“抗庐”，以示决心。熊克武却要他改为“息庐”，并解释说：“兹当国难，那里还计较个人进退，理应团结人民，共济艰难。‘息’可以释蒋氏嫉忌之心；‘息’可以示川中袍泽以无争之意。”

熊克武布后街2号的住宅，在租给外籍人、川西邮政局长居住时，内建有游泳池和网球场。熊克武收回住房后，把游泳池和

网球场辟为菜圃，他对家人说：“国步艰难，应多劳少逸。”

熊克武仅有一个女儿，叫熊凤翔，熊对她十分疼爱。熊凤翔与熊克武的秘书李亚恒的儿子李家荪结婚后生有一子一女。子名李德林。尽管孙儿孙女年幼，熊克武仍把这对年轻夫妻送到德国留学深造，德林也一同前往。

1938年夏，熊克武电凤翔夫妇回国参加抗战。他们拟先到香港，再由香港飞抵重庆。

由于李德林的名字与李宗仁（字德邻）先生字号音同，日寇情报机构错误认为李宗仁先生与凤翔夫妇乘坐同一架飞机。

当凤翔夫妇所乘飞机行至广东上空时，即遭到15架日本歼击机截击，坠落广东中山县境。后据收尸的人报告，见熊凤翔全身到处是成蜂窝眼状的枪眼，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由于怕熊克武过于悲伤，过了很久时间，妻子陈静芬才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

陈凄然地对熊说：“我们的独生女凤翔已经死了！”说完，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

熊克武闻此噩耗，神情恍惚，呆坐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自言自语地说：“没有呀，回德国去了！”

陈梗梗噎噎地说道：“我们的翔儿确实死了！”接着伤伤心心地哭诉了凤翔惨死的详情。

熊克武听完，心如刀绞，难过已极，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他闷坐了半天，才慨叹着对妻子说：“国难中，千百万英雄儿女流血牺牲，翔儿回国抗战，求仁得仁，死又何憾！我又何悲！”

这年夏天，邓锡侯从山西前线回来，到布后街看望老上司熊克武。邓锡侯一走进堂屋，熊克武赶忙迎上前来，一边握着邓的手，一边既亲热又赞叹地说：“晋康（邓锡侯字晋康），你辛苦了！”

邓锡侯感慨地说：“锦公，不是玉阶（朱德同志字玉阶）、伯承的掩护，我早就马革裹尸了，哪还有今天再见锦公之日啊！”接着他愤愤地说：“老蒋心太狠了，把川军放在最前面，却把中央军放在后面，让日寇来消灭地方军。”

说完，邓锡侯把朱德同志写给熊克武的信交给了他，其中有“家有老母盼多关照”的话。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熊克武担任国防委员会高级军事参议员，他经常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为抗战献计献策。

1945年5月，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彻底打败希特勒德国。8月，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熊克武梦寐以求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国民政府为了表彰熊克武在抗战中的功绩，向他颁发了胜利勋章。

三、迎 接 解 放

解放战争期间，熊克武时时关注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积极联络川康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作好反正起义的准备。

为了避开蒋介石对自己的纠缠，便于联络各界人士，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熊克武与但懋辛又一次在重庆创办了造福子孙后代的中国公学。

人民解放军在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猖獗进攻，进入反攻阶段后，蒋介石为了把四川牢固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其反共复兴的基地，于1948年3月下旬把他认为靠不住的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召到南京进行处置。

邓锡侯到南京后，蒋介石即宣布撤去他的省主席职，另调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接替。

邓锡侯返回四川，立即到布后街拜访熊克武，他激愤地向熊叙述了蒋介石逼他辞职的经过。

熊克武对邓说：“蒋介石诡谲阴险，十分狠毒，我早就把他看穿了。”他劝邓另谋出路，靠拢共产党，作好起义准备。

1948年4月中旬，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的王陵基前来四川走马上任。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又任命他的心腹张群接替朱绍良，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张群是熊克武的老部下，与刘文辉交谊亦较深。张很善利用这种旧日的感情拉拢四川实力派，曾亲往成都拜会熊克武，并向王陵基、刘文辉及省参议会中的上层人物征询意见，要求川省各界对安定西南予以充分合作。

张群刚来四川，刘文辉和熊克武便进行了商议：利用与张的旧关系，对张进行拉拢，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反对盛气凌人的王陵基。

因此，张群去拜会熊克武时，熊告诫张：“你也是四川人，希望能尊重川人的利益。”

张群为了搁平各方，在就职时提出了“团结、自卫、自保”三项治川原则。

王陵基对此十分不满，曾说：“张群接替了朱绍良，四川问题就更多。我对这位‘华阳相国’一向不怎样恭维，加上他一直支持刘文辉，这使我对他的不满。”

1949年4月，张群改任西南军政长官后，熊克武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商量，利用张群与王陵基之间正在加深的矛盾，借张群这块牌展开“驱王拥张”运动，扩大张、王之间的矛盾，使四川政局动荡不安。这样，即使把王陵基赶不走，也可以打击其拥蒋反共的气焰，换取广大群众的同情，削弱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为四川的和平解放铺平道路。他们商定：一致向张群

表示，拥护他兼任四川省主席。

熊克武当面对张群说：“岳军（张群字岳军），你出任四川省主席，我愿意给你当委员。”

张群见王陵基在四川搞得天怒人怨，也有心取王而代之。这样王、张的矛盾更加尖锐。

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正在向西南挺进。

这时，熊克武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为了团结地方势力，打乱蒋介石在西南的反共部署，争取四川的和平解放，联络与他们有关系的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和省、市参议员，接过张群“团结、自卫、自保”的口号，发动民众自卫运动，并于5月14日在成都组成“川、康、渝民意代表联谊会”，推选熊克武、吕超、包华国、赖健君、胡克恭、向传义组成主席团，通过了“政治自治”、“经济自给”、“军事自卫”的三项应变方案。

张群亲赴成都出席会议，表示支持。

王陵基则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宴请张群时说：“王陵基如此猖獗，非把他搞掉不可。”当场表示要张群兼任省主席，他们愿作省府委员，助张群一臂之力。

在张群的默许下，由熊克武出面与“联谊会”各方商定推派吕超、向传义、胡克恭、杨永浚等赴广州向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请求撤换王陵基的省主席职，因李、阎不能作主，未获结果。

张群为了笼络四川地方实力派，于6月4日电邀熊克武和邓锡侯、王缵绪、向传义赴渝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

熊克武等人赴渝后，张群组织他们召开座谈会，征求对“安川自卫”的意见。

7月1日，经张群批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正式成立，熊克武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以保乡自卫名义，反对王陵基的“戡乱”、“扩军”，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反对王陵基集中地方武装，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的炮灰；提出“自治方案”，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提出“军事自卫”方案，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戡乱”；提出“经济自治”，以反对滥发纸币，增加人民负担。总之，熊克武等以种种理由，向王陵基开展合法斗争，使王不能顺利得到所谓“戡乱”而急需集中的人力物力。

该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也只说保卫川、康、渝地方的安宁秩序，只字不提“戡乱反共”。

王陵基把“自卫委员会”视为眼中钉，大肆咆哮：“自卫委员会侵犯了我省主席的职权，与中央颁布的组织法完全不合，于法无据，我根本不承认。我兼保安司令，有责任维持四川地方秩序。”并向蒋介石告密说：“自卫委员会态度暧昧，连‘剿匪’、‘戡乱’的字眼都没有，与共产党有勾结。”

王陵基还串通国民党立、监委员、国大代表曾扩情、徐中齐、冯均琏等百余人，以“民众自卫”与“戡乱国策”相抵触为名，要求国民党政府制止该会的活动。

蒋介石于是命令行政院长阎锡山严令取缔。

7月18日，行政院电四川省转熊克武，斥责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未经政府批准，即行成立，殊属非是”。8月15日，又电令熊克武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改名为“川、康、渝反共保民委员会”，熊克武等拒不接受。“自卫委员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李宗仁、阎锡山相继

从广州来到重庆。

张群为了固守，于10月19日邀请熊克武和邓锡侯、王缵绪、刘文辉、向传义来渝商讨川省自卫组织问题，李宗仁亲临会场听取意见。

第二天，李宗仁到吴晋航家访问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在谈到相互的处境时，熊、刘等均提出撤换王陵基。李苦笑说：“莫说撤换省主席，就是撤换一个专员，也要蒋总统决定啰！”

熊克武等送李宗仁走时，邓锡侯说：“代总统，中央不管，到时候我们要倒拐哟！”

李宗仁无可奈何地说：“彼此保重，多多联系。”

熊克武偕同刘文辉、邓锡侯等从重庆返回成都后，便加紧准备，迎接解放。

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綦江，与南川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迅速向重庆挺进。

28日，阎锡山、张群逃至成都。当天下午2时，即在励志社接见熊克武、向传义等，要他们协助政府，共度危艰。熊克武仅敷衍搪塞地说了几句。

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重镇重庆。

蒋介石于这天由渝飞逃至成都。到成都后，即约见熊克武和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王陵基等。

蒋在讲话中，竭力掩饰从重庆溃逃及川东惨败的真象，说什么这是有计划的战略转移，并吹嘘：“胡宗南部几个兵团还是完整的，决能战胜敌人，希望川、康的朋友与胡宗南合作。”

张群还通过邓汉群给熊克武做工作，要熊将其家眷先送到台湾。熊克武执意不从，并立即把家属疏散到成都郊区高店子。

12月7日，蒋介石邀集熊克武、向传义、刘存厚等耆宿谈话，诱迫熊克武等立即携家属飞往台湾。

散会后，熊克武没有回家，刘文辉派团长邹善成保护他前往

成都南门外石羊场潜藏。

这时，熊克武在布后街的住宅已被特务严密监视。

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皇飞逃台湾。胡宗南也逃离成都。

24日，熊克武闻讯，从乡间返回成都。

为了使成都免遭散兵游勇、袍哥土匪的洗劫，为了迎接解放，熊克武立即与国民党成都市长冷寅东等人，出面组织力量，暂时维持成都市区治安，约集各界成立了“四川省会临时治安委员会”。

25日，成都市内贴出由熊克武领衔发布的《“四川省会临时治安委员会”布告》。

30日，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和成都各界人士代表前往北门外驷马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贺龙率领威武雄壮的解放大军，高唱战歌胜利进入成都市。

同日，熊克武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二章 新的历程

1950年1月6日，贺龙司令员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委托，亲往布后街2号看望熊克武。

贺司令员一见到熊克武，便亲热地说：“锦公，你好！”

熊克武凝望着贺司令员那英俊而热情的面庞，久久握着贺司令员的手，禁不住热泪盈眶，几十年前与贺龙同志相处的历历往事一齐涌上心头，竟不知说什么好。

贺龙同志向熊克武转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以及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亲切问候。

熊克武由衷地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蒋家王朝，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自己救斯民于水火的多年宿愿得到了实现。此时此刻，他是多么地兴奋和欢悦啊！

他俩畅叙了别后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共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晤谈尽欢。

贺龙同志十分感慨地对熊说：“我们终于胜利会师了！20年前挥泪握别，现在是胜利聚首！”

熊克武兴奋而感激地回答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如此迅速地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熊克武留贺龙同志吃了顿便饭。

临别时，贺龙同志一再叮嘱熊克武，希望他今后对四川工作多提意见。

这天晚上，熊克武久久不能入睡，一直沉浸在欢悦和幸福之中。

第二天，熊克武满怀激情给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同志写了一封长信。

人民解放军，转战数万里，会于吾蜀，竟其全功，尤幸地方未遭糜烂，战事短期结束，万众欢腾，出水火而登衽席。吾兄以宏毅之才，任重道远，备尝艰难，为国建此殊勋，乡党交游，与有光宠。敢以父老昆季之意，向解放军全体将士，谨致慰劳。昔从孙先生效力革命，二十余年，尚未成功，忧患余生，未得继续努力，抚躬循省，耿耿至今。今幸毛主席领导宏业，发扬光大，丰功伟业，震耀寰区。……

日昨云卿（贺龙字云卿）兄宣达毛主席暨玉阶、恩来、必武、伯渠、玉章诸君慰问之意，弥觉惭奋交加。……尚祈吾兄代为答谢，申此悃愞。旌麾何日西上，家有陈酿，渴望故人共进一杯，握手畅谈，倾泻肝膈也。

信中表达了他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爱戴，对解放军将士的由衷敬佩和热爱，对刘伯承同志的深情厚谊。

1950年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列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会议期间，他见到了自己十分景仰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到了与自己多年相交的老朋友吴玉章、张澜、李济深、唐生智等，见到了自己倾慕的沈钧儒、何香凝、蔡廷锴、郭沫若等各界朋友。

郭沫若特意走到熊克武跟前，同他握手致意，十分赞佩地说道：“能在北京见到你有说不完的感慨，你在四川闹革命时，我们还是娃娃呢。”

在会上，他认真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和闭幕词；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提请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郭沫若、聂荣臻、沈钧儒分别作的关于土改、政治、经济、财政、税收、文化教育、军事、法院工作的报告。

在历时十天的会议中，他每天都是那么欢快，那么兴奋，每天的感受都是那么丰富，那么新鲜。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话中，他懂得了许多新的道理，看到了新中国的灿烂前景和自己的光明前途。

从朋友们的发言中，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受到许多启迪。

从这短短的十来天会议中，从会议讨论的一系列国家大事中，他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年轻的国家机器已经开始了有节奏的正常运转。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所讲的：“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会议结束时，熊克武首先想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由共产党来实现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过好土改关和社会主义改造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刚结束，他正准备返回四川，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6月28日正式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熊克武返回成都作了简单安排后，于7月初赴重庆任职。

熊克武在离开成都时，嘱咐八弟熊达成将全部房产重新整修后，连同家具和花木一起，上交军管会。

军代表在接收熊克武的房产时，拟保留北新街住房。熊达成挂长途电话将此事转告熊克武，熊克武立即回答说：“在新社会里，我们不应留下私有的尾巴！”

同时，熊克武还将他在井研的万余册藏书全部函赠井研县文教部门。

西南军政委员会由7人组成，主席是刘伯承，副主席是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

熊克武目睹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王维舟同志待人是那么平易、谦和，生活是那么艰苦朴素，工作是那么兢兢业业，对党和人民是那么忠心耿耿，还常常主动征求他对西南工作的意见，鼓励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他深深地感到，共产党的干部真是与自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啊！

熊克武在共产党领导干部模范作用的熏陶感染和循循善诱的帮助下，不断解剖自己，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思想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他曾针对自己的弱点，工整地写了以下文字来勉励自己：

经常考虑别人意见，修正补充自己意见，去掉固执与偏见。

1951年5月，熊克武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他为整理、建设和发展川康两省的民革工作，不懈地努力。

熊克武一贯重视和关心西藏问题，几十年来，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他花了许多精力和心血，然而收效甚微。

解放才仅仅一年多，由于党的英明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的努力，西藏地方政府很快摆脱了英帝的控制，接受了中央和平解放

西藏的条件，并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5月23日在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高原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喜讯传来，熊克武是多么欣喜啊，他几十年的夙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当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路经重庆返回西藏时，熊克武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代表团进行了热情的接待。他对阿沛·阿旺晋美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精神，十分钦佩，勉励阿沛·阿旺晋美继续进步。接待工作做得很好，使阿沛·阿旺晋美深受感动，他向熊克武表示，返回西藏后，决不辜负祖国人民对自己的期望，一定致力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10月，熊克武任全国政协委员，于23日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他深知自己是受全国人民的重托，在这里开会审理国家大事，决定重大政策。一种强烈的当家作主的责任感驱使他认真学习会议所发的每一个文件，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1952年7月1日，熊克武应当时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之请，为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1周年纪念日胜利全线通车撰写广播稿，欢呼这一辉煌成就。他说：

清政府只在宜昌修了一座车站，后来索性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人民的股款亦被吞没了。人民掀起争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国民党政府把这条铁路遗忘了……可是人民还是需要铁路，尤其是成渝铁路。这条铁路连结两个经济重心的大都市，是西南铁路干线的中心环节。……反动政权经过半世纪没有铺成一尺一寸轨道，而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仅仅两年便完成了西南空前的巨大工程——成渝铁路。西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所热烈期望的成渝铁路，现

在胜利地完成了。

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也正好这一年在重庆胜利召开。运动会气氛热烈，规模空前。熊克武目睹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体育健儿，心情很激动，挥毫为运动会题词：

我们新中国的人民，要在体育活动中，培养健康的，精敏强干和刻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为祖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国防建设服务。

1953年，他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54年9月，他被光荣地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代会上，他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人代会结束后，他从重庆迁居北京。

以后，他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6年和1959年，他在民革中央委员会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解放后，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1959年，他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了，仍兴致勃勃地代表人大常委会到河南、西安、四川、武汉等地视察工作，行程近万里。

1961年10月10日，熊克武怀着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他受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的委托，代表民革中央在大会上代读了何老的长篇报告，会后还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各界代表合影留念。

这年，正是国家经济极端困难时期，人民忍受着饥饿的威胁，

为国民经济的恢复而顽强地工作、生产。熊克武随全国人大代表团来四川视察。他深深感到，家乡的人民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党啊，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建设毫不动摇。

一天下午，代表团休息，八弟熊达成和侄女们特赶到宾馆看望他。兄弟相会总有说不完的家常话，一打开话匣子不觉到了开晚饭的时候，女招待员笑容满面地进来说：“熊老，请和客人一起用饭吧，都摆好了！”熊克武想到一餐饭也解决不了亲属的暂时困难，广大群众都在这暂时困难面前经受着考验，我身为国家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他于是站起来对熊达成和侄女说：“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这不比在家里！”他回身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把几个橘子和一些糖拿出来，塞在侄女手里说：“你带去吃吧！”他把熊达成和侄女送至门口，才转身走进饭厅。

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当时熊先生正患病，未能去机场迎接。李宗仁闻讯后，即偕同程思远先生亲赴熊家看望熊克武先生，并馈赠从美国带回的哮喘药片。

他很有感触地对李宗仁先生说：“16年前，我们分手在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之时，16年后，我们又相聚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了，这真是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啊。今天的祖国欣欣向荣，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我衷心佩服！”

1966年11月，熊克武已81岁高龄，又值动乱时期，但他仍乐意地承担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工作，为会议的召开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会议在排除了许多干扰后，终于在11月12日按时召开了。这天，他精神矍铄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和上万群众一起参加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陷害贺龙同志，曾派人去熊克武家，逼熊揭发贺龙同志。这伙人一进屋便气势汹汹地向熊克武提出：“贺龙在你手下当团长、旅长、师长，他是土匪、是

军阀，你要揭发他的罪行！”

熊克武冷冷地半闭着眼睛说：“我只记得贺龙的旅长、师长是孙中山先生委的。”

这伙人对熊克武的回答很不满，便软硬兼施，要熊克武诬陷贺龙同志。

熊克武早看透了这些人的嘴脸，他慢腾腾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已80多岁了，又患病，早已昏聩了，过去的事情全忘了，已说不清楚！”

来人对熊克武无可奈何，只得怏怏离去。

不久，有关部门通知熊克武，要他的儿子熊仲华下乡，去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

熊克武把熊仲华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到乡下去锻炼。在旧社会，我十几岁就提着脑袋到处闯荡了。今天新社会，各方面条件这么好，有什么顾虑呢？去了解了解中国的农村，与广大农民同甘共苦，这对你们的成长大有好处。”

熊仲华很听父亲的话，自觉地到内蒙古乡下去参加劳动锻炼。

1968年，熊克武自觉精神不济了。国庆节前夕，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再出去参加庆祝活动。

熊克武固执地回答说：只要能走路我就要去，我多想见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自己的老朋友啊！

国庆节，熊克武不顾体弱多病，仍拄着拐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同他亲切握手致意，向他问好，还风趣地说：“熊先生，你好！你这个铁脚板也拄手拐了，要多多保重啊！”

1969年4月2日，和熊克武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伴陈静芬在医院病逝。熊克武悲痛不已，拄着手杖赶到医院。他见老

伴的遗体正被手推车推出病房，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抓住手推车跪下。熊克武的亲属、侄子们，慌忙将他扶起，劝慰说：“您老人家年事已高，又有病，要节哀！”熊克武流着泪说：“自我们十几岁结婚以来，她的一生为我担惊受怕，吃尽苦头，我真应该给她叩几个头！”

陈静芬去世后，熊克武时时都在怀念着她。早晨他要对身边的侄女说：“天一亮，你伯妈已起来浇花打扫卫生了！”中午他又说：“这个时候你伯妈又要催我吃饭了！”

他念念不忘老妻，感情是那么深沉、挚着。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后，有关方面动员熊克武说：“为了战备，您最好迁出北京。”熊克武回答：“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政府不迁走，我这个工作人员迁走了，像什么样子？要迁，政府何时迁，我就随政府迁！”来动员的人对这个“顽固”的老头毫无办法。

不久，熊克武病重住院。一天，家里人来告诉他：“为了战备，要派人来给家里挖防空洞！”熊克武听后，很不高兴的对家里人说：“不挖，不准挖！把国家的房子挖烂了我心疼。我是军人，不愿死在防空洞里！”

熊克武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切怀念在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于右任、张群、黄季陆、萧毅肃等，曾多次通过广播和新闻报道，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呼吁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国家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熊克武很重视文史资料的编写工作。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一直牢记周总理1959年4月29日在全国政协第三届全体会议结束时，招待60岁以上政协委员茶话会上的讲话：“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

熊克武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推翻清王朝的壮烈战斗；曾

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组建四川的第一支革命军队——蜀军；曾领导过四川反对袁世凯的“癸丑之役”、“护国之役”；曾领导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之役”；也曾参加过军阀混战；还曾被蒋介石囚禁虎门；以后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他是辛亥革命的幸存者，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空前激烈、空前曲折复杂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见证人。编写文史资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用毛笔一丝不苟地抄录了数10万字的资料，写了以下回忆录：《辛亥革命宜宾起义的经过》、《广州起义亲历记》、《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订正余切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等等。

直到1970年，他重病住在医院，仍念念不忘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

5月，八弟熊达成前往北京医院看望他时，他还向他口述了《辛亥革命前四川历次起亾亲历记》、《虎门蒙难记》、《10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等文。

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来说，在10来年的时间里，搜集数10万字的资料，写出几万字的回忆录是算不了什么的，但对于一个年过七旬，握笔都很困难的老人，能写出这样数量的文字，是需要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啊！

1970年9月2日，是熊克武弥留人间的最后时日。他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后事，家属的生计，而是台湾人民的前途和归宿；他留下的不是万贯家财，而是一颗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他没有叫家属记下自己的丰功伟绩，而是继续地无情解剖自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请读读他在弥留之际留下的发自心声、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遗嘱吧！

敬爱的毛主席：

为了推翻满清，拯救中华民族，我追随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念念于心，然少有成效。亲见蒋匪叛变革命，引狼入室，致遍野哀鸿，苍生涂炭。自觉对不起中山先生，但惟痛心疾首而已。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中山先生的理想实现了。我亲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中华民族欣欣向荣，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我无限欣慰，无限感慨。

前年十·一，毛主席和我亲切握手，是对辛亥老人的最大关怀，令人幸福成泣，热血飞腾。我只有更加热爱毛主席和共产党，坚决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

我年垂85岁，据我解放前40年和解放后20年切身经历，体会到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只有走毛主席和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

熊克武遗言(盖章)

留下遗嘱，熊克武安祥地合上了眼睛，平静地离开了人世，长眠于生育他的土地之上。

9月4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了向熊克武先生骨灰告别仪式。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参加了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人大常委会委员卢汉、陈其尤、季方、谢扶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民革中央常委刘文辉等，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熊克武先生生前友好和亲属。

对熊克武先生的一生，周总理曾用这样精练而准确的话进行过概括和评价：识大体，顾大局。

附录

在熊克武先生诞辰100周年 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仲勋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隆重纪念熊克武先生诞辰100周年。我和在座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谨向熊老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他的亲属表示亲切的问候。

熊克武先生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忠诚战友，著名的民主革命战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他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早在本世纪初，熊克武先生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帝制、缔造共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辛亥革命前，他在四川泸州、成都等地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4月，他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亲自率领敢死队，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同清军浴血奋战，战友方声洞、喻培伦、林时爽、秦炳等壮烈牺牲，他只身一人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幸免于难。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了，但是震动了全国，宣告了清王朝的末日来临，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熊克武先生在这次起义中所表现的英勇善战、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扬。

辛亥革命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了国家权力，

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全国人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革命，孙中山先生继续进行斗争。熊克武先生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在四川组织讨袁军，联络各方，共同讨伐袁世凯，为护国运动的胜利建立了重要的功勋。此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护法斗争，并任四川督军，对稳定四川局势，使人民一度得以休养生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熊克武先生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支持改组国民党。在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先生提名，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熊克武先生不满国民党当局反共独裁政策，辞官退隐，在成都居住多年。抗日战争开始，他为了共赴国难，应邀出山，积极动员和团结四川各方面的力量支持抗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从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方面。成都解放前夕，他毅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诱迫，留在当地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建国初期，熊克武先生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同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密切合作，对安定西南社会秩序，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以后，他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对大政方针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他在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期间，为民革工作的开展，组织的巩固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多次敦劝在台湾的老朋友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早日结束海峡两岸分离的不幸局面。熊克武先生在新中国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他在临终前上书毛泽东同志，坚信“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救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并以自己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无限欣慰。

周恩来同志曾经称道熊克武先生“识大体，顾大局”，这是非常确切的评价。回顾熊克武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在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中，他能够一本初圆，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保持了一位卓越的爱国主义者的政治气节，从而得到了光荣的归宿，这是难能可贵的。熊克武先生持身严谨，生活俭朴，待人接物谦逊和蔼，有长者之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纪念熊克武先生，就是要不忘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爱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牺牲所取得的光辉业绩，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坚持改革，不断创新，团结奋斗，再展宏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

后记

《熊克武传》酝酿于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完稿于1985年熊克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之时。

回首《熊传》写作的艰难历程，支持《熊传》写作的许许多多同志的音容笑貌，感人事迹，至今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熊克武先生的亲属廖望月、朱松涛、熊仲华、李德馨、熊达成、熊凤雏为我们送来熊先生的照片、手稿，及有关档案、电报，向我们提供亲见亲闻的史料及线索，并不断给我们发来一封封热情鼓励的信函。

熊先生生前的故友旧属及其子女苏树泉、刘世杰、尹君尧、邱翥双、向北高、余止沅、萧丽生、况鸿翔等同志，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亲见亲闻的史料及其线索。

我们曾先后两次到熊先生家乡井研搜集资料，进行采访，县政协和县志办不仅热情接待我们，为我们提供史料和采访人头，还派了王宗鼎同志陪同我们前往熊先生诞生之地研经镇协助我们进行采访。

另外，苏汝祥同志自始至终关心此书的写作，并给予了大力协助。

特别使我们不能忘怀的是前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老先生，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仍顽强地支撑着为这本传记题写了书名。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在此书出版之际，特向支持《熊传》写作的上述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对王昆仑老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周富道

1985年12月于渝

附 记

《熊克武传》初稿完成后，《人间》杂志于1985年第9期以《战将熊克武》为题，刊登了《熊传》的部分章节。熊先生的许多故旧亲朋阅后，纷纷来函补充材料，提供线索，十分关心此书的出版。重庆出版社政经编辑室张凌同志对此书的写作提了许多宝贵意见，然后由周富道执笔，对全书进行了两次全面修改，于1987年12月最后定稿。

周 富 道

1988年7月于渝